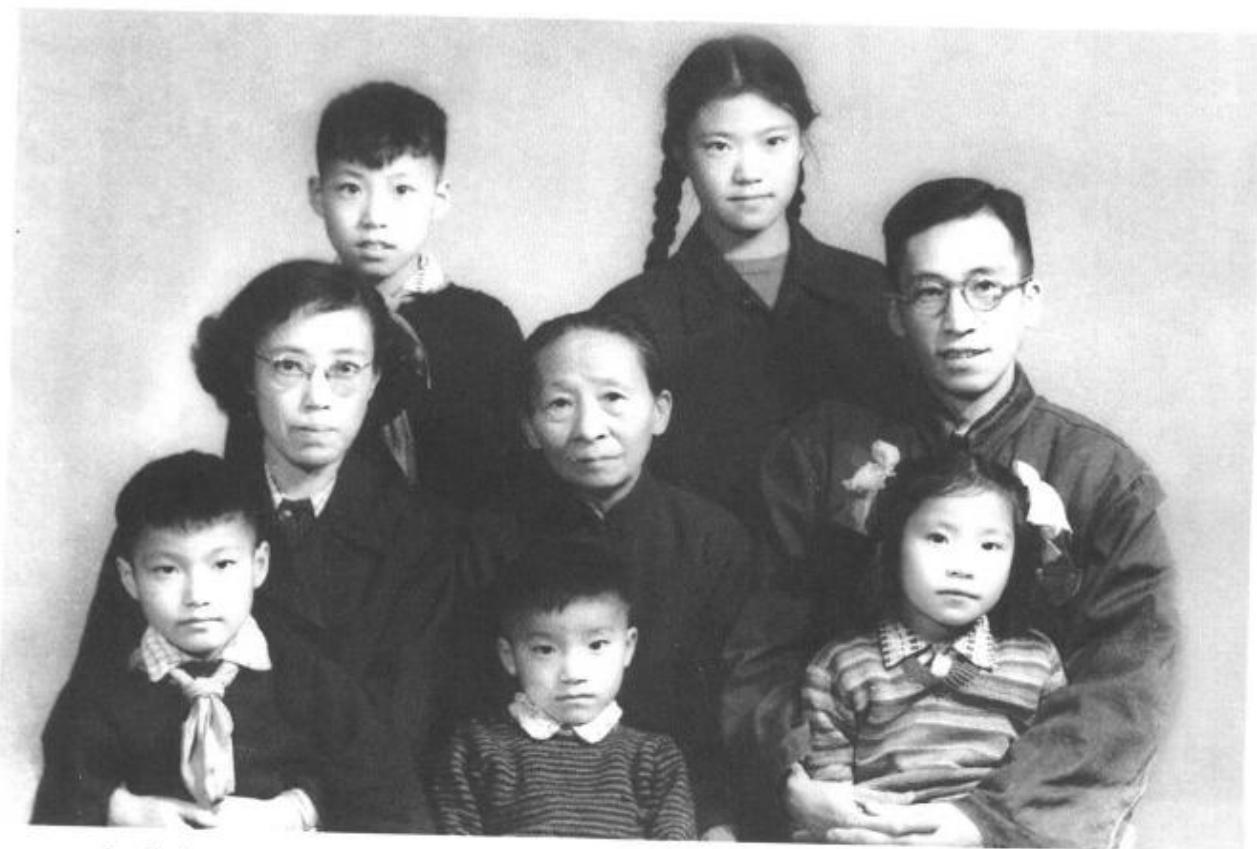




顾准，中国当代思想家、经济学家，1915年7月1日生于上海，1974年12月3日卒于北京。



匡庐留影。顾准1953年7月在庐山疗养时留影，左2为顾准。



全家福。顾准和母亲、妻子、儿女在一起，摄于50年代。



最后的书斋。顾准1974年摄于北京建国门内大街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他的住房前。

《希腊城邦制度》和《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就是在这里撰写的。



长城之巅。顾准1965年在八达岭长城上。



登长城。顾准1965年摄于青龙桥至八达岭的崎岖山路上。

手足情。顾准（右）与其弟陈敏之1974年同游北京日坛公园时留影。



兄弟相聚。顾准（右）与陈敏之1974年
摄于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

序一

中国需要这样的思想家

□吴敬琏

顾准是我的老师和挚友。重读他的遗文，真是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不但在河南息县明港劳改队中和他同窗共读的情景历历如在目前，而且觉得他好像仍然活着，正在和我们一起探讨中国当前面临的种种问题，或慷慨激昂或娓娓道来地发表议论。

我曾经有两次和顾准密切相处的机会。第一次是 1956 年。那时我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财政组从事企业财务的研究，当时顾准是我的领导。第二次是从 1963 年他重回经济所到 1974 年 12 月他因病辞世。特别是 1968 年到 1972 年期间，我们两人在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五七干校”同为已被定罪的“反革命分子”，在“隔离室”里朝夕相处。我们利用不准参加“革命群众活动”的机会和顾准通过巧妙斗争取得的阅读中外书籍的权利，怀着“为

什么我们追求革命理想，千百万人为之奋斗牺牲，得到的却是林彪、‘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这样一个当时使我们深感困惑的问题，认真研究各国经济、文化、政治发展的历史，探索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在这段朝夕相处的日子里，顾准对我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导致了人生道路的重大转折。因此，我是从他受益极多的。现在我主要不是表达个人对他的怀念和感激，而是讨论作为现代中国的一位重要思想家，他的思想和事业对我们的改革和改革的参加者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顾准是一个才华横溢、具有鲜明个性的奇人。和他有过接触或读过他文章的人，对于他作为学者的渊博学识和犀利言辞都会有极为深刻的印象。然而这些都还只能说是顾准的外部特征。如果说作为一个思想家的顾准的内在特征，我想是在于他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言人所未言。这些问题，例如中国为什么没有如同希腊罗马那样，发展起作为欧洲文明滥觞的城邦和共和制度，而是形成了几乎牢不可破的东方专制主义传统；中国的“史官文化”传统是怎样形成的，什么是“史官文化”的本质以及应当怎样对待“史官文化”；在革命胜利以前生气蓬勃的革命理想主义为什么会演化为庸俗的教条主义；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娜拉出走以后”要采取什么样的政治经济体制才能避免失误和取得真正的进步；社会主义是不是注定了只能实行计划经济，而不能让市场价格自发波动来调节生产等等，都是长期聚讼纷纭，人们莫知所从的。顾准都一一作出了自己的解答。他的见解往往惊世骇俗，却又有理有据，使人不能不信服。正如王元化为顾准的《理想主义与经验主义》一书所作的《序言》所说：“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它们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这种充盈于他的著作中的真知灼见，无疑来

自他不畏艰险、放言无惮的科学批判精神和艰苦卓绝、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问题在于，是什么力量支持顾准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勇往直前，坚持对历史轨迹和人类未来进行无畏的探索。在林彪、“四人帮”法西斯专政的淫威下，一般老百姓议论尚且有身陷囹圄甚至惨遭杀身之祸的危险，顾准是一个戴过两次右派帽子的“反革命分子”，由他来探讨“娜拉出走以后怎么样”，即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的政治经济发展问题，是冒着多么大的风险，需要什么样的勇气啊！而且当时顾准的生活环境是十分艰难的，缺乏研究和写作的起码条件。早在1969年在河南息县的时候，他已经痰中带血，除了参加劳动外，还得应付没完没了的“交待”和“批斗”，有了一点时间，他就抓紧读书，认真思考问题。1972年回到北京后，病况加剧，可是他却索性以北京图书馆为家，争分夺秒地查找资料，做卡片，写笔记，成就了《希腊城邦制度》等数十万言的论著。显然，只有对人民怀着炽烈的爱心的人，才能像顾准那样，如同一支行将燃尽的蜡烛，以自身的毁灭为代价，力求给世界以更多的一点光和热。

只从表面上观察顾准，会觉得顾准是一个极端冷静的人，因而能够完全客观地对待一切人和事，或者如他自己所说的，冷峻得像一把“冷冰冰的解剖刀”。也有人说，顾准的特点是“恃才傲物，目空一切”。的确，顾准只服从真理，不管在感情上多么难舍难分，只要不符合“真”、“善”的标准，他都义无反顾地加以舍弃；不管是有多大权势的显贵，只要是有悖于真理，他都理直气壮地加以反对。例如，由于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参加了革命工作，曾经为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出生入死，因而对于革命怀有深厚的情感，始终认为革命“可以完成历史的奇迹”；当他发现自己曾经拳拳服膺的某些信念包含着谬误的时候，往往陷入极度的痛苦。但是当他发现革命理论的失误和革

命队伍中的种种丑恶现象，总是毫不容情加以揭露和批判。他是一位伟大的民族主义者，念念不忘中华民族的振兴，热烈期待着“我们自己的‘神武景气’的到来”。然而他对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阴暗方面，如唯政治权威之命是从的“史官文化”，鼓吹愚民政策和无为政治的“黄老风格”，他都义愤填膺地加以声讨批判。他是一位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但是，对于被看作民主制度的极致的直接民主制，他却斩钉截铁断言它只适用于小国寡民的城邦，对于大国是不可行的，而且不可避免地在亚历山大征服后的希腊化世界中与东方专制主义相结合，或者在雅各宾专政后继之以拿破仑独裁。

然而只在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这个冷峻孤傲外观下面，有着一颗充满爱心和柔情的内心世界。

人们也许认为，顾准之所以能够这样无所顾忌地探求真理，是因为他在经历了种种人世沧桑之后，已经变得超然物外，对于人世间的喜怒哀乐都无动于心。我想，这个判断也是不符合实际的。顾准从来认为，“力求在一个没有希望的世界上寻求自己灵魂的安宁”，“不是禄蠹，就去出家”，“愤世嫉俗，只好自称老衲”，都不足为训。顾准精神是入世的。正像他自己所说，他的宗旨在于“为人类服务”。为了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未来，他立志做一个“用鲜血做墨水的笔杆子”。顾准的确实现了这一诺言，用自己的鲜血写下了掷地有声的篇章，至死方休。

我从同顾准的交往中亲身感受到，他的严肃冷静的科学精神、刚正不阿的处世态度、艰苦勤奋的工作作风，无一不是由对人民的热爱所孕育和支撑的。于是构成了他的貌似截然相反，实际上同出一源的性格特征：

一方面，顾准是一位顶天立地、威武不能屈的硬汉子。例如，在河南明港时，不断有外调人员武斗逼供，要顾准作伪证

诬陷一位与他有过个人嫌隙的老同志，虽然饱受皮肉之苦，他仍然严辞拒绝这种无理要求。事后顾准对我讲述他的遭遇时，谈笑自若，丝毫不以为意。我也还清楚地记得在一次无端指摘他“偷奸耍猾”的“地头批判会”上，他冒着雨点般袭来的拳头高昂头颅喊着“我就是不服”时的神态。但在另一方面，他对于在“文化大革命”的狂热气氛裹挟下揭发过他的“罪行”的老同事和被迫同他“划清界线”的亲友子女，却总是怀着体谅的态度，或者从社会原因来为他们辩解。例如在 1972 年回到北京以后，由于他的妹妹和妹婿（当时任公安部代部长）的阻止，顾准不能和近九十高龄的妈妈相见。当时大家对他的妹妹和妹婿这种不近情理的做法十分不满。顾准却说，他完全可以理解妹妹一家，因为他们只是一部巨大镇压机器的一个零件，身不由己，何况他们（妹妹和妹婿）全家“也是坐在火山上的呀”！有一位他的老朋友在“清理阶级队伍”时曾经用荒诞牵强的推理“揭发”顾准在 30 年代就是执行“右倾投降路线”的“内奸”，很久以后随着周扬的解脱，他的“内奸”问题才告解决。1972 年回到北京以后，顾准对于他们这位老朋友却多方照顾。考虑到这位老朋友的凄苦处境，逢年过节总是备下酒菜，约他共餐对酌，我当时很不以为然。顾准却说：你真是不懂得世事。他的这种古怪的个性和奇特的思想方法，完全是由党内不正常的政治生活和逼供信的“审干”做法造成的。这套制度毁掉了他的一生。这种悲惨的人生遭遇，造成了他的古怪脾性，我们应当同情才对，怎么可以苛责呢。

顾准对于荀况、韩非为专制统治者钳制舆论献策的言论，虽然事隔几千年，仍然严词指斥，愤恨之情溢于言表。面对某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左”派理论家，他义正严辞地宣言：“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过来的。然而，当今天人们以革命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

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另一方面，他对于人民的苦难，满怀同情，感同身受，甚至在看雨果的《悲惨世界》、狄更斯的《双城记》的时候，也伤心落泪，边读边哭。在看到别人被强加上莫须有的政治罪名，他会不顾自己的“反革命”身份站出来打抱不平。在议论给老干部落实政策时，他想到的是“中国农村冬天没有鞋穿的孩子们”。他在受到政治上的迫害时，首先想到的不是怎样维护自己，而是使他的子女少受一点牵连。“文化大革命”开始，他的子女受到“左”的思想的毒害和为形势所迫，同他断绝往来，“划清界线”。顾准对此深感痛心。然而他还是处处为他们着想，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最珍惜、准备以生命来捍卫的东西。在他的病已经宣告不治的时候，经济研究所“连队”的领导考虑给他“摘去右派帽子”，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要顾准在一份文字报告中作出“承认错误”的表示。这是顾准所万万不能接受的。但他最后还是签了字。签字时顾准哭了。他对我说，在认错书上签字，对他来说是一个奇耻大辱，但他要这样做，因为这也许能够多少改善一点子女们的处境。事事首先为别人着想，已经成为顾准的天性。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打开行军床休息”。那是顾准临终的一天。由于癌肿对气管的压迫，他早已说不出话，当时他的病情更是已经进入了危急状态，一呼一吸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到了晚上约十一点钟的时候，他看到我还在床边，便挣扎着用手势，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要我休息。只过了大约一个钟头，他就停止了呼吸！

我想，一个人只有有这样伟大的人格，只有有这样的对民族、对人民高度的责任感和为人类争取更美好的未来的使命感，才有可能在那十分险恶的政治环境和极其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孜孜不倦，勇敢地进行只有后代学人才能认识其价值，甚

至完全有可能永远湮没无闻的历史探索。他的学术成就，也正是这种精神的产物。例如，他写作《希腊城邦制度》，就完全不是“发思古之幽情”的结果，而是为了回答“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早在干校的时候，为探索为什么播下了革命的理想主义的种子却得到了林彪、“四人帮”法西斯专政的结果问题，追溯文化史和法权史的根源，遇到了东西民族的历史殊途是怎样开端、怎样形成的问题。为了解答这个问题，顾准真是做到了王国维所说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那时，顾准曾反复和我讨论希腊城邦制度的起源问题。他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假说，又一个一个地推翻，最后才形成了一套可以自圆其说的解释。为此，顾准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在有限的书籍中摘取有用的材料，细心地把它们连缀在一起，形成一个体系。回到北京后，他拖着低烧咯血的病躯，废寝忘食，每天只带几个冷馒头上北京图书馆，查阅了大量书籍，闭馆以后回到学部大院的集体宿舍再夜以继日地写作，终于写出了这部连西欧史专家也对它的科学价值赞叹不已的巨著。

时代发展到今天，顾准所深恶痛绝的东方专制主义和它的经济基础正在走向土崩瓦解，涤荡历史上积淀起来的污泥积水、实现民族腾飞的条件已经具备，十五年来的改革确实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然而“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旧体制和旧文化像一条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它们的代表者仍然步步为营，负隅顽抗。其中有些人借用“弘扬民族文化”的招牌为专制主义招魂。在转轨过程中，也有人打着“改革”的旗号干着掠夺大众的勾当。在这种时刻，我想我们知识界尤其需要发扬顾准那样立志为世界人民服务而不屈从于任何政治权威的精神，为大众的利益、为推进改革而奔走呼号。

现在似乎有一种误解，以为既然旧体制下当权者往往用所谓的“整体利益”压制平民百姓的发展个性和增进物质福利的

要求，我们今天就应当反其道而行之，一切以一己私利为依归，把利己主义的世界观作为改革的精神武器，把承认人的价值化为对金钱价值的顶礼膜拜。在某些错误观念的误导下，鄙薄崇高，崇尚卑鄙成为时尚。以损人利己为荣，以不择手段地敛财致富为务，对社会主义和公共道德弃若敝屣，把靠掠夺公共财富起家的暴发户看作改革者典范，把厚颜无耻地倡言市侩哲学与思想解放等量齐观，把正当的经商牟利同弄权“寻租”混为一谈。“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成了人生第一要义，利己主义被说成是时代的思想旗帜。的确，顾准也说过，有一种个人主义曾经是历史上积极进步的因素。不过，顾准所认同的，并不是任何一种个人主义，而是“像布鲁诺那样宁肯烧死在火刑柱上不愿放弃太阳中心说；像宗教战争或异教迫害中的殉道；像生命可以不要，航海却不可不去的冒险精神；像近代资本主义先锋的清教徒那样，把赚钱、节约、积累看做在行上帝的道；最后，像马克思认为是共产党的基本标帜每个人都能够‘自我实现’的那种个人主义。”顾准曾经自陈，他“是一个‘倾心’西方文明的人”，尤其倾心这种文明的先驱——希腊城邦文明。然而他却为希腊世界由于个人利己思想恶性膨胀而造成的种种败德行为而黯然神伤。他说，我写《希腊城邦制度》“本来是有感于希腊在那种小邦林立，相互竞争中，个人创造性发挥到顶点，创造出灿烂的希腊文明，……所以要写，是想歌颂它。可是写着写着，对于林立的小邦相互之间的自相残杀，甚至不惜勾引希腊文明历来的大敌波斯……对这种不顾大体实在受不了，不知道该歌颂不，有点迷惘了。”并使《希腊城邦制度》的写作一度“卡壳”。可见顾准对个人主义决不是全称肯定，而是有批判、有选择的。人民大众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处境的要求显然无可指责。但是，争取更多的物质消费并不是人性的全部。特别是作为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应当有更

高的追求。鲁迅曾经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应当说，顾准就是这样—个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

顾准是一座巍然屹立、高耸入云的山峰。不管是在天赋的聪明才智方面，还是在道德文章方面，我们都不一定都能接近于他所达到的境界。然而“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们应当积极努力在“为世界人民服务”的宏伟事业中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这也就是对顾准的最好纪念。

序二

智慧与良心的实录

□ 李慎之

这不是一本“好看”的书，因为它本来不是让别人看的。在当时的条件下，如果真的被人看到，那对作者来说，只能是“罪上加罪”。但是，它却是一个时代的实录，一个受难的灵魂的实录。

当然，在那高唱“六亿神州尽舜尧”的日子里，决不会只有一个顾准，然而却只有他留下了这样一份断断续续的日记，而且正如有人说，“只因为他的思想变成了铅字”，他给整个一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挽回了荣誉。

本来没有什么人的日记能有什么主题，但是时代却逼迫顾准的日记有十分突出的主题。

首先是要解决填饱肚子的问题。请看：

刨红薯，民工过路，敲薯不已，都到地头捡残屑，驱之不去。——一个新发

明，红薯藤磨粉。(1959年11月13日)

在冀鲁豫时不能下咽的，这回全部吃完。尤其晚饭三百斤菜，七十五斤米的菜饭，加一盆红薯叶，居然吃完。饥饿是可怕的。(1959年11月21日)

为食物的欲念所苦。想如何找杨陆何三人中的好对象得以早上喝一次菜汤。想如何搞一点红薯与胡萝卜吃。(1959年12月15日)

劳动队的肿病一下子在一个月内从四十四人增加到七十多人。(1959年12月17日)

(跟公社比起来)劳动队还是天堂。(1959年12月27日)

(蔡璋)说，南山粮多，现在农村流窜犯比城市流窜犯多。人们都往南山跑。青年妇女，分不清是姑娘还是媳妇，只要有吃的，自愿留在那里给人当媳妇。饥饿是可怕的，饥饿推动人们做出看来做不到的事情来。(1960年1月15日)

死人已知柳之弟、杨之女、刘之父。(1959年11月27日)

附近路倒尸二起。黄渤海家中……十五人中死了五个。(1959年12月17日)

够了。“饥饿——浮肿——死亡”这是一条规律，今天四、五十岁上下的人应该都还能记得的。

正因为这样，顾准花了不少笔墨来记自己如何想办法搞东西吃。一条胡萝卜，成了“宝中之宝”(读者要知道，这是斯大林对粮食的称呼)。有几次他吃饱了，就高兴得大写“痛快之至”。其实那个时候，不少人都已到了生物本能的极限，按照生物本能活着。然而顾准却还没有停止思考。

日记的又一个主题是改造。本来右派分子下放到农村，唯一的目标就是“改造资产阶级思想”，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顾准的日记中经常可以看到“写笔记”的字样，就是写所谓思想改造笔记。但是那是写了给人看的，被顾准称为“苦刑”。真正的思想改造笔记就是侥幸留下来的这几本日记和后来收在《顾准文集》中的那些笔记、信件和论文。从这份日记中间，后人可以看到改造是怎么回事。

改造右派的方法是全国统一的，就是“右派斗右派”，正式的名词是“自我改造”，或曰“自我教育”。让你抛妻别子，到农村中白天劳动，晚上学习，根据毛主席著作，“狠斗私字一闪念”（不错，这话是十年以后才由林彪提出来的，然而实际上他不过是把早在劳改队实行的那一套推而广之而已）。不要怕斗不起来：在每一个人面前都虚悬着一个“摘帽子”、“回到人民内部”的目标；对本来是党员的人来说，还有一个“早日回到党的怀抱”的目标，因此改造不愁没有积极分子。正如毛主席早就指出的，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一定有左、中、右三种人。在人斗人的过程中，谁斗人最狠，上纲最高，谁就是改造得最好，可以被评为“一类”。当然，你也可以埋头干活，缄口不言，然而那样问题更大，叫做“抗拒改造”，得到的反应首先就是“打你的态度”。总之，非要把你开口不可，不开口是办不到的，而只要一开口，那一定又有岔子可抓。这样连续不已的斗争就叫做思想改造。从改造本身的逻辑讲，可以说是没有改好的一天的。但是毕竟又每过两年总有一部分人“摘帽子”，“回到人民内部”。这个秘密就是管理右派改造的当地领导的心意。在顾准所在那地方的术语，这就叫做“接上头”，从日记中，可以看出顾准是很下了一点功夫研究如何能“接上头”的。请看 1959 年 12 月 8 日的日记：

沈（场长）说我“接上头”了。这其实是笑魔迎人的政策的结果。

我近来每次看到沈必打招呼，他不瞅不睬我也招呼，这就合乎他的心意了。

但是顾准也未免天真了些。他不但是北京来的知识分子，还是一个曾经当过“首长”的人，要想真的同农村管改造的基层干部“接上头”，谈何容易！只靠笑魔迎人地打招呼顶多只能使改造者一时心理上满足一下而已，至于摘帽子，没有上边的点头，莫说属于敌我矛盾的右派分子的改造，就是四清运动时挨批挨斗的村干部要“下楼”，文化大革命中的走资派要“解放”，都是办不到的，这就叫做“党的一元化领导”。所以顾准虽然自以为“接上了头”，可是到回北京还是没有摘了帽子。不过，千千万万的右派，又有几人能免于这样的诱惑呢？当然顾准后来也明白了，摘帽子只是一种“政治需要”。

要应付天天晚上的改造会，实在不是容易的事。顾准不能不想出一些可以供批判又没有太大危险的“话把儿”，以免“冷场”反而招致“斗态度”。他给自己选定了两个“话把儿”：一条是“架子”，一条是“人道主义”，说实在的，这也是当年许多右派分子在同样的情况下所作的无可奈何的选择。这样，“大致可以过去，前后也能一贯”（见顾准 59 年 11 月 10 日日记）。

照常理推想，顾准这样出身贫寒，做过地下工作，又曾在解放区长期工作的老党员、老干部，一旦成为人下之人，应该是没有多大的架子了。事实上，他早就明白自己的地位，下放之初就说过“我根本不鄙视”其他右派分子，“因为我不过与他们处在相同的地位而已”。但是他现在是“北京来的干部”，历史上还当过几年“首长”，这个“架子”就像他鼻子上

的眼镜一样是永远脱不下来的，哪怕他下定决心始终“笑魔迎人”也罢。但是这总比“抗拒改造”、“腹非时政”——反对三面红旗的罪行要好多了。

顾准给自己留给人家批判的另一个“话把儿”是“人道主义”。从日记中看不出顾准是怎么检讨自己的人道主义的，然而不难想像无非说自己心肠软，斗人不够狠，站不稳无产阶级立场而已。比如说，明明饿死不少人了，但是还是要肯定“粮食问题是思想问题不是实际问题”（见顾准 1959 年 1 月 14 日日记）。如果倒过来说，那就是“大是大非”的问题了。

这样的改造给予顾准的是时时袭来的“心头一阵阵绞痛”。请看：

我基本上学会了唾面自干、笑魔迎人的一套。（59 年 11 月 10 日）

精神折磨现象现在开始了。下午栽菜上粪时，思及生活像泥污，而精神上今天这个人、明天那个人来训一通，卑躬屈节，笑魔迎人已达极度。困苦、嫌恶之感，痛烈之至。（59 年 11 月 23 日）

在这种情况下，道德败坏，不能不成为普遍现象。
(60 年 1 月 15 日)

何（祥福）学好了，还是学坏了，上帝明鉴，他学坏了啊！（59 年 1 月 15 日）

水库六个月，赵淑仁学好了还是学坏了？学坏了啊！她现在感激劳动队为她脱帽。但是从脱帽得到了什么经验教训？钻空子，拍马屁，说谎话。

下放干部是有许多人学好了，这是他套社会责任感的宗教仪式的效果，其背后也有客观的物质基础。他们是外来者，他们来此是朝圣式的消除肉欲。城市式的生活方式

在等待他们。否则，饥饿也会促使他人相食，卖×，说谎，拍马屁，害人自肥的。

真是心头一阵阵的绞痛。

若说这是历史的必然，付出的代价也够重大的，后一个历史时期，为了消除这些恶毒的影响，不知要付出多少精神和物质的补偿。（59年1月15日）

小组通过思想总结，六个右派中，彭楚南和李宝仁二人未通过。彭楚南是不暴露思想，李宝仁是顽固。李宝仁的顽固是不相信丰收。这个姑娘很愚蠢，然而也是可钦敬的愚蠢。（59年1月16日）

我是否变得卑鄙了？我偷吃东西，我偷东西吃，我不如青年人有献身精神等等？不，没有。如法捷耶夫描写两个人在远东森林里打游击一样，我以后也要如实描写自己。（59年1月16日）

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有过与顾准相似的经历。然而，许多人甚至不敢如实地感受，更少有人敢于秉笔直书，给历史留下一点记录。这是中国的耻辱，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耻辱。早在1959年在商城的日记里，顾准已经下定决心要下十年功夫，研究世界的和中国的历史，弄明白人类的命运是怎么回事。这个计划当然过于庞大而不能完成，然而我们还是有了现在的《顾准文集》，它使人们在人家问起20世纪下半期中国有没有独立的、创造性的思想家的时候，我们可以没有愧色地回答：“我们有顾准。”

顾准的弟弟陈敏之在把顾准和他的通信结集出版的时候加了一个题目：《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这当然是正确的，顾准通过痛苦的改造放弃了对他曾经是神圣的“终极目标”的追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面对的是把理想主义庸俗化了的

教条主义”。他说：“我面对它所需要的勇气说得再少，也不亚于我年轻时候走上革命道路所需要的勇气。”他又说：“我还发现，甚至理想主义也可归到经验主义里面去。”但是正如许多同志所指出的，顾准实际上是一个上下求索，虽九死而无悔的理想主义者。因此说他放弃的是专制主义，追求的是自由主义，毋宁更切合他思想实际。他在 1960 年 1 月 17 日的日记中已经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结论：苛政猛于虎。”

在已经到世纪末的今天，反观世纪初从辛亥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志士仁人真正追求的主流思想，始终是自由主义，虽然它在一定时期为激进主义所掩盖。中国的近代史，其实是一部自由主义的理想屡遭挫折的历史。然而九曲黄河终归大海，顾准的觉悟已经预示了这一点。

顾准是孤独的，因为改造右派分子的政策就是要“孤立”他。即使到临死，他想与同在北京城里相距咫尺的九十老母见一面而不可能。在顾准的日记里唯一引为同道的是宋庆龄。他在 1959 年 12 月 9 日的日记中写道：“宋庆龄的和平、进步、正义是正宗的，目前的妖魔邪气何能持久？”

顾准可谓“时穷节乃见”的典型，但我更希望什么时候，中国能甩掉“时穷节乃见”这个被视为可贵可敬，其实却是可怕可怜的民族传统，让人人都能自由自在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的时代早早到来。1960 年以后的调整时期，1978 年以后的农村改革，都已经证明，只要稍稍多给人一点说真话的自由，中国虽然人多，吃饱饭还不是办不到的。希望中国今后不要老是以“时穷”来考验她的子女的智慧和良心。

总之，这不是一本普通的日记，它不属于顾准这一个人，而是属于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的那一段痛史。

1997 年 7 月 10 日

目 录

顾 准 日 记

1 / 序一：中国需要这样的思想家	吴敬琏
10 / 序二：智慧与良心的实录	李慎之
1 / 商城日记（1959.10~1960.1）	顾 准
132 / 息县日记（1969.10~1971.9）	顾 准
283 / 北京日记（1972.10~1974.10）	顾 准
312 / 致陈敏之的最后一封信	顾 准
314 / 基督教（译文）	顾 准

附录：

323 / 顾准生平和学术思想	陈敏之
369 / 我所知道的顾准与“三反”	陈敏之
375 / 顾准的最后十年	陈敏之
386 / 送别——在顾准身边的最后一个月	陈敏之
412 / 汪璧——一位不应遗忘的女性	陈敏之
418 / 致顾准伯伯的最后一封信	徐 方
420 / 迟到的理解	顾淑林
423 / 患难之交 相濡以沫——骆耕漠访谈录	邢小群
429 / 我与顾准的交往——吴敬琏访谈录	邢小群
439 / 编后记	丁 东

商城日记

顾 准 日 记

(1959.10~1960.1)

一九五九年

十月十四日 晨四时

菜园所种白菜（哇菜）

（略）

对我的照顾

日来杨、何对我照顾备至，前晚要我划表，免我夜工。昨晚要我站岗，又免夜班。白日浇水少，昨上午我自动要求浇水，因为浇到我的胡罗卜。杨学廉实际上已垮，也许是接受这个教训，免得在李克征那里交代不过去？

昨晚要我接下班站岗，三点不见人来叫醒，我起身大便，束装上班。现在棚东头小棚内写写日记。在此以前已巡视一周。

阴雨开始

三天东北风，昨晚起小雨。度又一次连阴已经开始，距上次连阴又是 20 余天。

连阴以前，有一个栽菜浇水高潮。从各组抽调一二十人，晚上加班栽菜浇水，加上种麦、收花生、黄豆，秋收秋播大致已经完成。所剩花生地三块，红薯未收，豇豆也已摘得差不多。西瓜地白萝卜已经拔完，所剩胡萝卜追肥间苗也大致完成，菜园就是等天下雨，雨天也没有什么要冒雨干的活了。雨后锄地，追肥，工作量都不大。大粪奇缺。百多块白菜恐要靠硫酸钡，若 300 斤 \times 0.25 元 = 75 元，所费劳动量更少。

预测今后劳动

工地夜班日趋缩短，近来二天九时半人们都回来了。城内扩干会议未毕，会后必须抓这里的学习。大坝合拢已达安全线，加以原备料已耗用完毕，抢高度时期已经过去。

菜园活也趋正常，所余一个高潮是收红薯，种腊菜，种豌豆，这些土地面积不超过六亩。已种的菜，当今后气候转冷，日照减弱、蒸发减弱的时候，浇水量也会大减。总而言之，拼命干的高潮是过去了。

沈场长种菜

近来沈种菜甚积极，村西旧番茄地黄瓜地悉数占去，大白菜昨下午由杨文华砍去，沈自己在挥锄挖地。有人预测，这是沈为自己打算安家的。那些地方合起来有一亩，都是好地，一年可轮作三至四次，且可种高级蔬菜，收入可达 150—200 元。劳动队若有改组，沈可用来帮他种菜的人正不缺少。

十月十七日 上午九时半，浇粪休息时间

接秀^①信

昨晚，“写笔记”时接秀信，语句公式化。吾心所深知，却不免有所波动，来商城后第一次半夜呜咽。幸床铺是单置的，未为人所知。

写笔记

连日工地还是每晚至九时半，较之十一时已缩短，据云民工至九时就都走光了。我一晚划表，一晚站岗，昨起又获准写

① 秀，采秀是顾准妻子汪璧的简称。汪璧原名方采秀。

笔记，可连续三四个晚上，得略作苏息。

何、赵之比

现在何、赵二个摘帽子的人可作一比较。何是一个乡村知识分子而目光开阔，深知知识就是力量，粗暴并非本色。赵貌似婉娈，而实际十分公式化了。真是不幸之至。

看来新的力量是应从底层找的，此来商城，并非虚行。

十月十八日 晚上九时半

写笔记①时间与写笔记

现在是写笔记时间，地点在澡堂。这里有柳学冠、芦苇二人。柳、芦二人连日不上夜班，开会写反省。所以我根本不鄙视他们，因为我也不过与他们处在相同地位而已！

笔记已写成三段，内容还要改组一下，明天起着手修改，一齐下手。

昨晚搞到十二时，现在十分疲乏，正喝豆浆，喝后就去睡，明天好好搞一下。

应该很快搞出来，估计十天半月，李克征又要找我谈话了。

蔡璋与赵刚

蔡璋昨天进医院，高热不退，基本上搞垮了。

昨晚在缝纫房干到十二时，赵刚给我吃半个馍馍。想买些孩子用的东西给她！她是维护我的。赵淑仁曾揭发她，可悲之

① 笔记：即思想改造笔记，是当时右派分子必须定期向管理干部递交的一种自我批判、自我检查的文字材料。

至。

装电灯

黄说每人要出五角。“公共积累”是不能动用的。

十月二十三日 评比会上

信上跟采秀吵架

15日向采秀要钱，二十一日信，更前一些还有一信，担心我改造不好的信。

十月二十四日 下午一时站队前

左股下挫

担水担粪已经很久了，我都用左肩，左股骨下挫二三天，继续坚持担。左脚肿，今上午下粪塘子，何照顾，让我砍白菜与翻地，在沈家畈内。下午我准备还去担水。

复信吵架

没有钱，只剩二元，杨学廉打碎了碗，借去五角。没有钱不去医院。再坚持下去。

昨晚复信给秀，有“生活本有各种方式，一切由你决定好了”。

评比

又是月评，昨晚是第二天。

第一天我评二类。舆论颇佳，是股骨下挫换来的。

徐云周评为一类。

下午七时半

谢少安组

浇水组今天改组，昨天在余济美组，今天在谢少安组。

继续浇水

上午翻了一二个小时地与整理粪塘子，下午本可继续翻地，谢少安不同意。整个下午还是浇水。

胫骨坏得更凶了。

没有钱，不敢到医院去，对秀的意见愈来愈多了。

十月二十七日 晚七时

修喷雾器与何

二天来的任务是打药，喷雾筒不好，修理再三。修理项目如下：

一、接皮带处漏水，打气杆螺丝帽漏水，

二、修好后远近调节处失灵未修，打气炸掉盖子，由杨明昭、高方前后焊接三次，三天，接线螺丝和焊口难修未焊成，由何到城内修好取回；

三、进水器阀门（铜珠）不移动。

计划进城一次，与高杨交涉二三次，我守候修理四次。

“打猫雄”

我跟何说“打猫雄”活我不干了，何说“谁干？你也怕打猫雄了？”

今天和他谈起何走，他实在是渴望早走的。

写笔记与赵

除通宵外，写笔记今天是第七夜，初稿将成。

昨天向赵报告。并送阅初稿。

赵俨然以指导者与大队长代表身分说话。

赵、何二人，初来时表面观感与实在内容，恰相颠倒。甚矣，了解人之难也。

喝豆浆

喝过一阵豆浆，时间大约有二十天。

今晚站队，黄说城内机关知道提出意见，“右派还喝豆浆，不象改造的样子”。

十月二十八日 晨二时

站岗

全休三夜，本不站岗，昨晚正写笔记，杨文华来要我站岗。前半夜睡得不好，脚已不良于行。照站不误。

站岗是我的时间。可写可读。

喝代乳粉一茶缸。

主要是看守待腌的大白菜。

再论沈场长种菜

沈的种菜，何、杨、陈寄初帮忙栽，占村西端草棚茅厕大粪，最近又把他父亲（？）弄来专门种菜。

白菜种得极好，还有蒜苗。白菜已砍了几次出卖，据说已卖到十多元。

沈的老婆小刘，曾于说到她今年棉裤问题时说，四个人，

三十多元，做不起棉裤。

沈在劳动队是独裁者，是皇帝。种瓜的人吃瓜是偷，他到瓜地可以随便摘瓜吃。他的老婆孩子可以随意取大厨房的食品，种菜这种事，鲜明表现他占取公家便宜。

你们忘了你们是有罪的人

沈占便宜，是占罪人的便宜。

他站队讲话，每次都要说“你们简直不象样子”。或是劳动不好，或是吃得太多——买零食，或是描摹人们吃饭时的“寒碜”以及其他等等。他特别反对人们骄傲自满，瞧不起他。

简直不象样子之后，往往随意“你们忘了你们是有罪的人”。

右派不准满街跑

地富反坏右一分子的右派，集中于南关附近，可是不准满街跑。

病人可以进城看病，在街逗留较久，公安局反映右派满街跑，黄队长在队前报告时提出批评。

十月三十一日 晚十时

雨中栽菜与学习

十三日晚间小雨以后，半个多月未下雨。按历年气候，十月十一月是少雨季节，所以十几天天天浇水。

昨晚小雨，今晨下大。工地上的人几乎全天在家学习。菜园上午栽腊菜，各组出一人帮忙，午饭时结束。我拔了半天菜秧，棉裤湿透了。午睡后烤了一下，下午四时半后帮烧猪食时又烤了一下。

下午菜园讨论增产计划，计二个月内可收入 1000 元左右。

白菜腊菜各按三分半计算。

晚讨论周的“伟大的十年”，粗读一遍而已。

写笔记没时间搞，反不如劳动的日子。

去医院与致秀信

昨天上午去卫生院看脚，顺便看望蔡璋。

秀寄三十元来。决定不再吃零食，计划储蓄二十元。

致秀信，说我昧于形势，埋怨太多。告她劳动、笔记、节省计划的情形。

沈报告，二个月补助费不发现金，一律存起来。小组讨论节约计划。看来卡住一切开支办不到，增加储蓄极是可能的。

方医生诊疗意见与刘复生完全相同。他不愿提出什么关于劳动安排的意见。

抗旱局面要变

好在抗旱局面要变了。此次雨量，比十三日雨大得多，至今将届，蒸发将继续大减，浇水量至少将比现在减少一半。

十一月一日 晨六时半

雨天的休息

十月初以来，全队到昨天才真正的休息。各组上工不久，因雨即回，全日讨论增产节约问题。菜园上午栽菜，下午也进入了休息。晚上十时就寝，今晨起身已是六时十分以后了。

讨论的水平

平心而论，菜园组的领导是开明的。

在十二组大逆不道的杨学廉，到了菜园组，恢复了人的尊严。菜园组外来干部多，高级知识分子多，何能够容忍，能够

利用他们的长处。即在本地干部中，杨文华、徐云周也高于刘方忍、余济美，平均水平是高的。

昨晚九时菜园组讨论结束。八组是十时结束的，边看报，边听发言，那里讨论的水平太低了。八组全系本地干部，小学教员占半数以上。说增产节约无非是吃萝卜吃月饼喝酒等等，简直是言不及义。大学生所知仅张培从一人，看来也平民化了。

八组的小学教员中还找不出象何祥福、杨静超这样水平的人，二个组长，王秉三偷摸吃，甘也极低。

劳动队全体水平，是被决定于这批普通小学教员的。看来各组水平，比之队部，是要低得多。难怪沈那一套，完全吃不开。

见到李云卿

去卫生院治疗时，见李云卿。那次我拄了一根棍子，李云卿对我大有怜悯同情的样子。劳动队的劳动生活，以及我的脚痛，大约是会普遍得到商城的下放干部以至达于北京的（原文如此）。这对我全无坏处。

腿病其实是休息问题

前天实际劳动仅半天，昨天半天只干了拔菜秧子，腿与脚踝显著好转。看来这全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休息就会好。

今后还是采取老办法，重活抢着干。累不死人，而菜园的活，今后也是日趋轻松了。那天天浇水的情况，也已经是不得不变了。

隐蔽的人性

蔡告我，何、黄对蔡之是否回队，意见全与我一致。“在队，不动，你不安，我们难处。好不容易办了这多手续进了院，不好不要出来”。

即如从不见他笑的黄海泉，也隐蔽着人性的。

劳动队那全套制度，应该由谁负责呢？

反右倾，鼓干劲与局面要变

右倾机会主义是从外面来的，上面来的，所以问题特别大。

从下面看，反右倾鼓干劲，声势浩大。其实正如战略投降所举实例，色厉内荏。

我曾估计局面要变，前三十天昏昏沉沉的，对此思考不周。清醒过来，考虑一下，局面非变不可。

农村如此紧张，水库民工回去背米不得，吃一顿菜上工，成为偷萝卜的根源，不变如何能行？所以色厉内荏是因为现在连要变的本钱都没有，局势紧张到了要强迫储蓄，如何得了？

昨读伟大的十年，也有若干体会，例如“加强薄弱环节，继续大力发展农业”之类。

赵家骅说冬季是加强农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这也是退兵式的教育，目的为维护现制度，与1957年冬季不同了。

十一月四日 晨三时

坚持重劳动

连日阴晴不定，间有小雨。菜园补苗为主，呈现一种田园诗式的生活。二三两天，我仍坚持重劳动。二日帮徐翻地上粪一块，三日为胡萝卜地上石灰并浇水。晚间累极，代何站岗，七时就寝，十二时起，休息得好。

腿病依旧，何、杨争着照顾我，坚持重劳动不辍，这样他们还好讲话一些。

徐家断炊

前日徐云周儿来，今晨站岗，徐要跟我说一回话。

徐家断炊。收成，亩产三四百斤，各家偷藏一些稻米，均被翻检以去。来时断炊，吃菜而已。

与民工返家取米不得相对照，问题的严重不是从明春始而是从今冬始。如何得了？

慰徐

徐极端痛苦。家庭负累，农民疾苦，生长农村，要为农民谋利益，结果如此，政治上难免极端苦闷。

我告知，100万吨钢如何可能，化肥是用电换来的。我告以他应消弥农村祸患于无形。

反右倾机会主义

反右倾，鼓干劲，徐家区委书记又在停职反省。我跟徐说，应当安心，若不成右派，今日也必成右倾机会主义。

通达历史——话说得太多

难在通达历史。

告徐以历史规律而外，话说得太多。从上面来，从外面来，中苏关系等等，说了许多。

色厉内荏，估计无误。

村里的红薯已经吃光了

民工队来买菜的人说，村里的红薯已经吃光了，这应该是真的。

陈章初说，这个人恐怕不是民工队，是倒卖蔬菜的，连何、杨等人都听了默不作声。

刘引芝的父亲死了

刘引芝的父亲死了。

肿病——劳动过度，营养不良。

缝纫室张的哥嫂同时死亡，也是肿病。

1959年旱灾，1960年春夏，该还有多少人死亡呢？

劳动队是天堂与避难所

劳动队真是天堂。

徐云周的孩子在这里吃了晚早二顿稀饭，欢喜得不得了。

破米还能买到。红薯未起，破口子储备起来，腌菜已达九千斤，这一场雨后，白菜苗长，还有胡萝卜。

徐云周是在避难所里，我对他说。现若他仍在农村，目击心伤，如何过去？

劳动队何时解散？

恐怕要过去明年春荒。在此以前，有一个避难所，于公于私，二方有利。

政策不转变怎么办？

可是这不以政策转变为前提。否则，这一类集中营还得扩大。

转变的艺术

值得注意的是，转变的艺术如何？

大会堂在开群英会，趁粮食还有，今冬大抓水利，这都是反右倾鼓干劲的必要与本钱。过此以后，又将如何？

生活素描——停止吃月饼

月饼吃完了。从此决不再吃。已跟蔡璋说好。

学会饿肚皮——其实劳动队饿不了肚皮。

气候与田园诗式的劳动

30日以来，连续阴雨六天，至五日止。六七雨天，阴晴不定，仍觉酷热，晴不巩固，日内有再雨可能。

雨天开始数日，大家查苗补苗。昨天开始较大规模地浇粪水，并毁菜秧子地种白菜与腊菜，总之扛水扁担是停止了。而且，已经连续七八天没有夜工。劳动是田园诗式的。

菜秧

分给我原赵淑仁的地。原已栽上白菜秧二块，腊菜秧六

块。砍白菜五块，二块整理成菠菜地，三块又下了腊菜与乌菜秧。现有莴苣、菠菜三块，菜秧十一块。共十四块，未砍白菜十块，也可能全部改成菜秧地。

管理菜秧比管理成菜细致而轻，何、杨大概对我是有照顾的。徐整地，特别卖力。我上粪极厚。而徐地的活，也欢迎我去协作。

我向徐建议一协力争上游的意见，例如毁菜秧地即为一端。

李宝仁

李宝仁打烂赵刚的热水瓶而不想赔偿，态度极坏，此人品质恶劣。在小组里批评，她说可以缝纫菜园开联席会，昨天就开会辩论她。

科学院的人幼稚得很

这样的会议是要一面倒，一笔抹杀的。我对李毫无同情，当罗治安要我发言时，我不否认李的劳动积极。今晚沈特别找我责问何以为她解脱，我竭力解释我的“诛心论”的性质。

看来菜园组是最文明的，何祥福实际上是右倾的。

沈说你们中央来的人都幼稚得很，实在贴切之至。

十一月十日 中午

雨雪纷飞的一天

八、九二天，雨雪纷飞。八日的雨，是春季以来所仅见的，入晚转为飞雪，九日整日未止。阴冷之至，是去年在华北所未经历的。

穿上大衣，穿上棉鞋。

二整天来未下地，也是来劳动队以后所仅有的。

斗争李宝仁

八日，斗争李宝仁。上下午都是“辩论会”，科学院六人为主。科学院来人展不开斗争，这回展开了，沈也满意了。沈极注意我的态度，我也积极起来，大概对我也满意了。

晚上转为斗争会，还是沈来收场，要李坐下。然后转为批判发言，我说了一些话，颇博得罗治安的好评，大概印象转变了。

暴露思想会

九日是菜园的暴露思想会，我把我的思想笔记读了一遍，并且发了言。大致可以过去。前后也能一贯。刘世明还不见得满意，但展开不易，因刘近来发言力量颇小。

我劝刘世明不要斤斤计较人家不符事实的批评，不要见外，不要多写书面检讨，刘频频点头。我基本上学会了唾面自干，笑魇迎人的一套，渐渐也能习为自然，这是我气质的变化。

生活

晚上冷极，昨晚用瓦罐做尿壶。

今晨五时起身，帮外面厨房烧火，用稀饭汤冲了代乳粉一大缸，美极。

今日晚上吃鸭汤。中午干饭凉，也喝了一碗代乳粉。

九日中午稀饭。

今天本准备二顿饭，工地吹号上工，结果还是三顿。中午稀饭有一好处，热，增体温。

刨红薯

雨后上工，首先是刨红薯。

河边红薯，浇水栽下的，结实极稀，与去年华北所见迥异。看下棚附近的又是如何。

八九人刨红薯，今晚吃，大概一顿吃完了。

晚六时半

吃红薯

红薯三斤，菜二斤，吃糊涂，味极鲜美。

思想与劳动——冬季生活

雨天开组长会议连续数天，杨透露今后抓思想改造，十分紧张劳动时间度已过去。冬季生活大概就是如此。

致秀信

写成致秀信一封，未发。待机。

十一月十三日 晚九时

刨旱灾红薯

刨红薯四天，今日毕事。

红薯收获，较去年在赞皇所见大为逊色。沙滩地是原因之一，基本原因是旱灾。气温降低到适宜于红薯生长的时间过短，霜冻来得太早，薯块水分多而淀粉少，脆弱极了，一碰就断，象水果，不象薯块。

民工过路，欣羡不已。都到地头来捡残屑，挥之不去。

一个新发明，用薯藤磨粉，徐云周调去做这件事。旱年本应如此，惜在劳动队见闻不广，形形色色的现象知道得少而已。

学习——反右倾，鼓干劲

雨雪天第二天暴露思想。接着根据大家暴露的思想出题讨

论。开始和风细雨，气氛极好。十日晚，沈报告，这是运动，准备斗一二十人，结果颇好，不用斗这么多云云。

菜园提的问题是刘方惠的甘居中游，余济美的三个问题，公社没啥吃，送请假信不易真假，脱帽子在上面；徐云周的抗扁担思想。还有刘世明对批评的态度，其他还有什么不得而知。

我不是对象。暴露思想，我说了七八点：一、九日后日子过得快；二、劳动队主要二点收获，认罪与架子；三、写笔记；四、腿疾与劳动；五、对监督与对领导的态度；六、右倾问题；七、花钱；八、对脱帽子的态度。并且在会上读了我的思想笔记。

和风细雨式地谈思想专题，态度十分积极。宣布是运动后，对余济美的态度也是积极的。

十一月十五日

又红又专还是工厂农场 何对人物的胆 觉悟不高与
分化孤立 种菜退地与赵刚的批评 沈的说话 记柳学
冠 学会反右倾 今天的种萝卜与疲累

十一月十八日

学习粮食问题 捡红薯头 刘世明谈民工吃饭 余
济美与陈新初 粮食问题 徐云周家迁移到固始 杨文
华——余济美——赵淑仁

刨红薯 种萝卜 种豆——劳动生活

十一月十八日 清晨四时

熊熊灶火下作日记

十日开晴以来，晴好不过七八天，昨下午又阴雨连绵，竟晚未已，度今日未必能上工。衾寒尿多，第四次小便后不愿再睡，起为外厨房烧锅。勤添烧草一小时以后，谢德征嘱烧硬柴，熊熊灶火下作此日记。

红薯

晴后首先是刨红薯，连续四天，甚感劳累。晨起霜冻甚烈，曾用棉手套扯红薯藤，得杨文华奖励。

红薯共收约四千斤。薯块脆嫩，向所未见。结块太晚，霜冻太早，红薯基本上是幼年状态，有以致之。

薯田累承民工照顾，柳学冠犁田时公社一小孩跟随捡薯块，所得甚少，而喜悦愈恒。一派灾年景象！

继续跃进，反对右倾，是抵制灾年景象所必要的，确也煞费苦心。

种麦，浇粪

红薯收获后，费一天浇麦。其中间隔的一天种种子用萝卜。间隔一天，劳动转轻，而疲劳愈恒。种麦，头开套，竹萝，用手抓“麦粪”，与杨文华合伙，面积居第一。

种麦后，栽菜一天，昨日天阴，整日浇粪撒粪。

可喜的是胡萝卜可望丰收。胡萝卜的生长期间，气候正常。苗期雨少，长根期雨水丰沛，收获量可预卜为菜园所种各种庄稼中首位。

追粪甚多，饲养场载回的粪可起很大作用。

学习粮食问题社论

上次雨后，基本无夜工。工地劳动定额为四十五车，五时半即回，似乎想抓紧学习。

领导水平太低，反右倾学习抓不起来。其实问题不在领导，而在群众。

于是，最近确定学习重点是《河南日报》十一月三日“大力节约粮食之风”社论。

民工吃的饭

社论是“忙时闲时”，粮菜混吃一老套，所据消息是办得好的食堂如何吃法，标准是吃得好，吃得省，消息还有顿顿有馍之语。

其实背后隐藏着一个很可怕的事实。刘进明说，有些民工队一顿中午饭，每人菜一斤，红薯半斤。如何禁得人们不来红薯地捡薯头？

还是初到赞皇时的感觉。农村吃粮历来紧张，但是有冬眠时间，有男女之分。如今冬春不分，男女都下田了，粮食标准依旧已不堪设想，何况紧缩。强迫劳动，慢性饥饿与死亡，是大跃进必不可少的产物，也是新的人口问题的解决之方。

学习与负伤人数

学习反右集中在粮食问题上，是农村环境，与领导者群众两方面水平必然结果，鸣放时主要也是粮食问题。

可以记录的是四十五车之后，负伤人数大增。现已负伤的十二人。

沈种菜与赵刚

沈种菜，用公田，公粪，右派的帮忙。赵刚说沈种菜搞私有，罗治安列队时报告，吼声大起，“忘恩负义”，“小孩子”，“斗她”；赵出来解释都不能辩声音。

但赵毕竟未斗，而沈田也退了一部分，种萝卜种的田就是他退出的。

昨日中午，列队讲话时，沈还说他跟熊县长讲他种菜还卖了三四十元。这是他在备案。剃头的怕癫痫头，癫痫头怕剃头的。

暴露思想与分化孤立

学习粮食问题在暴露思想，分析批判已近结束之后。

暴露思想是学机关整风，所获无多。菜园组看来搞得最深刻，中心不过是反了甘居中游，徐云周磨红薯藤粉，滑过去了。

其他的组，主题也是甘居中游，甚至一天即尽。

在此阶段中，何祥福曾暴露了对右派分子的策略，“分化孤立”。就此点而言，劳动队的收获最大。全部生活与制度，曲尽其妙。相互间态度粗暴，与评比结合发钱多少，隔离外界，打下架子，要求认罪，成绩昭彰。

这一关我过得很好。现在这第三关也必须过好，策略已定，且看效果。

又红又专与赵、何比较

种萝卜种，何故意与我在一起。谈起将来，还是想专，而意识到重重困难。我约以订交，期以帮助。

赵刚反是。想当教员，想抛弃专业，想与老公住到一起营家庭生活。楼阁可望星星，志不在飞升。池沼卑湿，却有潜龙，天下事大率类此。

记柳学冠

暴露思想间以小评，柳学冠承认企图对我打击。对我在他绝望时所作鼓励，感动得很，说老顾若看得起他，准备与我谈谈云。说到此时，泣不成声。

劳动队虽有一切残酷生活的外形，而人性确实活跃其间！

赵对柳的呜咽，解释为委屈之感，呜乎哀哉！

十一月二十日 晨四时

雨天二顿饭

昨雨，原不拟上工，安排二顿饭。第二顿米面红薯饼二个半，菜饭一大盆，本来很好。九时半上工，饭弄得十分尴尬。饼，十二时，二时半各吃一个，晚饭五时半。

吃红薯叶

二顿均以红薯叶当菜。

在冀鲁豫时不能下咽的，这回全部吃完。

尤其晚饭，三百斤菜，七十五斤米的菜饭，加一盆红薯叶，居然吃完。

十一月二十一日 晨四时半

熊熊灶火与幸福之感

三时大便。现在外厨房帮烧火。烧火，有幸福之感。一时脑袋中想起想写的东西都忘却，简直是陶醉了。

要改变农村情势的估计

反右倾鼓干劲持续了将近三个月了，看来过去曾作的估计要修改一下。

野生植物的小秋收，养猪养禽如今全部都是“集体”和“运动”。不再依靠或不再意图依靠个人喂养解决问题了。重庆的派购政策受到鼓励，看来副食品与肉类也将依靠国家计划与

“任务”来解决问题了。这原是政治挂帅与群众运动的必然逻辑结论。与此相联系的是国家资金供应技术装备，与大量征工进行农村水利建设。

农村的工业化具体了新的内容，逐渐在凝成一条路线。

消费管理

与此同时，分配制度实质上成为消费管理的手段。

公共食堂成为粮食消费管理——管得彻底无比的武器。中国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要解决粮食问题大约也非此不可。当然是指增加粮食供应而言。

RETURN TO 1957，此路不通

1958春所出现的情况，曾使毛害怕，因此企图 Return To (回到——括号内楷体字为编者注，下同，不再另作说明) 1957。但如此做法，必然否定总路线与人民公社。二者兼顾，此路不通。加以外来的刺激，于是决定走 Stalinism (斯大林主义) 的道路到底。而 Stalinism (斯大林主义) 在中国是有生命力的。

《河南日报》提出，在苦战三年的基础上再苦战三年，时间估计是否大体如此？

十一月二十二日 晨三时半

红薯叶与拉肚子

第一天吃红薯叶，三顿，每饭一碗。晚间菜稀饭，加大碗红薯叶，翌晨拉肚子。20日吃红薯叶，量减半

烤红薯记

清晨烤红薯一块。五时许柳学冠等来，无法取出，值地上

有小红薯，张哲华给我一个特大的，我随手撩到灶下。柳从十一组屋内取一个大红薯烤着，他却发现了我的。他说要质问张哲华，我说我见了那个大红薯，不必去问了。天明，我找机会取出我所烤的那个，里外熟透鲜美绝伦。柳学冠竟不敢取。

早饭时张哲华问，我烤了红薯，为何不取，其实这是柳学冠的那个。

我既与柳是同犯，也就不再检举他。张哲华质问我，我本想和盘托出，想想不好。看昨天情形，不会再有事追究，也就罢了。

其实，只要有机会，无人不吃。下棚生红薯，上棚萝卜。我站岗时也吃萝卜花生。

柳学冠烤的那个，竟未敢取。今天谢德征让我吃了。

跃进饭

民工队来买菜的多。

东风队来买菜，闲谈情况。每天十两，中午吃跃进饭，为米面中和蔬菜的糕。大体现存粮食，够如此支销，到达明年夏收，已算了不起了。

捡粪

昨上午捡粪二挑。

捡粪，简直是等人家拉，也要强占毛厕，心里是腻烦的。

不是死蚯蚓，是蛔虫

在商城农场，看稻田所浇粪水中有死虫，以为是死蚯蚓。捡粪才知，那是蛔虫。

蛔虫甚多，有一堆粪便，粪极少间，蛔虫倒有七八条。

商城人民健康水平不如赞皇

不作详记。

十一月二十三日 上午九时半

22 日这一天

隔宿参余、杨会议至十时半，22 日晨站岗，二时即起。接连二天少睡，昨日疲劳愈恒。

中午大改善，豆腐包子三个，红薯包子一个，死猪肉与猪血豆腐汤。饭后小休，竟至不知不觉迟起一小时上工。好在事实上确是不知者不罪，何来叫我，推被茫然，不致被疑为躲懒。

上工不久，疲劳得厉害，董来，叫去开会，肉体上疲劳这一关算是躲过去了。

暴露思想

董要求暴露思想。他嫌我暴露不够，大训一顿。

大概反右倾的整风方式就是如此。如今是整风成为交心的别名。事情愈糟，问题愈多，怀疑愈甚，要求交心愈严峻。E—K 区别，真不知何在。

我辩了一通，这也是暴露思想。然后接受赵淑仁意见，“虚心一些”，停止不辩。及会议终了，始终维持笑魔迎人的一套。与赵同送董到大街，竭力解释不暴露的原因——充实思想笔记，思想上有松了一口气之感云云。总之，抵触情绪是丝毫没有的。

没有右倾思想不能过关

此次整风特点，大约是没有右倾思想就不能过关。作为党员，愈是要靠拢党，愈要暴露，暴露愈多，愈是进步，不暴露不能过关。

因此今天开始，想想如何暴露法。问题恐要环绕人道主

义，蔓延及于先进吃亏论等等上去。三五日内编出一套提纲。

对不起院领导，对不起爱人

董之大训一顿，背景如何，值得研究。

标题二语，盖以秀信“老同志期望殷切”等等，莫非是要提早为我摘帽？

好的，我来做这件事。

“否则，想回到党的队伍是做不到的”，再看今后风头。

精神折磨的痛烈之感

过度劳动这一关大致上已经过去。天冷润湿。二日来遍浇粪水，亦不过如此。栽菜，要等菜秧子长成再栽。近日连阴，晴好后几次突击也就过去了。

精神折磨现在开始了。下午栽菜上粪时，思及生活象泥污，而精神上今天这个人，明天那个人来训一通，卑躬屈节，笑魔迎人已达极度，困苦嫌恶之感，痛烈之至！

然而又有什么办法呢？

要对得起院领导，还要对得起爱人哪！

十一月二十七日 晚九时半

舒舒服服写一次日记

今天在澡堂写日记。杨明昭在画猪舍的图，电灯通明，人声静寂，新盖的“机器房”缝纫机声和笑语声杂沓，杨明昭在工作，时间还很长，我可以在这时不受扰乱地写一次日记，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

新盖房子和养猪场建设

来后见劳动队新盖房子四栋，三组一栋，车棚为名而仓库

其实的一栋。如今四面空隙都已堵住，留前后门各一。

今天县委库部长来决定县直养猪场建设在上菜棚与下菜棚之间。叫做千头猪场，据杨明昭画图时咕噜，准备发展到五万头。猪饲料呢？

反右倾，暴露思想，吃饭问题，发展畜牧

连日用评比的方法发动暴露思想，暴露最多的是吃饭问题。

商城去年全县平均亩产 600 余斤，今年则达七百余斤。余济美说，赵家棚子的公共食堂停止供饭，各人自己设法，结果是各家吃菜。董副大队长说粮食问题是思想问题，今年征购任务尚未完成，想来下放干部对此普遍思想不通。

今年打下粮食，隐藏私分是普遍的，搜粮与停止供应也是不乏其例的。然而隐藏私分必定为量不多，中秋过后，吃饭问题已经紧张，征起粮食，明年供应，叫做细水长流，慢性饥饿必较今年更甚。

死人，已知柳学冠之弟，杨文华的女儿，刘方惠的父亲。其他所听说的还不少。

商城全县平均土地，每人不过七八分，用这个办法解决人口问题倒也好。

大量发展畜牧，而且是集体大猪场。将来还是让猪吃人呢？还是计划落空，浪费一大笔钱呢？还可以观察一番。

菜价，菜园与养猪场建设

菜价，城内牌价萝卜八分，菜价三分半。城内无菜供应。

天气寒冷，蔬菜已基本上停止迅速生长。

蔬菜作为代食品，民工队竟来买撤的菜叶。菜园的白菜，可砍的可撤的都将完结。十二月，一月又是如何？胡萝卜还可以供应一时，以后大约是腊菜了。

不少菜地，原来分给个人的，如今蔬菜成为主要食品了，

又归公统吃了。

刘方惠偷红芋

刘方惠偷红芋六七斤给他的母亲小孩带回。

据说是小孩可吃生，其实还是饥饿问题。

评比中我的积极表现

评比中我表现积极，成为主要发言人。

评比，今日完毕，末个蔡璋。

徐云周暴露思想涉及产量，建设中的大手大脚，实在拆烂污。

我在董大将我军之后，一开始说自满，牵涉到人道主义问题，跃进的愿望与人道主义的矛盾问题。这倒是写检查，暴露思想的一条主要途径。

再记赵、何祥福，并记杨

赵暴露思想，琐琐屑屑，我将她二军。第一，心理系的废品；第二，凌乱，不成系统，不学习理论，自甘落后，只红不专。

杨自诩全无问题，样样都通。此人告密别人，鹦鹉学舌式地积极，奉承领导。论过去，是一个旧社会极世故的人。弄清本质之后，觉得可厌。赵其实与他相同。赵所乞求的是脱帽子与做老婆，如此而已。

何祥福确是有理想的人。如今善对沈、杨，不过是不得已的举措而已。

猪场负责人

养猪场负责人是罗治安与廖红仪，刘应中当了队长。劳动队调猪场工作的有七八人，都是摘了帽子的，杨明昭不是。

看来全队局面不长了。

蔡璋是个大滑头

蔡璋回来，评比中说得痛哭流涕，其实是因为哥哥不寄钱

来，住不下去了。

带回月饼十个，沙糖一斤。在他那儿的钱弄丢了，再买些东西吃算是拉倒了。

如今人都有二副面孔，黄海泉也不例外。

十一月二十八日 晚八点半

写笔记

白天拔秧栽菜，晚上要写笔记。这是苦刑，写什么好呢？

检查右倾情绪

慢慢来，群众生活，休息，消费基金的分配，农民苦，得不偿失，唯条件论，一应俱全。

劳动队纪律，病员，监督方式，对坏人坏事的斗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了解。

土地改革，整风整干，三反，党内斗争。

十一月三十日 晨一时半

29日晚写笔记与其他经历

29 还是写笔记，可是有一些其他经历。

第一，冯顺抓一个民工偷柴火，剥去棉袄——剥者三人，刘玉林，冯顺与杨柔远，光膀而去。闻此人又到别处去偷衣服，被打得半死，将次毙命云；

第二，冯顺说，县委书记准备以十万元绿化水库区，建设大公园，要冯设计，沈说要我参加。与黄、罗谈菜园花园果园三者联合的计划。

第三，翌日，杨文华说，在理发室既不写，坐着休息，影响不好云。

价格

昨晚所闻，胡萝卜市价二角。市场挂牌二分九厘。

死人续说

柳学冠家母弟同时死了。

杨柔远母亲死了。夏伯卿家死了人。张保修家死了人。

读报政局

今晨站岗，昨晚有时间读了 26—28 三天的报纸，得以集中思考一些问题。

国庆已过，年关将届，冬春度荒理应提出，湖北、河南灾荒已开始报道。

艾地、约多^① 关于华侨问题发言，涉及中印边界纠纷。东南亚显然有一个排华运动。

苏美和解，中国表示赞成，但报纸上总是把美国的扩军备战列在首位，并说明其无诚意。外国有些人为中国辩护的，则声明中国赞成和解云云。

内政外交总是息息相关的。

晨九时

沈买车子

沈每月 38 元，却已买了一只手表，昨天又买了一辆自行车。

^① 艾地、约多：均为当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

劳动队对他是便宜的。吃饭七元，全家伙食费估不超过十八元，却能随意选吃好菜与最好的生蔬菜。利用劳动力种菜已得三四十元。右派没钱，出卖的东西，他就会优先购买。

场长买菜

与此相同的是几位场长买菜。罗买萝卜白菜已三四次，价格与黑市相比，只有 $1/2$ — $1/3$ 而已。黄也买菜。

水库

大坝合拢 9.12 开始，已一个半月还多。合拢口与大坝高度尚未看齐。民工人数少，来了跑回去的更多。三天来城内大批机关干部、学生来义务劳动，劳动队晚间就奉陪，他们来时，大约是一天三班轮班来干的。

据说大坝工程要春节前完成，看来是成问题的。

紧张局势

蔬菜价格，民工回家，局势实际上是非常紧张的。劳动队是保险库，短期内不能解散，否则群魔乱舞，如何是好？

劳动队是艰难的，比之农村，犹是天堂。

十二月一日 下午三时

生活琐记

昨天早晨站岗之后，挑塘泥不到半天，其余全是锄菜地。

站岗之夜，读完 26—28 三天的人民日报，就寝九时以后，睡着已是十时以后。十二时半起身，睡眠太少。下午锄地，极感劳累。晚上本来想写笔记，没有办法，只好就寝。今晨起五时半，烤烤火就上工了。

站岗之晨本想吃赵刚他们的剩余，或是烤红薯。张哲华不

同意烤红薯，赵刚他们吃时不在场，二头落空。张哲华铲出的稀饭锅巴，吃了一茶缸也就够了。此外又喝了一缸白糖红茶。

中午饭多，晚饭破米稀饭，极饱。今晨大便，还是拉了稀的。

今天上午翻地栽菜拔菜秧。杨文华很严厉，我在翻地速度与准时上二方面并未落后。

是呵斥，怒骂，态度十分恶劣。

但他是一类，而且摘了帽子。

又要搬家了

黄队长批准我搬到外厨房卧室。那儿屋小，暖和，晚上可看报；没有人在那儿开会，早上可以早起烤火，越冬是好地方。

还有，我的床铺不会有人来坐了。

厨房的秘密也可以进一步窥探了。

可以分肥。

要挤进劳动队的统治阶层。

批准的经过

批准的经过也可以记述。

向黄提是笑魇迎人，亦步亦趋，极尽卑躬屈节之能事的。黄的答复是极不耐烦地说“你要搬不就搬了啦”。此是第一阶段。

在里厨房烧锅烤火，何祥福也在，黄也在，我对何说，黄已批准我搬那个屋。黄这回以较和蔼的态度说，你也应该跟他们商量商量。

杨静超已经表示欢迎了。

今晚至少有二处斗争会

雨雪中坚持工地工程，晚上各组发柴火烤湿衣服。

菜园正在斗争柳学冠，因为他喝中药喝得不好，把药倒了。

七组不知在斗争哪一个。

我前面的锅里，正在熬豆腐。

厨房里的人在读反右倾鼓干劲的那篇文件，现在正在读到反对甘居中游的那一段。

十二月二日

搬家的事可能吹了

因为谢德征与张哲华不同意。

今天累得很

活不重，主要是晚上睡少了。加以昨午吃饭，凉了，下午雨雪交加，呆守下棚，很冷，跑肚子。

我的胡萝卜挨偷了

被偷至少十几个。

萝卜种至少又有一个大的被偷了。

昨下午，一个妇女当着下棚许多人，偷胡萝卜。当群众饥饿的时候，如何看得住？

蔬菜联的胡萝卜地要毁了

那千头猪场避开了我们的菜地，却要毁掉蔬菜联的大批菜地。

设计公园

王书记要建设水库区公园，准备拨二十万元，先拨 15000 元。要我参与设计，尚未开始。也好，可以开开眼界。

喝了四毛红酒

昨天喝了四毛钱红酒，与跑肚子可能有关。

度增产节约之风将成过去。

笔记已经写成

昨晚今晨，笔记大部分完成。现在又是写笔记的时间，却很困难，搞不下去。结果只好睡觉。后晨站岗，又可搞完它。

十二月四日 晨三时

又是站岗

今天又是站岗。与刘世明交涉，一点起，昨晚八时睡下的。

前晚微烧，感冒了。前晚八时睡至六时，昨天几乎整天是掏冰块，为的是利用我的大靴子。

冯顺

二日，我早起写笔记，冯顺站岗，也参加烧火。他利用灶火火花，观察我写什么，也侦察我茶缸里烧什么。

冯捉住过姜实味偷菜，王国园偷胡萝卜，对沈出奇的恭顺，目前是属于告密者这一类的。

何祥福

昨下午掏水塘，是何有意识地让我们二人在一起搞的。和他谈谈摘星星摘月亮的大志，与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他颇为所动。他也以接近领导为权宜之计，但对自己能进大学已经不再设想了。此人溷迹劳动队而本性未泯，相约订交，并许以帮助。

何、冯有别，何、赵有别。观察一个人若从表面来看，将一无是处。

劳动改造与技术进步

在所有的人中间，人性最少，而阶级性最多的是沈。何祥福谈，菜园犁地借牛，沈不赞成，说用人力挖。这几天菜园曾屡次谈到技术改革，何说沈不会赞成。因为劳动改造就意味着用肩膀抬土云云。

昨天沈报告，猪场建设任务大，他要求各组晚上担砖，他要求担任建屋的组晚上等工地夜工完时用架子车拉砖。

在他的眼里，思想改造永无成就可言。

这不是阶级性，而是兽性。

菜园田野基本建设

我还在努力促成菜园田野基本建设。

菜园地头粪缸化大有成就，装备已基本上可以完成。水塘增多了二个。昨天与何深谈以后，他已同意用下棚最大的水塘作灌溉自流化的设计。说干就干，是干得起来的。尤其因为那里可以利用猪场建场建筑材料的方便，揩揩油容易。

只要有一个开始，事情就不会停下来。

晚九时

担砖

中午突然宣布为建设猪场担砖，距离三里，每人三十二块，在工地的人九时放工以后干。

我准备参加，向王洪亮借了秧筐，大概又是照顾，让我帮忙砌跃进灶，勉强混了一个晚上。

女的都去了。

十二月五日 晨六时

病员数

截止三四天前规定病员吃豆浆时为止，肿病凡 44 人，脚病 4 人。

肿病续有发生。柳学冠也肿了。

晨 九点三十分

上工地与翻地

昨晚雨大，今晨仍雨。起床哨子是6:40吹的，早饭是八时左右。早饭后工地吹起上工号，准备集中，我们来下棚棚后挖地，我挖了一小块。杨学廉，王宏亮过来，说电话联系的结果，指挥部同意不上工了，于是我们是进下棚学习来了。

补记担砖

昨晚工地上下来的人，担砖至十一时半。杨文华说，有掉进毛厕里去的，有摔交的。

一个架子车可运100块。担一次十六块。沈不考虑如何利用车子，强调担运，也是改造的一例。

十二月六日 晨六时

又是站岗

烧澡堂，代冯顺站岗。

叫醒张哲华时，取胡萝卜二个，小红薯三个。喝红茶，在外面吃生的吃掉了。

稀饭熟时，喝米汤一茶缸半。通体暖和。

共用糖9 Tea spoon full (满满9茶匙)。

三四天内无电与讨论题

三四天内无电，无夜工。商城城内也是一片漆黑。

决定加强学习。讨论题叫做“什么叫做政治挂帅与群众路线？为什么人民公社——应该保护？”

厨房的秘密

厨房严禁外人入内。

倪济川、杨永新贴大字报反对厨房多吃多占，然而厨房的多吃多占取决于领导集团的多吃多占。

沈，每回晚回，必另做饭吃。昨天我特别观察谢德征给他做的饭，面疙瘩，加大量猪油，用芫荽。谢有胃病，不馋，分一杯羹给老姜。

昨晚用二个鸭子招待砌跃进灶的劳师傅，显然事后可以分润。

杨荫堂卖糖，非病号不卖，然而厨房的人大概都有。

回想从前我做首长时也相同。然而那时还是供给制。现在伙食费相同，还不准随便自购东西吃，而特殊化现象又不可免。不偷才有鬼。

所以我也偷了。

偷其实普遍之至。建猪场的人拔地里胡萝卜吃，我洗我的胡萝卜时，过路的人无不伸手。王秉三之类偷摸，其手段是拙劣的，然而不过手段问题而已。

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

按照苏联的现阶段所提倡与反对的伦理观念而言，可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重新定义。

社会主义是在保证少数人有正常与富裕生活条件下集中国力作战时经济式的建设，偷盗小帐等是不可免的。

共产主义是关怀多数人的生活，使生活水平的悬殊减少，并在社会道德方面恢复市民生活的正常秩序，消灭社会主义时代所发展的畸形。

如此而已。

应该说老实话。那不过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史前期而已。

十二月八日 晚六时半

担砖五次与杨学廉替我

晚饭后要担砖，我借好了刘世明的秧筐，等候集合。集合的是七、八等担负建设猪场的组，与菜园、厨房、“机器”房。罗治安宣布今晚担五次，发票，谁先完成，谁先休息云云。

昨天拉车，何与我同一车，只一次，给跃进灶拉的，轻松。前晚为跃进灶担砖，担十块，路上张哲华为我去掉二块，柳学冠为我拿走四块，到家四块，比昨晚还不轻松些（来回六里路）。今晚，菜园报名七人，任务男十六，女十二，五次共520块。去车一辆，人八名，至少运四次才够数，并且不到下晚一点，不能回来。

我准备去。杨、何商议，把原来看上棚的杨学廉弄去担砖，我的天哪！

猪场，公园

沈在一次会议上说，水库阴历年内完成，劳动队就要住到猪场新建房内去，要大家努力帮助猪场建设。县委限定十二天完成。这样宣布的要大家运砖。

原决定夜工后再运二次砖，看来水库指挥部不同意。现在变成这个方案了。

架子车，水库指挥部也一律限用于水库工程，据说七八组的已收回云云。

还要修公园，沈说，水库完成后，劳动队就建公园云云。

不雇外车运输与 242:2:44

据说有人提议过雇城内架子车运输，罗不同意。不是，不

是罗不同意，而是沈不同意。

沈是一切技术革新都不同意的。劳动队，就应该用最原始的方法劳动。

这 242 人，一年来贡献的劳动，是水库的主力与技术兵种，还贡献了万元以上的公共积累。

242 人中，二个死了，喝豆浆的病员 48 人。

柳学冠，打夯时肋骨折断，生了肋膜炎，现在肿了，今晚上还挑五次。

鲁涤园，肿了许久，现在进医院了。

检查我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学习笔记

今晨二时半起身，写我那检查人道主义思想的学习笔记。

真是活见鬼！人间何世！总路线反映劳动人民迅速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愿望！

党性

沈万山是劳动党性的化身。

昨晚宣布评比结果，又有关于李宝仁的嘉言懿行。

李宝仁曾写信给人家，说劳动队成绩是微小的，沈深恨此事，所以不断找她岔子。昨晚宣布李是四类，说八类也可以。他说，李宝仁说我们理论不高，我还不是要斗你就斗你啦！

如今的党性都属此类。莫看沈是粗人，他是深得毛之三昧的。毛对费孝通不也是这样说的吗？

我得到了沈的表扬

反之，我倒得到了沈的表扬。沈说我“接上头”了。这其实是笑魇迎人政策的结果。我近来每见沈必招呼，他不瞅不睬我也招呼，这就合乎他的心意了。

赫鲁晓夫的警告

赫提出了警告，这与中国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恰成对台

戏。

现在是赫在警告不要骄傲自满了，并以拉科西为例，狠狠地说了许多话。

前途

谁知道前途如何？

过紧的弦会发生什么变故，谁也不知道。

右派分子的摘帽子

而所谓右派分子的摘帽子，无非是一种政治上的勒索。

北京宣布 140 余人，都是为了照顾政治影响，潘光旦、浦熙修之类都是。对广大的右派分子，是绝不放心的。局势愈紧张，防范愈严。

所以，我的改造表现再好，不过求苟全性命而已。什么摘帽子，摘了帽子能如何改善环境，都是采秀式的空想。

不见此间摘帽的人依然在劳动队不往外放吗？

电灯月亮太阳——水库猪场

今天还是第一天哪。

前几天阴，如今晴定了。前几天电灯坏了，今天又放光明了，猪场场地上电灯通明了。今天初九，月光明亮。

准备一个新高潮吧，这是全国一致的，水库与猪场。

明天起，准备再拼命干一下，横竖是非干不可的。

大跃进万岁！

十二月十日 下午五时

不学习了与全部转向猪场

昨晚宣布部分人员运砖，部分人员上水库工地的夜工。今晨四时半起身，宣布不学习了，全部转向猪场。天明前，全体

担砖，天明后部分人员建屋，部分人员运砖。

养猪如今也是群众运动。大跃进万岁！

柳学冠

昨晚做栅栏，柳学冠去高中跃进门取绳子，被站岗的逮住，说他破坏，送来劳动队。

今天发现他偷了鹅屁股二块，藏在羊棚，黄给他展览了，写了大字报。

四防月

早上黄说现在是四防月，不准动人家一针一线。以前是动的。劳动队的家当是靠搜集破烂撑起来的，不能辨明什么是偷什么不是偷。

三个人调走

柳、刘、余调到二组去了。

十二月十二日 上午十时地头

估产，下放干部会议，民工吃饭，食品市场，综合队，猪场建设与担砖高潮，斗争会，偷吃的东西，人道主义笔记，赵淑仁谈话，菜园冬蛰，吃饭分量，何祥福担砖，盖房水利与猪场建设，货币经济之废除，城市支援农业之性质，政治挂帅的性质，其适用范围。

十二月十三日 下午六时半

赵淑仁传达下放干部小组长会议

1. 粮食 5/7 公社超额完成公余粮任务，全体超额全县任

务。

核产，根据核产安排群众生活，能完成公余粮任务的能安排到夏收，红薯叶，蔬菜。

2. 麦播 多数完成任务，麦苗比往年好。

3. 多种经营 上石桥突出的一个队，每家有十多个鸡，有存款。商店粮多。

官畈全面跃进。卫生，食堂，冬播。

燎原，县委重点。

4. 万人检查与下放干部全体参观。

十二月十五日 下午四时半 上棚

雨雪天气打“猫熊”

连阴已第六天。菜园简直找不出活来干。杨、陈、何给间隔担砖，我留家干活，而杂活也难找。今天担粪水五次，合满挑的三挑，帮陈新初浇粪四块，浇我自己的莴苣地一块，现在四时半，已无活可干。

杨文华在下棚打草簾，赵淑仁帮忙。现在赵淑仁去清她的地沟去了。

阴雨开始，气候暖和。现在逐渐转冷，今上午西北风，现转东北风，风大飘雨，并且转雪。

前晚挑砖一次，昨白天雨中挑砖，晚上免工，“讨论”第一题。今晨五时起身，烤衣服，大家到七时才起。

昨天雨中补苗撒菜，衣服尽湿。

为食物的欲念所苦

昨天三稀，今天中午居然一顿干饭，而早饭特稀。可以补充的食物了然无存，清晨傍午，颇为饥饿所苦。

前晚昨晚均早睡，未能入寐，为食物的欲念所苦。想如何找杨、陈、何三人中的好对象得以早上喝一次菜汤，想如何“搞”点红薯与胡萝卜吃。想回家时如何尽情大吃一个时期，烤白薯北京很难买到，窝窝头是美味。实在买不到啥吃时，打算到东安市场，阜外大街作巡游，有啥吃啥。再不然，到专备外宾吃的菜馆去吃它几次。

想这些事，竟至不能入寐。原拟今晨早起，竟至耽误。

商城食品市场

商城如今已无食品市场。卖糊涂的饭铺均已停止营业，月饼黑市已紧绝，只能通过医院或杨荫堂的路线买到少量。医院自己进行加工。酒也买不到。土酒没有，杨荫堂买到一点红酒是稀罕事，大曲全无。今晨他值岗，烤火时托他买瓶酒，回称“啥也没得”。

估产与安排生活

赵淑仁传达下放干部小组长会议，可以从中略知一些消息。

徐家断炊，赵家棚子砍公共食堂大锅，都是征购中的事。如今宣布征购结束，要安排到明年麦收的生活了。估产，看来是征购完成以后做的。估产过程中间，大力开展反对富裕农民路线，斗争私藏粮食，是今春所做第一幕剧，提早到初冬来进行，意思是好的，叫做省明年紧张。

但今春五十六字式的调整，明春不见得会再有了。既要保卫人民公社，反富裕农民（其实是国家 VS. （反对）农民）看来年年要做。有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刺激，大反一通之后，往胡同里又走了一截，很难退出。

如今再三强调政治挂帅。解决肉食蔬菜是重庆路线与千头猪场——公养为主，解决农村技术改革是号召城市支援农村。起点可以有所不同，前进的路线却只有一条。

路走得愈快愈好。Marx on Napoleon III (马克思在《拿破仑第三政变记》，即《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是完全适用的。老田鼠，你掘得好哟！

综合队盖房

综合队如今已扩大到了 30—40 人，人的来源是农村中恐粮严重的，或者还有其他来源。综其名曰逃窜犯。人员骤增，近正大力盖房。综合队人员担砖的，于途络绎不绝。

综合队据云实行这样一种制度，劳动按定额，凡不能达定额的扣饭。

充裕建设中的人力来源，这是一种很好的办法。因为凡这样的队伍，军事化的程度高，劳动效率大高于民工。劳动队与民工的对比，即其显著的例子。

政治挂帅的性质及其适用范围

凡此，皆属政治挂帅的范畴。London Timse (伦敦《泰晤士报》) 对政治挂帅的诠释是正确的，即由离开经济手段而用政治手段实现经济目的的，都属于政治挂帅。惜政治挂帅全部适用的范围仅限于农村，城市不仅不能实行，相反，还要维持一个比较过得去的货币经济的外观，而农村之盛行政治挂帅还是服务于此一目的的。

由此想来，1934 苏联废除粮食配给制，当时的集体农庄在提供粮食方面有严格规定。所不同的，苏联留下半公顷这一条路，与集体农庄市场这一条路，用以调剂而已。当时农村情况，惜未得坦率暴露的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卷不知如何？

斗争会

担砖中间有一天间歇，十一日晚，开斗争会。斗争对象柳学冠、王秉三等人。

柳学冠偷鹅肉，被刘世明、冯顺所发现。加上跃进门事

件，在十三组狠斗一晚，值我站岗，未暴露我的“右倾思想”。

王秉三，八组组长，偷过馍，近多吃一份饭，撤职，斗争。

赵淑仁要挖柳学冠地主恶霸思想的根未果。那天时间不早，草草收场，要柳学冠检查完事。

柳调走，今天吃饭也分桌了。在厕所里他对我说，分开了，颇表惋惜。借此人心术不可测，未敢订交。

人道主义笔记与赵淑仁谈话

人道主义笔记已交赵淑仁，十三晚科学院六人开一次会，会前赵提了好些意见，思想暴露不坦率，挖根未涉及世界观问题等等。传达以后，知道这是取经得来的，也就不以为意了。

答应再补充，但准备到 20 日后开会完毕再写。能拖，拖一下也可。

行期

行期不远。在劳动队无论如何耽不到一个月了。那个会议的工作布置到十一月底为止，一月份的未作布置，也许元旦过后，就要匆匆道别了。

今晚担砖要死人

今晚用大车运砖。沈报告说，重病号不去。他说，我知道这几天“担浪了”，没有办法。他说，再这样下去，要死人。

明晨站岗

今晚不发生我的免役问题，因明晨要站岗。明晨第一天吃跃进饭，可以参观一下。

今晚盆已集中，杨柔远正忙着指挥。

今晚晚饭

今晚稀饭很稠。新编桌，人数七，度打饭还按八人，（即按八人那也是分量很多的）加上要我刮盆，吃得极饱。赵淑仁

要让我一些，我拒绝了，她给了何祥福。

中午饭是没有吃饱的，分得似乎我这一分也特别少些。

十二月十六日 晨一时四十分

河这边的站岗

河这边的站岗是看柴火与萝卜种。萝卜种种下197个，被偷的已20余个。一般说来，这边的站岗任务不重。四时以前，不致发生事故。

晚饭吃得很饱，现在毫无饥饿感。

河哪边的站岗是看西瓜地的胡萝卜，那是宝中之宝。严格说来，实在是看不住的，每天要损失几个。而且站岗的人，连杨文华在内，必定自己也吃。

记机器房

“机器房”以前的屋小，新盖三间，大为宽敞，现在那个手工缝纫的工作台颇有规模，灯光明亮，与理发室同为劳动队的奢侈。里厨房设备不佳，但是一个严格的禁地。

下放干部的任务

下放干部现在普遍参加社会工作，也参加斗争粮食的工作（原文如此）。据说赵家骅那个单位还参加到公社去，那是一个“极坏”的单位，一天只吃过一顿菜。

群众瞒着下放干部吃东西。下放干部之初下乡也，有土改工作队归来之誉，宣传上也盛行称道。如今竟成严重对立，可见目前农民问题的性质到底是什么了。

再述劳动队是保险库

所以劳动队对我来说也是保险库。若与下放干部在一起，

竟至要参加这一类活动，情绪上不起反感，决不可能。而现在所要反的右倾，恰恰就是“农村中的自发资本主义趋势”。阶级分析是空话，所要反的实际是全体农民，很难设想当时何以自处。

十二月十七日 上午九时半

病了，全休一天

昨上午担过了粪水浇麦，一阵阵冷，担不起担子。想想是发了烧了，到刘复生那儿去量体温，腋表，38.3度，给了全休一天的证明。

跃进灶与病中休息吃饭

病了，该睡，刘复生给的是发汗、退烧、止咳的药，理该吃了去睡。可是要吃饭，不吃不能睡。刘复生不懂我的发烧——不，不懂劳动队全部人病情的性质。所以他的指导我是不听的。

回后，跃进灶第一次烧，蒸的饭根本未成，还差得远。穿上大衣，睡到十二点半，还差得远。一时半，吃了一碗米面糊涂，大家上工，我还是不睡。

我在灶堂子喝了一碗红茶，在躺椅上假寐了一二回。四时半，跃进饭吃成了，才睡下去，直到今天七时。

跃进饭十二两一盆，赵刚还给了我不少。发烧消化本会不好，结果是影响十分良好。今晨，稀饭吃七勺，大便极端良好。

肿了七十余人

我这是发烧。刘复生诊断是把脉，不量体温，他量不得。我，昨天与上次一样，一开始他也是不量体温，我要求了才

量。把脉时，他说没有什么，感冒。加以我的脉搏本来低，有什么呢？

但劳动队的肿病病员，一下子在一个月中，从四十四人增加到七十多人。夏天来时，肿病是极个别的，不过李国庆之类真有心脏肾脏病的而已。九十月间，七组：岳正中、李学海、刘代勤全肿了，人数增到四十余人。而今，一个月，一下加了三十余人。六组，除一二人外，全部肿了。

今晨刘复生跟病员在谈肿病病因。他说传染，但是县里没有肯定，不敢说。

其实，谁都知道是休息与营养问题。荒年，农村人吃草根树皮，全身浮肿，所在都有。而今，过度劳动加甚，没有瓜果吃了，没有月饼吃了，没有酒了，没有糊涂了，那能不肿？

民间肿得更厉害。民工，一眼望去，浮肿的很多。二三年后来统计人口，就会知道大跃进实行 Malthus（马尔萨斯）主义，所得效果，究竟如何。

跃进灶

跃进灶，就是用蒸饭代替煮饭，这在节约粮食消耗方面是有用的。因为容器直接是食器，流失减少，与火面接触损失的部分也就减少了。

杨柔远不懂得兢兢业业的处理新事物，第一次用跃进灶按通常程序，结果吃了大亏。实际上，烟筒还必须改装一次，使火力集中于第一锅，才算解决了问题。

吃饭制度的三变

吃饭制度，如是已经三变。

第一种制度，打在饭桶里，大家在桶里装碗。那好紧张，真是抢饭那。我吃干饭也不免少嚼急咽，还不免“干活一个不如一个，吃饭一个比一个厉害”的批评。那是何祥福的话。

看来第一种制度，在去年还行得通。粮食多，吃不饱可到

工地食堂与小贩那里买鸡蛋、包子、干饭、馍馍之类吃，有人卖，也有钱买。

今夏，瓜果多时，也还勉可维持，紧张程度不免愈来愈甚。

第二种，那是十一前夕实行的，各人一盆，实行分饭。紧张程度减轻了，可是分饭时还不免紧张得很。

第三种，连分饭都不要了，定量下盆，各人直接从蒸笼里端。

贫乏出办法，那倒是真的。

可是以后再没有剩饭了，早起烧锅，喝碗米汤也办不到了。

上午十时半

国际形势

1956——1958，有 Suez (苏伊士)、黎巴嫩与其他各种类型的殖民地斗争，当时的殖民地斗争，矛盾还针对西方，还调剂了一个匈牙利事变的暴烈空气。

1959，情况变了。阿联反苏，中印边界纠纷，矛盾针对中国，苏联改弦易辙，力谋与西方和解，中国仍旧维持斯大林时代的世界政策。如今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 又变了，排华亲美了。中国对苏加诺期望最大，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力量最大，可是也变了，原因何在呢？

原因不外是西方国家经济上力谋克服生产过剩危机，用第四点计划来当作解决这个问题的主要武器，军援与政策要求降低，帝国主义的面貌在变化，非复列宁所分析的情形。其次是，仿照中国与苏联三十年代的办法来建设自己的国家，代价

实在很高，争取外援，实在需要。尼赫鲁如果要照中国办法建设经济，不得不实行一套严峻的内政政策，而以国家作为一个抽象的实体与全体农民相对立，这是他的哲学所决不允许的，那么他就不得不力求输入资金，以期输入建设器材与粮食，这样一个现实问题对苏如诺同样是重要的。

中国的大跃进，其实是在匈牙利事变以后，再一次告诉落后国家，建设工业的 Stalinism（斯大林主义）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它起了一个反面教员的作用。如果说，三十年代人们对苏联是讴歌的，那是因为 1929 的大恐慌，1934 以后的法西斯主义盛行，相形之下，苏联的办法是英勇的自我牺牲行为。如今，中国的办法是内政严峻，而外交上又咄咄逼人，加以事情发生于波匈事变以后，它实实在在新独立的国家不复起什么吸引力的作用，相反，倒变成了反面教员了。

国际形势对国内形势的影响

国内形势是，清了党，意见一致，指挥统一，上下贯彻愈迅速，舆论愈一致，行动愈迅速，但是假话愈多，集中营愈多。这种局面，愈是苦战的时间延长，愈是要逐步推进。1959 夏天，才提倡一次讲实话，讲实话的人又是如是之少，已形成一个小小马鞍形，由此可见，事情是愈益向极端化方面发展。

但是朋友愈来愈少了。万隆会议后的有利形势日益消失，二个最大的邻国，Indu, Indunisia（印度、印度尼西亚）相继反目，苏联，又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来源。

国际形势要反过来影响国内形势吗？要影响的。

但王明这个人是不能起什么作用了的，历史太臭。要起作用，应该是别人。

但愿 1960 年有一个丰年，那样，也许毛先生自己也会变一变。

由此想想，水利养猪二件事，是期望大丰收年与改变极

端，改弦易辙的最后一着？但这二件事，收效肯定不能在一年内实现。

谁知道事情如何变化？

和解是不可免的

一年也好，二年也好，国际的与国内的和解是不可免的。

西欧党如今是陶里亚蒂路线了。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到底从 Keynens（凯恩斯）主义获得了不少东西，期望资本主义被国内工人暴力推翻是不可能的，亚洲非洲与拉丁美洲都在走改良了的资本主义道路，——和解的道路。

中国也不能不在内部求和解。

世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 20—21 Togliattism（陶里亚蒂主义）的路线。

下午七时半

埋葬死人

昨晚，附近路倒尸二起，一起由综合队埋了，一起由何祥福徐云周老邓三人负责埋了。死者“罗店”人，工地民工，才来未上工，身上有人民币四元余。

黄渤家中死人

八组黄渤家中，老婆，父亲，哥哥，二个小孩，在一个半月 中相继死亡。这个家庭也特别大，未死人前连黄渤本人共十五人，小孩七人。十五人中死五个，则死比例也不算小了。

一家连死几人之例

一家连死几人之例，已听到的有：

柳学冠，母亲和弟弟

张保修，哥哥和嫂子

黄渤，则上举五人即是

肿病是思想问题

今晚站队，黄大讲肿病是思想问题。他说，若一发肿病即怕死，精神垮了，再治也治不好。他要五个肿得厉害的人下来不上工，他说不准在家偷偷扒扒的，其中即有柳学冠一人。

柳学冠的棉袄

队部做了一件好事，给了柳学冠一件棉袄，这实在是应该的。柳在 1958 搞滚珠轴承，挣了一千二百元的公共积累。这个强劳力，每月工资无论如何在 11 元（4 类）—17 元（一类）之上。

所以劳动队还是天堂，公社的人，就得不到这样的照顾了。

刘复生的肿病药

刘复生搞了一种肿病药，是黑色丸子，每天服鸡蛋大的一颗。询其成份，有枣泥，面粉，蜂蜜，与若干种中药云。这是疗饥丸，但也正是治肿丸也。

地头谈肿病

今天，杨小华、赵淑仁等地头谈肿病。大家数了一下，六月我们才来时，肿病初蔓延，以后好了些，好的时候大体在七八月至国庆前后，那时正是我所计算的瓜果与月饼齐来的时候，而那时的小马鞍形，也使劳动强度较为减轻。

十一以后，摘帽子的刺激，反右倾鼓干劲的号召，大家狠干了一阵。工地拉车四十五次，建猪场以来，担砖诚如沈所说“担浪”了。而食物的额外供给，几乎全部断绝。呜乎，其不肿也几希。

地头浮肿，大家绝口不谈休息与营养，其实心照不宣，大

家知道是休息与营养问题。

若要我开药方，事极简单。每天十八两半之外，饭盆里每盆装上胡萝卜半斤，每天一斤半，则浮肿病可治愈大半。但胡萝卜如是吃法，十五天即尽，以后且将无鲜菜可吃，所以又行不通。

今冬明春

不日数九寒天将至，水利与养猪还要狠抓。数九天气将根本没有菜吃，一斤粮食维持强劳动与抵御寒冷是不行的，死人还要增加。

现在问题已不在死人不死人，而在死些什么人。黄渤说，父亲死了，死了没啥。孩子，死了也没啥。哥哥死了，是糟糕事，诚哉斯言。农村中死掉一些孩子与老人，达到了 Malthusism（马尔萨斯主义）的目的。若死强劳动力过多，则是大大的纰漏了。

越春，菜苔与腊菜花菜，三月大收，情况要转好一些。但到麦收前，还有一道空白，春荒可怕，商城 42 万人口，麦收前能保存 35 万已是大好事情了。

再衰三竭与局势转变

一鼓作气，58 年我见之矣。年初大辩论，春夏大治水，夏季庆丰收，秋季则钢铁与人民公社齐来。

再而衰，1959 我见之矣。意图调整而骑虎难下，旱灾说成丰收，水利与猪场齐举，惜严冬未届，路旁已见冻死之骨。

.....

吴芝圃要在二年苦战基础上再苦战三年。是再衰三竭之后尚有四五次鼓，殊不知四鼓五鼓，曹刿又如何论战耳。

记我的服装

半年来服装外形变化不大，夏季曾穿过短裤，在地头劳动一二天，那是秋老虎时期。把一条长裤改成短裤，穿了短时

期。冬季，现在穿大衣，——棉猴下地，不穿大衣，还是那一身棉衣而已。

背带已革掉，现在已习惯勒紧腰带干活，韩振小的忠告已试行了。

冬季，胶靴内套毛袜，极其有用。晴天则蓝球鞋是有用的。

变化是在满身是粪。手套上沾上大粪，裤脚上大衣下摆上沾上了粪，根本不同。初浇粪是要用肥皂洗手，现在也根本不问了。

手的变化

手的变化最大。现在已不再起泡，但这双手已完全不适宜于抚摸我的妻子跟孩子了。起茧春裂，右手大指食指中指尤甚，手指甲都变了形了。

吃饭

吃饭，用盆分饭，端起大盆，开始颇不习惯，还要从盆内装碗，现在端起那个洋瓷小盆都不习惯，就是大盆合适了。返家时，盆已不能带去。吃小碗不知如何能行。看来一个汤盆是合适的。

无论如何，回家后一个星期内要用各种办法猎取食物。科学院有“薪”可取 350，用 50 元吃十天大概总是够吃的吧。

我不至成为饿殍

离商城有期，我不至成为饿殍。别人也许有同样想法。

呜呼，个人主义！

十二月十九日 下午八时

改善生活

今天见余本江担回牛骨头一架，昨天厨房做豆腐，今晚做馍，要改善生活了。

刘复生说，牛骨头是熊县长批的。他又说沈场长和杨荫堂二人前天到市场转了一圈，一无所获，结果熊批准后才得到了牛骨头。

刘复生又说，城里有人说，“肿的人多，改善生活，不就好了啦”，可见病因是大家都知道的。

刘复生又说，城里有人说，去年劳动队还有些干部味道，今年跟民工简直一样了。这其实是改造的主要成绩，彻底工农化，本是改造的要求。再说，没有假日，没有自由支配的休息时间，吃饭干活睡觉，怎能不变得和工农一样。

雪中劳动

农村不习惯在雪中劳动，今日大雪，大坝八九时上工，下午三时放工。我们上午八时起担砖，返来约为下午四时。全日主要担砖。

再发烧

今日复发烧，体温37.5度腋表，晚上站岗与评比都免了，现在去睡觉。读完了一天的报纸。

彭铁所传播的

彭铁传播了一个说法，他一家数口，都是肿病，短时期内死完了。

熊县长可以批牛骨头给劳动队，对此，他是束手无策的

了。

昨晚的会议

昨晚又有一会，内容是说，城内各机关都为超额完成1959年计划拼命，劳动队近来劳动情绪不高。

阴天，是一个原因，主要是肿的恐怖。

会议是反右倾鼓干劲。今上午担砖指标是五次，结果减为三次。

再衰三竭！

今晚评比

今晚评比以前，又开组长会议，精神如何，还不了解。

十二月二十二日 下午三时半

病假与病情，劳动之不能令人满意

十九日量体温知发烧，翌日阴转晴，何嘱我担粪水看棚。十时半，在下棚端小凳坐棚外，何回，大不满意。下午，又有剩余时间，用锄锄地，何、杨均不满意。二十日开始捡粪，疲劳万状。晚间偶在刘复生处量表，腋表37.7度，刘有些担心，今午再量，腋表36.8度，嘱我休息半天一夜，给我磺胺类药品，怕我患气管炎——肺炎。想来连日发烧，始终未退尽。

晚间咳甚，昨晚尤甚。右胸肋骨因剧咳大痛，至睡眠不能反侧。痰多极，都是脓状。发展下去，变成肺炎，完全可能。

十九日开始评比，昨晚结束，我于二十日说了评了，自称劳动下降。何对我尤不满意，还特别找我谈了一次话，赵淑仁也颇关心。

如何处理？

如何处理？

论劳动队一般情况，若伤风剧咳，发微热不退，则刘方海之流均须休息，劳动力要去掉一大批。雪中劳动，尤其是雨雪夜工以来，病号已不知道加多少了。所以刘复生照例不量体温，奇怪的是人家也不要求量体温的。所以，我确是特殊的。

即以科学院之人而论，我也是特殊的。权少珍肿得脸象大阿福，依旧出去拉树。彭楚南体力不胜，并且有病，与权少珍一起抬树，连摔五六交，起来热泪盈眶，回家即睡倒了。赵淑仁自称腹泄腹痛，坚持劳动。所以，赵的意思，象今天的情形，根本不同意我接受医生的全休决定，会主张我继续捡粪的。

然而我不如此做。原因有二：（一）我现在根本不再指望在商城摘帽，这是不可能的；（二）沈现在极怕死人，劳动队病员情况，正在向上报告，蔡璋发病，即嘱送医院，我人滚蛋在即，他决犯不着对我认真。在此情形下，我还要留得一条老命回去。

摘帽子

摘帽子，眼看是一场骗局。遍地哀鸿，人相食，灾荒报丰收，打肿脸充胖子，大搞水利养猪以达劲可鼓不可泄的目的，右派分子如何能摘帽子，各令返回原阵地？局势一天不好转，只能来一个 10% 左右，备备节日气氛，做一个政治勒索的资本，如此而已。即以商城劳动队而论，摘掉帽子的人离队根本不可能，只能就现有基础，创办一些事业，仍约束群魔，不蹈洪太尉复辙。

若要真摘帽子，必待另一个历史问题的决议出来。这件事之来到，为日无多。世界形势，决不容 Stalinism（斯大林主义）在中国复活。1959.4，全国人大的气氛，宋庆龄的和平，

进步，正义是正宗的。目前的妖魔邪气，何能持久？

人相食

除民间大批肿死而外，商城发生人相食的事二起，十九日城内公审，据说二十日要公判。一是丈夫杀妻子，一是姑母吃侄女。

二十日进城买痰盂，遇蔡璋，蔡告我这个消息。既是公审，自然满城风雨，但在劳动队内是传播不得的。

公开说谎

公开说谎，已成风气。岁初，郑州会议时还想恢复实事求是之风，积弊已深，骑虎难下，反右倾鼓干劲一来，事情的趋向就算是暂时肯定了。现在类似舒同所写的文章，都是表示态度，其中最重要的是：毛主席的领导决不会错，跟定毛主席走，是中国人民长期斗争所得出的最重要的经验教训。至于事实，尤其是农村现状，所遵循的唯一原则是根据上级的指标定产量，根据上级的意图做调查而已。

人民公社典型调查

人民公社典型调查发表了一批，其中有浦江的种菜养牛，黑龙江的机械化，上海市郊的公共食堂——“并起来吃”（？）等等，都丝毫不足以代表本部各省农村。

本部各省农村的命运——对地球开战

不幸本部各省，条件最坏，人口最密，而 1959 除河北省一省而外，无一省不旱，无一省不灾。

旱与灾二者之后，又决心对地球宣战，从历史命运说，是有某种必然性。因为这些地方的人，啃山吃水，消尽自然资源，若非灾荒一兵一匪，必是治山治水，慢性饥饿与死亡。艾奇逊说，任何一个统治者都无法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确实值得思索。有人要解决吃饭问题，只能用活人的生命消耗来对

地球宣战。一则补偿列祖列宗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二则减少农村人口以改变糊口经济的现状。除此而外，岂有他途？

逃窜犯——农村体制

实现这一套办法的体制，经多年经营，已经成功。其结构如下：

甲。公安户籍体制。有此一条，灾区农民，无法流入城市。每天吃菜一顿，也不能再外出逃荒。

乙。人民公社，仍然是产业军体制，它把纯粹农村结构组成营连，并可以从中随时组成野战军（如水利）队伍；

丙。公共食堂，把农村粮食消耗彻底控制起来，使“粮食出荷”不足以造成骇人听闻的个别饿死人事件，饥饿限于慢性，死亡起于肿病。医生若说是饿死的，医生就是右派或右倾机会主义者。

所以，在宪法有居住自由这一条规定之后，又有逃窜犯的名目。

商城除综合队3—400人之外，城内还集合了200多人在盖戏院。这些人都是到处找吃的人，看来队伍还得扩大。

再记蔡璋这个大滑头

蔡璋，回队后不避重劳动，结果又大发烧，卧床数日，沈把他送回医院。买痰盂之日，看他整洁健朗，大街上买套鞋。到城关镇医院，他独占一室，并与医院的人搞得很好，可获额外供应。他给我信阳饼三个，硕大味美，比本地饼在分量上可抵2.5个。我在医院吃一个，晚间床上吃一个，翌晨和稀饭吃一个。

这个大滑头，在队时斗柳学冠龋和尚 一切曲加人意 瞄

食品与药品

连日发病，我不得不谋自全之道。食品来源，愈来愈窄，就向药品进攻——决心买虎骨酒与鱼肝油。

虎骨酒与鱼肝油托吴华买，医生做这件事，应该不会批评到我身上。

向药品进攻，已成风气。八组的人，买鱼肝油者极多——八组除少数人外也都肿了。所以麦精鱼肝油已经买不到，现在只能买到果汁鱼肝油。

我估计今天吴华复命之时，可能没有鱼肝油，只有虎骨酒了。

商城人口

商城全县平均，每人不足耕地一亩，还包括北部平原黄泥巴地在内。1929以前，商城红了，又变白了，死了一批，走了一批，但人口耕地比例，若有不确切数据，目前必低于1927以前。

彭铁不足三十，孩子四个。黄渤一家十五口，其中孩子九个，没有超过九岁的。不死一些，这片土地如何能养活如许人？

咸菜干饭树兜子大，天上神仙不如我

人口如此，而农村经济的基本方向，可以何祥福昨天所引证的商城山区人所自豪的一句话来描摩其典型的糊口经济方向。

如果山区的这家人家，过神仙生活之余，孩子一个一个下来，又无耕地可辟，必定做樵夫，破坏山林，最后全家沦为贫农。

因此，我要改正一个看法，土改后，人多劳力少的合作农户，改划为贫农成分；人少劳力多的农户，改划为富裕农户，原来是有道理的。中国农村的阶级变化，决定于土地所有

制者，比重恐不到一半。人口增殖对阶级构成之变化所起的作用，恐远甚于土地所有制。

在此种糊口经济与人口大量繁殖的情况下，若无统购统销，人民公社，用进口粮食来满足工业建设的需要，一个高商品率的农村经济永远无法形成。农村不会有积累，所能积累的只有自然增殖的过剩人口，这部分过剩人口将压低城市劳动力的价格，障碍机械化的发展。

政治的取舍

所以，这劳动队所锻炼出来的我的政治态度应该继续下去——做一个历史观察家。我不忍参加这个剿灭人口的向地球宣战的战役，然而中国除此之外，别无其他途径可走。这个战役不会长期继续下去，结果必将以坦率、开明、宽恕、人道主义、文明的方向来代替目前的用说谎、专制、严刑峻法、无限制的斗争，黑暗的办法来完成历史的使命。这些都是不好的，然而贫病愚昧，还自夸天上神仙不如我的农民，又如何能文明得起来。只好消灭一部分，从中培养出一批新的人来，新农村才能建成。这个历史使命完成之时，新局面就要开始。新局面开始之后，或者我能再干些什么？新局面开始前，沉默自全，跟着走，记录历史，使这个时期的真相能为后世所知，但坚决不做纳吉，如此而已。

这个体制会自下而上地崩溃吗？

答复是不会。

农民中确无能人，劳动队这些人看不出有什么可做农民的政治代言人的。徐云周也许是一个，然而他能提出什么政治方向来代替现在的一套？

何况整风反右，加上反右倾鼓干劲，把仅属于萌芽状态的农民代言人禁锢起来，或者大洗脑筋。农民自己是作不了什么事的。

再加上国家这个统治机构，从农民中选拔了大批人当连长营长会计技术员高中生。统治阶级愈善于自被统治阶级中选拔人参加统治集团，它的统治愈是稳固。当然，这不能代替说谎，专制，道德败坏。……

所以，这个统治体制是崩溃不了的。禁锢与思想统制愈甚，裴多菲俱乐部出现的可能性愈小，统治维持下去的可能愈大。

何况，这个体制面临危险的边缘，1959 仅其第一年。1960 若有丰收，再加上“工业支援农业”，只要一年有半年干饭吃，再叫人具体看到水利、机械的好效果，略松松弦，中国农民是容易满足的。

真正的改弦易辙，必待农村财富积累，可以从生产资料这个盆边溢到消费资料；必待糊口经济的强力改组已消耗完了它的生命力，放宽，有利于生产发展之时才行。在中国，这意味着粮价提高，农村粮食供应尺度放宽，公共食堂方向取消而代之以严格的工资制。公社有力量为农民营缮新宿舍等等的时候才行。新制度是工资制度，新制度不仅不是吃饭不要钱，而是吃饭很贵，少一张嘴，生活水平提高很多的制度。

五年之内，仅见曙光，十年，庶几有成乎？

十二月二十三日 李谈话

(本页日记缺正文)

十二月二十四日 上午五时

要走了

前晚赵淑仁主持的会上我提出要找李克征谈一次，昨下午发烧至腋表 37.4 度，刘复生要打针，我问他打什么针，他说药水针，我说废话，这样，昨下午双重任务进城，找李克征，到卫生院。

李克征不在家，女秘书说看房子去了。准备先到卫生院，门口见李，劈头就说 28 日集中县城。谢天谢地，该离开这个集中营了。

9/12—12/28，前后共计 100 天，是整数，倒也凑巧得很。还未结帐，反正劳动日在 200 天以上。

人们继续在这里受难

可是劳动队的解散是遥遥无期的，人们还在这儿受难，连何祥福何时走都不知道。

劳动队固然是天堂，但 1959 的劳动队，艰苦甚于 1958，预计 1960 更甚于 1959。先不说别的，1959 的春荒，不能不影响到劳动队。若维持 34 斤的吃粮定量，已够大家受的了。

固然是群众不济事，决定领导可以胡作非为，然而我不能不深深怀念这儿的人们。

生活水平与秘密供给

说劳动队的生活水平高于农民是事实，可是在此哀鸿遍野之际，商城生活水平高的人还有的是。

蔡璋说，他那儿住着城关公社的党委书记，天天吃肉，天天吃炸油果。接新兵的人在这儿，开各色各样现场会的人在这里，天天好好招待。而医院病人无肉。预计我们集合时生活不

会太坏，因为来时农村日给六两，我们却生活得十分奢侈。

更甚的是群众。街上卖咸菜是食品商店的唯一业务，很多人买了，就当饭吃——在路上用手送到嘴里就这么吃起来了。

黑市价格

米五角一斤，鸡粮票二斤，青菜一角几分。

上午八时

各有各的吃的门路

从李克征那儿出来，时间不到三点半，跑到蔡璋那儿吃了一点健身粉——炒米粉。

忽然权少珍来了。事后所知，是萧海滨要他来找蔡璋搞点吃的东西——糖、月饼——无一不可。

蔡说，各有各的吃的门路。黄海泉也吃，杨荫堂用劳动队名义买来的东西，供应几位大人的恐怕是不少的。

所以，人应学会一面骂庄永胜，一面自己搞东西吃的本领。

你们是有罪的

沈则公开地吃，鸡，肉，常有。有人提意见，说是自己买的。若说我为何不能买，那么回答就是：你们是有罪的人。

这当然不适合于黄海泉。黄是牢狱里的龙头，本身也是有罪的。

所以问题还不在有罪与无罪。

最后一次站岗

昨晚赵淑仁还要督促我写，答以站岗。今晨为了弥补这个生硬，把与李谈话的经过约略告她，以缓和空气。

最后一次站岗，起身三时，根本未到外面打转，门口站站，唯烤火而已。

公开要求喝米汤，喝了二碗，实在不少。

今天午饭

今天午饭是跃进灶蒸的糯米饭。我准备把剩余的糖一下用完，加上大量鱼肝油。进城以后，吃的门路还多，不用保留了。

何祥福也走

摘帽的人也要走了。何祥福已到组织部门谈过话，还到教育工作岗位。今晨写了一个条子给他，告诉他通讯地点，相约通讯。走，也是 28 日。

要与徐云周作一次秘密谈话

26 或 27 日，决定与徐作一次谈话。所有东西，全部送给他。但方式，还要考虑。

不劳动了

今晨，决定我们全日写材料，也许从此不再参加劳动了。

预定写是二天，但所剩 26——27 二日还能做些什么呢？

我这二天，可以休养好了。

最后一天劳动

上面这二三小时在打猫熊，烤火烤得很舒服。从这二三小时所知情况，劳动已经结束了。

所有摘帽的人都 28 日走，除几个队长。所有摘帽的人都在打猫熊，等候今晚上库部长的报告，那我们还会做什么呢？

因此要记录这最后一天的劳动。昨天上午，正值前天被责之后，早上匆匆整理粪几子，站队一散，马上出发。前天既把坝顶上石头缝里的散粪捡完，昨晨的捡粪就来得困难了。坝顶厕所，粪不多，有一个民工说你们捡不到粪了，因为我们都喝

米汤。在坝南端取土地方巡回二次以后，再到坝顶茅房，所得仅半担，想往北巡回后下坝，刘世明去了，只好下坝找坝下的茅房。哪知下坝后第一个目标，存货很多，捡完后满载而归，归来正好吃饭时间到了，极为顺利。

在这个厕所内一个看来是基层干部的人在拉屎，便秘，硬是用手挖出一个个粪蛋。我想和他交谈一下农村吃饭状况，他只说了现在没有米，过年时国家会供应，其它不说了。他是越美的，我问他越美在哪里，他说说给你也不知道，你捡粪，捡了走不就行了云云。于是我只好走了。

再写些什么？

李克征还要我写，大纲还与大家一样：

一、右派言行及其已解决未解决的问题

二、红专问题，人生观问题

三、劳动群众阶级观点

四、对人民公社，总路线，大跃进的意见

写什么好呢？踌躇整整一个上午。

想这样写：

第一部分：

甲，思想根源；乙，个人迷信，波匈事变；丙，阶级斗争熄灭论；丁，大国沙文主义；戊，前进的道路——宽恕，放慢，个人崇拜。

未解决的问题——统购统销

新添加的问题——农村情况

二年来的认识：Macro declaration（大声明），总路线，人民公社

大跃进

工农联盟问题与阶级问题——二者择一问题

宽恕与改造问题

情绪上的问题——自由平等博爱问题——所谓世界观问题
——旁观者与投身于斗争之中
领袖与群众——跟毛主席走不会错
大国主义，中苏关系问题

第二部分：

单纯技术观点，已如检查
技术业务为政治服务的前提——意志统一
上下贯彻，高速度的前提
政治挂帅
群众路线与社会主义民主
社会科学——对谁有利——客观主义

第三部分：

劳动观点，一穷二白，实干苦干——眼睛是狗熊手是英雄
劳动生产率问题——水利建设为例，三并举问题，土法上马
大坝合拢与水竞赛
抗旱种菜
我们祖先的斗争与当前农业四化，工业技术革新问题
群众观点，群众中先进人物
阶级观点，当前阶级斗争的中心问题——小生产者的自发
资本主义势力

十二月二十五日 上午十时

休息

正如预料，24日以后就是不劳动了。趁，写什么材料，
我把它看成是经过半年以后的大休息。

昨天下午吃糯米饭，加了大量的糖与油，消化极端良好。下午到地里正遇上收胡萝卜，吃了四条。晚间讨论他妈的郭如山的人生观问题，睡时已十一时以后，已觉又饿又冷了。

今早起来后根本无意于写作。沈在昨中午站队时说我们要在 27 日前交总结，以便作鉴定，昨晚我提出我只能写成初稿。今天赵淑仁说今晚要讨论人生观问题，我说我可以说一下，写时，因问题分散，写不起来，还是休息。

与赵淑仁吵架

昨晚乘便对赵淑仁反映归田一事表示愤慨，她说了我对菜蔬农业有兴趣，不关心政治，我说这是九指与一指，最后她说我自满情绪又上来了。

去他妈的 X 的自满情绪！

我只要把归田的愤慨情绪表达了也就行了。

处理东西

开始处理东西。

送给徐云周新缝成雨布斗篷一件，旧衣四件（补裤二条，汗褂二件），瓶子一个。竹箔也送给他了。

准备把撒尿的一套东西送杨学廉，家具送下棚，实际是送徐云周。

给杨永华二元，准备要他来一个夜宴。酒，加胡萝卜，菜心，及其它菜类。

下午四时

补记库部长报告

昨天，盼望已久（本说前天）的库部长来做报告。逗留时间长，吃二个鸭子，炒了芫荽菠菜，晚饭后先学习了一小时，

七时半起作报告约一小时，比王检察长简单扼要。

可是论据贫乏，捉襟见肘。说商城丰收，只说坚决不容置疑，只说怀疑是立场问题。说形势无限好，连劳动队形势也是好的，提倡改造中的乐观主义。可是二者也都缺乏论据。这比沈的成天指责，当然要好得多。沈是挫尽人们的自信心，一天到晚用整人来压服这伙人。库希望这些人还象人，但对肿，只说了二句话，好人不可能不病，病人不可能全治不好。所以，归根到底，掌声并不热烈。

如今事情大率类此。劲可鼓而气不可泄，弄来弄去，气劲也不过如此而已。

十二月二十六日 下午二时

休息生活继续着

这休息生活还继续着。

昨天是到处找有火的地方烤火，下午到猪场建设工地担了一挑劈柴，也在那里烤了一阵。天色阴沉，奇冷，白天冰凌不化。今天早饭后在澡堂打了一个盹，冷极了，刘复生说去卫生院看看，跟赵淑仁说了一声，实际是到蔡璋那里坐了半天，回来正好午饭，饭后在里厨房灶上打了一个盹，头痛，如今又来到澡堂里写写日记。那个总结还早哩，不忙写，看看到底要求什么再说。

座谈会

昨日晚前晚都是座谈会，中心是郭如山的人生观，那是一个雇佣者的人生观，批判的人却也不能脱离这范围。我昨晚简直未发一言。

如今强调无产阶级的革命人生观，所要求的到底是什么

呢？是一个职业革命者的人生观吗？显然不能对全体人都作这样的要求。所要求的是向秀丽的人生观吗？……

高尔基还区分了家雀与海燕，可是海燕是少数，如今的海燕又岂能对大批饿死的人充耳不闻？海燕又怎能是驯服的工具？所要求的是驯顺的家雀，摘星星摘月亮的大志都是可怕的东西，而又要提倡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其间逻辑的道义的联系，简直是弄不清楚了。

不如承认多数是家雀，同时承认家雀的各种权利。家雀之中什么有海燕，干脆把家雀与海燕区分为二种才象话。

可是现在什么都变得朦胧不清的了。……对一般人又要求无产阶级的人生观，而实际生活又实实在在做不到这一点。空话连篇，相互欺骗。如果一边强调交心，一边极力掩盖。思想革命，政治挂帅做到如此地步，实在可怜已极的了！

十年前强调入城后腐化的危机，闯王集团的这个危机是自上开始的，不图我们亦复如此。

饥饿与食品供应的危机还在发展

上次进城离今日不过三天，城内食品供应又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卖酱的卖咸菜的也没有了，卖饼子的停止发卖了。蔡璋说，住在那里的食品加工厂的厂长说，乡里一窝窝的饿死，还能做饼子卖？

工资

蔡璋又提供一个工资的资料——城内新工人一律 15~18 元，所得比劳动队的少。

仅商业系统，每个店员提供的利润 150~160 元。机械厂呢？每天也是四五点上工，晚上还有夜工。

所以王书记有钱，可以慷慨地准备以十万元建设公园了。

建设——大会堂的例子与劳动力价格

王书记的打算不是没有范例的，范例是北京的大会堂与国

庆建筑。

所以人民公社是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而产生的。这把人的劳动力的价格贬低到无可再低的程度，它阻止城乡劳动力的流动，它提供县社工业廉价的劳动力。

这样，积累的速度将是可惊的。大小工业将不计成本地建立起来，还有剩余，那么北京的大会堂，商城的戏院就会应运而生了。

可是这是严重的摧残了劳动力的供应。也对，劳动力的供应缩小了，工资才能提高得起来。

本部各省，1959—1960，在或高或低的程度上，按商城的方向在发展着。

如果 1960 丰收怎样？

如果 1960 丰收，1957 年前的局面也永远不会再来了。

养畜业，农民一般群众将仅处于饲料收集与在限价内发卖的地位，种植业则是 2.5 元/月工资的劳动者，农村建设还要加紧进行。吃饭，菜与红薯的成分会少些，可能吃得比今年饱些，饿死人究竟是可怕的，然而 57 年前的局面不会再来了，直到实行下列的根本改革为止：提高粮价，农村全面实行工资制度，粮食自由供应，公共食堂自由化。

劳动队人物志

里厨房 沈万山 黄鑫诠 罗正安 萧海滨 刘应中

杨柔远 张彦生 徐可嘉 杨荫堂 老 姜

外厨房 杨敬超 张泽华（当过伪看守，一类）

谢德征（小学二年教师） 夏伯卿

缝纫室 周北萍 赵 刚 刘美悟 张保珍 雪 梅

张克侠 (?)

理发室	冯顺	邓振兴	王折溪		
菜园	何祥福	杨永华	余济美	刘方海	柳学冠
	陈舜初	蔡璋	王宏亮	徐云周	刘世明
	顾准	赵淑仁	李宝仁		
七组	柴广坤	李光汉	骆昭田	刘北勤	朱正翔
	毕祥麟	李学海	沈保平	岳正中	王进先
	王再映	陈德选	邹松航	杨刚	杨明昭
几个病号	李国庆	鲁涤寰	庄永胜	王冕南	杨义昭
	刘引光	姜实唯	蔡从兰		
八组	王秉三	张世英	甘斯益	张承业	黄渤
	张振武	张培从	杨永新	老余	宋一峰
	余本江	(针灸医生)			

其他突出人物

廖鸿义	(猪场)	宋步初	(综合队)	
任保乐	刘复生	(医生)	吴华	(医助)
高航	(铜匠)	岳乐	郭鸣剑	张士元

十二月二十七日 下午三时半

还是休息

这真是大休息。什么也不想做，什么也不想动，昨晚上七时半睡下，今晨六时半起身，硬是睡了十一小时，早饭后，午饭后，还各小睡了片刻。中午饭向杨柔远要求单打，张泽华给饭，老姜给菜，各约比平常分量增加 $1/4$ ，加一两以上的鱼肝油，吃完觉得十分饱，喝了茶，小睡片刻之后，又是很舒服了。

赵淑仁说，你自己去跟队部去讲

早上站队，赵淑仁催总结，我说初稿未完，睡不起来，她说你自己去跟队部去说。站队未完，我就找沈，说我病，写不起来，进城还要学习，写完后复写一份自己送来队部，沈一口答允，并说你还是抓紧写。中午躲在里厨房锅门口吃单打饭，黄新全（前误黄海泉）问你怎么这时候就吃饭？我说小组吃饭凉，杨组长批准单打。他问写起总结没有，我说身体不好，没有。我接着说进城后还要学习，黄也同意这跟写总结有关，意思就是在此以前，写总结是白费。队部一关，算是通过了。

与沈、黄说时，挨上去，请求指示，态度诚恳。凭此一点，就足够把你赵淑仁甩开了，其实，队部鉴定，正如权少珍所说，早已写好，与总结又有什么关系呢？

进城以后，还要继续闹病。其实也确实不好。晚上睡下去，胸口痛未已。身上乌糟糟的，急待整理一番，在这里却什么也不想干。

该理发，洗澡，洗衣服、鞋子，晒被子，整理报纸。明后天参观，真不想去，准备专办这些事。

参观有什么用？真正地了解情况，该听四面八方的反映，例如权少珍说，他出差时，住在一家人家，听晚上大哭小叫的喊叫饥饿等等。

拒绝支援

至今还有人要求我的支援。权××要借五元，彭××要我的鱼肝油，一概拒绝。

从彭××在讨论会上所说的话来看，这半年他已经屈服了，他的哥哥对他是有影响的。他追求的是摘帽子，不复想回马来亚了。

权××是大少爷，拼命搞吃的，你吃你的，我可没钱借给你吃。

所有这些人的品位，都低于何祥福和徐云周。何志在飞翔，徐忠于他自己的政治见解。这些人，都不过是图谋一技之长，维持安适的个人生活而已。昨天下午与何祥福还谈了一下这些问题，并相约一定通讯。

下午四时

与徐云周谈话

下午，尤文瑞来要植物病虫害讲义，找老徐自己来取。在此以前，坐在大棚里看报，跑到苗圃的里屋子里也谈了一回。

老徐着急的是总结如何写法，其实这个人只是还没有学会如何撒谎而已。我说了三言两语，他认为可以解决问题了，无非是学会说谎这一句话而已。

徐说，他准备到城市去，做码头工人也可，我跟他说无论如何不要如此，坚持留在农村。

我跟他说，历史要重写的。谎话连篇，哀鸿遍野，这一段历史如何能不写？

二十八日 上午十时一刻

劳动队的最后一夜

入晚，因喝了几口酒，昏昏沉沉的。刘世明突然叫唤我，说我是上班，他是下班，还要站岗。

人们都去上工了，我跑到八组去睡。人们将要回来了，我跑到外厨房烤火，这就是最后一次的站岗。

柴火堆已经没有了，人们只能偷萝卜种。劳动队对劳力使

用反正是不计成本的。

晨四时，便急，又到外厨房烤火，这样结束了劳动队的最后一夜。

元旦前的劳动

昨天本来好容易买到一些白酒，准备晚上在上棚喝酒的。商议好了请黄队长也来。傍晚，在澡堂等吃饭时，突然杨永华来说晚上上工，喝不成了，酒也给了我。

晚饭后集合，沈讲话。他说库部长对猪场进度很满意，要求年底前四天内完成。他说，他准备每日公布每人的劳动情况。他说，过年，商业局不供应，他准备自己抓生活，至少搞到一百斤酒，大家喝一瓶。这回他说的全是鼓励的话。

他说，思想总结不做了，过年再说。劳动队本来是纯粹的劳动，何必过问思想？

今日上午

别了，劳动队这个 Concentration camp (集中营)。

二十九日 上午八时 城内澡堂
离开劳动队

午饭

午饭还是单打，说是最后一餐了。我在里厨房拿起一个大盆，老姜给的菜不少，杨静超给打饭，存心想多打一些，他说菜在下面，怎么办？意思是再打就不好看了。我说够了够了，其实觉得对劳动队多吃多占，实在不好意思。饭是拿到澡堂吃的，烧了一碗红茶。

打行李与搬行李

行李，十时一刻前就打完了，不幸事后发现少打了一条毯子，也好，今天去拿，还可以在那里混一顿午饭吃。

报纸、胶靴和暖水瓶，存在储藏室，准备再走一次去担，整起来的行李一个人挑得了，“菜园顾”的扁担架好待命。

徐云周把竹箔和模子挑走了，杨学廉来打饭时要他把痰盂和罐子拿走了。

沈场长指示

午饭后，坐在杨文华一起，还是缝纫室的南墙外，交换几句分别的话，赵淑仁来叫向沈去道别。

等彭楚南不来，五个人先去，沈场长老实不客气地指示了。其内容是接上头接不上头，我对你们的教育如何如何等等。所说的话只有一点是有内容的，就是要从大处看党的成绩。这意思就是，说谎，饥饿，死亡都是小事，你们回去说话小心。

这个王八蛋居然自称我对你们指示。假如有那么一天，让我来审判你！

接上头与接不上头

权这几天在洗澡堂内在蔡璋处说了好几次所谓接上头接不上头的问题。蔡璋说了一些事情，使我恍然大悟他之所以接上头之故。原来他经常买东西给沈的孩子吃，而且这一次临走之时，还跟蔡璋商量，买些什么送沈呢。从此以后，我对此人鄙夷到骨头里，再也不理他了。

要蔡璋卖大衣手表

另一件事是蔡机关补助要劳动队证明，沈说他有呢大衣，手表，为何不卖。为公家节款，还有理由，可是他同时要刘应中找蔡，20元买呢子大衣。又找另一人，80元买他的手表。

蔡璋有呢子大衣和手表，别的人有筋肉与骨骼，各尽所能，各贡所献，沈眼中的右派，就是如此而已。

行李一架子车运，崔方督送

行李是三辆架子车送的，崔方负责督送，同走的还有五六人，何祥福也在内，行李都装上车了，另一人的行李，专人挑走的。

架子车送了行李还去拉车。同是右派，开始分为高低了。

送别

送别的人很多，杨文华有依依之情，赵刚特别真挚，徐云周避嫌不来。

就这样，离开了劳动队。

开始过自由人的生活

到底算是释放了

还是住在县委招待所，各归各队，赵淑仁的权威开始解除。

赵家骅他们未到，农场欢宴。我跟赵作了最后一次请示报告，上街转转，走了。

现在想到哪里到哪里，开始觉得还不习惯呢。每晚上，土壤队那一伙喝的喝，睡的睡，我七时睡下，完全合法。我今天不到长竹园很容易的通过，这才真正觉得是释放了。

吃饭，粮票，想吃东西与犯罪心理

在蔡璋处闲聊，还以为县里对我们吃饭会特别照顾，结果是不如劳动队。每天十七两粮食，基本无菜，只有咸菜。饭也是蒸的跃进饭。昨晚今晨，都是半斤的干饭，是一天中最丰富的一次。其他早饭三两，午饭六两。

粮票赵淑仁只取了二天加一顿的，她给了我三斤。

蔡璋说，只要有粮食，可以到他那里搞东西吃。他买了五斤面，可以做油馍云云。

于是我要找粮票。土壤队的人，从农场把一月分的粮票全取来了，今晨他们去长竹园，我大声征求粮票时，陈定一就给了三斤。这下不行了，这二天是完全自由了，可以搞点东西吃了。

可是有一种犯罪的感觉。若在劳动队，这不是彻头彻尾的犯罪吗？

长竹园的二天

人们都到长竹园了，只剩下我在这里，我是真正的自由

人。

昨天买了二双线袜，脚下整齐起来了。今晨到澡堂洗澡换衣，短裤里尽是屎，晚间起床便急所致，早已知道，未换，今天也换下来了。停会去理发。

下午要洗衣，晒被，中午到劳动队去取毯子，并混一顿不要粮票的饱饭吃。邮局也要去一下。

这些事，今天一天可以办完，明天做什么呢？是颇费踌躇的。

队的计划

估计大队计划，元旦或二日前，不准备办正经事。29、30二天参观，31过年联欢，元旦放假，可是我却过不了这么多的休息天。

29—30二天弄几顿饱饭吃，31、1日不会饿肚子，填了这么几天，不干活，24—1共九天，几近一旬之后，生活应可趋于正常了。

写那个总结，只要苗头看准是不困难的。有一个良好的写作条件，写起来是容易的。现住地点这个条件是有的。那一排南房与墙角交界之处，中午十分暖和，昨天就在那里看报。

那么其他时间干什么呢？开始整理这200天的日记，倒是一项重要工作，或者，拔长耳朵听各方面的意见也好。

睡觉

睡觉，九人一屋，统铺。但究竟是床，不是竹箔子。房子阴湿，究竟不是新泥的墙。是房子，不是棚，比八组那几干燥，暖和，强多了。

而且，床头还可放烟，洋火，手绢，不愁会掉下地去。盖的棉大衣，不愁两袖、二襟垂到湿地上弄湿。总而言之，这已是真正的天堂了。

洗脸，洗脚，抹油与早上喝开水

晚上打到开水，早上温水洗脸，今天明明想洗澡的，但洗完脸还对上开水多洗了一次脚。

到澡堂洗澡之后，开始用李宝仁给的凡士林大量抹手。龟裂冻疮，能在回京以前消失无余，这是最所希望的。

下午二时，城关镇医院
劳动队的最后一瞥

相约今下午的宴会

从澡堂出来到蔡璋那里，相约今晚的宴会，留了二元和一斤粮票。然后理发，理发完了到劳动队。

到劳动队是为了取毛毯，出乎意外的肥皂盒子也找到了，厨房的人捡还送队部的。在那里找杨柔远吃客饭，这里的午饭丰盛，半斤粮票二毛钱，别处是吃不到的。

但谢德征和老姜打饭打菜都一般化，已无惜别之意，这是最后一次了，下回不再来了。

劳动队的伙食

劳动队的伙食是好的，他们今年的阳历年，丰盛胜于城内机关。因为自己种麦，自己种菜，而如今是自给的世界，不是商品生产的世界。

城内，特权分子是生活得好的。食品加工厂厂长将供给蔡璋点心，我今天准备弄五斤胡萝卜回去。交换一下，维持到元月四五日的伙食能吃饱就好了。

城内机关伙食是不好的。如今压缩得厉害了。

买胡萝卜

向杨永华买胡萝卜，三毛钱买了五六斤。杨永华与杨学廉二人亲挖，杨永华登账，杨学廉证明。

从帐本上看，杨柔远买了萝卜，每斤一角。张宝修买了，杨永华买了。我的帐登记的是三斤，也是每斤一角。

不到市场上，根本不知道那是咋回事了。

用一块包裹的布衬里，用遗忘的毛毯包起胡萝卜，这就最后离开了劳动队。

下午七时，县招待所

大休息的最后一天

吃饱了

在蔡璋那里吃饭，他给弄了二个烤馍，大约半斤米的糯米饭。烤馍无糖，只有一些盐。糯米饭里放下了五六个胡萝卜。他给打了五角钱红酒，买了医院的一分菜——青菜，粉丝，很少一点豆腐，从二点半吃起，吃到三点半吃完，吃饱了。

半醉与睡觉

五角钱的红酒也给人以睡意。毕后匆匆回招待所，就睡着了，一直到七点半以后，半醒半寐，简直不想动，懒得象一头冬眠的熊。

梦中干活

这大休息是自由的，合法的。连日来都是如此，但连日来都不断在梦中被催醒干活，总有一大段任务尚未完成。这半天假寐亦复相同。

不能再休息了

然而我自己警觉，不能再休息了。自 24 日以来，大休息已六天。六天中所动脑筋，无非是吃。目前吃的问题应告解决。明天吃招待所饭，随意吃多少，吃饱不成问题。粮票超不超管他娘。蔡璋今天跟我买东西界限分明，胡萝卜储藏在他那里，元旦以后若有需要，可到他那里去吃半天餐，吃饭恐慌应已过去——不，应说，吃饭已不成问题，吃好的是明显的在商城没有希望的了，放下这个包袱吧。

应该干活了。不是撇菜浇粪，而是写作。首先把必须敷衍门面的总结写起来，然后整理劳动队记录的大纲。

明天一天，那个总结应能写成。

十二月三十日 下午六时

劳动队劳动日数统计

六月十二日到劳动队，十二月二十八日离去，实际时间 199 天。因雨，因事非体力劳动时间共 19 天，其间大体可以自由支配的只有最后四天，其它无非集体活动，只有几次到卫生院检查身体是例外。正规的劳动时间（清晨一节，上午下午各一节，平均每日 9.5 小时—10 小时）之外，加班共 40 次，以四次加班折合一个工作日计算，加班时间共十天，所以体力劳动时间折合 190 天。

在商城的体力劳动统计

农场	80 (共日数)	65 (体力劳动日数)
劳动队	199	190
	279	255

连同在华北的参加体力劳动时间，共 350 天左右。

在乡时间

在乡时间

华北 180

商城 310 (估计)

490 天

今天这一天

今天这一天，开始好好过日子了。早上慵睡至七时，七时半早饭后到澡堂洗澡写东西到晚饭，那个总结的主要部分已经写成。明天不费多少时间可以完稿。晚饭后做了上面那个统计，工作地点是我们所睡的那个房间。晚上有电灯，这个房间就变得可以利用的了。

吃饭，早上稀饭六两，和鱼肝油，中午干饭，十二时，和鱼肝油，及虎骨酒。饥饿病在冬蛰中逐渐过去，晚间青菜二盆，干饭四两，还需要烧点茶喝了。

计划明晨到蔡处煮胡萝卜吃，把早饭的粮票节省下来。午饭在招待所有鱼肝油，最多吃半斤。晚饭再看情形。

大雷和长竹园之行

昨傍晚下雨，晚间转为雪，今日整天未停。长竹园这大伙今天未回，回不来。我坚定不移地不去是正确的，若去，冻，饿，疲劳交集，恢复体力就成问题，反而还要加病了。

体力正逐步恢复中，右胸肋骨痛逐渐消失，左腿股骨发酸，是旧病的影响，发作一会，以后准会逐渐消失。在澡堂二天接连用凡士林涂手，半月内虽不能恢复原状，估计也会好转的。

生活可以逐渐正规化

今天的生活已开始正规化，但还不够紧张，下雪，黑屋子与此有关。今后，据说不久要搬到宾馆去，那儿生活条件工作

条件更好，可以好好工作了。

总结对我是不费事的，问题只是窥测方向，初稿已成，改作誊写费时不多。劳动队的记述可作，但要看工作条件而定，未必能畅所欲为。

有一个工作可做做，把人民日报所发表的人民公社的典型调查作一个类型分析，并加以评论。这对边疆农业的分析与本部农业的比较是有用的。

下放干部的变化

回后，与下放干部接触太少。初步观察，比初来时大有变化，对吃饭问题的反映尤为敏锐，尤文瑞他们在木河大队每天吃一顿菜，都肿过。历史所一个女的，谈到那里的吃饭问题欲言又止。

Dr. Johnson said

Bishop of Canterbury, Dr. Johnson said (坎特伯雷大主教约翰逊先生说) 饥饿在中国已成过去，人民日报用花边新闻加以登载。这些下放干部，从今而后，学会听其言而观其行，不再轻信了。

湖北省的劳动锻炼文集

大队发给每人一本劳动锻炼文集。大体可以引起 1958 年下放锻炼的回忆，应该说那次下放的作用还是积极的，因为正处于一鼓气盛之时，1959 的下放就鸣乎哀哉了。

观察记述，也是今后十多天工作内容之一。

计划明天的工作与推测今后的形势

写了一封给采秀的信，在厨房烤火，遂还不想睡。

计划明天早上到蔡那儿吃早饭，写完总结，到老朱那儿探消息。到邮局发信取款，到卫生院取二角钱，回来午饭，下午再说。

写下下面的推测。

今后三年的经济形势

7000万人在水利工地与铁佛寺水库，伏山水库

今年水利冬修，全国有7000万人，相当于1958年的大办钢铁。

铁佛寺水库水与坝争高，这场大雪，我怀念那里的民工。伏山水库，坝高仅一丈，完工还早。

驱饥疲之众，到处是新开的工程，这些水利工程到完全修成水渠系统，完成土地与灌溉系统的整理，没有三年是办不到的。

现在有水利高工效运动，然而

小洋群的装备与工业配套仍将耗尽一切工业的增产

小洋群炼铁据说有了进步，然而所有的中洋群达不到中型企业的水平，进步是极有限度的。加上选矿，耐火，炼焦，动力，交通，今后几年，工业配套，仍将耗尽工业所增产的产品。只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工业中劳动力的增加，极端受到了限制，这也是政治挂帅的结果，它的代价就是用新的工业增产来装备工业，以提高工业劳动生产力。

农业四化，限制于商品率高的地区与部门

工业方面的这个形势，逼迫城市供应，使商业极端追求农产品的采购率，于是现在高唱入云的农业四化，不得不极端限制与商品率高的地区与部门。北大荒国营农场的商品率极端被赞美，重庆的蔬菜肉类自给也相同。边疆农业，郊区农业，再加上经济作物区，是今后农业四化的重点。

本部农业的商品化与农业四化的性质

本部农业也强调商品化，糊口经济阻碍商品化，索性利用公社的组织，搞千头猪场之类的东西。今冬，除 7000 万人上水利战线而外，搞猪场的人还缺乏统计。

本部农业四化所采取的是别一种方针，叫做城镇支援，而非物质支援。机械是分不到手的，化学肥料买不起，只好土机械化，强调城镇支援。

本部农业的技术中心所能发挥的作用

当然，本部农业也在逐渐建立它自己的技术中心。商城的铁厂与机械厂就属于这种性质。然而要商城的机械工业能够装备自己的水利工地与农业建设，没有三四年的时间，不会发生作用。因为它（一）本身需要国家工业支援，（二）装备工业本身，已经耗尽它自己的生产力了。

本部农业目前有三种负担却几乎不能有所得

所以，本部农业目前有三重负担：（一）支援国家工业化，所以，低价搜集一切农产品；（二）支援城镇工业建设，商城的机械厂之类也靠在它身上；（三）完成农业本身商品率提高的改组，水利与猪场建设属于此类。而本部农业在农业四化方面却几乎全部无所得，那十亿元一年，无非用于提高商品率而已。

水利化，提高商品率，工业配套与本部农业的技术中心的建立都需要二三年的时间

结果是，不仅用双手筑水坝，而且还要用性命扑上去。二三年后，这几件事都开始有成效可见之时，本部农村人口也将减少 $1/3$ ，那里机械化已经成为迫切需要的事情了。二三年后，城市工业与交通，就现有城镇人口提高劳动利用率与劳动生产率已达相当饱和点之时，还要向农村吸收劳动力，那时本部农业的机械化更成为必要。

也许，到那时候，仅仅物质上的机械化已不能解决问题，本部农业在经济上不能不“改善待遇”了吧？

问题的全部关键在于能不能再撑二三年

问题的全部关键，在于能不能再撑二三年

假如 1960 丰收，加上 1958~1960 之际农村已死了一批老人小孩与部分壮年，粮食消耗量有所减少，可以吃得饱些，也许能撑得好些。

~~但是扛肿脸在胖子家音能办得开吗？不今乞丐从饿人？~~

吃了十两午饭，还是随着吃了一顿。

六时三刻，赵家骅回来，要下放干部去听报告，我们则是写总结。总结写得差不多了，我来写日记。

八时半，还有一顿糯米稀饭。机不可失，必须去吃。

今天这一天

今天上午执行了昨天的计划。在蔡璋那儿早饭。蔡不好，吃不下，他是一顿早饭四两，我吃了。还吃了炖胡萝卜六个，然后到邮局取款，到李克征那儿去，到卫生院取瓶款。回来午饭前后，坐在饭厅背后，晒着太阳写总结。直到他们回来为止。

李克征对总结的指示

我找李克征，是为了表示忠诚，告他总结的内容，请他指示。

他基本上同意我的提纲，他阅第三部分还要补充加深。遵照他的指示，写起了第三部分。

现在还剩下要添加的一个第四部分，今后努力的方向，这好写，明天上午他们还要开会，一写就成了。

读报

送来了 28—30 的报纸。4:30—6:30 就是读报，没干别的。读得认真。

东西方渗透

东西方相互渗透之说，已为西方学者所传播，苏联的一位作家专门写东西加以驳斥。

经济发展的阶段论与东西方渗透论，很有兴趣的题目，我是基本上属于这个类型的。

就算我是花岗石脑袋吧。

我将潜伏爪牙忍受十年，等候孩子们长大。

人们对我的观感

人们对我的观感，始终不过是特殊化，有一套等等而已，谁也弄不清我到底想些什么。就这一点来说，我只能讪笑他们的无能。

.....

继续这个态度，潜心研究十年，力争条件逐渐好转以有利于我的研究工作。这才是我的真正的努力方向。

所以要争取经过经济研究所到北大或复大去教书去。

回京后怎么样

现在弄不清的是回京后，如何安排我。到南口去也好，当资料员也好，总比在劳动队强。在劳动队的艰苦的日子里，凭站岗的时间写，凭田野休息的时候读，仅有的资料是人民日报，也不曾中断我的观察与研究，今后还有什么困难环境可以难倒我呢？

一九六〇年

元旦 十时 县招待所

岁末与元旦

岁末，晚八时喝了一碗半凉的糯米稀饭，回来参加赵淑仁的长竹园之行的座谈会。十时就寝，人们岁末联欢到十二时才回。

元旦，六时半起身，七时早饭，稀饭两勺。饭后到商城国营农场转了一下，赵、尹、徐都不在，遇见熟人，都不过一般

的招呼一下，在小王的气象站坐了一回。

九时到蔡璋那里，煮了八九条胡萝卜吃了，回招待所。

其余的日程以后再记。

长竹园座谈会

长竹园看来是商城的招牌。20000人，20000亩地，7000只羊，深山区，地不处交通要道，汽车路才修通，水库没有长竹园的民工。伏天，可能多下一些雨，据说每亩地收了八百斤以上的稻。由山地供给肥料的16000稻田是肥沃的。吃得好，不见缺粮现象，生活安排到明年之日，小麦还每人平均有15斤。他们把科学院的人当作中央检查团招待，一顿十七八个菜，肉食丰富，皆大欢喜而归。

据说食堂办得好，燃料充足，周湾食堂一家有一个火口，热饭热菜，烤火用木炭。现在还有许多木柴运不出来。

权少珍说达权店也好，不象王敖、四顾墩那些地方，吃饭打饭还无饥饿恐慌现象。

二区都处城南。长竹园90华里，达权店60。

这是世外桃源，但愿不要发生“人怕出名猪怕壮”的后果。

安排生活

风闻这次扩干会议又是安排生活。

莫说安排生活是一件简单事，它核实产量，真正缺粮的要供应，因此要有一个严重的反瞒产私分的斗争。除非县委承认估产错了，这场斗争估计对群众的好处不会太大，会有所点缀，那是饥饿病死人现象突出的地方。其它地方在阶级斗争的名义下，还会出现若干惨象的。

用阶级斗争来解决饥饿问题，解决一部分人，摧毁另一部分人，这也好，可以加速农村的纯化，却无助于人口的减少。

商城农场重游

重游商城农场，并无什么突出的印象。岳克旺有了一个孩子了。冬闲不干活，这是张长英说的。二队食堂还是那些人打稀饭，会计室里在写春联，不能记忆全文，其中一句的下半款是“农业四化尽快实现”，他们居然征求我的意见，我连声说好。

小王说，气象科学研究所的预报，今年伏汛还是不正常，是涝的危险大。但愿 7000 万人的水利大军在春耕前能够做成一些事，能够解决一大批问题。Refer (参看) 12/30 人民日报社论开展一次水利大检查。但愿今年的水，还能蓄得一些给明年用。

商城机械厂

国营农场之行，印象最深的倒是那个机械厂。三栋车间已经建成，附属建筑一无所有。看来最南的一个车间，是准备做铸锻工段的，但只见到了一些铸工的安排。车间西段堆置了大批焦炭，西端有人在筛砂。最北的车间最小，不知准备做什么用途。现在是锻工场，排列一些极土的洪炉，还远不及赞皇的合作社。中间那个车间看来是切削与装配的，有人在掏地基，已经运来的机床极少，目前在进行工作的只见一些钳床。

这个机械厂按其目前水平而言，大不如 1958 的赞皇机械厂，它会成长，但远不是一年内所能成长得了的。熊县长说已能够制造什么什么，显然也是牛皮，与收获量，水利工程完全一样。

商城的现代化

商城实在是极偏僻落后的地区，距铁路 360 华里，就决定了这一点，与蔡璋同住的一个架子车工人说，商城架子车大量发展还是 1956 年的事，以前运输全靠扁担，那与赞皇的畜力车与人推车相比，落后的程度是严重的。

商城县委一切都是婢学夫人

由此可见，商城县委一切都是婢学夫人。纪念日游行。工业化，机械厂，人民公社，公园（那甚至要模仿汉口与郑州的规模）一切都是如此。其他还都可以，产量的谎报，却真是大苦我民了。

来时听刘书记报告，对商城人曲尽讥嘲，毫无同情。就是这个刘书记，是公安局长提升的，右派分子就归他管。

农村经济发展的估计

但商城不过是过分了一些而已，其基本路线是拥护三面红旗，拥护毛主席领导，没有问题的。

农村，还是三重负担，农村技术中心的建立还必须是三五年内的事。商城机械厂造起那么象样的房子，使上海弄堂机械厂望尘莫及，目前只装些破烂东西，这现象从投资的经济效果而言，全国各地不过程度有别，基本方向是一样的。

三并举，大家动手搞工业，地方工业的群众运动，与基本建设中的重点主义，无非就是使地方建设投资与劳力耗费提前支付，厂房等机器，水坝等灌渠，涵闸等发电机，因而可以预期成就，目前却支付极其沉重的代价，不仅少吃，而且把人命也都支付上去，如此而已。

对人民公社的估价

保证这一点，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就不能缺少。因为只有人民公社，才能控制生产，控制分配，而且控制消费，才能极度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使生活安排与核产密切结合起来。

当然，也不要忘了，只有人民公社，才能组织大的商品生产，把小的糊口经济生产全部打垮。还有，7000万人上工地搞水利，也是人民公社的作用。

体制已经建成，下马万万不能

既然人民公社已经建立，机械厂已经修好了房子，全部体

制已经完成，下马是万万不能的。下马，是大乱，一切预期效果都会落空。例如，商城机械厂的房子会变成博物馆，伏山与铁佛寺水库会变成长期内的未完工程，连引洮、丹江口都难免如此。……

晚十时

今天一天吃了些什么

除早上一碗稀饭和胡萝卜之外，吃了油炸糍饭糕三块，午饭米饭一碗，晚上大队的聚餐晚饭一顿，实质上等于没有肉食，因为嚼不烂，炒猪肝一盆，萝卜丝炒炸豆腐丝一盆，酒二两，烤红薯馍两个，不算少了，却不觉过饱。

到蔡璋那儿一天走了三次，都是吃完就走。

蔡璋有救了

他哥哥来信了。他姐姐也可以寄钱给他，他很高兴，今天还喝了酒。

我之对待他，决不揩他的油。他对我很帮忙，实际上半年来额外补给的吃的东西都是他设法的。粮票没有亏他，钱只有三四元的富裕了，下回还要留二三元在他那里。

今天下午开始学习了

很有趣，开始学习文件也是集体读，开始前各人表态，区队开会，还要决心书，挑应战一番。

但情绪却毫不热烈。

到底什么是资产阶级世界观

找了好几篇文章，陈伯达的，施东向的，找不到一个确切的定义。

一种说法，引列宁的话：世界观是对世界的社会的最一般的看法。列宁还说了特别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看法。一一见了一次，第二次找不到了。

第二种说法：施东向，对新生事物的态度。

第三种说法：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 VS (对) 集体主义。

第四种说法：无产阶级世界观就是辩证唯物主义。

陈伯达的文章最妙，标题是世界观的斗争，实际上却大谈自由平等博爱，但并不指明这就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

看来这个问题还要我自己解决。

一犬吠影，百犬吠声。

吴华家也死了几口

三个，留一个孩子，寄养在附近，还向蔡璋借了钱。

死几口的人还有哪。

补记赵淑仁摘帽子之钻我的空子

赵之摘帽，未由院批准，来后待遇与我们相同。她之摘帽，显然出于沈李之类的意见，原因是我不合作，她表合作，所以她是钻了我的空子的。

祝贺你，我不埋怨你。

学文件的好处

好处很大，可以体会一年来的变化，例如现在说紧张论，去年八大二届全会总路线才发表时刘的说法已不时髦，而代之以一穷二白；又如刘对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说法，“找到了农村中达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道路”也是很妙的。哥穆尔卡是一种，赫鲁晓夫是一种，中国又是一种，而中国则较之斯大林为尤左。其实原因也简单，因为集体农庄在苏联已足以解决商品粮食问题，在中国，若不“组织生产又组织生活”，商品粮并无保障，归根到底这是人口与土地问题。

难道社会主义也是愈到东方愈野蛮吗？

一月二日 县委招待所

今天一天是紧张的

今天一天上下午读文件，晚上做笔记，很紧张。我除了中午去蔡璋那里呷了二口酒，吃了并带回了一些饼干之外，都是跟班学习。晚上整理了五个月的报纸，不日可以寄回。报纸一大包，书一大包，轻装可以准备走路。整理报纸的过程中，劳动队的二百天生活轮番出现在眼前，百感交集。这些报纸是很好的纪念品，可不能丢了。

文件的中心及其逻辑体系

文件的中心是刘的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它构成自身一套逻辑体系，以前读报，彻底马虎，弄不清这个逻辑体系的面目。钻研一番，面貌就清楚些了。

这套逻辑体系，似乎八月份有一个结构，十月又有一个新结构。十一月份的新结构是世界观问题，只听李简单说了一句，那又是来自极笔。——1957年初陆定一的自由平等博爱也显然来自极笔。详细内容还不得而知，回去打听吧。

一月四日 中午一时

讨论

昨天下午三时半起是讨论。晚上受到围攻。组长早晨开会，似乎是为了阻止围攻空气的造成。今天上午我就不再暴露思想，并且决定一直持续下去。

奔走于额外供给

昨中午吃糯米饭，十时半后还有一杯酒酿，今天就完全平常化了，不能解决问题。午饭后到蔡璋那里，凑巧他们吃面，吃了一顿。

蔡把他的点心批点给了我，弄走几次，买到一点饼干，中午又加了一点饼干下去，吃饱了，其余的明早吃。还要跟那个门市部去缠，决心要买到几个月饼吃。

钱会发生问题，抽烟方面省下来。

蔡那儿长了五六元，长线放远鵠，还有十多天呢。

劳动队压坏了人与春后节粮

劳动队压坏了一个，肿拉车无力，压坏了腰。据说春节后那里还要节约粮食，日子是难过的。

临走前还要去看看。

日来天气暖和，中午温度在15度以上，那里的菜园应该多长些东西出来给人们吃。

村里死亡相当重，一死就是一家。城关卫生院组织医疗团下乡去治疗这个传染病去了。

李富春元旦文章

李富春元旦文章，提法是一农二轻三重，到底是色厉内荏呢？还是改弦易辙呢？应该研究一下。大致差不多的。一个中心，大力支援的是那些商品率高的地区部门——边疆，郊区，经济作物区。

一月五日 上午八时半

吃的收获

昨天买到五元饼干，今天又买到一元月饼，五枚。

早上起得早，路上等开门吃完饼干，饭前吃月饼二枚，真的吃饱了，痛快之至。午饭后又吃了第二枚。

讨论会上一半时间用于考虑如何谋求补给。

腿还无劲，其他都好了。腿的无劲，近来也颇有进步。

听土壤所的人们说，他们过去吃饭也获得了许多额外补给，不过是利用工作地位，不花钱的而已。

农村哀鸿遍野，我努力谋求补给，实在也特殊。今后努力来偿报。狮子奋进，总是有这一天的。

省拨粮

据说省拨粮，1000万斤以上，水库民工定量37斤，若以30万人五个月计算，150万人月，每人所得10斤。若以水库水渠3万人计算，五个月 $3 \times 5 \times 37 = 555$ 万斤，已去其半。水利工程有了保证，老幼不过略作点缀而已。不错，壮丁应该维持，老幼死一些没有关系。

粮食问题是思想问题不是实际问题，今天的讨论中还在重复这个滥调。其实一切决定于数字，那崇高的理想也决定于数字的。

春节的点缀与商业利润

这点拨粮，已决定有10万斤以上做点心吃。我想还有部分酿酒的。

商城城内的春节，于是惨淡景象会略有减少，中秋前后的吃的喜悦，又会降临一个短时期。但是，这十万斤粮至少可以赚五万元。一斤点心卖一元，成本最多五角，事实上卖一元五角，卖二元有人买。

赵生祥带人与带消息

昨晚赵生祥说，他到鲤鱼山买鱼，半路上带来了一个肿病的女人，家里已肿死了二人，剩她一人，走到城内找叔叔，实在走不动，要赵的自行车带一下。这样，他带了一个人，也带

了一个消息。肿病，全家死亡，不仅限于右派家属。

省拨粮能够根绝这种情况么？不能。最多不过缓和而已。

省拨粮保证水利工程，要保证夏收夏种，二条去掉，所余无几了。

商城实在人口太多，耕地太少。如果能留下壮丁，死些老弱。对商品率的增长是大有好处的。

记一个老太婆和几个孩子

在城关招待所我们的食堂里，今天有一个老太婆拿起我们吃完了的饭碗，用手捞其中十分稀薄的残羹在吃。残羹之少，原因是我们这些人已经刮得很干净了。

似乎随那个老太婆在一起的还有几个孩子，实在精瘦得可怜，也是在找吃的。

赵生祥还说了一件事：一个小孩子跑进我们的伙食房，藏在床底下，吃我们的鱼丸子和牛肉。

孙家湾，熊家湾，熊家祠堂

这个小组到过的地方，正式名称叫做孙家湾，因为全姓熊，他们给起了一个名字叫做熊家湾或熊家祠堂。

到那里去是为了反对富裕中农隐藏粮食。所知情况是十一人带去 11 斤米，掺在一天二顿菜（青菜胡萝卜和胡萝卜缨子）里；调查访问十余天，结果除发现有人晚上煮干饭吃而外，别无其他成绩。马光富动摇，再三作了检查云云。

饥饿声中检查粮食问题是思想问题与对党为何有怀疑和动摇

这是讨论题的一项。任务是信任 700+ 斤/亩的年产量，反富裕中农。

很可纪念的事。

Compare 1943 of Honan (与 1943 年的河南比较)

Compare 1959 Spring at Thengchow Conference (与 1959 年的郑州会议比较)。

一月六日

A. Industry Army—Commodity Rate (工业大军—商品率)

B. Human Being—Productive Power (人的生存—生产力) Commodity Rate (商品率)

C. Center of Modernization—Center of Accumulation—Center of Investment from State (现代化中心—积累中心—国家投资中心) (公私合营)

D. Centre of Restriction of consumption (限制消费中心)

I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mmune Conception (公社概念的变化)

II The Transformation of Class Struggle Conception (阶级斗争概念的变化)

III 会议的气氛

IV Hungry (饥饿的)

V No Reason to Be Weak and Mean (没有理由妄自菲薄)

VI Why Doubt (为什么怀疑)

VII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Way Forward 1960 as Compare to 1957 (1960 年前夕与 1957 年前夕的比较)

少扣多分与三定

家庭副业

大量农贷

粮食定量

所有制

VIII 小土群与养猪场

从小土群到小洋群的发展 (?)
印度农业是学不会的——赵家骅
IX 十大建筑是总路线的产物

一月七日

昨天饿坏了，今天吃饱了

昨天毫无补充食物，虽中午有江米饭，把我饿坏了。每天早晨例有的大便也毫无胀意。

今天早上从蔡璋那儿取来十个馍，早上在蔡那里且烤且吃四个，午饭后转小巷吃一个，晚上吃二个。晚上“会餐”有肉食，到招待所加了一碗饭。吃饱了。

一会儿还有月饼与红薯丸子可吃，明天早饭，稀粥也过去了。

“顶不住”

晚上常可遇见劳动队的人，有一个人过来招呼，见面就诉苦“顶不住”。早晚各五两，中午半斤，减量了。听后心中十分难过，不安了一个下午。

政治理论问题

听大会，有一系列政治理论问题可作分析。可是在这个环境中，竟无劲头做这件事。

听大会，对最近的逻辑体系大体已可见全貌。李克征说，落后了，说北京正在转入系统理论学习，又是政治经济学，又是毛泽东著作。什么花招还弄不清楚。

捍卫总路线与今后方向

在劳动队听到“保护”之说，现在则几乎正式地叫作捍卫

总路线，捍卫党中央和毛主席。到底是什么把戏？下文如何？

以前曾作了二个估计，色厉内荏，掩护退却；蛮干到底，再衰三竭，但体制不会垮台。到底是什么花招？

看来是两者兼有之。完全回到 1957 做不到，蛮干也不行。于是，在人民公社这匹马上，把农业提到第一位来。工业建设速度降到 20—25%，已作解释，还叫跃进。水利必定维持下去，不惜用大批粮食作本钱。商城水利工地民工粮食改为每月 37 斤，大致是全国通行的办法。

不是农村本位的农业建设，而是高商品率的农业建设

这不是 1953 后苏联的农村本位的农业建设，而是高商品率的农业建设——1930—1937 的苏联型的农业建设。不过十年，农业建设的转向是不能的。

人民公社概念的变化

人民公社概念真正起了重大的变化。

A、产业军的人民公社——无分城乡。

B、产业军的人民公社——农村服务于工业建设。按照这个概念，说大办钢铁是一切考虑农村的需要是谎话。是超英赶美的要求，要农村提供人力物力。

C、12 月决议，郑州会议，邓子恢的人民公社内容混乱，含义不同。

D、八届八中全会后的人民公社，有了明确的方向，高商品率的，国家投资——公集合营的，全民所有制不断发展的人民公社。

.....

一月九日 县委招待所

日程与吃饭

七日上午整个是发言，下午还有一部分人发言，其中包括化学所的何浦。七日下午董作学习总结，把学习作了一个系统的全逻辑体系的阐述。

八日李克征作总结报告，还捎带了晚上一小时多。

七日，一天吃了三斤多粮，吃饱了。因为十二时左右还有三个饼，一碗酒酿，八日上午不想吃了。八日下午还是饿，离开会场二次，终于到招待所吃了半斤米饭，我们的伙食是面条，还加上面汤，吃得空前的饱，晚上加班开会到十二时，早上大便一次，又空了。早饭稀饭，还加了二个面饼，现在十四时，又顶不住了。肚子不是缩小，简直是愈来愈大。

又给蔡璋三斤粮票，请他代搞月饼。学习时间还要延长，真是难矣哉。

思想改造的高潮

日来出现思想改造的高潮。可惜 1958 年 5 月，赞皇整风我未经历，无法对比。

人们是激动的，特别是年轻人，激动的中心问题是社会责任感，这差不多是一项崇高的感情，比赵的牌号的缺乏社会责任感的服从与工具主义要强得多。赵的牌号的克服个人主义是沈万山式的。李克征到底要强得多。

但是这个牌号的社会责任感是直接引导到做驯服工具这条结论上去的。细细辨察，虽然国庆建筑与哀鸿遍地同时并举，人们对此联想还并不多。这证明 Stalinism (斯大林主义) 在中国还有生命力。

其实，人们还昧于事物的客观规律。出身于反动家庭的人之所以被重视，出身于成分好的千千万万农村青年，虽然历史决定他至少要半生过牛马生活，纯然出于需要，而这是被决定于历史的客观发展规律的。社会责任感出于谴责自己的贡献少与享受多，但是一年时间若干感受以后，还各走各的路。若说培养什么好东西，是社会责任感。除此之外，全部是宗教情绪而已。

激动与交差

当此人心普遍激动之际，我也不免略有感受。没有感受，写不出东西，有了感受，可以写出一些比较象样的东西，以便于交差。今天写成了六页，连前四页，交给赵家骅，勉强在高潮中交差。

延长日期

今天下午是老红军报告，晚上还大会发言。

据说学习的时间要延长，趁大好形势，趁热打铁，这是自然的。

但我的总结的基本部分业已写成。现在十一点，下面二部分提纲写成之后，10—13还有四天，写，誊，大体已经足够，要写写日记。

衰弱与卑微之感

前几天，曾出现过一些衰弱与卑微之感。

卑微是从千方百计仅求一饭来的。日夕奔走于食品点与蔡璋之门，费尽心计计算时间到招待所吃二碗饭之类，觉得这个人变得下流了。

衰弱之感是从精神分裂来的。参加会议，表示积极，实际认识又是一回事，于青年人的单纯，积极，显得自己没有力量。

仔细想想，这些感觉都不必有。

哀鸿遍野，我努力求饱，有些说不过去。陈毅宴会，还有著名演员演出助兴。我要恢复我的精力，节用我回京的时间。我还要工作，我要保存自己。我还要战斗。而这个战斗不会是白费的，至少应该记下一个时代的历史，给后来者一个经验教训。

衰弱之感也是用不到的。大声说话，理当有此机会。历史决定时代不能是 Stalinism（斯大林主义）的，除了现在态度，我还能采取什么别的态度呢？今天有社会责任感的青年，在李克征的讲台面前被引到一种宗教感情方面去，明天同样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将被引导到更为健康的方面去的。时代会发展，变化不出十年而已。

阶级斗争还有二十年，甚至是五十年

比如说，一种说法，阶级斗争还有二十年，甚至是五十年。而现在在斗哪些对象呢？

说什么思想改造等等，会造成一些神经病患者，会造成一些人的宗教感情。对社会，经济结构是无所变化的。严重的是，现在阶级斗争在斗“富裕农民”。而在这个斗争中，据说又要分别具有本位主义思想的干部，受影响的好农民，与真正的反动农民云云，那不过是掩盖在阶级分析方法下面的国家与农民的冲突而已。

再继续斗下去，又斗谁呢？

若说目前对农民的斗争，是因为农民人数太多，自给太强，商品率太低，要消灭一部分人，要强迫他们建设商品率高的农业，要强力消除糊口经济是历史的不得已，那也罢了，偏偏这又用了多少马列主义的词句来加以掩饰。若说紧张局势不能不藉斗争的名义来设法渡过倒也罢了，偏偏一方面在努力缓和这个局势，一方面又宣称要斗二十年。斗下去，势必斗到尽头，“老田鼠，你掘得好啊！”再斗下去，无非是自己而已。

大革命局面下的必然产物，Terrorism（恐怖主义）必然不能持久的。

坚定起来

所以，要坚定起来。1848以后，马克思还沉寂了十多年之久呢。

一月十日 同地

八个钟点的夜间会议

昨晚，自由发言。从六时半起到深夜一时半左右，大部分是表示态度，还有一些冗长的人生观漫谈，二十余人说了八个小时，实在够受。

前天是小组讨论到十二时，日来睡眠实在太少了。

今天我把总结大概写起，明天誊写。今晚决定八时睡觉，好好睡一下。

这是另一种疲劳，与体力劳动不同，好受一些，老名词，开会的疲劳轰炸。

RELIGION? (宗教)

如此进行的人生观革命，陈志雄用一个问题尖锐地怀疑：何谓宗教？何谓献身精神？

确实，社会责任感是一种崇高的感情，这是区别家雀与海燕的东西。宗教情绪是卑微的，它引导人们趋向愚昧。

我的答复是，各个时代的社会责任感各有其表现形式，历史科学会回答这个问题。

既然达到这个结论，我对稽头（顾准大女儿顾淑林的小名）也不必引起什么冲突了。

也许采秀也希望这个局面的。

而且，从昨天与一连几天的高潮来看，青年人要避免这种宗教情绪的影响是不可能的。我为什么要强制人家做一件在他无力抵抗的事呢？

Stalinism（斯大林主义）终究还有生命力，这是可悲的，但同时也是可喜的一件事。若没有一定的宗教情绪，某些崇高的情绪，在知识水平低下的人们中间是不容易产生的。

行期变更

行期变更，十七日走，决定发信给家里。

形成高潮，必然影响行期，无可奈何的。

一月十七日 同地

总结搞完了

昨天写完总结底稿，晚上七时上床，好好睡一觉。今天誊写完毕是下午三点半，写日记，等一会到邮局寄东西回家。

数行期，住这里的时间还有五天，五天以后要离开这个鬼地方了。

该诅咒的商城县委。但商城这个地方也反映了南方农村的一般特点。莫看吃大米，南方城市经济是发达的，南方农村苦于人口过剩，是贫困的。当社会制度限制过剩劳动力流入城市时，其贫困面貌更为突出。因此，消灭过剩人口就不自觉地执行了。科学院下放安徽、四川、河南的干部，生活都不如在陕西洛川的，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明。

吃的额外补给不可能了，也似乎不必要了

吃的额外补给愈来愈困难。饼子要 20 日以后才发卖，面粉机坏了，没有面粉；粮票完了，现在只剩下老蔡给的一点儿糯米粉，但额外补给的需要似乎也减低了。昨天吃馍，四个

半，李鸿霞给一个，五个半，今天中午乘机加了四两米饭（招待所），下午拉了一次稀，这是以前所没有的现象：停下来不做体力劳动到底将近二十天了，前几天额外补充千方百计设法，到底也没有亏待肚子，看来行了。

蔡要为我饯行，有老母鸡吃，交换条件是到北京给他买东西给护士。半年来他确实帮了许多忙，彼此关系确是酒肉朋友，也要善始善终才行。

估计今后大队伙食也还有所改善。粮食不免有积余，钱更有积余，他们也要善始善终的。

鉴定与总结讨论

还有一个节目，鉴定与总结的讨论。

劳动队已有鉴定，这是可以肯定的。对我总是猜不透，敷衍一阵也就过去了。只是那又一定要熬夜，反正也习惯了。今晚，无论如何还可以好好睡一觉的。

下午八时

强烈地怀念劳动队的人们

四时，整理书报，费了三元，从邮局寄回去了。

到蔡那里，他回水库去了。出来路上见到他，原来是他的箱子被撬开，大失窃，计公债 200 余元，呢料衣服一套半等等。

劳动队是培养道德败坏的地方，虽然如此，我今晚却引起了强烈的怀念他们的情绪。这一伙人是无辜的，他们现在是在炼狱之中。

象刘、余这样的人们，一个极小的天地之中，意识形态是低级的，然而他们并没有抵抗历史的前进。这样的人要关集中

营，中国该有多少集中营啊！

象徐云周这样的人尤其可怜。他忠实于农民，他有自己的政治信念。他不是富农政治上的代表，而是全体农民的政治上的代言人。他不应该坐集中营，他的品质比沈万山之类不知要高贵多少。但愿他能撑过这段苦难的时期，能重新进入农民的时代。

有一个强烈的冲动，想今晚上去看看他们，尤其是如果徐云周在那个小棚里值班的话，谈谈该多好。可是去是不好的。只好不去，到京后写信吧。

无论如何，想知道劳动队的结局如何。

无论如何，以后要到这个集中营所在地来一次，看看我在那里待了半年，过了忘怀不了的半年的地方，过几年变得怎样了。

我甚至在计算，假若省直的人走了，剩下一百七十人左右时，他们的生活将能改善到什么程度。1959（该是1960年）春是不好过的。他们中间必定要倒下一批人。

本部农民的厄运

这也是本部农民的厄运。

若说1959灾荒，他们必将倒下一批人，但1958年上半年，丰收年的一个春季，他们的厄运已经开始。

若说1959是灾荒，但1960即使是丰年，即使丰年继续一个时期，他们的状况也改变不了多少。产量已被夸大到远离实际，以后还要每年加10%，农业、商品率已被提高到首位，情况哪能改善呢？

中国农民过着糊口经济的生活，他们中间的知识分子同样不懂得这个问题。他们从糊口经济的立场出发，在土地革命的旗帜下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结果是他们的救命恩人回过头来，以强力来打破糊口经济，代替圈地，代替羊子吃人的是在饥饿

状态下上山炼铁，与 7000 万人的大兴水利，而且，还要在政治上给以资本主义自发的称号。

若说农民留恋生产资料私有制，那么这个称号还可以说得过去。现在根本不是这个问题，而是饥饿问题。象农村那样“组织集体生活”，城市工人必要引起暴动。

这些下放干部今天在写思想总结，检查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然而他们回到城市，过的又是什么生活呢？

这是一个历史的悲剧。虽然从历史来说，这个悲剧是无可避免的，然而他们的救命恩人却全然不懂得这个问题。不，或者应该说，1958 年以前他不懂，以后他逐渐懂得了，并且摸索一些解决办法，他试过好几个药方，结果选择了现在的药方——马列主义的人口论，恐怖主义的反右斗争，驱饥饿的亿万农民从事于过度的劳动，以同时达到高产、高商品率的农业与消灭过剩人口——是最堂皇、又是最残酷、最迅速、最能见效的办法。若说这也将记入史册成为丰功伟绩，那确实与 Peter The Great（彼得大帝），与曹操一样。他是聪明人，他是有意识这样做的。从这个意义来说，他应该感谢 1959 的天旱，并且也有一种说法，叫做把坏事变成好事。

回到下放干部队伍中的半个月

再来记录一下自己。

回到下放干部队伍中已经半个月了。无论如何，这是自由人的集体，虽然赵家骅不同意在上班时间上街逛逛，总没有人追问一天的行踪。人们身上粮票吃完了，也没有人追问你怎样吃的，经过一些什么关系去吃的。小便不用请假，日记本是被尊重的。然而我却养成了一个秘密工作的习惯了。半个月来，我的额外食物供给未被发现过一次。小组里的人也不知道我几乎每天到蔡璋那里去。我变得卑微了，但也变得更谨慎小心，甚至是狡猾了。

我在想，回家后这种精神面貌能够保留下吗？也许能，除掉对采秀，大概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听到我的真心话，义之，三妹都是如此。跟上海与福建通讯也会变得缄默一些，说话一个人是一个样子。我该能拿出不少套货来，在劳动队，对赵淑仁、杨文华、何祥福、徐云周至少已经有了四套了。

虽说下放干部在乡里还是过的艰苦生活，床铺，电灯，木炭火，写字的桌子，至少比劳动队已在天堂中了。在劳动队待了半年，什么其他生活都能过得去的了。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来审判沈万山哪!!!

外貌上看我真的沉默了。半年的沉默已成习惯，将来也不会变的了。

想过在总结上写上一条，失掉自信

曾经想在总结上写上一条，目前有一个缺点，失掉自信，想想不必写，后来摸摸李克征的气候，确实也不宜写。写上又变成唯我主义。

Refer (参看)：马克思论谦逊。

一月十四日 晚七时

三天的总结鉴定会议

12—14 日是总结鉴定会议，到今天晚饭前算是讨论完了。

以前，曾经企图了解这一年中间，下放干部精神面貌有什么变化，这个会议解答了这个问题。应该承认，精神面貌有了很大变化，确实，觉悟水平提高了。张秉刚、陈志雄转变了，李云卿大变了，赵汛勤、李鸿霞变化不大是受到孤立的。尤文瑞更坚定了，马光宙的功利主义也有很大变化，连赵生祥也变

了。

前天，认为陈志雄是对今日的宗教精神有所怀疑的，结局是误解了他的意思。正相反，陈志雄从中找到了解决思想苦闷的道路。他从罗曼·罗兰的泛神论，走到了马列主义的泛神论。对于他，神是群众。

宣传与教育的力量

从这里看，不仅证明了 Stalinism（斯大林主义）的活力，也证明了宣传与教育的力量。

人们硬是说，相信丰收，又自觉节粮，尤文瑞是以献身精神、宗教精神来自我牺牲的。他对我晚上等馒头吃大有意见，他若知道我这个半月来吃了多少东西，那还了得？

人们硬是歌颂十大建筑，而又以农民的艰苦生活当作献身精神的原动力。

青年人是纯洁的，易染的。他们首先接受时代思潮，所以 1957 是可怕的。

应该承认，Stalinism（斯大林主义）是今天的时代思潮，我必须充分懂得这一点，以此为根据来决定我的行动。同时也应该记录到历中去。

秋收以后的战略部署

从这个总结鉴定中，也可以追溯到商城县委——也许是全国的战略部署，中秋——十一前后是狂欢庆祝，十一以后是征购，同时发动了一个反富裕农民的群众运动，反富裕农民运动完全见于报纸，只在理论文章中出现过这个论调，其实是费了很大劲的。这里，何店做典型，召开了群众大会，然后又苦心孤诣地组织干部参观丰收乡村，以坚定思想。这样，粮食问题是思想问题不是实际问题这个答案被定下来了。然后是核产，安排生活，省拨粮，维护民工。

不，应该说这是全国性的做法。农村中发动一次社会主义

教育运动，运动的对象就富裕农民。

还有，作为补充的是十一月初起的增产节约运动，这里是停止饭店卖饭，扩大综合队，推行储蓄等运动。

应该承认是费了很大劲的。

设计得也不坏。

对我鉴定

我所做的是二年的总结，鉴定是三个月的农场生活。五一是调整空气，现在是反右倾空气，当然不会有好话。现在，尤文瑞是极右派了。赵生祥还挖空心思说了不少牵强附会的左的话。

还有什么事干

事情完了。只有：

剩下的半个月报纸转给蔡璋。有些旧报纸，明天也给他送去好了。

想到劳动队去一次，想想又不想去了。

要转户口，别的没有事了。

还缺少一斤粮票要想办法。

伙食有所改善

这几天伙食有所改善。每天有牛杂碎吃。可惜嚼不下去。只是多了些胡萝卜和粉条，增了一些量。

昨晚有稀饭，昨晨今午把炒米粉吃完。昨午伙食是糯米糍粑，所以昨今二天都吃饱了。明天去吃蔡璋的钱行饭，后天没有增加的。但最后一天，估计大伙会改善一番，不再有他谋了。十七日能吃饱，早上一顿 153 斤豆与面，45 斤肉，15 斤粉条，留一部分路上吃。

路粮在信阳搞，他们准备在火车上吃的。

身上还剩 6 元，加路上津贴 2.4 元，该够了。这些在火车上要吃一顿。

粮票少一斤

给蔡璋五斤粮票，要回三斤，还缺一斤信阳用的粮票。正在思想斗争，向蔡璋要呢？还是向陈志雄借。

决定向蔡璋要，因为而后有点心了。

面貌

我的容颜憔悴之至。镜内自望，都不认识了。

来时肿，现在完全消肿，显得特别消瘦。今天赵汝成见我，都问我是否有病，农场人如张长美，元旦说不认识我了。

明天要去理发。

我是否变得卑鄙了

我是否变得卑鄙了？我偷吃东西，我偷东西吃，我不如青年人有献身精神等等？

不，没有，如法捷耶夫描写两个人在远东森林里打游击一样，我以后也要如实描写我自己。

若不是夏天的瓜果，中秋前后的月饼，集中期间不偷吃东西，我将如何？11月起，一个半月的无外援，结果是肿。若这期间无补充，我不会大肿吗？

象现在这样回去，马上投入工作是可行的，象权少珍那样就不可能了。

我也是回去就投入工作。

一月十五日 商城城关镇

公安局派出所

办户口

前天，赵淑仁才说起我的户口迁移没有办好，于是要办户

口转移。

好艰难哪。

昨天中午到农场，见到赵汝成，未见尹会计与柳会计。去，是农场的李队长来，说到柳会计马上就走，到北京去了，要我到车站去找他。车站找不到柳会计，于是到农场。赵说要他们办好给我送去，很客气，我就走了。

今天，我是什么事都没有了，我知道办户口是艰难的，从蔡璋那儿出来就到农场去。赵尹都在，尹给写信，我就到派出所。去时十一时半，办事人吃饭去了，要下午去。于是吃完饭，大约一时半到派出所。

派出所不给办，理由是要户口底册。我知道不是户口底册的问题，而是户口转移不该由我自己来办，于是又到农场，并且请求农场去一人帮我办。尹会计慨然答应，冒雪一同来到派出所。

到派出所那门口的办公室，人多，在开会，我知道我的身份不该坐在那间屋里，于是我坐门外等着。一会儿尹出来，说要大队部的信。他问我大队长在哪里，我说不在城关镇招待所开会，就在县委。尹想打电话，城关镇招待所没有电话，尹自己去找。

尹自己去找是劳他的驾的，然而我没有说我自己去。因为想来尹去比我自己去好。

现在尹走了，我在候审室那样的小房间里等着，这也是理该如此的。

但愿办户口的事记到这里就算记完，没有其他的情节需要续记的才好。否则，明天不仅我要跑一次，也许还得劳驾赵家骅或者其他的人再跑一次。

(谢天谢地，赵生祥到县委组织部给我弄了介绍信，户口办妥了。)

蔡璋饯别

早饭后到蔡璋那里享受他的饯别宴。

他给我留了一碗牛肉面，二盆牛肉豆腐。有昨天从劳动队带来的胡萝卜炒的丝。先吃面，又吃四两干饭和那盆牛肉豆腐，然后我去买一瓶红玫瑰酒（1.09），又吃一盆牛肉豆腐。这是真正的牛肉，并非牛杂碎。三下子合在一起，大约有半斤牛肉，这就很丰盛了。酒醉饭饱，辞别而去，明天也不去了。到京后还要给他买几样东西，说好，是送给他的。

他帮了我不少忙。代乳粉，糖和饼子，还有几次饼干的。这些额外供应，应说是不能以钱来衡量其价值的。

肿病与见物不见人

肿，到处都是肿。

菜园全都肿了，杨文华、余济美、陈新初、徐云周全肿了。

那家食品供应部现在经常往外卖糖和红枣，今天我去买菜时，有人找到位经理买饼子，可以听到他们二人交谈，糖和枣是专门批给肿病的，而且是商业局批的。

在农场耽搁了很短一会儿，听到彭仁鑫一家死完，剩一个小孩，人家给他送来了。

所以说，见物不见人，人具有高度主观能动性，但人又被一件事所限制着，支出的热与吸收的营养必须平衡，于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又被物所限制了。

肿病是证据。

我应该感谢蔡璋，哪怕说是酒肉朋友也好。若不是他，权少珍肿时，我早也肿了。

我也肿了。

但留城内 20 天时肿消了，腿也有劲了，这又该感谢他。这 20 天，每天我获得了额外供给，其中 80% 是应该归功于他

的。

蔡说他花了一些钱，但按我的“主观价值”而论，这是不能用钱衡量的。

我也对他表示了一些真诚的帮助，他第一次住院时对他帮助不多，但是真诚的，他也会知道。

所以，我决心帮他买他所要买的东西。采秀如不愿意，向母亲要“施欣苹”（这是顾准妹妹的女儿的名字）户存款。

四时 招待所

长竹园达权店与农村人口流窜

蔡璋又说到一些珍闻，但很合理的。

他说，南山粮多，现在农村流窜犯比城市流窜犯多。人们都往南山跑。青年妇女，分不清是姑娘还是媳妇，只要有吃的，自愿留在那里给人当媳妇。这算是流窜，但南山不易找媳妇，人们同情找到了媳妇的人，有时也马马虎虎算了。男的流窜犯又如何处理呢？那就不得而知了。

可见，我以前的想法，有户口，综合队与粮食供给制度，人口自由流动不可能，并非完全是事实。

可见，萧海滨所说的共产党的天下，不会有逃荒的，也并非是事实。

饥饿是可怕的！饥饿推动人们做出看来看不到的事情。

还有四个半月，谁知道会出什么事？

也许不完全知道。那么，1960 上半年还会有些什么措施呢？值得好好注意一下。

新县与长竹园达权店的秘密

这个消息，足以证明南山粮食确比其他地区多，不能以南

山粮食推论商城全县粮食，否则人口流窜就不可能的。

据说，新县还要好些，市场副食品如糕点之类还有供应。

秘密究竟何在？

我想，老苏区优待是一个重要原因。公余粮要得少，供应充分一些。

会计、炊事员与道德败坏

在这种情况下，道德败坏不能不成为普遍现象。

现在我这招待所的锅门口，有好几个采购员在烤火漫谈，他们说。

(一) 小城市花钱较少，粮票费得多，大城市花钱较多，粮票花得少；

(二) 如有机会转业，一定干炊事员。

真的，这个招待所的炊事员与会计吃饭完全不受定量限制。我烤火多，亲眼见他们一顿吃三碗，全日合粮二斤多一

济美以及对余济美的斗争相比)。

.....
何对沈万山有半分钦敬吗？不会有。何说的是实话吗？不是。

何学好了还是学坏了？上帝明鉴，他学坏了啊！

写到这里，心里一阵阵地绞痛，犹如写肿死与建设之间的关系时的绞痛一样！水库六个月，赵学好了还是学坏了？学坏了啊！她现在感激劳动队为她脱帽，但她从脱帽中得到了什么经验教训？钻空子，拍马屁，说谎话。

下放干部学好了没有？

下放干部是有许多人学好了，这是他套社会责任感的宗教仪式的效果。其背后也有客观的物质基础。他们是外来者，他们来此是朝圣式地消除肉欲，城市式的生活方式在等待他们。否则，饥饿也会促使他们人相食，卖×，说谎，拍马，害人自肥的。

真是心头一阵阵地绞痛。

若说这是历史必然，付出的代价也够重大的。后一个历史时期，为了消除这些恶毒的影响，不知要付出多少精神物质的补偿！

天气、日程与其他

我的事全部办完了。

今天下午是党团员入党入团仪式，当然没有我的事。明天是县委书记的临别赠言，不知道有没有我的事。

本来，可以到菜园去作最后一瞥，不幸下起雨。今雪。明日还不知如何。如晴是可以去一次的。

今晚，馍 12 两，明天一切如常，没有额外补给，可能菜多一些。反正是可以过去了，只有一天。

一月十六日 下午二时

最后一次到劳动队

早上，不下雪了，放下早饭饭碗，立即到劳动队去。

下棚，刘方海在写总结。地上雪把庄稼盖没了，一路东行，见徐云周担粪过来，在地里交谈了几句。然后见扬静超，张彦生，老姜，张哲华，到机器房，再到队部见黄鑫诠，还说了几句客气话。这客气话出于半年来习得的本能，但事后想想还是需要的，因为不要让跟我通讯的人受罪。然后与杨永华一起到了下棚，拿了十来条胡萝卜归来。

赵刚说，现在吃的午饭，跟以前的晚饭一样稀——菜稀饭。

大家都说我好了。瘦了，但气色正常了。因为以前确实是肿了。

杨文华肿得极明显，徐好些。上棚我不敢去，因为不忍见柳学冠的惨象。

一个典型的死人的数字

徐云周说，沈家畈附近一个生产队，七十余人死了三十多个，这是一个典型的数字了。

路遇张承业，请假归家，大约家里死了人。徐说家属死的多，请假的多。

徐问，其他地方如何？我说不知道。但湖北灾情比河南重是事实。本部各省，只能有程度的差别，情况该是相同的啊。

DIED NO.3 (第三个死亡者)

劳动队又死了一个。三组的周为风，肿死的。前天抬进医院，昨天死了。

今天劳动队不上工，做总结。但上午天晴了，我看又该上工了。

杨文华请示黄烤火，黄坚决不同意，——其实是公安局坚决不同意。

《河南日报》关于铁佛寺水库的报道

一月十日，《河南日报》有关于铁佛寺水库民工生活的报道，典型的客里空。报道说民工有保暖饭具，我所见的是工地送饭，而且是青菜红薯。报道说有澡堂理发，都是劳动队的事，民工队哪一个有。报道说民工热火朝天，天知道。

我们的饥饿病肯定是好了

才受了一番洗礼的我们这批人，饥饿病肯定是治好了。

今天中午的菜十分丰盛，有四两左右的肉，晚上还多。我吃了中午饭肯定是饱了，身上的胡萝卜除午饭前吃了六七条生的而外，现在真的不想吃了。晚上还有半斤月饼，明早有炸油条、馍、馅饼、牛肉（不就是现在拿，现在我已经去拿来吃掉了）。到信阳还要吃饭。

我吃饱了，别人也饱了。吃饱的人易于激发宗教热情，只有我这个老油条除外。

李宝仁要检讨自己的顽固思想

据了解，小组通过思想总结，六个右派中，彭楚南和李宝仁二人未通过。彭楚南是不暴露思想，李宝仁是顽固。

李宝仁的顽固是不相信丰收。这个姑娘很愚蠢，然而可钦敬的愚蠢。于是，昨天，右派分子可以不参加入党入团仪式，是自由的，李宝仁还要坐下来写。

而且，李宝仁肿了。

附记，下放干部妇女月经不调。李克征调查以后说这是正常的，农村妇女都是如此。

于是，死亡率高之外，再加上一条，生殖率低。

上帝明鉴，若四年五年之内，农村人口减至三亿，再加上扎实提高一些产量，大跃进就大功告成了。

照相

大队全体照相。

我站在高处，还自然表现出一种高傲的神情——不，高傲而沉思。

现在精神上肉体上都健康了，都站起来了。

农场小组自己买了一卷胶卷照相，对不起，我不象去年那样参加进去。他们今天下午还要到农场去照相，对不起，我也不去了。

正如陈志雄所说，我没有沉沦下去。懂得这一点的，也只有陈志雄而已。

下午四时 劳动队六个月的追忆

读日记

记完上面几段，把上部分日记所记劳动队部分拿来重温一下，追忆这六个月的经过。

大事记

6.12 到达

7.3 移居下菜棚

8.7 沈召开对我的“生活检讨会”

14 因看戏事，沈在队前批评

16 写检讨

9.11 专责管胡萝卜地，开始担水

27 搬到八组

30 宣布摘帽子的 22~26 人

9.28~10.15 夜班 10 次，共合 17 班，34 小时

11 初 沈作增产节约报告，综合队大扩充

11.12 左股骨开始病

11.21 烤红薯

几个时期

1) “不用脑子”的两个月 6.12~8.7

2) 恐怖与屈服 8.17~9.10

3) 大跃进 9.10~11.16

4) 反右倾，增产节约与烤红薯 11.17~12.3

5) 病了，肿了，走了 12.4~12.27

这一段时间的回忆与分析，大致上与劳动队其他队员的心情变化相符合，只是具体情节与所走路线有所不同而已。比如说，大跃进这一个阶段大致上是人人经历过的。这段时期柳表现为狠狠加强对别人的监督，杨大大加强对别人的告密等等。反右倾——烤红薯这一段也是各人不同的。在杨永华、杨柔远就会往家里买菜，抓小偷，柳学冠就干脆偷着吃，杨静超是早上喝米汤，张彦生是处理豆浆，杨荫堂名堂更多。组里的人只能五花八门地自保，办法少，成就可怜。最后一阶段，更是结局各人不同，凭上帝保佑了。

不用脑子阶段

六月十二，到劳动队时，肯定了这是一个集中营。在集中营中只好劳动吃饭，吃饭劳动，还加上一条，卑躬屈膝。这本来是对的，可是卑躬屈膝却没有做好。不理人，自顾自地劳动吃饭，吃饭劳动，并不能达到目的。必须笑魇迎人，唾面自干。而我却傲视大官，还加上一条，虽视劳动队为集中营，而眷恋之情未断，“自己家里的事”未绝，甚至还想向李克征控

诉一番。控诉未做，其实却做了，六人汇报之时，说了多少话，于是就出了岔子。

这一段生活过得去，分的饭吃不完，大吃瓜菜，实际过得比农场好，消费不受清教徒式的生活戒律的限制。伙食也好，粮多，初期菜多，后来大吃南瓜，花钱多，慷慨，请客。

余济美评判这一段，“不象改造样子”颇恰当。是右派队伍中的大老爷。

这一段时间的心理上的特征是觉得日子过得昏昏沉沉的。与过去用脑做工作，有身边的家庭环境要操心等等相比，日子确实单纯。厌恶这种昏昏沉沉的生活，然而只能这样过。据劳动队其他的人们诉说，大致都有这一段。不过表达的方式不一样，有人说“不习惯”，或者象沈所说，叫做“没有接上头”等等。

恐怖与屈服

然后是恐怖与屈服。八月十五日沈向我开炮，指名批评，要贴大字报。以至写检讨，与检讨以后的忍气吞声，谨慎小心，对任何人都低下头来等等。都属于这个时期。

蔡璋、王冕南也经历了这个时期，斗争小集团就是，商城本地人都经历了的，那就是 1958 年底以前普遍开斗争会的期间。

商城县委通过李庭长与沈庭长，对右派分子是充分运用了对敌斗争的一套政策的——分化孤立，强迫劳动与政治教育相结合。所以，大开斗争会，既通过群众路线教育了被斗者，也教育了斗争者，并从斗争与被斗争者中物色了积极分子与骨干分子。于是有的人是经过恐怖达到了屈服，有的人方式不同一些，“自觉地”成为积极分子，但总的说来，无非还是从恐怖到屈服而已。

对我来说，还有一个偶然的巧合，那就是这段时间正好又

是食物缺少的时期。于是喝酒，磕瓜子，对“提饭”特别感觉兴趣等等。那段时间，还没有学会偷东西，只学会了偷吃东西。

大跃进

“摘帽子”的刺激，对恐怖到屈服的人来说产生大跃进的效应是一种常态。只是，别人通过别种刺激，比如 1959 初熊县长对劳动队的报告，办工业，奠定长期改造思想等等都是。我，恰逢其会，碰到摘帽子这一次政治勒索，于是精神振奋，劳动积极，负病干活，思想活跃，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一句话“变好了”。我这个变好了是其实没有变好，但说好的成份一点没有也不见得。那是一种双重生活，但也有表现，那就是反复，“好好乖乖”。

对我来说，又有一个偶然的巧合，那就是这个时期食物又丰盛起来了。这是中秋国庆前后，大吃饼子。一天干十四五小时，若没有饼子，早就肿了。对别人未必如此，但劳动队初期的大跃进，一般说来，还有较丰富的食物供应做支持的。若不然，就如沈万山说的，决心书大字报发生的效力只及三天。

增产节约，反右倾与烤红薯

我把时间定为 11.16 起，因为跃进的最后一次是种麦；头上套一个“皋子”用手抓麦粪点麦，地点是红薯茬地，除留作菜地的，一天全点完。同时，那时候正是市场开始变化到饭铺不卖饭，抓逃窜犯这个阶段。增产节约报告是十月底左右的事，十月底进城就诊，跟蔡璋讲不吃零食了，那时候，其实还有些存货，到十一月半时就真正光了。

标记这个时期特点是：劳动又开始马虎下来，并且设法偷东西吃了。烤红薯就是偷东西吃的开始。以后站岗的时候，吃过好几回生红薯、胡萝卜，早上向杨静超他们要“米汤”喝，拿钱买不来东西（对别人说是没有钱买东西吃了）。饥饿促使

人找出路，对任何人皆然。有的非法。有的被发现，有的未被发现而已。

病了，肿了，走了

这个阶段维持不了多久，体力强的不过多挺几天而已，结局总是病了，肿了。

劳动队目前病了、肿了的 80%，我病了，肿了是从雪地裁菜，连续伤风开始的。谢谢上帝，病了肿了到走了，前后相距不过一二十天。而且，在商城城内的二十天，我想尽一切办法，每天几乎没有间歇的找到额外供应，消了肿。我真是得天独厚哪。

周为凤就不行了，倒下了。

郭鸣剑找食物补充不得，而且被迫还要跃进，今天蔡璋说，他是有希望的倒下去的候补者。

昨天我向蔡璋说，果类蔬菜赶早育苗。这是救命的事，这是真的。

然而连杏也要麦黄才下，麦黄以前，病了，肿了，“走了”——不是象我那样走的，不知将有几人。

下午九时 商城城内的最后一天

回来吃胡萝卜与烧锅

回城是十时，找地方煮胡萝卜吃不得，吃生的，吃了六七条，门打不开了，记了日记，找活干，帮我们的厨房烧锅——还起了作用，保证及时开饭。

午饭菜是满满一碗胡萝卜，粉与肉，饭不多，饱了。

饭后照相，一如前记。

追忆六个月，晚饭，月饼，与联欢会

下午追忆六个月，很动感情，作了前面那段日记。

未记完，晚饭，份量与午饭同，月饼是来了就吃掉。四时，买二分钱茶叶，煮了喝了，以畅消化。

晚上联欢会，对不起，我不去了。记日记，人们还未走，抽空到蔡璋那里去一次，把一本土壤肥料学讲义交给他转徐。回来，在女同志房里记完了前段日记。

在商城城内的最后一天就此度过。明天走了。

今晚还要做一件事：把小东西收拾整理一下。

一月十七日 信阳专署招待所

告别商城

告别商城的仪式是隆重的。全队于行李上车后，步行到汽车站，王书记来送行，整队呼口号。上车，车行后，车上呼口号，王书记再见，商城同志们再见，商城人民再见。

我也有告别商城的方式。陈定一、沈瑞士他们不要的破衣烂鞋，包成一包送给蔡璋。第一次去，门还未开，到城关招待所去大便再去，放下后就去吃饭。

车行，吃饭，与到达信阳

因为仪式隆重，而商城的司机又未免未脱农村习气，所以开车已是十一点了。

早饭丰盛，肉食足六两，连胡萝卜粉丝一大碗，包括赵生祥拨给我的一些在内。另油条三根半，豆包子四个，麻酱花卷一个半。我吃掉了油条，菜与一个豆包，一个半麻酱花卷，十分饱了。还带牛肉半斤。

三时从潢川开车，七时到信阳，招待所歇下来，吃完饭，

恐已八时多了。

招待所的饭是每人一张餐券，每人摸一个，米饭不限量。我事前喝了一碗开水，米饭吃得少。菜少，我也毫不在意了——菜是城市式的四碟一汤，一碟猪肉，一碟白菜，其他二碟都是胡萝卜。

怀念与绞痛

从此步入城市生活了。清教徒们无论如何诅咒，还得跟城市生活走。城市生活的特征，1960初春与1959初春当有所不同。1958秋冬农村杀猪，烧花生，大吃了一通，城市供应困难了。1959秋冬，厉行上调，城市供应一定比较顺利，可是这个农村哪！

我的挎包，还剩一个豆馍压碎了，徐云周给我的胡萝卜还在。

我真怀念农村的人们哪！

信阳铁厂

车过信阳铁厂，很象样。烟囱林立，对面土法炼焦火光熊熊，人声鼎沸，而且还有典型的郊区商业供应。

尤文瑞说，那里不久将有 $100M^3$ 的高炉，可以预料也会有正规的炼焦厂出现。小洋群向中洋群的过渡，短期内不会终止。过程放慢了，丢弃一批太不合算的逐步实行工业整理，还是非做不可的。7000万人的小土群是全部丢了。应该承认发生过作用的小洋群，二三年内也会丢完的。钢铁生产确实发展了，而且是星罗棋布的全面的建设——对建设一些为农村四化服务的工业点是有用的。但正如前面分析的那样，这是给农村加了负担的。

中小型工业的工业化目的不明确

而且还有一个大问题，中小型工业的农本主义极不明确，相反，无论大中小点的建设目的，都是大会堂式的现代化——

拼命的刮削农村来进行建设，而建设本身便是建设的目的。

土包子而怀抱城市中心主义是极其可怕的，对农民真是天大的灾难！

统计学式的灾难

这个灾难实现的具体途径，是通过统计学来的。那个5500亿斤就是标本。

城市中心主义的建设 与自上面下的指标式的统计学 重

一月十八日 同地

集中炼钢铁的铣床工小陈

晚间，人们去联欢，我留在这儿写日记。以后，八号房间的小陈，包头坦克厂或是炮厂的铣床工，来这儿集中炼钢铁的，给我一些茶叶，拿茶叶来烧，就一块儿烤火烤到十二点多。前半段是他讲旅途见闻，后半段是我劝他努力学习，一个晚上颇有意义的过去了。

信阳与新蔡、上蔡、西丰等地的供应

今天禁止上街，不能采访市场情况，小陈提供了许多有意义的材料。

信阳供应同样不宽裕，我们来吃的饭是代表待遇，不限量，一般的住客是按粮票买饭的。市内饮食铺对长途旅客优待，本地人吃饭也可，要等候四五个小时。

点心每人每月凭票供应，4/10斤。糖果看来隔壁那个百货铺还有一些。那儿食品部陈列出来的东西，基本上跟商城为准备春节陈列出来的相似——红玫瑰酒，葡萄酒，瓶装水果，不过花色略为多些。

他谈，新蔡、上蔡两地吃饭问题同等严重，看来比商城好不了多少。

湖北流窜难民

他说，坐慢车，可以见到车站上湖北流窜过来的灾民。买短途票坐长途车，那是真正的逃荒了。

他说，还有买短途票到餐车吃饭的，所以现在餐车上只有长途旅客才能买饭吃。吃饭要验车票。

郑州以北好些

他说，郑州以北要好些，车站上能买到东西吃，摊多，买的人们也不那么挤。

59年的旱灾，看来是以湖北为中心，二头扩展的。河南确实还算较好的。

一月十九日 下午 0:30

信阳的一日

信阳的一晚是有意义的，而信阳的一天是十分灰暗的。

上午，人们听报告，我不必等人家通知主动请假。右派不参加会是从来信阳时就开始的，回时当然不会变化。什么事也没有，烤火喝水而已。其中到办公室转了一转，读了十六日的第一张人民日报，到外面买了一包烟。

大队部严禁外出，上午根本没有出去。

下午，本来大家参观公社工业展览会，我饭后一睡到三时，未去成，这也好。三时后，小雨夹雪，愈来愈大，根本也不能出去了。只是鬼混时间而已。其中读了十七日的报纸，是从报贩那儿买的。

吃饭，三餐是大米稀饭，馍，与大米饭。都不算多，但却吃饱了。还吃了器材局一位女同志的一个半豆包。

心情阴沉，曾设想到北京如何，根本不作其他考虑，唯希望到南口而已。

上车与担行李

5:30 晚饭，7:30 集合，8:57 开车。

我们这个队伍强调军事化，集合上车也作了详细的军事化的布置，可是效果只是一团糟。

人们行李都托运走了，我的行李全部带着。我用扁担担着。从招待所到车站三里多，加上列队集合，等车，担得一身汗，眼镜发朦，只好摘掉。50—60斤的行李基本上担到了，不觉得过累。锻炼比去年到底有许多进步。同时，比之最后几天担粪，动员，不是拖不动的味儿。这20多天，体力基本上恢复了。

一月二十日 下午五时半

车上，也是昏昏沉沉过的。

误点一二十分钟，基本上是正点到达。华海峰来接，十分帮忙，行李总算拖下来了。坐院部公共汽车到动物园，从动物园到家是担回来的。

到了百万庄还迷了路。找到家门，望窗口发黑，大家都睡了。把身上的一套衣服全部脱下来。煮预定的一份饭——一个压碎的豆包，徐云周给的胡萝卜，商城发的牛肉，吃完洗洗脚就睡。这一次旅程，就算是结束了。

谁知道以后的日子怎样过法。

息县日记

顾准日记

北京—东岳—明港

(1969.10~1971.9)

1969年

- 10月31日 在民族所第三期学习班作检查交代
11月1日 第三期学习班总结，下午回建内学部。
11月2日 全日修改检查交代，填下乡登记，打报告要见秀。
11月3日 斗争林革时大会。眷写检查报告。
11月4日 眷写检查报告。口头再提见秀。
11月5日 检查报告眷写完毕。开大夜车
11月6日 交检查报告。再提见秀。张吴谈话，下乡动员
11月7日 去三里河整东西，闻噩耗
11月8日 发信致方毅，请转信义之。下午知周一稽头、小米要来。斗争周慈教。
11月9日 购买东西，锯木板准备做箱子盖板。
11月10日 赵钟声同志对我“说清楚”，下午知道稽头、小米不会来了。
11月11日 做箱子盖板完毕，开始整理东西。
11月12日 整理东西完毕，第二次出去买东西。方毅要人复电
11月13日 乘帮杨抬东西之便，访百万庄旧居，见窗帘依旧，捆，做标志完毕
11月14日 雨，“抢救”行李，东来顺晚餐，“还君明珠双泪垂”
11月15日 “清洁卫生”一号楼
11月16日 成行，上车
11月17日 3:30 到驻马店，14:00 到东岳，经汝南、平舆、

新蔡、包信。

- 11月18日 基本上休息，帮助运砖
- 11月19日 做煤饼；托运的二个箱子到达
- 11月20日 做煤饼
- 11月21日 { 卸车，积肥，安置，借用行军床……
- 11月22日 { 霍蒋两副政委关于办学方针的报告
- 11月23日 { 学习讨论，继续安置
- 11月24日 }
- 11月25日 学习讨论，李副政委报告，通知参加积肥组，开积肥组会议
- 11月26日 积肥组劳动的第一天，听录音报告
- 11月27日 积肥组劳动第二天，听传达报告（李茂生）
- 11月28日 去菜园送尿二次，挖菜园尿坑，积肥组碰头会
- 11月29日 做尿桶盖，送尿一次；王贵宸谈送尿事
- 11月30日 送尿一次；参加任务讨论和表决心大会；听赵钟声同志总结报告
- 12月1日 休息；洗衣；送尿一次；灌水二十桶
- 12月2日 运砖、运砂（息县）；参加曾延伟座谈会
- 12月3日 修路半天；听息县王副政委报告；罗山文学所来参观
- 12月4日 修路。下午专案组调查会一小时半
- 12月5日 修路；息县讲用团
- 12月6日 修路；电影（晚）
- 12月7日 修路
- 12月8日 修路；息县运砖
- 12月9日 搭工棚；
- 12月10日 搭工棚半天；下午讲用会
- 12月11日 假日生活

- 12月12日 做煤饼
12月13日 运砂，搭工棚（张曙光、杨长福、吴敬琏）
12月14日 搭工棚
12月15日 清队（“五一六”^①）动员并讨论
12月16日 搭工棚，垫工棚土方
12月17日 同上。写成《彻底改造右派立场，坚决走毛主席指引的继续革命的道路》交出。
12月18日 搭工棚。下午地头扩大学习班
12月19日 忆苦大会，并讨论
12月20日 上午搭工棚，下午基建安排的报告会
12月21日 假日生活
12月22日 工棚垫土，安立柱
12月23日 上午工棚垫土，下午进驻一周年座谈会
12月24日 上午工棚垫土，下午化石灰
12月25日 上午纺麻线，下午化石灰（雨中）
12月26日 联欢（庆祝大）会
12月27日 搭工棚垫土
12月28日 搭工棚垫土
12月29日 搭工棚打夯，半天
12月30日 搭工棚，拉板车运砖，传达总理报告
12月31日 拉板车运砖（半天），和东岳学校联欢，庆祝元旦社论

① “五一六”：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的简称，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其真正的起因、前景，以及最终结果，现在还是历史之谜。在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运动中，无辜受到伤害的干部、群众数以百万计。

1970 年

- 1月 1 日 表忠心，游行，休假
1月 2 日 休假
1月 3 日 工棚垫土
1月 4 日 雪，学习，扫雪
1月 5 日 晴，学习，扫雪
1月 6 日 运砖；开始发烧。大刘庄
1月 7 日 病假
1月 8 日 病假 赵报告，结案阶段
1月 9 日 学习
1月 10 日 病假
1月 11 日 假日
1月 12 日 病假。晚上学习，交第二次思想汇报
1月 13 日 打井队学习班
1月 14 日 团中央干校参观传达；筛砂
1月 15 日 全总干校参观传达；运打井机具
1月 16 日 运井筒
1月 17 日 筛砂
1月 18 日 去淮滨筛砂，夜宿息县接待站
1月 19 日 运石头
1月 20 日 筛砂，并装车回来
1月 21 日 打井，准备工作
1月 22 日 落实政策大会；开始写检查；晚赵钟声副指导员报告
1月 23 日 打井第一班

- 1月 24 日 筛砂
1月 25 日 打井第四班
1月 26 日 打井第七班，批判会
1月 27 日 打井第十一班，加班未参加，病假
1月 28 日 病假（下管）
1月 29 日 病假（小结）
1月 30 日 病假（新任务开始），确诊为肺炎。交检查报告。
1月 31 日 病假。退烧
2月 1 日 病假。开始正常化
2月 2 日 病假的最后一天，参加积肥一小时半，写上旬思想汇报
2月 3 日 捆秫秸束，后勤；积肥
2月 4 日 建房工地劳动第一天
2月 5 日 续病假一天
2月 6 日 工棚，工棚垫土
2月 7 日 工棚，塞秫秸
2月 8 日 工棚，垫土。晚又发烧。徐济成、孙时平事件
2月 9 日 筛砂和运砂—瓦工小工
2月 10 日 工棚垫土和埋树苗；写思想汇报，关于批判孙治方的文章
2月 11 日 休息，徐济成追悼会
2月 12 日 工棚垫土
2月 13 日 去息县装瓦，杨长福带队
2月 14 日 打夯，卸砖
2月 15 日 垫土，卸砖
2月 16 日 垫土，打夯，卸砖
2月 17 日 打夯，运泥；和泥，抬土
2月 18 日 抬土；二时起写外调材料

- 2月19日 拾土；挖埋杆子窟窿
2月20日 雨 休息
2月21日 雨 搬家
2月22日 雨 总结
2月23日 雨 总结
2月24日 雨 写思想汇报
2月25日 雨 杨坚白、巫宝三会议——听赵副指导员谈“五一六”问题
2月26日 雨 乘晨间冰冻至东岳运行李，又至东岳扛面粉
2月27日 雨 搭脚手架 转晴
2月28日 雨 休息，洗衣服
3月1日 雨 批判“五一六”大会，下午卸发电机
3月2日 雨 李副政委报告
3月3日 阴 下午淋灰
3月4日 上瓦运泥
3月5日 同上
3月6日 挂瓦，杨长福
3月7日 脱坯运泥
3月8日 同上
3月9日 同上
3月10日 搭棚子
3月11日 休息日，整理林场仓库，去东岳运杂物
3月12日 雨，批判孙治方大会
3月13日 阴转晴，搭林场棚子
3月14日 林场棚子
3月15日 林场棚子收尾工程
3月16日 到息县就医
3月17日 林场工棚垫土

- 3月18日 食堂工棚
3月19日 食堂工棚垫土
3月20日 脱砖坯的准备工程（批斗李学曾大会）
3月21日 休息日，清晨脱坯准备工程
3月22日 脱砖坯
3月23日 脱砖坯
3月24日 脱砖坯，运土
3月25日 脱砖坯，运土
3月26日 运砂子，平坯场拉滚子
3月27日 菜园修干渠。找商大夫
3月28日 装窑
3月29日 装窑。建窑做小工
3月30日 建窑培土。上午菜园修干渠
3月31日 建窑做小工。菜园修干渠
4月1日 菜园修渠。新窑事故
4月2日 休息日
4月3日 讲用会和讨论
4月4日 上午脱砖坯；下午菜园修渠
4月5日 脱砖坯雨中收拾 傍晚起雨
4月6日 清砖场；去信阳，宿第三招待所
4月7日 在信阳装瓦，四时起参加脱坯劳动
4月8日 学习、讨论（雨）
4月9日 监管人员学习会，下午菜园劳动（斗争罗宇周大会）（阴雨）
4月10日 雨，写思想汇报
4月11日 休息日，泥地挑水满缸
4月12日 园房泥里墙
4月13日 平整坯场；脱坯

息/县/日/记/

- 4月14日 脱坯，供泥
4月15日 去息县运砂
4月16日 脱坯，打水及其他
4月17日 脱坯，打水及其他
4月18日 脱坯，供泥
4月19日 霍副政委报告；下午脱坯
4月20日 脱坯，供泥（第一幢房屋破土）
4月21日 “休息日”，去东岳修理衣服；去石寨劳动，挖河泥；夜垒坯
4月22日 垒坯至十一时；雨天停工；听霍副政委报告
4月23日 上午坯场排水；下午批判会（极左思潮）
4月24日 上午坯场揭盖；下午整坯（传达四次人大决定）
4月25日 整坯，盖坯（人造卫星）
4月26日 运坯，挖房屋地基（第二幢的第一天）
4月27日 和灰土；运灰，打水
4月28日 运灰打夯（外调）
4月29日 第一幢房屋砌砖上屋架，小工；去林场卸洋灰
4月30日 出窑（运砖）
5月1日 休息日（全休洗衣服）
5月2日 去息县运砂；回来筛砂（狄、林、彭）
5月3日 第二幢基础——筛砂（6—19:30）
5月4日 第二幢基础——筛砂，下午做小工
5月5日 第二幢砌砖，抬砂半天（两半天）
5月6日 第二幢砌砖，和泥
5月7日 运坯，帮林里夫迁石寨——五七纪念联欢会
5月8日 出窑运砖，4:00~11:30；雨天学习
5月9日 小雨，（砌墙）运砂，和泥
5月10日 阴，（砌墙）运灰，筛砂，和泥

5月11日	休息日
5月12日	砌墙小工
5月13日	砌墙小工半天，运坯半天
5月14日	砌墙小工半天，近代考古搭棚
5月15日	近代考古搭棚
5月16日	近代考古搭棚
5月17日	近代考古搭棚
5月18日	近代考古搭棚
5月19日	近代考古搭棚
5月20日	主席发表庄严声明
5月21日	上午庆祝大会，继续搭棚
5月22日	搭棚半天，耪地半天
5月23日	耪地
5月24日	休息日
5月25日	整理坯场
5月26日	整理坯场；制瓦，作坊基建
5月27日	拉滚子还蒋庄，栽白薯，整堤北坯场
5月28日	(久旱逢雨)取葵秧；栽白薯
5月29日	(清晨洗湿衣)挖土壤沟造秧稻田，坯场挖沟
5月30日	续搞水稻田 10:30—14:00
5月31日	续搞水稻田
6月1日	休息日，去东岳抬薯秧，拔秧苗
6月2日	水稻田
6月3日	水稻田
6月4日	水稻田至 10:30；去民族所拉打井工具
6月5日	割麦
6月6日	割麦
6月7日	双抢总结及讲用；水稻田

- 6月8日 水稻田
6月9日 水稻田；榜地
6月10日 榜地；“五一六”批斗大会（对抗和反复；退还材料）
6月11日 休息日
6月12日 榜地
6月13日 榜地
6月14日 榜地并撒化肥，午暴雨
6月15日 种豆子，东岳拉粮
6月16日 撒化肥
6月17日 榜地；（午小雨）撒化肥
6月18日 撒化肥，种豆，建猪圈
6月19日 种豆；出窑 6:30~11:40→14:30~22:30（11小时）
6月20日 翻白薯地；榜地
6月21日 休息日，写崔红军、宋德蕃材料
6月22日 听学部宽严大会实况录音；晨种豆，下午稻田推水
6月23日 榜高粱芝麻
6月24日 上午稻田推水；下午榜红麻
6月25日 榜红麻，白薯
6月26日 去息县拉沙，淋灰土用石灰
6月27日 淋灰，晚劳动运土 21:30~1:30 第四幢房子开始
6月28日 雨，撒红麻化肥，听4月19总理报告传达
6月29日 去石寨抬薯秧；补薯秧
6月30日 榜豆子、红薯；“五一六”问题讲用会
7月1日 休息日；去东岳送被子拆洗；值日，傍晚锄白薯
7月2日 菜园翻地半天；传达生产会议

- 7月3日 勾第一幢灰缝，和水泥沙浆
7月4日 糅白薯、芝麻
7月5日 糅芝麻
7月6日 为陈秦搬家
7月7日 糅豆子
7月8日 糅白薯，小雨
7月9日 推稻田水，拉坯
7月10日 糅豆子，上午完成。下午拉回盖坯材料
7月11日 休息日；晚修井 17:30—0:30
7月12日 补休半天；水稻田推水
7月13日 盖房拉土
7月14日 盖房拉土
7月15日 水稻田推水（传达关于国务院各部的中央文件），
拉土，中心点盖房开始
7月16日 拉土，当小工，房顶上泥（5:00—21:00）
7月17日 上瓦供土 8:00—10:30，1:30—8:00
7月18日 上瓦供土；去东岳运粮
7月19日 雨；讨论中心点建设安排；下午学习班
7月20日 上午挑水；下午学习班
7月21日 休息日；写思想汇报（学习班发言）
7月22日 中心点和泥
7月23日 中心点和泥，运砖
7月24日 运砖
7月25日 第一幢房子屋北复土、运土和灰；加强纪律动
员，冯余珊
7月26日 豪雨；复灰土。写材料。抬西瓜。宪法传达，修
改宪法讨论
7月27日 第四幢房子泥墙杂活

- 7月28日 中心点盖房当小工，纪律讨论
7月29日 中心点盖房当小工，纪律讨论
7月30日 中心点盖房当小工，纪律讨论
7月31日 第四幢房屋填土
8月1日 总理形势报告及息县两代会传达讨论
8月2日 修路，纪律讨论
8月3日 中心点抹墙当小工，晚1:30—2:30卸石灰
8月4日 中心点抹墙当小工
8月5日 菜园翻地
8月6日 休息日，积肥
8月7日 二排宿舍垫土
8月8日 同上；晚通宵上煤
8月9日 休息半天，下午推水
8月10日 搬家；推水；抬瓜借筐未成
8月11日 休息日；晚看电影，0:00—2:00
8月12日 翻白薯秧；去东岳担粮；卸煤
8月13日 种菜推水；
8月14日 收拾坯场，平场挖土填洼
8月15日 推水稻田水
8月16日 为猪圈拉沙；平场拉滚
8月17日 平场拉滚
8月18日 同上
8月19日 收割高粱，失镰
8月20日 同上
8月21日 同上，收割七十亩
8月22日 收割高粱（结束七十亩，突完三十亩）
8月23日 收割高粱（捆秫秸）积肥
8月24日 （大会战誓师）推水，割高粱，伤足踝

- 8月25日 打秫秸把二小时。雨，补假一天
- 8月26日 装卸秫秸；晚卸砖
- 8月27日 装卸秫秸；晚出窑砖 20:00—2:30
- 8月28日 补休；表决心大会；晚卸砖 20:00—6:00
- 8月29日 补休；种萝卜
- 8月30日 运木料和柁架
- 8月31日 泼石灰，铲运房基土 | 以下仓库工程
- 9月1日 出窑；晚运砖 20:00—24:00；凌晨种萝卜
- 9月2日 补休半日；拉运横杆
- 9月3日 挑供灰浆
- 9月4日 同上
- 9月5日 菜园推水半天；讲用会，卸灰
- 9月6日 仓库填土
- 9月7日 仓库填土（6:30—9:00），挑供灰浆，卸灰
- 9月8日 休息日，种白菜
- 9月9日 打井
- 9月10日 打井；脱坯，晚大雨
- 9月11日 休息日，整被子，玉米脱粒
- 9月12日 学习九届二中全会公报；栽菜，12:45—17:00
- 9月13日 出窑；栽菜，5:00—12:00；13:00—19:00
- 9月14日 出窑
- 9月15日 中秋，栽菜，推水；晚卸铁锅二口
- 9月16日 仓库工程当小工半天；雨，卸砖一车
- 9月17日 上午学习班；打稻 12:30—18:00
- 9月18日 仓库工程小工
- 9月19日 党章学习，磨镰；割红麻半天
- 9月20日 外调；拉砖半天
- 9月21日 拉砖；雨中拉红麻皮

- 9月22日 休息日，雨
- 9月23日 学习党章；运麻入渠
- 9月24日 看守麻皮；捆麻皮，6:00—18:00 雨
- 9月25日 新党章学习；玉米脱粒（完） 雨
- 9月26日 剥霉绿豆 雨
- 9月27日 剥霉绿豆 雨
- 9月28日 剥霉绿豆；出猪圈 雨
- 9月29日 出猪圈 转多云
- 9月30日 摘绿豆（民族所西田间） 多云
- 10月1日 节假；打绿豆
- 10月2日 节假“国庆文艺会演”
- 10月3日 出窑
- 10月4日 装砖，收拾绿豆
- 10月5日 运麻皮
- 10月6日 听大寨参观传达；麻皮下水
- 10月7日 麻地杂活
- 10月8日 割豆子的运输 冒领事件
- 10月9日 割豆子的运输
- 10月10日 割豆子的运输 下午学习，麻皮下水
- 10月11日 割豆子的运输 6:30—19:30
- 10月12日 休息日，捡豆地豆子 5:30—8:30
- 10月13日 上午学习——运麻入渠；下午刨白薯
- 10月14日 出窑，去东岳看病
- 10月15日 病假（胃病）
- 10月16日 病假（胃病）
- 10月17日 “总结”典型报告会半天；菜园翻地半天
- 10月18日 [总结]菜园推水
- 10月19日 割红麻；插队动员，写外调材料

- 10月20日 撒化肥；刨花生，洗花生
- 10月21日 休息日，整日写“整理思想”的思想汇报
- 10月22日 割红麻
- 10月23日 捆红麻，刨白薯
- 10月24日 刨白薯；下午雨，学哲学
- 10月25日 雨，学哲学，摘记矛盾论和实践论
- 10月26日 同上
- 10月27日 捆白菜，洗麻皮
- 10月28日 捆红麻
- 10月29日 出窑
- 10月30日 平整脱坯场。刨白薯；欢送插队大会；卸猪饲料
- 10月31日 脱胚
- 11月1日 休息日，去东岳弹棉褥
- 11月2日 刨红薯
- 11月3日 刨红薯
- 11月4日 装运红麻 7:30—22:00
- 11月5日 刨红薯，听讲用会
- 11月6日 整坯
- 11月7日 刨白薯，运麦糠
- 11月8日 运麦糠两次
- 11月9日 同上
- 11月10日 垛坯、整坯
- 11月11日 休息日
- 11月12日 拉滚平坯场；整坯
- 11月13日 动员会，整坯，寒流
- 11月14日 脱坯、供泥
- 11月15日 脱坯、供泥
- 11月16日 脱坯、供泥

- 11月17日 脱坯、供泥
11月18日 脱坯、供泥
11月19日 脱坯、供泥
11月20日 整坯、垛坯
11月21日 去淮河运砂，寒流
11月22日 补休息日
11月23日 收运白菜
11月24日 家属宿舍修建动员会；细雨中拉煤到托儿所
11月25日 盖锅炉房拉坯、拉土
11月26日 盖锅炉房拉坯、拉土，和泥，整理棚内床铺行李
11月27日 盖锅炉房拉坯、拉土，准备灰土用灰和土；整坯
11月28日 垛坯；锅炉房杂活
11月29日 整坯；拉劈柴；家属房挖地基
11月30日 垛坯；家属房打灰土
12月1日 休息日；淋灰
12月2日 淋灰；补休息日淋灰三小时假
12月3日 整坯；淋灰
12月4日 整坯；割花箕；夜运砖，19：00—4：30
12月5日 补休半天；校部哲学讲用会传达并讨论
12月6日 休息日
12月7日 垛坯；卸灰
12月8日 泥坯垛顶；饲养房和泥
12月9日 饲养房上草顶
12月10日 饲养房上草顶
12月11日 “五一六”动员大会；下午竖大字报席屏（运动
开始）
12月12日 大字报席屏；用玉米秸代红麻盖菜，寒流
12月13日 续盖菜红麻（按休息日作息时间）

- 12月14日 同上，去民族所拉小米
12月15日 同上，晚卸车未成
12月16日 同上，卸砖
12月17日 同上
12月18日 同上
12月19日 机务队小房上秫秸把
12月20日 休息日，扫坯垛雪一小时
12月21日 学部批斗“五一六”大会——细雨中；下午讨论
12月22日 抹饲养房墙；整院子
12月23日 挖种树坑
12月24日 抹饲养房墙
12月25日 种树施肥
12月26日 饲养房填土
12月27日 上午饲养房铺灰土；下午出圈填圈
12月28日 种树
12月29日 院内种树挖坑；整白菜
12月30日 整白菜；绞肉（饺子馅）
12月31日 到东岳担粮；整院子，整白菜

1971年

- 1月1日 假日——文艺表演观看和吃饺子
1月2日 假日，清整
1月3日 学习元旦社论，下午家属宿舍打地基
1月4日 去张大庄拉砖
1月5日 打家属宿舍地基淋灰
1月6日 去张大庄拉砖

- 1月7日 中心点戏台土方；掏井
- 1月8日 掏井
- 1月9日 仓库砌墙当小工
- 1月10日 同上
- 1月11日 补星期天，清整；晚批判假造反大会
- 1月12日 仓库砌墙当小工；晚，智取威虎山
- 1月13日 仓库砌墙当小工；晚，批判大会
- 1月14日 同上
- 1月15日 拉木材
- 1月16日 去息县拉沙（高涤陈带领，张文敏、周建军、曾延伟，另三人）
- 1月17日 仓库工程当小工
- 1月18日 雨批判大会，上下午各一次
- 1月19日 出猪圈；东岳挑肉
- 1月20日 仓库工程小工
- 1月21日 同上
- 1月22日 同上，清晨去工地拉砖
- 1月23日 同上，清晨去工地拉砖
- 1月24日 同上，凌晨去中心点拉车到东岳
- 1月25日 上午开会；下午搞白菜
- 1月26日 假日开始，双值日，“吃饺子”
- 1月27日 （春节）担泔水，煮猪食 7：00—13：30
- 1月28日 无任务；开始写思想汇报
- 1月29日 值日挑水；写思想汇报
- 1月30日 假日完了；写成思想汇报
- 1月31日 出圈填圈
- 2月1日 息县拉沙（曾、顾、小周，另制瓦排四人，林、郭、狄、黄）

- 2月2日 息县拉沙（曾、小周；另制瓦排四人，梁、秦、徐瑞英，刘文璞）
- 2月3日 家属宿舍淋灰挑水；仓库递木板，锯木板
- 2月4日 锯木板；担石灰
- 2月5日 拉石灰；家属宿舍砌砖，切油毡
- 2月6日 去杨庄拉秫秸
- 2月7日 宿舍工程和泥
- 2月8日 全校大会，传达五七学校会议精神并讨论
- 2月9日 讨论
- 2月10日 讨论
- 2月11日 讨论
- 2月12日 讨论
- 2月13日 讨论（去息县拉砖未成）小清整
- 2月14日 讨论
- 2月15日 讨论
- 2月16日 去息县拉砖
- 2月17日 讨论措施
- 2月18日 泥坯架顶，挑水，备泥
- 2月19日 家属宿舍拉坯；打秫秸把，备麻 下午雨
- 2月20日 打秫秸把备麻 阴雨
- 2月21日 休息，去东岳送衬衣裤 请缝制 阴
- 2月22日 备麻，雨中盖未完成的家属宿舍 雨
- 2月23日 席棚拦小房；耳房上瓦 阴
- 2月24日 家属宿舍扛坯 转小雪
- 2月25日 家属宿舍扛坯； 扛檩条
- 2月26日 当小工
- 2月27日 屋顶抹泥和泥担水半天；供泥半天
- 2月28日 移居饲养班；干杂活

- 3月1日 上午写外调材料；下午批判田光大会；喂猪，雨
3月2日 整理老饲料房，帮助张曙光移磨；喂猪，阴雨
3月3日 砌烟囱坯基，和泥等活
3月4日 凌晨去东岳，拉糠，拉坯，拉草，砌烟囱
3月5日 出圈，圈院稀泥出清（实际的第一天）
3月6日 砌烟囱；去中心点拉水泥
3月7日 值班，喂猪
3月8日 补休息日；清整，换季
3月9日 正式出圈第一天；过道、院内填土，第三圈
3月10日 第二天；院内填土；第三圈
3月11日 第三天；第三圈；帮了张曙光等完成第二圈；张
完成第六圈
3月12日 第四天；第一圈未完
3月13日 第五天；完成第一圈（彻底）；挖土；开沟犁划
界
3月14日 休息日
3月15日 第六天；第一圈填土铺草；挖土，喂猪
3月16日 整粪堆；修路；半天第四五圈（8）
3月17日 第四五圈；填路（9）
3月18日 第四五圈；半天（10）；巴黎公社100周年会议
3月19日 拆窑，运柴火材料半天；第四圈完，第五圈填
完；第三圈坑上（11）
3月20日 补挖第三圈坑上；填完第三圈；运走圈院外稀泥
3月21日 喂猪值班
3月22日 补休息一日，写思想汇报
3月23日 院上稀粪运完；拉砖
3月24日 拉砖；垫土，打夯
3月25日 开大会，宣布搬家；烧猪食

- 3月26日 全连大会；赶猪去东岳
- 3月27日 送鸡鸭去东岳，拉回两头猪肉；整饲料
- 3月28日 刷洗锅灶用具；整剩余稻糠
- 3月29日 整东西；移居锅屋；短时移交稻糠
- 3月30日 去东岳帮家属运行李
- 3月31日 全连大会，通知留守
- 4月1日 全休一日
- 4月2日 做支床木凳
- 4月3日 去东岳一次；帮厨房捆东西
- 4月4日 清晨装车，最后清理锅屋，下午休息；移居中屋
- 4月5日 割韭菜；洗衣服
- 4月6日 修钉床架
- 4月7日 东岳至明港途间
- 4月7日 全连大会
- 4月9日 学习；帮贺菊煌搭铺
- 4月10日 挖垃圾坑；运走垃圾
- 4月11日 星期日，洗被、床单、睡衣
- 4月12日 运垃圾；翻地
- 4月13日 托儿所间隔 阴雨
- 4月14日 托儿所杂活 阴雨
- 4月15日 同上 阴雨
- 4月16日 学习 阴雨
- 4月17日 学习发言（小结） 阴雨
- 4月18日 上午搭开水炉棚；做寄表盒，理发 转晴
- 4月19日 学习小结和第二单元布置
- 4月20日 上午挖地；下午自学
- 4月21日 讨论
- 4月22日 讨论

- 4月23日 讨论
4月24日 种玉米扁豆半天；讲用会
4月25日 休息日，清整
4月26日 去明港拉菜；学习小结（第二阶段）
4月27日 学习
4月28日 学习（五一演连内预演）
4月29日 学习（五一演，五一节联欢）
4月30日 去明港拉肉，环境清扫
5月1日 帮搬家；晚节目和电影《列宁在十月》，晚雨
5月2日 全休 雨
5月3日 学习，帮陈令淑搬家
5月4日 学习，帮贺江整箱子
5月5日 俞震报告；打桨子
5月6日 学习
5月7日 学习，帮吴会琮搬家，取钢板，整仓库
5月8日 学习，整大厅；全连表决心大会
5月9日 削萝卜，去明港拉面粉
5月10日 拉高粱面；学习；帮装灯
5月11日 学习，写翌晨天天读发言稿，帮装灯
5月12日 学习，做西墙遮阳
5月13日 同上，做赵陈家的门
5月14日 食堂栏间壁
5月15日 同上；堆粮食与行李
5月16日 休息，挂蚊帐 雨
5月17日 听小结会
5月18日 学习，半日讨论
5月19日 锄地，拉玉米豆子去加工
5月20日 加工玉米豆子并整理

5月21日 学习，全连批判会
5月22日 学习；去指挥部拉黄豆
5月23日 休息日 雨
5月24日 学习
5月25日 学习；王礼琦找谈话
5月26日 学习
5月27日 学习；写批判稿
5月28日 学习；写批判稿 翻粮包 端节
5月29日 学习，帮食堂拦宿舍
5月30日 休息日
5月31日 翻晒粮食
6月1日 学习（开大批判稿讨论会）
6月2日 学习，《反杜林论》摘录；理发
6月3日 排大批判，学习 阴，小雨
6月4日 学习；麦收动员
6月5日 收麦
6月6日 收麦
6月7日 补休息日
6月8日 学习
6月9日 学习 阴，雨
6月10日 学习 阴，雨
6月11日 学习 阴，雨
6月12日 学习， 阴，多云
6月13日 休息日，继续天演论 阴，多云
6月14日 学习 阴，多云
6月15日 学习 阴，多云
6月16日 学习；洗澡 多云，阴，小雨
6月17日 学习； 多云，阴，小雨（支架）

- 6月18日 学习；卸煤，锄茄子地；多云转晴
6月19日 学习；锄棉花地 晴
6月20日 休息日；锄西红柿地 晴
6月21日 学习；做木匠小工；茄子追肥 晴
6月22日 学习；做木匠小工；对面西红柿豆子浇水 晴
6月23日 学习；整西红柿 晴
6月24日 学习；西红柿追肥浇水 晴转阴，晚雨
6月25日 学习 雨转晴
6月26日 学习；洗澡 晴，多云
6月27日 休息日，西红柿施尿素完毕。去明港 晴
6月28日 学习；锄茄子和西红柿 晴
6月29日 学习 阵雨
6月30日 学习 阴，小雨连绵
7月1日 学习 上午大雨
7月2日 学习七一文章 晴
7月3日 学习；晚宣布换排 晴
7月4日 到二排，搬家 晴
7月5日 上午讨论会，下午准备思想汇报提纲 晴
7月6日 上午明港帮托运行李，下午学习 晴 茄子追肥
7月7日 学习 阴，小雨
7月8日 学习，大批判会 多云
7月9日 学习 多云，阴
7月10日 学习，排批判会 多云，阴
7月11日 休息日，去明港 多云，晴
7月12日 盗窃机密批判及动员大会，交思想汇报，去明港送张江滢等 晴
7月13日 准备写学习心得汇报，阅读过去材料 晴（摘茄子，追肥）

- 7月14日 考虑写第二篇汇报 晴
7月15日 读九评 晴
7月16日 读九评 晴（西红柿追肥）
7月17日 读九评（提探亲假事） 晴（茄子浇水）
7月18日 休息日 晴（西红柿追肥）
7月19日 讨论公报，学习 晴（西红柿浇水）
7月20日 学习，卸煤；晴摘茄子
7月21日 讨论公报，学习 晴
7月22日 轧面，数饭票 多云
7月23日 着手写汇报 晴
7月24日 再着手写汇报 晴 茄子浇水
7月25日 休息日 晴 摘茄子
7月26日 曾延伟会议 晴
7月27日 批判会 晴 茄子浇水
7月28日 学习 阴，小雨
7月29日 学习 多云，晴
8月21日 天演论结束；批吴会 多云
8月22日 休息日，数学 雨
8月23日 修理女盥洗室整天 阴，雨
8月24日 读中国革命史料 雨
8月25日 读中国革命史料 阴，多云
8月26日 读中国革命史料 多云间晴
8月27日 路线会；学习 阴，小雨
8月28日 中国革命史料 阴，小雨转晴
8月29日 休息日，去明港，晒衣被 晴
8月30日 回到《小逻辑浅释》 晴
8月31日 “偷生”半天，《小逻辑》晴
9月1日 《小逻辑》晴

惠/县/日/记/

- 9月2日 脱坯，卸砖，看报 晴
- 9月3日 《小逻辑浅释》，摘棉花 阴，雨
- 9月4日 路线讲用 多云
- 9月5日 休息日，家务，整茄子，搞出一批蓖麻子 晴
- 9月6日 《小逻辑》，帮张纯音整理房子，挨批 阴，小雨
- 9月7日 《小逻辑》 晴
- 9月8日 《小逻辑》、《国家与革命》学习笔记 阴，小雨
- 9月9日 同上 阴，小雨
- 9月10日 学习笔记；批判会 多云
- 9月11日 学习笔记； 多云

一九六九年

《新生日记》开始记

十一月十二日

《新生日记》^① 的取名，是为了纪念三期学习班上，决心转变立场，跟毛主席继续干一辈子革命。可悲的是，这种新生的心情竟不能告诉采秀，而以前，唯一听我诉说一切的人，只有她一个人！

十一月一日，星期六，下午自民族学院回建国门学部。二日星期日，竟日埋头修改检查交代，三日，开始誊写。因为插上其他的会议，而我也不存心迅速搞好，进度较慢。晚上排里开会叫填下乡的登记表，随表我写了一份要求见见采秀的申请。四日，一面誊写，一面整理，进度较快。晚上，开始感到秀也许不在了，跟冯秉珊说，她答复了，也可以告诉我，冯秉珊镇静地回答，你的问题，由宣传队直接答复你。五日，加快整理誊写，晚上整一点，完成。翌日凌晨，交杨重光。旋即下乡动员。我想检查交代交了，应该不会再有什么要清理我与采秀之间的事情了，所以交材料给杨重光时提此事，晚上找了张副连长吴师傅提此事，宣传队大概考虑后果，还不以实告。七日上午去三里河整理东西，抬了一上午木头。晚上找杨清华指导员，保证无论她死了，疯了，病重了，都一不影响下去，二不影响改造，杨才去找陈德金说了实话，可是死期，死况，遗

① 顾准将 1969 年 11 月至 1971 年 9 月间的这本日记命名为《新生日记》。

言，一概不知。当时我向杨请求帮我找找稼头或棣妹^①，杨说，我们哪儿去找去？我心想回去穿上衣服，想去百万庄、力学所等处时，赵钟声副指导员走来，说你去整理东西，我们帮你找找……

闻噩耗，既觉意外，也不觉意外，意外的是，她爱孩子，为什么给孩子留下一个“母自杀”的家庭环境。不觉意外的是，1965秋，她已写过遗嘱，1967年5月，她看来已经实在支持不住了。杨告我时，我说，“她为什么自杀？她不是不许我死，说要害人。她为什么要害人？”我此时只想知道她死时情况，赵说，他们帮我找找，我就去打饭来吃。吃了几口饭，悲从中来，脸伏在饭盆上失声大号。但是我还是抑制住，努力把饭吃完。我要活下去……

竟夜不寐，前尘影事逐幕出现脑际。我怕稼头、小米都已下乡，想到能够知道义之机关，而我又可以找的，唯有曾山、方毅二人。五时起床，写信致方，附信致义之、棣妹。又写了二张找稼头、小米的地址表，一交郑国绮，一交小王。下午1时去八号楼，郑国绮亲切地告我，星期一来。

这是星期六，八日。当晚虽崔唐大钉箱子，我还是酣睡了一晚。星期天，出去买东西，在东风食堂午餐，还幻想了在那里招呼稼头、小米来吃一顿饭。当晚，睡了二三小时。

十日周一上午去八号楼走了好几次，赵钟声同志第一次告我，要办一个家庭学习班，要我谈谈思想，要稼头、小米来，如果“你妹妹有时间，也请她来”。第二次告我，“说清楚经过”；周一上午稼头来电话，不来；又告我小王去，我可以找小王询问经过。下午四时，小王详告二次找稼头、小米的情形，告我周一第二次谈话达三小时，最后没有说死，说周二电

① 棣妹：顾准的妹妹。

话答复。昨天，十一日，小王说，小米回了电话，不来，提几点希望，小王拒绝听他的希望。小王说，稼头、小米意思是动摇的，决定不来的主要因素是“姑姑”。小王说，她们考虑个人前途，私字作怪等等……

这些都无关宏旨。重要的是，我的《新生日记》增加了一重意义“Let bygones be bygones”（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1944在延安，我为父亲服丧。这一回，我不服丧，因为我为秀服丧是终身的。长恨歌说“此恨绵绵无尽期”，那是空话。但是马克思把他父亲的小像，镶嵌在胸饰中，带进了地下。我至少还要活二十年，三十五年的记忆，至少在我心里还要活二十年。

九日买了二十个信封和二十五张邮票，那是准备给稼头、棣妹她们写信的，现在把它搁起来，不到她们来找我，我决不用它。她们会来找我的，因为既然我决心新生，有朝一日，她们现在所有的一切顾虑就会打消。而且我决定不做魏连菱，那是一个自暴自弃的人……

所里同志们的同情是极可感谢的，尤其是赵钟声同志。我对杨清华指导员说，宣传队是仁至义尽了……

征途

十一月十八日

十六日上午10：30集合，在北京站上车，想了一些办法，把行李系在一起背上火车。车行十四小时至驻马店下车，在车站喝了一碗豆腐脑。五时上汽车，匆促间遗失所带公家水瓶一个。夜间汽车行驶迅速，上车又极匆忙，踩烂牙膏一支，蚊帐架一个，彭泽益所赠烟丝一盒。车经汝南、平舆、新蔡、包信

集，都是沥青路面。包信集以下为泥结碎石路面，十余里后为土路，翌晚雨雪，路上泥泞，车行困难。徒步五六里再上车，到东岳为下午二时。一夜未眠，兼以三百里汽车颠簸，到后累极。回忆 1943 年、1945 年行军，究竟又过去了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体力差得很远了。又比之 1958 年去贊皇，1959 年去商城，此行虽有老人小孩，而雷厉风行，令出如山，则又数倍之。“令行禁止”，完全部队做法。指挥者实系指挥部霍、贾两副政委。仔细想想，如果不是运动中大家觉悟极度提高，如果不是解放军作风的贯彻，这次行程是走不过来的。

东岳环境，并不如在京所闻那样严峻。我们睡在一个棉花仓库里，集中住的约一百四五十人，犹如一个连队的驻军，不过每个战士所携被服丰厚，物品众多，决非连队所能比拟耳。土地辽阔，据闻每人耕地可得七八亩，但也决不是万里荒滩。村落田地，景色与淮海区依稀相类。论地理环境也大致相似，此间本是密迩淮河的淮北平原，不过地处上游，纬度又较淮海区偏南而已。干校建校后要进行农耕，大概还不免和老百姓犬牙交错，不是纯粹的荒漠中的创业……

安 置

十一月二十六日

十七日到达，指挥部预定留作“安置”的时间为一周，到二十三日为止。二十三日休息一天，二十四起开始学习和生产。实际“安置”时间比计划为长，到现在为止，一排还睡在地上，在等候铺板。

安置的结果大体是这样的：男宿舍在棉花仓库和小学校，后者住一个排。棉花仓库搭了架子，半数以上的人睡“高铺”，

其余的人睡床板，处中间，行李箱笼放在架子下面。这一个仓库很长，有十间房子，这样安排的结果，室内蔚为奇观。女宿舍在粮管所，家属宿舍分散在兽医院、卫生院等处。家属宿舍也是三五家一间屋子，林里夫一家乌家培一家独处一屋，是个别的例外。

“安置”中当然出现形形色色的现象，大体说来，还是符合政治第一，但政治工作不能代替“管理教育”这一概括。也有一种好处，即这里不可能有办公室和家庭的二重生活，一切都无法隐蔽，于是口头革命派就无所遁其形迹了。

已经走上轨道的生活秩序，是清河饲养场式的秩序，而不是赞皇、商城式的秩序。也有一些区别，清河饲养场的成员普遍情绪低落，普遍背有劳动惩罚论的包袱，这里则是一片蓬勃景象，有活争先恐后地干。

昨天午后李副政委报告河南、信阳、息县、东岳环境颇为详尽，这是全国状况的一个缩影。第四个五年计划，河南省的电力设备，从 50→150 万 KW，城市人口将增加二百万人。1975 以后，看来步调还要加速。这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了
.....

积肥一周

十二月一日

学习是从二十四日开始的。实际上，我从二十三日开始搞积肥，学习一周，在我是积肥的一周。这一周，确定了炉灰单独使用，尿粪分开，人粪沤肥，向菜园送尿的办法，以及安排好送尿的工具等几项活动。遗憾的是，向菜园送尿还未上轨道，泥封堆肥还未做成。今天消息，我调离积肥组了.....

因为积肥，这一周的学习我参加得很少。所知学习内容有，霍、蒋二副政委的报告，李副政委的报告，传达十二月份任务，以及搬家的总结。这几次报告，霍、蒋所提为办学方针，李报告省地县一般环境以及今冬农村整党要求，赵则做了一次生动而深刻的搬家总结。其间，各排分别开了大批判的会议，批判下乡镀金、劳动惩罚、入党做官、怕艰苦、缺乏创业思想等等。这些活动各有内容，李副政委的报告，传达了第四个五年计划在河南省的轮廓，以及备战、革命、建设的总方向，使人眼界扩大。终幕则是昨天赵钟声同志的总结报告。

赵 1935 年生，年轻，外貌和内心是工人阶级，可是文化水平颇高，而且博闻强记，文采风流（虽然他的腰实在太粗，而且据他自己说低血压经常在 120°），说话委婉深刻，辛辣处一针见血，婉转讽喻处令人感动。他说五七干校，主旨是继承抗大传统。他既引当时抗大校歌，又极能体会这一时期青年的政治情绪，他说得使我极其激动。他也说得十分辛辣：抗大是一个大熔炉，抗大的学员有的成了烈火，牺牲了；有的成了钢铁，还有的成了渣滓。我虽非抗大学员，我既也喝过延河水，我也自愧成了渣滓。他又说得十分“统战”，比如，他说，许多长期在国外生活的人，仅仅下来一事，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云云。……这是一位工人政治家，他理当成为新时代的党的骨干和核心。可是能不能这样呢？……

12 月份要转入紧张的基建活动。指挥部传达的任务中，大家注意的是运输与盖房，其实这方面所需劳动力还比较少，更严重的是土方工程：修路和垫房基。看来需要开沟犁，需要较多的小型独轮推土车，需要大石滚，以便利用拖拉机代替压路机等等。如果不能，甚至需要一掘凿机。至于我调到基建，原因何在我不清楚。到那里，当然要好好干。

基建十天

十二月十日

二日开始基建的劳动，第一天是到息县城运砖和到淮河河滨运砂，间隔几天之后，八日又到息县城运砖一次，只半天。其他，自三日至八日是修路，九、十两天在工地搭料棚。

运输的二天，其中一天没有“贯彻始终”，因为赵钟声同志那里抓我参加曾延伟座谈会，回来时没有参加卸砂。其他几天的劳动大致正常，其中尤以修路的几天还发挥了一些干劲。可是因为一日和一日前抬尿把胸口压痛了，到八日修路终止还未好，九、十两天的搭工棚发挥的作用就很少了。

这几天的劳动，宣传队大概为了照顾开始几天大家体力还不适应，所以三日有息县王副政委的报告，五日有息县毛泽东思想讲用团的讲用，八日下午，则三点就收了工。今天，是休息日，也只劳动了半天，下午安排了讲用会，讲用者靳汉生、乌家培、陆斐文、杜培荣四人，实际上这九天劳动了不足七天半。

这算是正规劳动的第一旬，大体上我还是顶下来了，没有落后。只在第二次运砖时擦破了左手小指的皮，既未打泡，也无其他事故。劳累是有的，也不太厉害，一早休息，第二天就能休息过来。看来今后还能有所进步。

劳动时间一天七小时，因为按规定时间八小时，还要除去天天读的一小时。工地距离远，每天走路二十余里，费时二小时，实际干活不足五小时。这样的劳动强度是不难适应的。

倒是这十天有不少感受。杂记于下。

信阳专区的十年

王副政委三日的报告，谈了不少息县的情况。地理、土壤、气候、农业无不具备，其中建议的我们这个五七干校的耕作制度，即种一季小麦，种一季绿肥——绿豆和芝麻——压青，颇有道理。我对别的同志说我想补充的只有一条，即既然大种绿肥，就可以大喂牛羊，以厩肥肥田。这对有些地广人稀的农村也许是困难的，对我们则是不困难的，因为我们的人力，用于大田精耕，无论在质和量两方面都是困难的，用于畜牧业则是合适的。当然，这一点，要实行起来还有十分巨大的思想障碍有待于克服，因为汉人的精耕农业和不熟悉畜牧业是一种极其难于克服的成见，是不容易解决的——正如草木灰拌人粪尿这项成见一样。

王的报告中谈信阳地区 50—60 年的刘毒^①，很直率。他说，这里，这两年中劳动力的损失很大，有些生产队整个都不复存在，至今还看得见有些水渠环绕的宅基，那就是这些消失了生产队的遗址。王还谈到所谓信阳事件和光山事件，可惜事件详情我不知道，王也未详细谈到。

来后我和农民有过两次在这方面的接触，一在上月月底筛粉煤灰的时候，参加砌砖的一个东岳社员谈到他家死了三人，50%；一是从淮河滨返来时和机耕队的一个铁匠谈话，他说他家七口死了五人，那就是 70% 了。可是，现在这里机耕极普遍，东岳机耕 2/3，每亩耕作费八角，连耙为 1.2 元，耕作面

① 刘毒：文革期间批判刘少奇同志的流行用语。

积扩大，一季小麦，一季蚕豆可收二百斤，人畜两旺，创伤是完全恢复过来了。

现在的问题是，这里颇似苏联集体农庄：机耕，集体收入小，社员依靠自留地和个人养畜业以取得收入的比重特别巨大。劳动日工值为2—4角，除分粮分草外，不再有什么很多现款可以开支。而一户养母鸡可达20—30只，养猪可达2—4头，自留地每人0.17亩，那位铁匠从0.68亩自留地上，施用化肥，收获小麦350斤。这比大寨的集体经济的巩固程度相距实在太远。

这里也发生了我思想上十年来的变化。究竟还是“同情”农民，赞成资本主义倾向呢？还是彻底革命，事事从巩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着眼来观察问题。要写一年总结，即准备以此为题材。

从前有过再访商城的意愿，到息县来，即使不去商城，这个意愿算是已经达到了。

息县五七干校有八所，信阳地区各县更是五七干校相对集中之区。原因何在，王副政委的报告已经作了解答了。

息县，信阳和河南

十二月十一日

所到息县，知息县电厂发电容量为130KW，小型化肥厂已在建设中（《河南日报》载有驻马店地区化肥厂的消息，度非大型，最多是中型的）。有机制砖瓦厂、机械厂、中学。机械厂规模不小，问机耕队铁匠，知为各机耕队服务的。王副政委报告中谈到，息县几乎每一个公社都有机耕队，东岳机耕队有T100一台，东方红54五台或八台，每台东方红巨布和班布

业量达 250 亩以上。耙有老乡自己干的，耩麦则全用畜力。机耕规模既然如此之大，机械厂自然有许多活要做。

息县机耕规模之大，自与 1959—1960 年的刘毒有关，这是中央关怀本地区农民的补偿措施。与此相应，自然要有县机械厂的设施，这是自然必然之事。

息县地处淮滨，在淮河的紧北面，1968 年，全县因特大雨量（三天四夜下了六百毫米以上）而被淹，据云是二百年未遇之大雨。但今年还看不出什么受灾的痕迹。中央关怀淮河地区，已决定河南在五年内修六个水库，其中商城水库容量 22 亿 m^3 ，今年上马，明年完成。王副政委还传达中央意图，对从前谭震林只顾皖北、苏北、淮河下游的治淮方针作出严肃的批判，并说河南地区淮河各支流水库设计完成多年，搁置了很久，现在决心逐年上马。安徽按上游来水的方针，已经不能再继续，看来治淮一事，不仅河南，皖北、苏北也必有通盘筹划。

信阳还未去过。只从曾在县打井办事处的一位搭车的东岳革委会委员处知道，信阳现在发电容量为 6000Kw，扩充的 10000Kw，本年六月可以发电；届时东岳也就可以有电，信阳本地和信属各县的工业也应有巨大发展。河南总的前景更为宏伟：河南全省各电容量现为 500000Kw；三年内将扩充达 1500000Kw。到 1975，即第四个五年计划之末，当可达 3000000（我的估计）Kw。又据李副政委和王副政委两次报告，六年内河南全省新建大厂达 83 所，新建焦作到湖南的第二京汉线，又《河南日报》载，渭河到南阳的地方铁路已经通车。

这一切和备战都有关系。八方风云汇中州，苏修窥伺，颇类辽金；美帝日帝若有动作，河南又是紧靠前线的后方，所以这是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又是巨大的屯兵点。由河南建设推

想全国，三线建设的中心如西南地区，规模当更为宏伟。建设和备战是一事的两面，十年之后，祖国面貌当焕然一新了。

千里淮上

59年来商城，孤陋寡闻，此次来息县，对千里淮上有了一番新的认识。

“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要米有米，要面有面”。这是赵钟声同志引的息县民谚，实际情况也确是如此。然而二十年来，淮上从来是南北对峙地区，从未成为重要经济基地，原因既是政治的，也是自然条件的。主席指示：“一定要把淮河治好”，确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治淮问题的症结，既在于把淮河上游一切水源都筑成水库，也在于中下游大办方田，使平地沟洫相通，形成网状平原水库，同时抬高地面。这两者，仅用人力，都是无法想望的事。现在大筑水库，可以说已经肯定。可是中下游的网状水库，以千里淮上的人力而论，恐怕还不足以解决。假如北京地铁的掘凿机能大规模使用到这个地区来，可望迅速有成。不此之图，而如曾希圣的空谈淮北三改，未必能望其有成。这一点，可以相信，不出几年，必能逐步实现。因为淮上的自然条件如此优越，作为农业基地，前途如此有望，水利加化肥，仅仅千里淮上，就可抵得世界上任何一个著名的谷仓。我国人口众多，如果高产农业地区，一直只限于成都盆地、关中平川、长江和珠江三角洲、太行山山前地带，和南方丘陵，那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对于千里淮上的锦绣河山所知较多，更加觉得我们祖国的

宏伟壮丽。备战，要多发展工业，也要发展农业。农业需要国家关顾之处极多，有赖于发展了的工业力量的支持者更多。千里淮上，若有大量土方工程机械和大量的化肥，前途实未可限量。现在的问题是农村自身的再投资力量不大，分配中照顾集体和积累较多，客观上又不免减缩反对自发资本主义倾向的效果。这一点，既与分配有关，又与我几年来关怀的粮价问题有关了……

假日生活

假日生活，紧张有逾劳动日。这一天，计：

洗衣服五件，枕巾、袜子、手帕四件。

洗 65 年秀床上揭下来的垫被套一件。这件垫被套上还有血迹加粪迹，大概还是渤海区旧物，二十年来未洗过的了。

借张纯音布票二尺，买维尼伦混纺布 30 尺，做被里二个，准备把旧被套腾出来做垫被套，又把 65 年汪阿姨缝在丝棉被一起的棉胎单独缝成一条薄被。后者缺少被面，明年发了布票再买。

这两条被里缩小。

改组箱子的内容，把随时准备动用的衣服集中在大箱子里，把随时准备应用的什物集中在小木箱里，把鞋子等东西集中在旅行包里，腾出挎包，准备运输外出时携带。

洗头、洗脚。这二件事，平时都难做到。平时，若晴天，可以利用中午休息的一小时。晚上，既黑又冷，又总有活动，大体上是干不成什么事情的。

这些“家务活动”，过去是写信给秀的资料，现在则“便

纵有千种风情，待与何人说”？旬日，梦寐中曾痛哭失声，醒来强自抑制，犹留呜咽……

然而生机蓬勃。被服如此补充，逐渐可以成套，用的是大量素白维尼伦混纺布，枕套被里都是。我国服丧从白，这次整理起来小的被服，大体上可以用到我长辞人世之日，服丧从白，从古礼也……

皮板箱盖已和箱身脱离关系。明年探亲假去京，准备买皮箱两个，铁行宏庄一个，西洋一个，西古一个，东古两个，山姐一个。

一因，第一基建区地点未定，而且工程方案尚在讨论。今天下午，石工程师向经济所全体和在这里的文学所少数人作了报告，排里进行了讨论。这样，连屋基的土方工程也还来不及进行。所以，这一旬的劳动是松弛的。

生活倒已经确实安定下来。明天准备把一条丝棉被整理一番——把渤海区的、65年从秀床上揭下来的垫被壳子缝成丝棉胎壳子，把新缝成的被里子缝上去。本来想把那条带红紫色的被面换下来，现在想少一些事，就这样缝上去拉倒。早饭后和午饭后的空闲时间可以做一些事，假日就不会太忙迫。明天洗衣缝被，大概时间足够用了。

从此以后，也许要过一个漫长时间的平静的劳动生活的日子……

交出了一篇社会宣传队进驻一周年思想汇报，以后写这样汇报的需要大概也会减少的……

一九七〇年

迎接七十年代

元旦

过去的十天，并不平淡，也并不平静。不平淡，是因为其间听了一次总理在十一月二十八日军工会议上的报告，又除夕听了元旦社论。不平静，是因为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三里河所址房屋要交出，江明去京收拾，托他照料书籍、手稿和卡片。又正在这天的前一夜，深夜不寐，检讨了那种过平淡生活的想法，觉得还应该积极有所作为。而这种积极态度，又因总理报告和元旦社论的启示而更加肯定下来。这就是我迎接1970年，

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的想法。

今年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要迎接一个 decade（十年）。50 年在上海，60 年在商城，推而至于 40 年在上海，对于一个新的 decade（十年）是没有什么敏锐的感应的。其间，那个时候报章上，党内也较少成十年的设想。有这样的设想，始自 70 年，我自己显然是受报章的感应。

但是我的 70 年代确实也不同于过去任何一个年代。60 年代，除 62—64 的短短三年外，我过的是单独生活，不过那时至少还有一个实在或意想中的家——窝巢、后方，或所谓 last refugee（最后的流亡者），丧失它，实际上始自 60 年代中期，连意想中也彻底丧失，则自 70 年代始。所以，我虽然决心要继续革命，而不免有过平淡生活的想法，这是前十天的事情。

25 或 26 夜，深夜不寐，想了这件事。——不，这是记忆错误。深刻地想，这件事在 29，即请江明帮我收拾书籍卡片手稿开始的。三里河房子要交，我这个不稳固的后方有连根拔掉的危险的消息，给我的最初反应是懊丧和可惜之念，其间也不免杂有不久回京继续搞研究这种幻想的破灭的成分。细细想来，这不是继续革命的态度。要继续革命，就要在任何环境下继续观察思考和研究。自暴自弃，何以对死者？——秀永离尘世之际，究竟是怨恨我还是对我有所希望，也许我永远不能知道的了。然而秀实实在在为我而死，我若不能有所作为，我的生命还有什么价值？

就在 29 夜，听了总理 11/28 军工会议报告的传达。总理对于革命与外交，备战与建设，作了精辟的说明：盖备战，为不作城下之盟计，备战亦为建设计，即柳宗元所谓世人但知敌之害而不知敌之利之意也。68 年秀永离尘世之际的 dose（一次）为内敌，69 的 dose（一次）为外敌，内敌则改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后者之效力当然十分信于前者，于是不但派性消

除，而建设亦获得前所未有的动力。既如此，七十年代当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十年。总理又说，Apollo（阿波罗）登月壮举，我将俟之二十一世纪，于此可见，现在的方向是解决尘世的问题。二十年已经过去，当然应该急起直追。未来十年中，可望增长率大大超过 50—60 年代的日本……

元旦社论更十分强调“搞好斗批改”。确实，如果局限目光于经济，循首钢倡议前进也大致可以过去了。然而经济与教改和文化不可分，循是以观，70 年代第一年的任务确实十分艰巨，盖政治、法律、文化、教育与夫全部意识形态领域，大破之后，就有待于大立。70 年代的第一年如此，七十年代的整个十年，在这个方面更是任重道远，波谲云诡。我既决定要继续革命，我又胡可以妄自鄙薄？

所以我决心在五七干校一面劳动，一面继续观察思考和研究。北京藏书，大体上已经利用过：通过这些书籍，我眼界开阔到上下古今，今后有赖于这些书籍的，不过是引证史实，引证百家，不致有文词上的错误而已，大体上 their meaning had been caught already（意思已经领略了），即使这些书全部丧失，我也写得出东西来了。手稿，比之要写的东西，幼稚肤浅，可以采用者少。卡片不外抄摘与感想，有，当然好，丧失了，与丧失书籍手稿结果一样。一个人，用全生命写出来的东西，并非无聊文人的无病呻吟，那应该是铭刻在脑袋中，溶化在血液里的东西。我所要写的，没有书籍、卡片也可写，丧失它们，又何所惧。

这里现在并不是可以写作的环境。但是这种状况不会长此下去。一年以后，有四人一间的宿舍，有灯，冬夜可以取暖，其情状与大韩继后期相类。我要在那种环境下分篇写出一些东西来，作为日后在良好环境下补充、扩大、延长、完满的基础。这就是我的打算。

以前也曾经有过许多不寐的长夜，想过一些想入非非的东西。下面把其中与来此后见闻有关的东西写下来。

千里淮上、治淮、治黄 与中国大平原的农业

十二月二十日

自江口以北，伏牛、桐柏、太行以东，泰山以西，渤海东海海滨起，燕山之南的大平原为中国大平原，除皖北我到得少些而外，冀、鲁、豫、苏到过不少地方。这个大平原是季候风区域，苦于黄淮之不治，历来把它贬到低于宁沪杭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川西盆地与洞庭鄱阳滨湖地区。其实如果黄淮治理得好，又能懂得因地制宜以蓄水排水的道理，这里应是最主要的中国农业基地。这里本是中国文化发源之地，从历史观点说，它也应该起这样的作用。

除广泛兴建山谷水库（例如海河上游各县，每个县应该有一个机械化的水库建筑队伍，仿意大利平宁水区治理办法，由下及上以及于坡顶）而外，黄河应该修建成一个合理坡度的分水岭上的河流；两侧，尤其是郑州以下的冀鲁豫金堤地区，应利用机械和引黄灌溉的沉淀，修成宽阔的岗地，应该南水北调，引黄灌溉，又有绵密的入海排水河流。曾经见过一篇文章，说黄河河身年年淤高，还应考虑黄河分流入淮云云，这是荒唐的主张。中国工业化了之后，理当运用浩大的动力彻底解决古文化发源地的黄河流域。北方苦旱，南水北调犹恐不足，何能引黄入淮？

淮河，除山谷水库而外，应结合方田修成网状水库，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应用强力掘凿机于农田水利，仅持人力是解

决不了问题的。人力应该发挥作用，可以发挥作用之处是岁修——挖河泥作肥料，这一工作也应以机械为助。

黄淮平原苦于三料俱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大量供应燃料，而供应燃料的关键则在于修建减低运费的铁路网。东起海州，西迄信阳、驻马店、漯河、新乡、安阳、邢台各点，应修筑五六条简易铁路，于是燃料可以运入农村，畜产品、农产品可以运出，这块大平原就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大片的精耕高产农业区。至于化肥、农电、机井等等，当然不在话下。问题在于仅有这些东西，还搞不成一个农牧兼营的高产农区，至多把它变成一个供应军粮的、还达不到繁荣农业水平的中产农区，而这两者则显然有极大差别的。

经营这个大平原农业的经济效果，远胜于山区的治山治水。大寨型的农村是可贵的，然而这块大平原的农产量却是无限的……

关键在于大寨是三线农业，黄淮平原密迩海边，《十大关系》所说的工业的方针，其实是合于农业的。

粮价问题仍是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唯有一个富裕的农村才能提供最大可能的积累，见于《论联合政府》。

问题的最后重点当然不在农业，而在于富裕的农村保证充足的粮食，hence（从此），无限的就业扩大，hence（从此），把中国建成一个最大的工业国。竭泽而渔，苏联可为借鉴。

通货政策，应该提高农产品价格，而不应维持总物价于不变。这样，就说物价而言是趋缓的，然而这是促进经济发展所必要，是工农报酬平衡所必要。当城市人力不足之际，逐步小量降低粮价，即可一举而解决一连串问题——促进农业合理化，略略提高实际工资水平，不必有什么工资改革吸引人力进入城市等等。

这是开始时后退一步，然后更加飞速前进的方案。这个方

案的实行，看来五年之内甚至十年之内是不可能的。但是五年、十年之后，工业基础更比现在雄厚一些，又是实行这个方案的有利条件——虽然这个方案在四五年前实行最为有利时机，现在也还可以做。但是政治条件不具备……

与粮价问题相联系的是房价问题……

元旦决心会

昨夜今晨的辞旧迎新，七连学员游行二次，部分同志连夜草决心书，今晨二排七时集合讨论，八时半开表忠心会，九时去指挥部专递全连决心书，行列整齐，旗帜和主席绣像飘扬，口号震天，情状热烈，与在北京相同。元旦晨加餐，还至十时以后才开饭。

元旦社论固然强调抓革命促生产，然而更加强调斗批改，包括整党建党大批判等在内。70年任务，看来后者较前者更为迫切。由是，对于学部五七干校的任务又有了深一层的理解。看来，上层建筑中的问题，目前重点在于整党建党，文教战线还未提到议程上来。文教战线上的问题早晚要提到议程上来，这时就会出现一次文艺复兴。这个名辞不确切，不仅在于内涵的不同，也在于其出现不见得是一次自天而降的狂飚，而是长时期的和风细雨——不，应该说是整整一个化育万物的东风化雨的季节。

所以，我应该安心乡居，安心劳动。今冬如可能，应该把还可以找得到的北京存书和手稿一起装下来，真正准备在这里长期安家落户下去。

论孤立主义的和平经济和战时经济

一月二日

粮价问题其实有一个前提，即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的现代化，究竟遵循孤立主义的和平经济途径呢？还是遵循战时经济的途径。历史上这个问题曾经有二个典型，很值得检讨一番。

十九世纪末期的美国经济遵循的是和平主义、孤立主义的道路。他们先发展农业，在人力稀缺的基础上，以最高度的生产力发展经济，吸引人力，直到 1940 年的第二次大战为止，他们在政治一直是孤立主义的。其实，到第一次大战结束时的 1917 年为止，美国在经济上已居世界首位，然而在政治上他们甘愿居于配角地位，仍让大英帝国处于世界政治的支配地位。“引而不发”，至第二次大战以后遂成为世界霸主。这样做，美国经济的发展，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畸形与病态。他们的生产关系是资本主义的，这当然是不可不注意的事情。但在生产结构上说，而不是在分配结构上说，这一点可以姑置不论。

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的苏联建设，是在和平时期按战时经济模型进行的建设。其结果是众所周知的——苏联长期来成为国际军火商，农业停滞，消费品生产永远落后于购买力的增长。这种经济上的畸形，延续五十年之后，简直成了苏联经济之癌，积重难返，任何药方投下去，总要被政治因素所抵销——到现在，苏联海军已经游弋全球，征服太空的活动咄咄逼人，然而西红柿黄瓜面包的问题却迄今解决无望。所谓经济改革，一碰到预算战争的压力，其预期效率不得不全成泡影……

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经济理论家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把它提升到理论的高度。十八世纪末期，Adam Smith

(亚当·斯密) 的世界主义的价值理论，曾经碰到 List (李斯特) 的国家主义的生产力论的抵销。List (李斯特) 的理论，实际上至今为止，还是一切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的理论指导。二十世纪中期，marshall (马歇尔) 的自由竞争十全十美论，曾经受到 Keynes (凯恩斯) 的抵抗。Kegnes (凯恩斯) 理论自命为世界主义的，实质上是国家主义的（他吹嘘重商主义并非没有道理）。所谓自诩为世界主义，这是因为他的理论表面上只为治疗危机，而不涉及扩军备战问题。所谓实际上是国家主义的，这是因为遵循他的方向指导国家经济的，无不以国家的政治霸权为目标。但是，遵循他的理论以追求国家主义的目标，结果总要碰到上述的困境，可惜经济理论家至今还没有在理论上论述这个困境的。

理论总落后于现实。二次大战前，这个问题尚未提到议程上来，苏联的计划经济的成就，二十年代末期，在理论战线上是以资本主义的危机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样一个命题出现的。二次大战以后，不仅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资本主义国家，都将会充分发挥经济国力以争夺政治霸权的技术，资本主义已经脱离了个人主义的根据，德意日等（一）军费负担大大被迫减少（二）劳动力充沛（三）技术传统已经形成的国家，以最迅速的速度前进，这个问题就具有了一般的意义。但是问题虽已具有一般的意义，却还来不及成为理论的命题。我对这个问题认真思考，也仅仅始于 1957 年 Lange (兰格) 论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当时我像触了电，这表示它感觉到这个问题的重大，但还没有完全理解其意义。其实 Lange (兰格) 不过提出了这个问题，也没有展开和解决这个问题。

要把这个问题放到应有的位置上来。这样做的结果，宏观经济就始终居于微观经济的首位，marginal utility (边际效用) 成为雕虫小技（虽然是有用的），政治就居于经济的首位了。

.....

七十年代的最初一个月

二月五日

今天算是阴历除夕。瓦工和监管对象都继续劳动，我请求续病假一天，得准。下午午睡至三时，全天获得了充分休息。

一月份二次患病，较去年一月更坏。先是一月六日从大刘庄运砖到大院，感觉发烧，连续几天烧至39.5℃。其后几天，正是所里劳动任务最松的几天，安排侧重于学习，有些学习我不参加，得以休息六日。一月十三日成立打井队，办学习班。十四、十五两天所里一部分同志去参观全总和团中央五七干校，是为紧急劳动的动员阶段。我们于十四日开始筛砂。

十六日始运井筒，其后在息县接待站住二晚，干三天，二十一日正式投入打井。五六天内，晨四时起，五时二十分动身去工地，六时开始劳动至下午二时，这是十分紧张的一周。当地生产队打井老人妇女概不参加，我们则老人妇女竟占一半，而且干得认真，所以，例如打穿流沙层，因井筒内灌水不断，竟无坍方，技术师傅三人也表示赞叹。可惜打井最后一班我已带病劳动，翌日下井筒，是打井中最关键的一段，我竟未及参加。

这次又是发高烧，又达39.5℃，学部商大夫28日来，由她主治，连续打青霉素，第三天发现铁锈痰，确诊为肺炎，是为一生中第三次患肺炎。回忆1947年宫乃泉诊治的一次和1953年住华东医院的一次，不免感慨。尤其1953年秀亲自送我住院，现则未及话别，竟已长逝……

打井和患病中插上一次检查和批判。检查批判会举行于

26日晚，其实当时已经发烧。会后交书面材料，写于30日，是时体温尚在38.5℃，也还未知肺炎。批判会距上次已整整一年，还是在排里开的，最大收获是从此要夹紧尾巴做人。盖学习班所获结论为决心继续革命，此次批判会则是念念不忘自己是罪人与敌人，两者并不相反，其实相成。既然衷心认识这一点，此后自当切实做到，也必能切实做到也。

一个多月来，生活匆忙，劳动紧张，脑子几无所活动。这是好的，预计一年以内不免继续这种状态。

昨天第一天去工地，这是我们今后生活之所。空旷洁净，令人喜欢，二十天内我们就要搬家。从此以后的生活，将有点像大韩继后期了。

第一个战役

二月十一日

自一月十六日李副政委动员报告，迄至二月十一日为止，可称为学部五七干校的第一个战役。就七连而言，第一个战役的任务首先定为春节前打井一口，建房一幢。不久，宣布春节不放假，种果树。旋因自然科学史室和大学联春节后即下乡，又规定十二日前建成厨房一幢，大部搬家，并建成工棚三幢，以供居住。所以，自十六日以后，瓦工从未休息，并有几天早五时起床，六时上班，下午加班至六时半等措施。

这一战役的任务大部（并非全部）完成而结束。二月八日，发生了徐济成、孙时平事件。二月十日，赵钟声副指导员自京返息，带来了全力清理“五一六”，自然科学史室等下乡推迟的消息。自十六日以后，上下工时间正常，今天全连还休息了一天，于是第一个战役告一段落。

人民的罪人与敌人

一月二十六日的批判会，着重指出我是人民的罪人与敌人，任何“好人犯错误”的想法都必须打掉，这对我是一次极大的教育。二十六日批斗会以后的书面报告，二月二日和十一日的思想汇报都着重说了这个问题。加以 1970 年第 2 期《红旗》刊出了批判孙冶方的文章，更使我深切感到自己的政治上道义上的责任。仅此一点，我就应该肯定我是人民的罪人和敌人。

这是 1969 年 10 月份以来的第二个收获。十月份学习班的收获是继续革命；一月二十六日批判会的收获是罪人和敌人。从此以后，我要以罪人和敌人的赎罪心情，继续革命下去。这一点觉悟十分重要，此后决始终不悔。

迁 居

二月二十八日

二十一日迁居，二十日休息了一天，我们所住的工棚是十九日糊成泥墙的。这样，下乡后的第 97 天我们就迁到自己抢建的工棚里来了。

东岳的大仓库，休息时间及休息日人声嘈杂，这个工棚住二十人左右，嘈杂不亚于大仓库，而且显得更挤。尤其是，迁居当天即雨，雨雪霏霏，连续一周。而工棚开始时无塑料薄膜可以蒙窗户，全棚漆黑，白天点灯，加以全排活动集中此间，

包括东岳来的个别小孩子如巫谦都在这个屋子里吃饭，实在热闹之极。这几天，屋里生了四个火，我任其中两个火的夜间看火，也算有事可做。

工棚里搭铺是精心设计的。事前绘图，逐个安排。高度至饭桌，以使铺底下可以安放行李。这和行李简单的延安学校，贫寒已极的建筑工人工棚都有所不同。时代变迁，条件不一，任何事都无法简单地重复历史，此又一证明。

休息一周，饭量甚至更大于劳动之日，最多一天吃过一斤七两，消化良好，肺炎后的严重消瘦逐渐有所恢复。惟晨间常常仍发现铁锈痰。既然一不发烧，而饭量好，体重恢复，也就不去管它是怎么回事了。

清理“五一六”掀起了另一个高潮。一打三反者，即清理“五一六”加上三反，局势似在逐渐向建设推移之中。

阴雨三周，就医，息县医院

三月六日

自二月二十日起，连绵阴雨，达三周之久，今日始有较长期放晴之意。三周的雪，除二月二十一至二十五日这四天而外，每天都有劳动，其间最重的活是七至九日的三天脱坯。脱坯前胃口好，三天脱坯中饭量不增而减，二三天后始再恢复。

二月初以来，晨间痰中不断见血，有铁锈痰，也有鲜红血块，一直坚持劳动，没有提出。一旬前与任沙谈此事，数天后，三月十一日晚间，告我于十二日晨间搭信阳煤车来息县就医，可惜这一天东北风怒号，雨雪纷纷，未能成行。今天，在雨雪二天、阴天一天后放晴，始得来息县，写这段日记时，正坐在息县医院门诊间走廊候诊长凳上。

这一段时间的大事，有一打三反运动的正式开展，息县也召开公审大会，息县街上，唯有河南省所有专区和直属市的布告，大概三四年来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完全加以处理，作为运动的开端，闻我排同志说：杀经君健小孩和岳母的年青人处死刑，又沈元乔装黑人企图入法国大使馆未果，如何处理，北京已交群众讨论，同志们的估计，此人大概也是要处死刑的。

一打三反运动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行见社会秩序将趋于十分整齐严肃，如此抓革命之后，生产跃进必将开创新纪元，一个新的时代将开始了。

这一段时期的第二件大事，是在《宣传会议讲话》发表十三周年之际，发表了《红旗》的重要文章，《团结改造知识分子的宏伟纲领》，于改造之中，略略偏重于团结。我排本来准备从今天起在天天读时间中加以学习。可是晨六时，我正在吃

建信阳旅社、旅行大楼，而道路也已全改为沥青公路，忆1959—1960年，所见信阳，不过54年洛阳景色，市内全为土路，未见高楼大厦，此为第二变化。车到信阳前，距市中心十里，已是大城市郊区景色。尤其是距城六里的平桥，简直是北京东郊的再版。车行过速，两旁大院招牌无法认清，火电站是可以认识的，据吴敬琏说，设计装机容量为10万KW，建筑物外观，也决不是16000KW的电站。此外见有磷肥厂、化工厂、砖瓦厂的招牌，其中磷肥厂是由小高炉铁厂改建的。这些认清招牌的工厂，不过占全部厂栈建筑物的20%而已。装瓦在一个仓库，仓库有物资，主要是五金类的东西。

综上所述，可见十年来信阳面目已大为改观，这是十年来我国工业化成就的一个缩影。河南省工业建设，迄今为止重点侧重北部，其最南部的信阳，变化已如此之大，可见全省变化是惊人的。

干校信阳联络站设第三招待所，在该所设站的有全总、团中央等十余单位。第三招待所有套房一二百间，设有食堂，服务人员工作熟练，绝无息县接待站人员的土气。信阳全市究竟有几个招待所，不得而知。依番号推想，至少有三个，而第三招待所则必定是设备最为简朴的。即以这个招待所而论，从五七目光来看，也算是很高级的了。

自息县过淮河入罗山境，小麦逐渐既黑且长。往返途间两次对比，东岳小麦相差很远。大概息县东岳季节要晚几天，但主要是息县田间施肥水平太低，息县周围属信阳专区的，还有淮滨固始县，属驻马店的有正阳、新蔡等县，这些地方的农业水平与息县相比究竟如何，不得而知。不过息县水平，在全河南恐怕总是很低的。在这里大批办五七干校，目前还不能马上发挥效果，几年之后，也能成为农业现代化的推广中心，则是没有疑问的。

蜡山芳郎论七十年代的 国际斗争与日本问题

四月二十一日

近几月来，资产阶级世界的评论家总是把七十年代的国际形势看做中苏美的三角斗争。曾经论述日美关系，把日本看做一旦羽毛丰满之际，即不能甘居于美国的不沉的航空母舰的蜡山芳郎，虽然也是这样来论述同一问题，但是他把日本问题看作决定动向的首要因素，可谓别树一帜。

蜡山显然是一个反美的日本评论家，我所见到的他历来的论著，总在指出日本不能永远居于美国鹰犬的地位，最近的评论，用意仍在于此，这是十分明显的。但是客观地考虑，日本现在已经跃居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经济大国，设想她能长此容忍冲绳十余枚核导弹中有三枚准对日本本土，这是不可思议的事。吉田死时，日本为之国葬，这是歌颂他在美国卵翼下迅速复兴日本经济的功劳，然而鸟雏羽毛丰满之时，总要脱翼飞去，还要造其原来庇护者的反，日本不能例外。中曾根的自主防卫，大东亚共荣圈迷梦的复活，即其朕兆。

蜡山显然并非中曾根一伙，他的反美不是从右面来反的。其实，以日本今日情形而论，反美而居于右面是不可能的。因为日本如要重温大东亚共荣国的旧梦，最便捷的路是甘做美国反华的走卒，想这样就可以轻易取代美国在南朝鲜的势力，南面窥伺台湾，以图恢复帝国旧业；然后进出南洋，囊括新马印尼，此时其最大的假想敌为社会主义的中国。至于日苏关系，在美苏勾结的条件下，也极易解决，晚近的发展即其证明。蜡

山的反美，显然不是这样的。

可以设想另一种前途。亚洲大陆的社会主义中国愈来愈强盛，即使是资本主义的日本，也不敢设想与我抗衡，于是日本甘愿——不，是形势逼迫她不得不成为以中国为盟主的亚洲人的亚洲，而这个亚洲，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在二十世纪的末期，都代替西欧北美成为世界的中心。假使日本仍旧是资本主义的，这种形势也和罗加诺公约以前，由拉伯罗条约联系起来的苏德两国关系有某种类似之点。不过德苏关系在日尔曼东进历史的背景下是不可思议的；而中日关系，在长期的种族、文化、经济的历史背景下并不是不可能的，此其重要区别耳。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在政治和文化上走的是“全盘西化”的道路，东条英机主流的反英反美，也还是以日尔曼为中心的德日轴心下的产物。从民族主义的观点来说，日本从来没有在西方主义下脱出西方的影响，认真地在全世界站起来过。其实这已无足奇怪。岛国日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气派。在全世界面前宣告亚洲是世界中心，唯有中国才能担当起来，这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历史地位的一个侧面。

蜡山芳郎说日本问题是决定世界局势的中心，这难道不足以引起我们的深思吗？

棉花会议

四月二十一日

前几天听了棉花会议的传达。全国棉花生产，大约已经远远超过 4300 万担。中央召开如此盛大的会议，作了今后七八年棉花生产的规划，人造棉花未提到，然而它的生产也必定有

一定的发展，两者都是大大发展纺织业的根本措施。

这就是说，今后若干年间，我国终将独占世界棉纺织品的出口——也许还包括棉纺织设备的出口，这件事本身的意义未必能够过于夸大，因为世界贸易中棉纺织品的位置已经远不如四五十年以前了。但是，这显然是中国在经济上雄飞世界的开始……

而且，在棉区粮食自给基础上大大增产棉花，这也是有效利用我国农业生产力的好办法，因为国际市场上的棉价和粮价的比例，棉花是有利的……

双抢二十天

五月一日

二十天来，双抢任务压倒一切。前旬主要是脱坯，本旬主要是盖屋。二十九日三十日两天，早晨五时、六时开始，二十九日夜战至九时，其间我做的最重的活都是到林场卸洋灰。

专案组学习班齐来，赵钟声同志也参加脱坯，和他一起抬过一次屋架。霍强调，当前双抢就是全局，所以实在是全所动员，无一闲人。七连负担的四幢房屋，第一幢二十日破土，三十日盖顶，明后天就要盖瓦，速度可谓极快。

结构用砖柱砌坯，东西两山墙外面全用砖砌，所以比以前盖的房子还要合于实用。

双抢第三旬

五月八日

双抢第三旬集中于第二幢房屋，但进展不如前此顺利，主要困难在于备料。老窑烧了二窑砖，新窑烧了一窑砖，共九万块，我所拨到和运到的，包括今天凌晨四时起运的一万在内，不到三万五千，全部用于第二幢并无剩余。而第二幢房屋的梁尚未自息县运回，瓦板在信阳，也未运回。由此推论，除土坯一项而外，砖、瓦、木料都有困难，进度不可能达到计划，推迟完成日期，势不可免。

第三旬到今天已过去八天，劳动强度大不如脱坯阶段。二日去息县，三日筛砂，一天筛了一汽车半，很累。其他做小工，和泥，运坯，出窑运砖，每天劳动都在八小时以下，应付裕如，肺炎病后，三至四月间曾咳血二月，四月份又经一个半月疗程，可谓痊愈。自此以后，体力恢复，体重增加，重劳动后，休息一晚即可恢复。更重要的是，五个半月来的劳动，逐渐地，但愈来愈明确地否定了劳动惩罚论，和世界观的改造密切结合了起来，这是 1958 以来几次下乡所没有的。这一点准备写到本旬的思想汇报中去。

西哈努克，人造卫星和计划会议

五月八日

双抢一月间，国际国内形势大好。

朗诺政变，使十多来骑墙的西哈努克决定转而依靠左派，

至四月二十四日的印度支那三国四方会议，和四月三十日尼克松的悍然出兵柬埔寨，形势已经决定性地起了变化——印度支那的革命必定取得彻底胜利，前此西哈努克这一类人幻想的第三条道路已经完全破灭了。又由于我们和帝修反作不妥协斗争的坚定，使三四年来自免于摇摆的朝鲜断然地采取了和苏修集团相决裂的态度，于是，面对美日帝国主义的自朝鲜经中国大陆以至印度支那的革命阵线最终形成了。鉴于越朝都曾经经历过摇摆，目前局势的形成，不能不说这是极大的胜利。

正是四月二十四日，我第一个人造卫星上了天，至此，运载工具问题可谓已经解决。中苏边境问题中苏修的核讹诈即使不能说是最后破产，至少，三五年后，这种讹诈就会变成一幕历史上的笑剧，不再有任何现实意义。

计划会议开会于二至三月，虽然还处在这一变化的前夕，其实和这一变化密切相关。1971—1975的五年，我们的钢铁石油将成倍增长，全国每人将有一亩旱涝保收田，每亩施用化肥将达四十四斤，由此推算，我化肥年产量，1975年将达二千万吨以上。现在全国产业工人为2,200万人，可以推想，1975年，全国产业工人将达四千万人，其中基建工人将占相当比例。三线地区，除西南诸省外，加上山西、豫西、湘西、鄂西诸省区，我国经济的地理分布也将发生决定性的变化。今后十年，中国经济的飞跃是决定无疑的了。

双抢转为榜地，和大队人马下来

五月二十四日

预定五十天的双抢任务，至第三旬转入榜地。榜地也可说是双抢，不过双抢中预定的建八幢房子，只盖起了三幢半，计

我们二幢，文学所一幢，民族所半幢，原因在于材料缺乏。看来建房计划，还得像最初预定的那样，十月前备料，十月后大动。

耪地参加了一天半，其他时间参加了近代史所和考古所点上的搭棚。学部所属各所，至今天尽数下来，其中近代史所和考古所点上只搭一个棚子，二三百人散在附近各村。这些人雨天到点上吃饭，一定十分辛苦，所以盖房的客观需要，还是十分迫切的。

退，势所必然，东南亚的形势即将改观，日本的动向也会变化。

蜡山芳郎的日本脱离美国的主张，在美帝势力笼罩东亚的时期是无法实现的。但是，当东南亚是革命的东南亚，朝鲜也激烈反对苏修妥协的形势下，日本国内社会革命即使一时不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其对外动向也会发生变化。

在这种形势下，倘我国经济在四五年内进入四五千万吨钢铁，十年内达到和日本相等的程度，经济实力和革命中心的地位就能大体一致了。

增产节约

六月十一日

半个月来的经历，写在思想汇报中，这里懒得再写了。

听说要传达一个中央文件，是关于增产节约的。自六月初起，报纸上已经出现“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通栏口号，报导了许多经济战线上的消息，由此推想，全国中心任务，已经开始转入经济的跃进了。

柬埔寨事变以来，形势急剧变化。苏联的反华凶焰已受挫折，美国的侵略军更深深陷入印度支那，1964—1965年，1969—1970年这两次那样的美帝苏修的侵略危机，都已被麻痹钝化，现在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组成世界反美统一战线”的时候了。当然，这一次的统一战线，已经是以前红色高棉、泰国解放军，巴特寮为基本方向的统一战线，绝非1954年日内瓦会议时代可比，所以，现在“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我们的任务是支援世界革命。所以，报纸上公布了关于对

越无偿援助的协议，当然还有其他许多这样的援助。在这种情形下，发展我国的生产就是对世界革命的支援，正如 1934 年前后，一位名人所说的，多生产鸡蛋，鸡蛋里会哺育出世界革命来一样——“手里没把米，叫鸡鸡不理”。

夏锄抢荒和抢盖新房

七月一日

今天是我的生日，算是五十五岁满岁了。

五月上旬以来，是夏锄抢荒阶段。因为参加考古近代搭棚，我进入夏锄较晚，查日记，始于五月二十二日，又去掉搞水稻田的七八天和其他劳动，实际耪地时间比较少，虽然如此，使用大锄也算初步练出来了。不过右手经常出现劳损现象，好在连续耪地的机会还不多，并未严重发展。

6月22日，传达了6月11日学部宽严大会，又传达了留京各所（历史、世界文学、学部机关）不日下来，要抢盖几幢房子，其中我所承担者两幢，要在七月十五日完成。这次突击的第一炮是六月二十七晚上加班赶我所第四幢房子的灰土基础，到晚上一点半勉强搞定，我和曾延伟两人任运土运灰。加班并无所苦，加班后决定第二天上午休息，这样的加班是吃得消的。这一次，因为第二天下雨，并未补假，而且上午也休息不好。如果第二天不下雨，大家上工时间倒是很好的休息机会了。

这次修起的房子，决定我们搬进去，看来脱离席棚生活已经为时不久。高压线已经拉到东岳，张向敏在积极筹备，今冬这里大概可以接上电线，居住条件，确实是在天天向上。

夏锄结束

七月十日

夏锄开始于六月八日。最初是老乡帮我们锄高粱，以后夹杂投桃报李的麦收，夹杂盖新房子几幢的安排，旋又放缓盖房，加紧夏锄，分配给我连的七百多亩高粱、芝麻、红麻、豆子、玉米、白薯，到今天全部完成。也许完成夏锄，在各单位是最早的。

始锄高粱，大家外行，效率极低。那时听说每人一天锄一亩，认为是不可企及的。然后锄高粱白薯，都已成半草荒状态，锄起来困难，效率还是不高，然而锄地技术和耐劳程度则普遍提高。最后锄豆子二百五十亩，锄得好时，大家也已经熟练，老弱残兵，居然平均锄一亩一二分。人数十分不足的一二排，还同时安排了拉坯，二百五十亩豆子不过费三天半时间就全部搞完了。

第一次看见八行中耕犁锄豆子，也看见生产队马拉中耕犁锄棉花。

一个月来几乎都干农活，对于这一片六千亩耕地的大农场如何逐步发展，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浮想联翩，耕机播麦豆两项，应成干校主要作物，高粱机播行距应该放宽，第一次锄地应用马拉中耕犁中耕，人力横向定苗，以后还可以畜力中耕一二次；机井附近这一片蔬菜田，应进行水渠系统的基本建设等等，中夜竟为之不寐。

明天写思想汇报，决定写几点建议。

(后来决定不写“建议”。)

夜班之后

七月十二日

昨天休息日，早晨四时半起身，循例洗衣服，读报，早餐，上东岳，午睡，写思想汇报，晚饭，与晚饭后例有的一二个小时假日劳动。这次假日劳动是修井——加筑井台和水池，因为不完工，翌晨无法打水，加班至0:30。今天上午休息，下午可能还是休息。晚间睡眠时间为1:30—5，上午仅7—8和8—9得以朦胧一小时。补上午睡，下午也许精神可以充足一些。下午要不要自动上工，还在犹豫不决之中。

这是第二次夜班。第一次夜班时间，即打第三幢房屋灰土基础时为21:00—1:30计四小时半。这次共七小时。但是这次如除去假日劳动二小时，仅得五小时。所以，下午要不要自动上工，是应该考虑的。

抢房子和学习班

七月二十一日

十二日以来的一旬，劳动十分紧张，主要是抢盖第四幢宿舍。十六、十七两天，为了抢在大雨前面，劳动时间很长，一天是早晨四时半起身，五时上工，至晚间九点收工。翌日六时上工，晚八时收工。

十九、二十两天下午参加学习班。学习班的第一天，王贵宸宣布了学习班宗旨，第二天就是文件——对敌斗争语录11—18节，《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与《敦促杜聿明投降书》，

以及学部宽严大会上宋副政委的讲话。下次开会，就得做系统的发言，这些发言，还要在班排上汇报。

今天休息日，准备在写成思想汇报时写成这份发言稿。

中心点抢工

八月六日

自七月二十一日起，十三天没有休息，到今天才休息，任务是抢修，中心是供自然科学史室和宗教所用的一幢房子。其间干了和泥、运砖、当小工等杂活，又杂以本所一些零星劳动，还在一个晚上卸石灰两车。虽然长期不休息，体力上并未感觉困难。中伏天气有几天极热，尚无所苦。

八月“大会战”，虽修了一天路，还没有正式传达，任务大体是在中心点修仓库。秋收转瞬即届，看来秋收准备工作和收秋之间还有时间上的矛盾。大批人马下来，修房子，抢农时，八个月以来一直如此，还得继续若干时候。

七月十五日传达国务院关于各部委建立革委会和党组的决定，我和林里夫两人去水稻田推水，事后听说，学部既不属于撤销单位，也不属于现有业务单位，而是“近代、考古两所予以保留，其他下乡劳动锻炼”这样一个单位。三月以来，各所陆续下来，而且来得很急。开始是修篷子，后来是住农家房屋，到现在为止，只剩下一个历史所，也不日下来。所以，东岳干校的极盛时期已经到来，房子紧张，也以现在为最。

不过极盛顶峰大概不久即将过去。国务院各部委合并已有

三年内，干校也许就成了“安置农场”了。

经济跃进态势

八月六日

八月一日建军节，传达总理在一机部各学习班上的形势报告。事后又参加了座谈。所知重要消息：

1. 焦作——枝江铁路，开工八个多月，已于七月一日通车。二汽位于襄樊，处该线上。
2. 成昆铁路，十分可能就是经过西昌的川滇西线，也已于七月一日通车。
3. 长春第一汽车厂，现在是年产六万辆的汽车厂。二汽规模，也许倍于一汽。
4. 预计五年内石油、冶金、化肥、电力设备的生产，总量各为三千万吨或千瓦，而 1975 年年产量则为八百万吨或千瓦。
5. 大规模油田，除广饶附近的胜利油田外，还有天津油田。北京的东方红炼油厂的油源，也许不是胜利而是天津。

看来当前中心，已经明显无疑地是经济。五七干校，理工大学，教育革命，斗批改，整党建党，只能慢慢来，但这些都不会也不能影响经济跃进。其实，经济建设也确是唯一的中心。唯有建设的开展，才能吸收大量劳动力和“干部”。所以这是社会生活的“正规化”的唯一道路。

两代会和地方工业

八月六日

八一传达的第二项是息县两代会。两代会者，活学活用毛泽著作的积极分子和四、五、六好的代表大会也。光辉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是继续革命的动力，所以两代会是推动粮棉双上纲和地方工业大发展的重要环节。经济大跃进，有国家经济体系的全面安排作为推动力量，加上农村工作中贯彻活学活用主席思想，使农业和地方工业的发展能够适合经济飞跃的新形势，这是两条腿走路发展到极峰，发挥无比威力的时期。

而地方工业的方针还有一些变化。两个月前，地方工业强调小钢铁、小煤矿、小化肥、小电站、小水泥。近两星期来，又加上地方资源的中间性加工和具有地方销路的小商品生产两项。这就是说纸烟、纺织不是方向，但棉区的轧花、打油是方向，竹制家具是方向，发夹、镜子是方向。至于钢铁至水泥这个系列，为发展农田水利和化肥生产所必要，当然仍然是方向。这个补充极合适，因为它既可充裕消费品和国家建设的物资资源，又可以积累地方工业建设所需资本。所以，新方针对于粮棉上纲和地方工业的发展将成为一个新的推动力量。百花齐放，首见于经济建设，殊可庆贺。

总理报告，还指出主席十大关系报告迄未发表一事，也说到外传文本，殊不确切。这就是说，这份报告不久可能发表，但内容与前此外传文本将有颇大不同之处。想来其中关于地方工业、沿海工业等部分，将以精确形式指出方向，而其中关于政治方向部分，前此讹传部分将有极大的修正。但是，不论如何，这篇光辉著作的正式发表，也将为我国新飞跃阶段的政治

——经济方向指示新的途径，从而开辟五年来的新的前进道路，则又是可以肯定的。

检查报告

八月六日

现在是十点，今天上午积肥两小时，九点坐下来写上面几篇日记。今天是三顿饭，午后写检查报告内容为：

- 甲、检查“狗道主义”的讽刺性说法。
- 乙、检查“自由市场活动”的历次错误。
- 丙、检查不服从监管的历次错误。

半个月以前开始的学习班迄未继续，想来是因为劳动任务紧张之故。学习班也可能继续推迟，不过这是很不重要的。我觉得，推得愈迟，也许更好。

检查以后更大的错误

八月十一日

检查写于八月六日，昨天，八月十日，在菜园和汪盛熙大吵了一阵，这是更大的错误。晚上看电影已二时，今晨五时稍迟起身，短短的睡眠中做了个历数平生的梦，竟至痛哭失声。

.....

搬 家

八月十一日

昨天搬家，搬到第一幢房子最后头的一间大房间，安床铺十一张。房子于搬家前夕垫高。铺灰土，泥墙，砖屋比席棚确实要凉快得多。也睡上了 1968/8 以来久别的床架铺板床，生活又提高了一些。

搬家以后，住东岳和村内的同志尽量往席棚里挤，上工时间孩子出没，吵闹异常。搬家以后我们比较安静了，东岳和外村同志恐怕更艰苦了。席棚堆置了大量东西，而且在里面休息的人又加上一、三排的人员，实在拥挤。原因之一，是一排的席棚给小卖部和生产组的人住了，我们的实际居住面积所增有限，何况还安排了一个工具间……

酷 暑

八月十一日

七月下旬入伏以来酷暑。久旱不雨者二周，这二周内气温逐渐升高，我也学会了光膀子，这是生平所未习惯的。

酷暑期中，不少人中暑，我还顶住了。有一晚夜战通宵，翌日白天休息虽较好，得以补偿，但当晚上煤至五时，竟没有支持不住的感觉……

秋收二周

八月二十五日

21 日本来休息。今天是一个月来的第一个雨天，宣布补休。这两周的全部劳动几乎都是收秋，包括平场和收高粱的两个阶段。平场我参加的主要是提石滚，割高粱主要是“割”，这是第一次学会使用镰刀。可惜昨天下午参加会战时镰刀尖伤了脚踝骨，今天早上只好“打秫秸把”了。

学会使用镰刀是有一个过程的，沙吉才教了一番有用，但是还得靠自己练。手劲比以前大了，这是学会使用镰刀的前提。我相信，以后割豆子这一关是可以过去的。

今天要写思想汇报。曾经都郑重地考虑过怎样写法。

气候转凉了，今天是第一场比较像样的秋雨，夏天算是过去了。

大会战的开始

九月二日

大会战在我连开始于 27 日的出窑。九月一日第二次出窑，两次都当晚把砖运完。这样，砖窑的周转期间缩短了，预计这样的劳动还将有好几次。

上次出窑后卸砖至翌晨六时，这次运砖至晚间十二时。今晨仍是五时醒来，预计加上中午的午睡，下午可以顶得过去。

为修建粮仓的劳动，迄今为止还是做了运送木料、柁架和砖，仓库的结构还所知不多。曾经以为它的填土量很大，实则

它的地坪用大量沙子，于是地坪修建成为一项专门的工序，不单是单纯地填上了。仓库砌砖量 11 万块，段师傅等老瓦工参加。运砖用拖拉机，出窑全连突击，砖窑周转加速，这样，如期完工大体上就有了把握了。

大会战的口号是“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革命促会战，厚礼献国庆”。预计到国庆节，机务连和中心点两处，各将有四幢房子，学部五七干校就粗具规模，而且，领导和生产中心一经确立起来，离“体制下放”的时间就不远了。——中心点以东，考古、近代和民族这三个中心，各有自己的砖窑，各有自己的基建队伍，各个专责经营一片农田等等。

东岳这个临时中心也将转移，那时将只留下一个历史所，以及经、文两所的家庭。不出一年，这些留驻人员也将搬出。

夜班后的补休

九月二日

夜班以后的补休，已经经历过四五次了。有一次夜班卸石灰，不算夜班，翌日照常工作。卸煤和第一次运砖，都是通宵。卸煤的翌日，半天休息，没有休息好。第一次运砖的翌日，上下午都睡觉，四时才起来天天读。昨天的夜晚，至十二时许即结束，今晨五点醒来，七点早饭，喝了三四个月没有喝过的茶，精神还充足，做了不少事情，顶得上一个休息日……

国际形势

九月二日

读了一些报纸。

五月二十日主席庄严声明发表以来，国际形势又有不少新的发展，并且形成了一种长期的趋势。中苏边境谈判仍在继续中，印度支那三国与朝鲜以我国为核心形成国际革命斗争最重要的中心，中东僵持，我支持法塔赫成了一个重要因素，以上是中心的几个环节。此外还有中罗、中南关系的改善，中印关系有改善的趋向，苏德“互不侵犯协定”的订立，苏日勾结日趋密切等等。至于美苏关系，则仍是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的局面。在此种种动向下面，更可对主席“世界主要倾向是革命”的英明论断加深某种理解，而我国经济建设在“革命加拼命”的干劲的推动下，必将一日千里地发展，则是可以肯定的。

据说，今年应届中学毕业生，北京市的全数分配于北京工业系统，可见经济建设的新浪潮，还将工业企业的在籍职工全部动员上了第一线，开始调动新的力量了。这股势头，我推测将要加速度前进。因为生产资料的生产增加，促进基本建设，基本建设本来也动员了地方的力量，而职工的增加，又势必促进地方工业中消费品部门的生产。于是，劳动力的需要就全面地增长了。二三年内，这一需要，恐怕会把连年上山下乡的城市人口吸收掉，还会吸收农村中有文化的劳动力，使 1958 年以来长期未曾再现的，五十年代中期的就业大增加再度出现。不过这一次不会再是一时的大量吸收，而是长期间内以逐渐增大的规模，有计划地增加就业人口。

9424 工程

九月二日

《文汇报》报导 9424 厂的英雄业绩，令人奋发，一年之内，从无到有地建成第一流的高炉——焦炉系统，这是奇迹。看得出来，这个工程是上海工业“包干”的，当然是采用会战方式，取得了集中优势力量打歼灭战的效果的。

9424 厂是不是在西昌？未能随便推测。可以参证的消息是，成都—昆明铁路于七一通车，和 9424 厂的出铁几乎同时。

这件事的另一结果，是上海工业社会的一次规模很不小的移民——不仅工业，而且也包括市政工程、商业和服务行业等等在内，而且它的人口构成，上海人比长春、洛阳要大得多。与此相联系的是，上海的就业将增加，上海的劳动力和妇孺外移人数也将增加等等。

这种方式，想来不限于“上海—9424”之间，“上海—邵阳”；“长春、上海—襄樊”之间，“大庆—潜江”之间，都通用这种方式。河南一定也有，不过我不知道而已。

这是一种集体主义的创业精神。我认为，五七干校所要培养的就是这种集体主义的创业精神。“精神变物质”，它将创造出无数新工业城市，也将在无数农村中绘出一幅一幅的改天换地的壮丽图画。学部的五七干校，是其中的一个。

大会战半月

九月八日

大会战已经过半个月，其特点是夜班多，除此而外，每天的劳动是紧张的，然而是正常的。原因之一，全砖结构，不怕雨。原因之二，仓库用砖全靠世经所供应，出砖量限制了工程进度。所以，这幢仓库盖得很细心，预计质量不会低于当地水平。

当地水平，今天上街看了银行所盖的那几间砖瓦房，看起来过得去，也是我们盖房所能够达到的。

今天休息。据说明天脱坯。坯用以铺地，计算需要 3140 块，加上损耗，至少应脱 3500 块。后天出大窑。大窑以后不久又是小窑，又会有几个夜班。

七月二十五日以来未得雨，八月二十五日小雨，昨夜又有小秋雨。今天去东岳理发，理发师傅说我们这块塘坡地豆子可以收 100 斤/亩，说是旱年，我们捞到了云云。

语言所在打井，考古、近代也在打井。今冬是大基建时代，明冬应该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了。

北京下乡青年

九月八日

去京探亲回来的人们在谈话，听到说，北京除今年毕业生一律分配当地工厂外，下乡青年表现好的，也找回来分配云云。可见工业跃进步伐十分迅猛。照此速度，不出两年，劳动

力就要向农村征用了。

农村建设步伐也是很快的。东岳理发师谈，此间预定修建的大水渠不日开工。东岳大约十一后可供电，息县化肥厂进展迅速……

夏 旱

九月十一日

七月二十五日暴雨以来，至昨晚始下透雨。前后夏旱 46 天。东岳理发员说，这块“塘坡地”比较不怕旱，我们的豆子还能收 100 斤/亩，从豆秧状况来说，大概是确实的。

夏旱 46 天中，高粱玉米等早秋作物全收起来，而且打场都打得差不多了。建筑方面，我连为自然科学史室在中心点盖起一幢房，中心点和机务队两个点上已建成的宿舍办公室，共四幢，而最重要的成就，恐怕还是近代考古那一座双窑。

夏旱 46 天中，我连把秋菜抢种了起来，而且经过菜班的艰苦奋斗，日夜浇水，苗情颇好。

夏旱 46 天中，曾小雨二、三次，可惜都只是湿了一个地皮。雷阵雨多，息县连续不雨 46 天的，据闻不过东岳附近的三个公社。这样的风调雨顺，息县今年的丰收大体是肯定的了。

廖集仁因妻子生产回京，据说北京雨季雨多而不涝，大体是晚雨朝晴，可见那里丰收也已成定局了。

“越战越强”

九月十一日

酷暑顶过来了，秋凉后健康状况更有进步。现在一天八小时的劳动已成习惯，如遇值日，晚间还可担水，并且不致动弹不得。最近比较狼狈的一次，是割高粱的末一天。挥镰大割，速度不减壮汉。可是晚上两腿抽筋，加上镰伤足踝，第二天一个上午组织上照顾，令“打秣秸把”。这种状况，比之东岳中仓库时期的感冒、肺炎，以及傍晚收工回去，步履维艰的状况，其实要好得多。

与曾延伟相比，我是愈战愈强，他似乎在衰弱下来。担水如此，其他劳动也是如此。前天打井，我是井下挖土的，他下去绊倒，以后一直在地面。

这和营养状况关系较大。尤其近两周来，鸡鸭蛋和肉食不断，我自己又买到了炼乳和奶粉，夏日吃瓜之多，过于商城；近又买到梨和苹果，营养水平和城市相同。劳动期间有这样的营养水平，是 1958—1966 这八年中几次下乡所未有。这样，消化作用强，除补充劳动消耗外，也许还有助于机体增强以适应劳动条件，这恐怕是越战越强的客观原因。

主观原因很多，已见历次思想汇报。

整行李

九月十一日

今天这个休息日，无须写思想汇报，应该找一些事情来

干。写到了整行李，于是：

甲：把原来的被里和枕套凑起来的垫被套，把那个棉花胎套上。垫被套是请缝纫组完成的，搞得很好。

乙：把原来厚棉被里的一条薄棉胎和一条薄丝棉胎，自周口店回京以来就拆了出来，加上何桂仙代缝的维棉布被里，和所买的素绵十尺，包起来准备拿到东岳去缝成一条薄棉被。

丙：垫被太薄，存有棉花一斤，加上还有一斤棉花票，有机会去北京时弹成棉胎，加到垫被里去，就大体足够了。

丁：今冬垫被太薄，准备用麻袋装麦秸代草垫子。

这样，今冬可以过得暖和一些，也许不至于再发生肺炎感冒了。

冬服不足，想买紧身丝棉袄，重缝丝棉裤，买老羊皮大衣和毡靴，以便即使冬日坐敞车也过得去。这些事情只好等有机会去京时办，而且也需要一大批钱，以后再说。现有服装，今冬大体可以过得去了。

这些事，以前都写信告秀，甚至告已经长眠的秀。现在无处诉说，默默地办了也就算了。

被子改组，今年元旦苦心经营，有一天假日，全用于和被子奋斗，自此以后，连续奋战，每个休息日即忙，又因席棚给人以不安定的感觉，一直没有拿出来，这个休息日要找事干，又是换季时刻，于是把它办起来了。

玉米脱粒

九月十六日

休息日的下午，无事可做，干了玉米脱粒。筐中玉米脱了三分之一。

休息日无事可干，处于无思虑状态，这是第一次。

中秋节

九月十六日

中秋节在农村是个大节，加菜二次，一次木樨肉，一次肉丸子。又前后买月饼二斤，苹果三斤，梨二斤，鸡蛋七枚，另加半斤计十一枚。可谓丰富之至。

中秋栽菜。晚间排里同志在云雾朦胧月色下嗑瓜子的时候，招呼卸锅，计卸下大锅二口。

节日夜间也处于无思虑状态。上床是九时许，可惜辗转反侧，大约十二时才入睡。

卸砖对仓库工程的影响

八月会战，其他单位承担的工程，进展都还不错，仓库卸砖，停顿已经八九天了。

这次出窑无夜班。碎砖太多，据说是坯湿所致。照这样的质量这项工程恐不免拖延。

夏旱之后，继以秋雨连绵。今天下午安排运砖。道途泥泞，卸下一车后只好停止。

菜园菜苗栽完，豆子白薯还不到收割的时候，七连竟出现缺活干的现象。

雨中运输

九月二十一日

今天本该是休息日，昨天傍晚连部核计了好久，决定今天拉砖（昨天已拉了半天）。二排上午八时起至一时拉了三次，我和沙吉才、李春子共一车。午饭后几乎没有休息，又去拉麻皮。装车时下雨，雨中把麻皮拉回来，回来是四点。全日拉车行程四十里，而且是道途比较困难状况下的四十里。

拉车时我的服装是破衬衣，短袖汗衫，土布长裤，内裤又一条，下乡当然全部淋湿。回来时用于毛巾擦擦身子，湿衣全部换下，穿上深秋服装，身体暖和，精神焕发，也算是愈战愈强的象征。

现在还在下雨，明天是休息日。这一个黄昏和一天还颇难安排。有一分外调材料要眷写（蔡承祖），要写思想汇报，其他想不出什么要做的事了。

这一间宿舍现在只剩下六个人。杨圣明、项启源回去探亲了，假日的活动空间是比较大的。

豫西、湘西和鄂西

九月二十二日

豫西、鄂西和湘西，最初听到时缺乏了解。翻开地图仔细研究，才恍然于这一条长带是我国的一个丰饶而险要的地区。洛阳的伊阙以南，是崤山的东麓山前地带，东北夹嵩山，为伊阳、临汝地区。宝丰、鲁山以南至南阳，有一个崤函山和伏

牛山间的谷地，以下直趋南阳盆地——崤函、伏牛、桐柏、大洪四山区之间这么大片富饶地区，刘备当曹操的豫州牧的时候，豫州的中心地区在此。也许他的豫州也只有南阳盆地这一片，南阳以下，经新野、襄樊直趋荆门、沙市，其西侧有邓县、老河口与宜昌，东侧为汉水西岸。这是豫西的鄂西。鄂西农产，占全省 $1/3$ ，广袤仅一个专区。

荆州是古代楚文化的发源地，降至汉末，犹为全国重镇。这是汉文化南向开发湖南以至广东的根据地。与“河湾地区”同具山前地区的特征。由此推论，商兴起于毫，毫即商丘，处大平原中心，是否有确凿证据，似尚不可疑。后期商都安阳，又是山前地区，不受黄河泛滥影响，已有证据，也符合历史规律。

沙市以南至常德，是武陵山的山前地区，也是洞庭湖西的滨湖地区。常德西南，是一长条沅江谷地，地图上看来山川险要，但是平坦的谷地面积并不算小。山名武陵，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出处在此，就地形而言，陶所说似乎确有来源。

这一带在古代是中国的心脏地区之一，降及清末，看重滨海、沿江、九派汇流中心之类的地方，这些山川险要的地方，都交给落后的封建割据者去摆布了。现在来开发这些地方，颇有意义。

1954年在洛阳，对于主席选定这样一个地下到处是古墓，处理颇困难的地方来建设工业，很不理解。豫西、鄂西、湘西这一串地方的开发，是洛阳建厂的继续。这不仅是国防建设的需要，也是深通中国历史的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粮价、外贸与发展

九月二十二日

昨天运麻淋雨，晚上喝了几口酒，早早上床，不能成寐。酒力促进狂想，对粮价外贸与发展有了一些新的想法。

今后三十年，我国如果不以跃进步伐发展经济，全国有半数以至 2/3 人口进入城市经济，粮价要调整了，外贸要占领世界市场，50—60 年代暴发户的日本要沦为今天的英国，这是 64—68 年间逐步设想过的。然而当时还设想，粮食与原料应该也可以力求自给。昨天的狂想，打破了这一限制。

我国人口增殖，除非达到全国农村大部城市化的程度，是停止不下来的。所以，三十年内如果经济顺利发展，工业经济的劳动力将达 3—4 亿人，亦即城市人口将达 8—10 亿人。在这种情况下，耕地与人口的比例，精耕水平将达到或超过今天的日本、西德和荷兰，然而粮食原料仍将有相当大的部分取决于进口。这样，不仅粮食内价将大幅度提高，世界粮价也将大幅度提高。

如同以英国为中心的早期资本主义发展，曾促进瑞典木材、丹荷乳制品、美国加拿大小麦的生产飞跃，我国经济发展将促进世界南方地区——拉美、撒哈拉以南的黑非洲、东南亚许多大岛包括澳新在内的精耕农业（一部分是小麦，大部分是水稻）的发展。中国工业对于矿产原料的需求，也将促进这些地方的开发。

这时候，世界将以中国为中心而活动，不仅英法，而且美苏日本都将沦为瑞典。这些地区的开发，将由本地区，世界各地移民来进行，也不可避免将由一些中国移民来进行。坦赞铁

路，是这一长期趋势的序幕。

后代的历史家将要发现，自从我国打败日本以后，我国客观上即不存在外敌入侵的危险。当然，在工业尚未发展，近代化国防尚未布置就绪以前，准备不能没有，这个过渡时期早期的准备，我所持者当然还是人民战争。我所说的客观上已不存在外敌入侵的危险云云，是指积一百年的斗争，中国打败日本站了起来以后，天命中国要雄飞世界，迎击外敌入侵云云，从长期历史发展来看，不免是对自己的菲薄。

蜡山芳郎的日美冲突论的是非

九月二十二日

然而这样看待中国的前途，重心其实放在经济发展上。

要指望中国成为工业居主位的经济大国，确实要有一些狂想的气概。外国的承袭人口论衣钵的资产阶级学者，悲叹中国资源贫乏和人民贫困，解放以后，降至六十年代，言我国经济发展前途者，犹多数局限在费孝通的乡土工业论的范围内。很长一段时期（包括今天），主导思想是古代的足食足兵，加上广泛的农业经济基础上的一套自给的国防工业体系。这种主导思想，其实够不上“现代化”的标准，这是十九世纪的法国，三十年代的苏联与日本式的经济结构，是一种半现代化的设想。

这种半现代式的设想应该淘汰，其根据是，日、意、法等国六十年代的发展，证明了这套结构必须打破也能够打破。而设置种种障碍，不令这套结构受到破坏的苏联，今天处在作茧自缚，无法自拔的困境。

迄到昨晚以前，我也受到这套想法的限制，我所敢设想的

极限，是一半人口在农业、农产品自给的工农业大国。但是这是一种不合理的限制。这种局限，其实不能摆脱贫农村贫困和农村人口增殖率无法抑制的困境，也就是永远达不到真正现代化的目的。人口与农业资源的平衡，在我国是可以达到的，但必定要通过一个发展工业，仰给外国，然后以十分先进的科学和机械装备农业的过程（前一时期供我农产品的国家本身工业化，农产品不再能够供给我国），即饥饿出口——进口——自给的过程。

亚非拉等后进国家的发展，直到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目前世界上原料、农产和制造工业品价格的剪刀差；富者愈富，贫者仍贫——新殖民主义对后进国家发展的限制作用的打破以至真正做到这些国家的经济独立，都要通过这个过程才能达到。具体描绘这个过程，那应该是：

世界市场工业品价格的抑低，西欧北美诸国经济发展的停滞，以至某种程度的生活水平的降低。

世界市场农矿产品价格的提高，发展中国家建设速度的加快。

西欧北美诸国的政治革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不仅普遍成为无条件的，而且变成反条件的。

蜡山芳郎式的日本，即一个反美的日本，必须以中国对日本的压倒的经济优势为条件。否则的话，日本的军国主义化，而且是附庸于美帝的军国主义化，在势十分难于抑制。

以经济为中心来建设中国，当然需要一定的条件。足食足兵，广泛的农业经济基础上的自给国防工业体系，确实是必须首先达到的，否则，关门建设而无防卫，无法防卫入侵，目的也就在无法过渡到上述过程中去了。

但是，随着时间的过去，实现蜡山芳郎式的日本，必经以我国经济上对日占压到优势为条件，也必定愈来愈明显。所

以，经济发展，在我国必将愈来愈成为中心，其他一切，势必围绕这个中心而转动。

刘静姝与郭谨仪

九月二十二日

一个月前，刘静姝病歿于石家庄其夫处。今天，郭谨仪雨中挑水休克，抢救不及，送到东岳卫生院亡故。这是我连第二个死亡事件。

郭体弱干活往往超过其体力，这是大韩继以来的常态。她是长期临时工，已与丈夫离婚，遗有二女云。

连绵秋雨

九月二十五日

九月十日，结束夏旱五十天，下了一场大雨，自此以后，又转为连绵秋雨，三天两头有小雨，地从未干过，从未出现过快晴天气。收下来的绿豆发霉了。白薯有失收的危险，我们的一亩试验田稻子，收下来了也没有机会好好晾干。这几天劳动安排，也煞费领导苦心。例如昨天是雨后天阴的一天，安排了砌仓库和收拾群众剥下来的麻皮这两项任务。砖只砌了一层多一点，还会发软，灰浆不易硬化。收拾麻皮，来去路远，效率不高。所以久旱之后盼雨，现在又成了久雨之后盼晴了。

合肥预报，明日起转晴，可望晴到国庆，如能实现，这就是大好事情。中心点基建未完成，秋收迫在眉睫，放晴之后，预料还有一段极其紧张的劳动。

续

九月二十六日

本来预报今要转多云，昨晚东北风强，今天依然是细雨不绝。昨天下午，传达康生同志关于整党的报告，我们没有听，抓时间把搁在屋里的玉米脱粒完了。今天上午革命同志讨论康生同志报告，我们八时半起剥霉绿豆。

玉米脱粒和剥霉绿豆的味道我并不是不熟悉的。1960年剥野绿豆和搜集残粒玉米，然后危坐终日加以处理，质量与今天相仿。不过那时候还有个家，搞这些事有一种私心，现在则在革命大家庭里，为集体搞这一类工作罢了。

秋雨对农作物危害甚大。白薯要烂，豆子还没有出来，不过此后从收豆到种麦，时间就十分仓促了。棉花落在地里的收不起来了，三万亩绿豆无法打场，校部号召紧急处理后，恐怕还不能解决问题。剥霉绿豆进度慢极了，不过既然还有二三天雨天（据预报，二十九日还是阴天），也就能够剥完。

闻民族所已断粮，我们食堂粮食也快完了，预料一两天内就会组织雨中背粮。

久旱久雨，都是麻烦事。这是建校的经验。

会计上的新问题

九月二十七日

经济大跃进后出现的会议新问题是，大批企业在生产中持续不断地进行基本建设。这些基本建设的材料，有许多是修旧

利废得来的，显然也会有生产用材料拨来的以及花钱买来的。建设用工，全部或绝大部分是生产工人发挥冲天干劲挤出来的，其他如用电用水以及经常费，显然都和生产成本不可分，这些不要特殊拨款的基本建设投资，财政管理上有什么新的规章制度不知道，可以肯定的是，从前那种削足适履的抄袭苏修

火，约旦也不能变更这个方向，这是因为巴勒斯坦难民的长期武装斗争在阿拉伯的世界所引起的人民革命，比之四十年代末期和五十年代中期纳赛尔造成的革命，更加强烈，势必要把阿拉伯民族主义推向一个新的高峰。而在美苏妥协的状况下，能够对阿拉伯民族革命作强有力的援助的，唯有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

国内局势也大异于去年。去年国庆节，实际上还存在局部地方的派仗，现在派仗彻底去掉而代之以整党，经济发展速度走上了新高峰，一年前，我预测的劳动力不足现象已经出现。

这种异乎寻常的胜利局面，使真正的宽大政策成为必要，也成为可能。“肃反中不得放走一个坏人，不得冤枉一个好人”，就是新时期标志。

所以我应该兴高采烈地过国庆，更甚于去年的国庆节。

节 假 十月二日

节假全校放假二天，今午全校大会。

节假前夕，安排探亲的人颇多。节假前夕和节假的第一天，我们这个房间是一派休息气氛，这是今年元旦以来所仅见。闻其他单位的五七干校，已经人马纷纷出动，也许不出一年，这个干校也会有类似的变动。

国庆社论是《继续革命，乘胜前进》，连国庆前夕招待会上总理的讲话，广播不过三十分钟，有了五月二十日主席声明，有了九届二中全会，今年国庆的音调，本来已经定下来了。

今晨不到五时就起身，写了一份思想汇报，九月三十晚间喝了一些酒，室内节日叙谈，笑语盈盈，我竟呼呼大睡，大概十一、十二时许才醒来自脱衣服正式睡下。昨天大洗衣服，今天是否去参加会议尚未决定。

胃病复发

十月十五日

节假醉酒，竟导致胃病，其间悼念亡妻，忆念家人，心情凄怆，又八日“冒领事件”大发作，八日至十一日的割豆子，孙迪文来获知书籍文稿有失散危险，都是胃病复发的因素。十月一日微感胃痛，此后几天还没有什么严重发展，十一日，割豆的最后一天，下午四五时起胃痛剧烈，以后愈来愈厉害。昨晚请假，今晨黄民华表示恐要去息县检查。胃病决不能任其发展，决心用一切方法和它相斗争，这几天就是要休息。带病劳动十余天，愈来愈烈，不能再犯这个毛病了。

悼念亡妻，无法自己。64年前半生经历，处处与秀有关，此生所有一切欢乐场面，都是秀给的。这几天，梦中有时出现这样一二个欢乐镜头，醒来悟秀已离人间……

(日记至此以下缺二页)

……准备的。昨天突然传来上面的新精神，我连今年没有盖房任务，原计划的四幢家属宿舍不盖了。这样，脱坯看来立刻就会停止了。

自九月下旬连续阴雨以来，气候转凉，白昼转短，我连的劳动任务似乎也愈来愈少紧张。其间割豆子四天比较紧张，最后一天突击到六时半，这在今年上半年是不算什么一回事的，这次却引起了很多意见。两个月来，学习转多，最近又大学哲

学，送 50% 的学员下乡插队，气氛似乎愈来愈不一样了。

这几天

十一月八日

这几天劳动正常，而劳动也并不很累，只有四日运八十亩的红麻，自晨 7：30 起一直干到晚十点，中午也未休息，算是一次突击。这次突击把八十亩地的红麻杆捆好运清，前后参加人员最多时不过十二人，少时仅八人，效率不可谓不高。然而即使运红麻也是“扫尾”工作，此外刨白薯、洗麻皮均属此类。三十一日起脱坯，正是这天传来今冬无基建的消息，于是脱坯着重质量。看来也是争取霜冻前少作连一级的积累，备作扩建猪圈、饲料房、鸡鸭房之用，并非大举基建的准备工作。

今冬腾出手来，应该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这一项工作理当着手，而且也应该由七连开头。假如此事能够做到，那真是好事。

托林里夫买炼乳，未打招呼，受到批评，这是应该的。

见到在外单位锻炼的崔喜禄，又刘永年、唐宗焜两人第一次下乡，此中是否有什么奥妙，不得而知。也许对我的最后清算，为期已经不远了。

国际形势的新动向

十一月八日

一个月前中加建交，昨天又公布中意建交的联合公报，度比利时、奥地利建交也不在远。又十月革命节我人大常委务委

员会和国务院致苏最高苏维埃和部长会议电，有两党间有原则分歧，并不防碍两国间解决悬而未决问题之句，这些都是国际形势的新动向。

看来今后五年，将是集中精力搞建设的五年。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由于缺乏经验，独立自主的成分不大，建设区域，也相对集中于东北。第二个五年计划，如果数到 1965 年，所解决的是西北原子工业基地和大庆油田两项，是迈开大步，独立自主的开端。第三个五年计划，所解决的是大西南铁路和工业系统，也为豫西、鄂西的三线建设开了一个头。第四个五年计划，当然还有重点，看起来四面开花的成份很大。这是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在解决了各地领导班子问题，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确定了新的体制，确立了以省为单位建设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这一原则。可以预料，五年内职工人数可能增加一倍。工业产值当然会超过一倍，一五时期那种就业人数极大增加的局面，又将以稳步的姿态重新出现。

事情也不能不如此。世界革命形势，以印度支那三国拉美斗争为中心正在蓬勃发展，中国肩负世界命运的责任，必须有与此相应的经济实力。日本经济的发展，1964 年以前已是严重的事，文化革命的几年中，日本经济又向前走了几年，到去年，日本是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事实，已经明显到无可忽视的程度，何况佐藤——中曾根的复活军国主义和保持日美安全体系不变的政策，不能不是我国的严重隐患。解决之道，是要在十年至十五年内超过日本，而且在工业实力上倍于日本，所以经济问题提到了首要的地位，四五时期，完成五年计划将成为压倒一切的任务，成为压倒一切的口号。而四五计划的形成，自下而上地发动经过文化大革命洗礼后的群众讨论，充分发挥群众积极性这样的过程，也必将成为增长率超过历史上最高时期的一个时期。

周总理一次报告中提到主席的十大关系报告应该重新学习（大意），也许不久将见诸实现。工业建设的潜在实力，沿海几省是很大的。宁沪一线的许多城市，都是工业城市，它们可以下蛋，可是下蛋之后还有力量大大发展本地工业。四面开花，这一力量理当动员起来。此其一。淮北平原，以至江淮河汉（不应理解为汉水，应理解为京汉线）之间的大片地区，是极其富于农业资源的地区。这些地方搞新农业，事半功倍，换句话说，这些地方的新农业建设，自然条件远胜于大寨。这一点，对于冀鲁豫平原来说也是成立的，虽然那里的土地盐碱化，比江淮河汉间处理困难一些。长江以南，京广线以东地区，我未曾涉足其间，自然条件没有概念，可是可以断言，那些地方也是应该发展和可以发展的。忧患一旦外敌入侵，那里要腾出来作为战场，而在建设上有所踌躇，势必延迟我建设速度。何况以今天的形势而论，建设愈发展，外敌入侵的可能性愈小。中加、中意建交，和苏联在国家关系这一级上改善关系，造成一个可以集中精力搞建设的局面，更为这一点添加一重保障。

今后五年我干什么？凡建设中我能参加一分力量的事情，不论是什么事情，我都愿干。

1958年第一次下乡以来，历十二年，而劳动能力似乎比十二年前还有所增强。十二年内个人处境，有过一些稀奇古怪的变化，但是，我继续革命的决心未因此而不能树立。再干二十年，二十年后中国就是雄飞世界的中国了。

续

十一月十二日

与中加中意建交同时发生的还有二件事，一是成田知巳代表团来华后发表的声明中，指出我国准备参加销毁和不使用核武器的国际谈判；二是有人推测，联合国内一旦能够解决两个中国问题，我国可以参加联合国。细细想来，这是中加、中意建交必然的产品，因为如果准备“另立一个联合国”，中加、中意建交谈判尽可以继续拖下去不加解决。而在五月二十日声明以后，建交、核武器、联合国问题，是一个结论中互相联系的几个问题，有此必有彼，未可分割的。

金日成在朝党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首都各报均全文发表。前后达十版，分刊两天，朝鲜目前产钢 220 万吨，发电量 156 亿度（装机容量应为 300 万 KW），纺织品 4 亿米，以一千万人口计，这是很大的数字，参考我 1957 年发电量也不过是 190 亿度，这个数字尤为可惊。1956 年以来，朝鲜工业总量值增加 10.6 倍，现在工业总量值占工农业总量值的 74%，全国农村已经电气化，此等进步，都很惊人。加以阿尔巴尼亚全国农村也已电气化，霍查组织隆重庆祝，两个友邦的进步都可借鉴。

下乡周年前夕的脱坯会战

十一月十五日

明天是下乡周年。前天，即十三日，李指导员召开全连大

总/县/日/记/

会，批评了连内出现的松动情绪，号召七天内参加九连大制砖坯，和我连自己脱坯二万五千块的会战。昨天战役开始，第一天，我排脱坯 1368 块，今天 1718 块，已经达到我排七天脱坯超一万的决心书提出的指标。

中心点正在建筑热潮中。外文所、历史所、哲学所、学部机关都在那里盖房，采取沿马路一线摆开的办法，和从前的分处若干个点的方案有所不同。最西边的民族所，和中心点西边的考古、近代所都未有新建筑。也许这是建校方案有所变化的

字相等。不过四月份的脱坯，盖成新房三幢，此次的脱坯，在建筑上将达到什么成就，不得而知。也许，哲学所、学部机关等在中心点盖房，会动用这些坯的一部分，也未可知。

我在此次脱坯中供泥时间之长，供泥量之多，也超过上次。查阅日记，上次脱坯时还有供水、运砂等间隙，这次脱坯，连续六天供泥，而且是供第一快手李春子、第二快手徐秉文等人，劳动量是很大的。

奇怪的是，顶过来了，而且胃病也未在供泥中复发过。综观一年，真是愈战愈强。

脱坯、整坯、运砂及其他

十一月二十一日晚

脱坯会战延至二十日初才结束。这一天，制瓦排和三排大拓了一天，我们排则作整坯、垛坯的工作。二十日晚间，转来二十二日还要脱坯三千块的任务，今天又让我去运砂。途间知增拓是为机务连盖库房用，运砂则是机务连对我们的报酬，砂子是准备盖家属宿舍用的。

惜今日寒流大至。昨晚开始呼啸，迄至今晚，风愈吹愈大，气温愈降愈低，下午二三时起小雨，黄昏转雪，明晨必有大冻。在这样的天气中运砂是艰苦的，留家过休息日，下午一时起垛坯，也搞得棉衣流水。看来，明天继续脱坯只好停止，而昨天三排拓的坯，不免于受损失，以前垛好的坯，没有盖顶糊泥，也并没有算了事。有的同志说，昨天若不脱坯，而全力从事保坯，也许更好一些。

查阅日记，上次去息县运砂是六月二十日，距今已经五个月了。五个月中，淮河大桥通化肥厂的公路桥已竣工，而连接

新桥的那几段桥头路还未完成，大概是照顾农忙，节用民工之故，化肥厂的机械设备安装看来已经完成，途间还能看到民工用板车运砂运石进工地，据闻县委决定化肥厂要在年内完工投产（贺菊煌是联系运砖时所得消息）。息县城内主街道经过一番修整，十字路口的“大厦”，停工很久，继续修建，已接近完工，这是我目睹的新现象。至于以前听说的息县还在修建一所小水泥厂，此次并未目击，也没有打听，想来这样的重点工程，一定像化肥厂一样是努力保证的。至此，除钢铁、煤矿，息县没有而外，小发电、小化肥、小水泥都有了。

日前公布了“濉阜”铁路的消息。濉溪接近烈山，已经升格成市，也许安徽省的淮北矿区就在这里？濉溪县连接阜阳，必有经济意义。如果不是安徽一省的事情，是不是打算把南阳—信阳—息县—阜阳连接起来，使之直通连云港海口，假使这样，息县农业资源和矿藏资源就能够充分利用了。

探亲假 事假 老弱病残评议

十一月二十二日

陈吉元夫人梁丽泉，原在煤炭设计院，1968年12月下放五七干校，去冬随陈吉元来我校，本旬奉令去京报到分配工作，十五日成行。这是干校学员分配工作的第一人。

但梁不是原学部的人员。原学部各单位，考古近代两所已划归中国科学院建制，现正在“站好最后一班岗”。除此两所

~~而外，其他各部均是“三三制”的，即三分之一的~~

并非易之。世经所租赁西颐宾馆，已经退租，所内东西亦已迁到学部。民族学院校址移交给解放军，民族所的东西也迁到了学部。总之，除考古近代两所而外，其它各所行止未定。想来这些单位属于“先搞好三分之一”的范围以外，暂时搁下，当前中心是工业发展，农业学大寨，和外交斗争。

但昨天突然由上面交议“老弱病残”，估计全所这类人员在三十人以上，全学部恐超过四百。巫宝三脱坯，章有义制瓦，杨坚白和泥，骆耕漠装麻，林里夫拉车，看来也是勉强，这些人，如能按照“除老弱病残者外”的原则处理，实在是十分妥当的。

指导员在最近一次讲话中，又曾提到，迄今为止还没有请过事假和探亲假的，将于春节前后安排。骆耕漠已安排探亲，因唐翠英事忙（？）未成行，这样看来，我也可以有事假或探亲假了。深夜不寐，也要考虑过这个问题。我想，帽子未摘以前，我不作回京打算。但也动过这样的念头，箱子压破，一旦回京，打行李票都打不成，回京一次补充一些东西也好。可是补充东西要钱，一年来每月五十元则到手即完，所剩无几，回京也无意思。踌躇未定，等以后再说吧。

电灯、李蕃、七日制及其他

十一月二十八日

来了电灯，第一次放光明是十一月十七日下乡的周年，亮了四天，是试灯，又停了几天，昨天正式开放，以后不会断了。

烤火七十五天，每人烤火费七元五角，基建组刘渊如屋里已温暖如春，我们这里已在置办炉子和烟囱，估计至迟十二月

总/县/日/记/

五日可以生火。这个冬天，比去年要好过得多，不至于再生肺炎了。

老弱病残评议以后第一个回京的是李蕃，工资照发。陆志韦，于早些时候回去，据云回去不久即病故了。

自十二月起实行七日休假制，第一个七日制的星期日是十二月六日，这个冬天，有电灯，有较多的假日，晚间时间较长，不知如何消磨是好。想要有系统地做些工作，条件是不可行的。今天买了一本主席哲学著作五篇本，最近将来想做一些卡片。

探亲假延长为十八日，今年不休的，明年可以延长，估计可以在京逗留一个月。如果我有机会回京，除收拾书籍杂物外，江右时间，不知可以干些什么江事。

本月十一日以来的清查“五一六”运动

不写日记将近一月，二周来干校情况大不同于以前。十一日，连里召开清查“五一六”大会，自此以后，进入一场十分激烈的阶级斗争，形势一日一变。此次清查“五一六”，动员报告中提出王系传系“五一六”都要抓，提出罪行是本质，以此以后，所内所有的“五一六”分子就陷入人民战争的大海，问题一个个提出来，一个个清查，以前我不懂得的许多事情，真相都大白了。这场斗争是彻底消除“五一六”隐患的斗争，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今后我国革命的建设一日千里地发展的重要之举。我对于“五一六”的罪行深感发指，对于斗争的胜利热烈欢呼。

运动中每天的监管对象安排一些劳动，今天全连出动约三十人种树，其他基建和生产基本上都暂时停下来了。

冬季生活，返京人员及其他

十一月三十日

十一日以来，运动已连续进行二十天了。身处运动之外，但看来进展很快。明天就要辞岁，后天就进入 1971 年了，运动速度不能不快。“要过细”“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七十

生春，加以电灯明亮，非棉花仓库可比。这几天，白天劳动，有时较轻，有时很重，晚餐以后，除读报外，大半时间无任务。看炉子，坐炉旁，考虑我应该从运动中吸取什么教益，一坐就是二三个小时。曾经想写一些重读主席哲学著作，清算自己反动哲学思想核心的笔记，因不成熟，迄未动手。

运动紧张，但还陆续有人调走——这一次是二十四级以下人员，全校据说走了三四十人，我所五人，王相元、李国强、王庆瑞、赵银花、邵广礼，据说是到北京东城区某工厂。干校人员，将分期分批调出去工作，这已是公开的方针。我校宣传队的正式名称，也已改定为“×××驻原学部宣传队”了。

虽在运动中，新年伙食极其丰盛。运来猪四头半，鱼恐在四百斤左右，集体伙食供三顿好菜，鱼、饺子、溜肉片。今天的劳动任务是绞饺子肉馅，这是五年来没有干过的活。

一九七一年

一九七一年的元旦

这是 1971 年元旦的二十一时，这一天已经过去了。

老了，没有年轻时迎新的豪情和对未来的无穷希望了。昨夜深夜不寐，萦绕于心的是炉子会不会灭，和吃饭等一些生活琐事。而今天早晨看炉子是灭了，晨九时半匆匆去看表演，一下子加了太多混煤，炉子又灭了第二次。可见即使是我萦系于心的事情，在这新年的第一天中也是极不顺利的。有时也想到，我这一生恐怕已经算做了结论，以后是残生余年，无复可作任何贡献之处，活下去不过是活下去而已……

昨晚所广播元旦社论，又翻了一下去年听元旦社论后的日记，看来今年比去年将是成就更大的一年。社论以五·二〇主席声明为基础，指出大好国际形势，在国内问题分政治、经济、国防三个方面，提出了今后的行动纲领，是十分振奋人心的。

哥穆尔卡

在这长长一段不写日记的时间里，哥穆尔卡倒台了。1956年，这位先生从太太给他做饭的公寓里，走上波兰政权的顶峰的时候，波兰人对他抱有很大的希望，而他当时也曾慷慨激昂地对赫说过，如果俄军出动，他将动员波兰人民抵抗，不过十四年，他竟然已经演完了一场历史悲剧！

恩格斯早就说过，波兰应该向东伸展，波茨坦体系把波兰推向西边。在华沙经互会锁链下的波兰，事实上把西里西亚弄得停滞了或者倒退了。而曾经主张过民族权利的哥穆尔卡，竟会在去年支持苏军进军捷克，原因虽多，无非是奥得——尼斯边界线把他紧紧束缚在苏联的战车上了。同样的原因，使波兰经济成了宇宙探索和军备竞赛的华沙条约的一系列牺牲品中的一员，而右派的哥穆尔卡的小农经济主义，既不能使波兰农业在社会主义的大集体农业中找到出路，又不能使波兰农业通过自由竞争达到大农业来找到出路，于是，Oscar Lange（奥斯卡·兰格）的故乡，也是 Oscae Lange（奥斯卡·兰格）曾经名义上担负经济高级顾问的波兰，竟然在农业——粮价问题上找不到出路而崩溃下来。这一切，其实决定于 1958 封闭直言周刊的时候，只是结局虽已预定，路还得一步一步走就是了。

现在看来，波兰的历史条件和中国多么不同！从 1957 年算起，中国岂但要过一个二十年，也许要经历两个二十年，才能在经济结构上达到 1956 年的波兰的状况。由此看来，到 1977 年，中国的问题也不同于 1956 年的波兰，而且，有的路的走法，是根本不同的。例如，农业经过合作化、公社化、大寨化，它之走向农业现代化的道路在世界上是独特的。历史的比拟最愚蠢，各国人民走的路是各个不同的。

Gomorka（哥穆尔卡）倒台在粮价问题上，提高粮价而不调整工资，要想出这个法子来，真需要特殊的愚蠢。Gomorka（哥穆尔卡）之所以要走这条路，一定是因为过去粮价过低，工资报酬不平衡，农业因为低价的限制，没有办法自己筹措现代化所必要的投资。然而历史上走了的错路，岂能用走回头路的办法来补救？谁要是竟敢大胆采用这种办法，谁就要遭到历史的和现实的双重的惩罚。

波兰的教训，也是苏联和东欧其他国家的教训。一个民族，抛弃了建国的理想主义，单纯从物资力量上追求超级大国的地位，企图用军事优势来支配他国，而且长期用大炮代替牛油，用悬殊之极的报酬制度来“吸引”达到这一目标的 Brain（智慧），这确实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国家。打倒这些修正主义者，确实应该是世界革命的首要目标之一。

这一周

一月十一日

这一周，从三日到十日，共八天。其间去张大庄拉砖二次，每次行程约五十里，顶过来了，没有出现去年此时的极度疲劳感。此外如淋灰担水，掏井，都算是劳动，也干得不差。

查阅日记，去年此时重感冒，不久即继之的肺炎，情况似乎大有好转。这一方面是体力增强，另一方面也是条件改善的结果。下工回来，室内炉火融融，温暖如春。我管炉子，每晚总是最后就寝，最早起身，但是铺盖收拾得好（被子二条，添了一条；垫被加了二斤新棉花），弄了一个瓶子当夜壶，晚上不致冒严寒去室外小便，所以入冬以来只感冒了一次，健康状况是良好的。

运动紧张，但已经实行隔日劳动制，现在的任务是盖仓库，照目前的速度进行下去，春节前后可以完工。前晚参加了一次批判传系“五一六”假造反阴谋的大会，有许多以前不懂得的事情，真相算是大白了。王关戚及其唆使下的“五一六”阴谋集团的罪行，实在令人发指。

听了地质会议的传达。综合找矿，群众报矿，大中小矿点同时开发，这对于我国工业建设的促进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又从会议报告中可知，1975年我国钢铁产量预定为4000万吨，这和我们机械计划的四个五千万，四个八百万后的估计是一致的。由此推算，1970年我国钢产量大约为1800万吨，化肥大约为（不足）一千万吨，电力装机容量大约为2000万KW，石油则在1000—1500万吨之间。经过“四五”，各可达4000万吨或KW。从四五开始，我国工业总产值要达到现在的美国、苏联的水平，还要十年到十五年。这里的一个根本问题是今后我国的年递增率。如果年递增产可以连续十年超过25%（日德等国五十年代发展速度曾达到此数），可以走得快些。要达到这种令人眩目的速度，需要四面开花。主席教导要有两个积极性。如果全国上下都积极发挥作用，即地方工业不仅及于省地，而且及于县及公社，又凡地方上已建立的中小工业，地方上还积极促使其扩建成为大型厂，那么这种速度是不难达到的。不过这样做还要有一个前提，即交通的发展要配合得上。

例如息县，若无铁路经过，即有煤矿也难大规模开采。地质会议报告中有一句话，要把刘少奇耽误的时间夺回来。真的，今后十年，如果年递增率达 25%，又假定 1958—1970 这十三年间的总增长为 3 倍，则 $9.4 \times 3 = 28.2$ 倍，二十三年的平均年递增率还不过 15.5% 左右，以我国人力丰富和基础薄弱而言，还不算快的。

干校的第二个春节

一月二十六日

假日开始，过来干校后的第二个春节。

今天是双值日——监管对象管的假日挑水和室内值日。清晨起来洗衣服被单，加上挑水，搞炉子。到现在十一点才坐下来。下午吃饺子我不会包，我还要挑水满缸。明天上午七时半到饲养房值班；29 日，即初四，还是轮到我挑水。除此而外，别无所事。怎样利用这个假日时间，还没有考虑好。

比去年的春节，今年春节大不相同了。去年春节连一天都没有休息，赶修我们现在住的这一幢房子和食堂。此外，去年正是春节期间，发生了徐济成、孙时平事件。今年春节，干校一片节日景象，大概全校都休息下来了。

以阴历论，今年去年相比如此。以阳历论，去年一月二十七日病，实际上一月二十六日开始发烧。正是一月十六日晚上，开了一次对我的批判会，即李斌俊发言批评我兴风作浪，不认罪服罪的那次会议，此后即连续发烧约一周，以后还咯血约二个月。今年身体健壮。擅自返京的田广生，回来后看到我，半开玩笑，半是嘲讽地说我愈来愈健壮了。

身体健壮，大大得力于营养良好。此次节日，全所加世经

所不到三百人，搞到一千斤肉，七百斤鱼，加上鸡蛋等等。节日小卖部供酒，供米花糖、柿饼、江角蜜、江米条等等，我一无所取。酒，去夏买了一瓶玫瑰酒，还存有一些杨坚白给的“泡酒”和白干五茄皮的混合酒，这次节假喝掉它也够了。节假日前小卖部廉价出卖“淮山米粉”，每包三角，我买了五包，也够吃的了。手头所存副食品，准备一一吃掉，不再保存。

春节我们给假探亲的共十八人，据闻这一批人员中，有些老头儿（至少有俞平伯、吕叔湘，也许包括刘瀟然）一起走了，信阳到北京，包了一节车厢，这一节车厢是一列专车的一部分，这一列专车则是信阳地区各干校返京人员联合包下的。

里夫患“米尼氏病”已久，想去看看他。启口为难，也颇有碰钉子的可能，只好作罢。

日子就是这样过下去了。心情宁静，只是昨晚梦见采秀，又哭醒了一次。家里一切人睽隔已久，度今年当一一能知消息，料当时心境，当和大梦初醒的 Rip van Winkle（瑞普·梵·温可，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笔下的文学形象，一个在山里沉睡了20多年，醒来后不能适应现实的人）一样。不过只要有思想准备，什么消息我都受得了。充其量不过是死人，最亲爱的人的噩耗我经受过来了，还有什么经受不了的？今后生活，大体上不过是五年来生活的继续，没有梦想什么大变化，大体上也不会有什么大变化。1965以后，我彻底变换了环境，犹如1940年一样。已经到了沟底，再沉沦下去，也不过剩下埋起来的一着而已。

进行一次思想和政 治路线方面的教育

一月二十六日

元旦社论，提出深入斗批改，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以及经济和国防这四方面的任务。一个月来，报纸上重点报导的是深入斗批改的必要性。报导避免经验主义，才提倡认真读书，从理论上亦即认识论方面提高路线斗争的觉悟。相比之下，国防和经济是具体任务，在思想和政治路线问题得到认真解决之后，具体任务的完成犹如水到渠成。

这样，文化大革命就具备了完整的形态了。想一想从“五一六”通知，经过十六条，到68年军工宣队进入清华，即“工厂里斗批改大队要经过这样几个阶段”的最高指示，即九大（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最高指示，与夫蚊子飞机、蚂蚁大象的比喻），到了九届二中全会提出学哲学，元旦社论提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这个历程，和遵义会议至七大的晋绥讲话虽然不能做冒然的类比，但在基本点方面是有某种共同性的。差别似乎在遵义——七大是十分慎重地步步前进，这一次则更加曲折复杂。

连排学元旦社论，结合清查“五一六”运动一起进行。发言普遍，又很为深刻，诚为沙吉才同志所云，这次是在斗争中学习，是学一点用一点，学一点落实一点。假日之末，准备写这一期思想汇报（2/11—31日，计二十天），也要好好想一想来写。

节假的第三天

一月二十八日

节假日第三天，第一天忙于“双值日”和洗衣服被单，第二天在饲养班劳动，7:00—13:30，傍晚去中心点看节目，八时左右，因人多看不到先回来了。今天没有任务，晨起较晚，上午苦苦思索了萦绕多年的历史观问题，写了几张乱七八糟的卡片。看起来，如果我还有若干年的余生生活可过的话，这个问题总是压迫着我要把它整理一番的。

下午想把这个问题放下，考虑写一份思想汇报。

节假后的二旬

二月十九日

节假日的两旬，去息县拉沙拉砖三次，其他干了一些杂活，其间参加中央机关干校会议传达的讨论，前后历时十天，除一天去息县拉砖外，我也参加了九天，这是下乡后连续不参加劳动的最长的一次，去年岁初两次病假，都没有这样长。如此休息，竟弄得我一天只能吃八两饭，也算开创了新纪录。

学习会议纪要时，听了主席批示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其中主席致中央常委几位负责人，是林、周、康三首长。

清查“五一六”运动还在热烈进行之中。运动着重清罪行，专案审查和群众审查相结合，会议开得极好。自去年十二月十一日动员以后，开始，这样的大会我们这一帮专案对象都不参加。一月十一日开始批判传系“五一六”假造反罪行，自

此时起，连排的大会都参加，不参加的只有革命同志单独召开的一些会议了。

节假后的第一个休息日

二月二十一日

节假后的第一个星期天，全连突击家属宿舍。八日，全校大会传达中央机关五七学校会议，会后布置了十天的学习讨论，其中夹有一个星期日，全校不放假，我们也不放假，到今天才放假，则已是阴历的一月二十五日，一月份已过去了。

讨论会议纪要我们这一帮专案对象全部参加，我发了四次言，一次谈收获，二次谈体会，同志们批评我认罪服罪不深；三、四两次发言是关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大体仍是去年十月七日所写建议的内容，看来，这个建议一时是实现不了的。其间困难，还是在于全校未必有某种长期规划——生产组的措施初稿，提到退田 2600 亩，即使如此，剩下的四千亩地，按一千四百人计算每人二亩半，可是学部这个机构，不免要大批分配出去，即使有若干个所恢复业务，规模一定大大缩小，剩下的人员不会达到一千四百人，轮训的人估计不会超过三至五百人。这样，生产规划究竟如何确定，确属难题。

清查“五一六”运动发展到现在的阶段，恐怕就算是最后阶段了，图穷匕首现，到达现在这个阶段，不能不说这是清彻底了。清到这个阶段，无政府主义就会彻底肃清，群众，以及新老干部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了解，当会大进一步。自此以后，路线斗争将进入愈来愈深入的阶段，其中心内容是大寨、大庆，勤俭建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伟大的破和伟大的立，而就立这一端而言，在路线问题得到真正解决之

后，还必须用制度把群众的创造巩固下来，举一个例，经济核算将是一种群众性运动，然而企业财务制度，企业内部的情报系统和统筹，以致财政制度、银行制度（如基建生产的划分、基建拨款问题等等），五十年代搬进来的一套四十年代苏联制度就全部不能适应，而要有大刀阔斧的改革。

这些问题，一到我的问题解决之后，准备写一封信给方毅。——不，这封信，现在就要着手草拟起来。

续

下午十九时

中午擦澡，洗衣服，嗑葵花子，冥想数小时。回忆 1968 年 8 月前读书二年，1968 年 12 月起释卷，迄今也已二年半左右了。一旦摘帽，方毅那里的信是要写的，关于会计、管理的“文章”则不准备写了，因为实际状况的变化，据报纸上所登载的不过十之一二，其他情况一概不知道，全面的论述并无根据。而且今后我究竟在哪一方面有所效力，尚不确定。会计、管理固然是一个方面，倘若沾手，会占去我全部精力，1963—1964 一年间全力以赴，成就有限。现在想想我那几章“会计学”草稿，实在一无是处。要做这方面的工作，还确实要有一个班子，要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而且要准备长期搞下去，并不是“浅尝辄止”所能解决的，这样，陷下去容易，拔出来就难了。

也把前些时候写的几张有关资本主义发展的卡片拿出来重读了一下，其中关于法兰西大革命的再估价部分，上次写着写着就搁下笔来的，想起来要对这个问题真的能够有所认识，还必须把中世纪以来的法国史，尤其是十六——十八世纪的法国

史弄得有个眉目，才能形成初步意见。人寿几何，能够二个拳头打二个人，甚至妄图长出第三只第四只手、第二个脑袋来么？

换 排

二月二十八日

这一周主要是盖家属宿舍。二十七日，当家属宿舍房顶上完秫秸把，糊上泥巴以后，下午五点开全连大会，公布班排调整，我调到饲养班。这个饲养班的任务，除养猪、养鸡鸭、养驴而外，加上了积肥一项。今天搬家，帮了帮“闲”；任务尚未确定，看起来是搞积肥。

这是第三次搬家——第一次从东岳搬席棚，第二次从席棚到一号房，第三次从一号房到饲养房。这个饲养房我曾经抹过一间房的墙，填过三间房的土，平整了院子，现在我搬来了。同住的为张曙光、刘国光、张之毅三人。班里全部人员为刘国光、杜浩智、张之毅、张曙光、巫宝三、孙家琇、刘淑英、陈长源、汪熙曾，共十人。

饲养班的十八天

三月十七日

来这里，今天是第十八天，其中九天用于出圈填圈，看来自再有四五天，可以完成第一个周期。这一个周期是困难的，因为过去的半年多，严格说来，猪圈从未彻底清理过。一月三十日及二月一日，王贵宸、杜浩智等五人，和我带的吴敬琏、

曾延伟等五人，花十五个工，“彻底”地整理一次猪圈，其实是不彻底的，最主要的是猪坑上没有掘地三尺，而且小圈底下的肥坑也没有彻底整清楚，即便是“院子”里，也没有挖彻底。这第一个周期所以困难，还因为现在是运肥到堆肥场，而这个饲养场地内坑坑洼洼太多，所以，清圈填圈是和挖水圩子、填路一同进行的。水圩子计划得到大家的热心赞成，巫宝三以六十七高龄，尽力挖土；拖拉机来，用开沟犁把水圩子的轮廓开了出来。张曙光这个大力士，是清圈、填圈、铺路的主力，来后十八天，我用其中一半时间搞清圈填圈有关的工作，张曙光实际参加的时间要少得多，但是他完成的工作是远远超过我的。这十八天，尤其是最近十天，每天累得晚饭后只剩躺下的一法，然而目睹久已设想过“挖填”工程进展迅速，预计不久的将来，这块小小的四方形场地内可以整理得有头有绪，而且将变为一个并非可以自由参观的一个饲养场，心里是十分高兴的。

宣布搬家

三月二十五日

正在兴高采烈，准备修建，而且已经动手搞猪食槽地坪的时候，今天全校大会宣布搬到明港的一所营房集中搞运动，消息对我完全是突然的。而且是在学习会议纪要，完全安下心来搞喂猪的时候发生的。当然，从远景来说，也并不突然，因为一种政治安定和全力搞建设的局面已经出现，像现在这种状况不可能长期继续下去。

到新地点再记日记吧。

干校的最后一个月

三月二十九日

干校的最后一个月，在饲养班，就我个人而言，到饲养班来是来参与结束的。这一个月的前二十天，所做的是清圈填圈。未清以前，猪坑大概没有彻底清过，这一次把建圈以来的猪粪尿全清出去，而且月初雨后院内的一锅稀泥，也扫数运出，堆成了一个很大的粪堆。二十四日，开工要建食槽地坪，挖土夯实，抢运剩砖，二十五日上午全校大会后戛然而止。

二十五日下午，为对付今后猪食计，一下煮了二大锅这里传统的猪食——泔水、稻糠、菜皮，结果还剩下一半交石寨大队猪场运走。因为烧猪食的翌日，就选送二十头送东岳外贸，当时还说丹麦猪七头和一头白猪要拉去明港。第二天，送鸡鸭，第三天，猪只扫数处理完毕，饲料整清，全数卖给铁道干校，今天已有人来盘糠了。

“明港集训”，原以为是学部独特的措施，其实不然。巫宝三夫人孙家琇，原中央戏剧学院教授，原拟联系原单位，离此返校，为了发电报问地址，获悉他们早已离原地去“玉田集训”了。由此推想，中央机关五七干校会议所定原则，即使并无变动，也仅适用于机关而不适用于学院和文化事业机构。这是因为机关的问题是精简，而许多文化学术单位的问题是存复。局势的发展，不仅清查“五一六”和历史积案不许久拖，文科的学院也许也不宜弦歌久辍。目前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涉及的问题不止一端，这一个方面也排上日程，开始要走一条新路了。依此类推，七十万下乡青年的问题也将提上日程，文化、教育、学术的欣欣向荣，已经为期不远了。

局势发展的迅速出乎意外，现在是全胜的局面了。二月八日开始的九号公路战役（美国人的蓝山719）以全胜告终，现在这一战役的政治后果，还看不清楚，也许会大大超过奠边府之役。尼克松于此一战役彻底溃败之后，不像希特勒那样公开宣告败绩，而且掩饰败局，吹嘘达到了“原定目标”。这就说明他并不企图组织一次卡内败绩后的拼死再战，扳回战局。法国的德姆维尔推测，九号公路战后将出现美中和解的局面，苏联也不断攻击我正在勾美反苏，从三角斗争的逻辑而言，这也许是必然的结论。66年致秀函中，曾谈到我的出处，将在越战胜利之后，现在从某一方面来说，已经到了这个时候——当然，当时我们设想的越战胜利，其实是半途而废的胜利，是某种让步后的和解，而不是一种辉煌的军事光荣的胜利，这是我这样一个猥琐人物头脑里提出来的结论，那种气壮山河、决战决胜的前途，是主席、胡志明这样的大人物才能下的决心。

打赢美国，迫使美国承认败局，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平衡的相互关系，然后以三大国中的一员活动于国际舞台，使我成为小国和大西洋诸发达国家革命人民仰望的中心，同时在这种全胜的鼓舞下加速经济发展，以便在十年十五年中超过日本，在再长一点时间内超过美苏，如此功业，彪炳千秋，在我国历史上秦皇汉武唐宗都不能望其项背，在这种情形下，文学之士是有用的，学部存废问题已经解决了，这就是明港集训的背景。

干校的最后一个月，是在“学习会议纪要”后的一个月，这一个月，全校硕彦，不知有几人多少推知会议对学部的结果，迥非这一个月实际上做成的；这一个月，世经所以夜战修成一幢房子，我们的家属宿舍建成了，养猪计划已年底达到一百头，大田定出了产量指标，而我也是在这种“大干”安排下调来饲养班。不期“奋战”竟以“结束”告终，此孙家琇所以

叹为魄力真大也。

干校的一年半

三月三十一日

1969年，我连首先到达东岳，到此次搬家搬完——估计不会早于四月十七日——前后历时一年又五个月。其间，经济、文学两所先离北京，第二批是自然科学史室。如经济、语言所及民族所在70年3、4月；5月，考古、近代下乡；8月，其他各所及学部机关扫数南来。所以哲学、历史、外文等后来各所，在乡时间不过八个月，比经济、文学两所少九个月。经济、文学两所下乡最久，建房规格是经济所做出来的样子，砖窑是经济所第一个动手，脱坯也是经济所第一个动手，但是，70—71年冬春，经济所已经任务不足，颇现松劲。而中心点庞大的建筑群，则是后到各所奋战的成果。

这一年半，农业生产实际上并未着手。1970年夏收归各生产队。1970年夏锄，高粱动手迟，质量差。豆子差强人意，秋收中有绿豆收割而未运走，遇雨霉烂事件；有黄豆未晒干归屯发霉事件；至于农田水利则几乎全未动手。下乡不久打起的一口三十米深的井，一直没有提水工具来配套，全未发挥应有作用。

所以，这一年半，实际上只是忙着给下乡人员建设居屋，许多所，建成的房屋还未完工，还未住上人，“集训命令”已经下达了。瓦厂的最后一批瓦给哲学所，去完成一幢未完的房屋。世经所夜战建成的一幢，盖上了油毡没有盖上瓦。“干校会议”后一个短时间，干校计划71年集中力量搞农业生产，成了未能执行的计划。

在大战精神的鼓舞下，经过二三年，把这一片塘坡，建成大寨式农场，这种想法，恐怕并不仅仅在我的脑袋中出现过，一声令下，这一切全都搁起了。

有没有人利用这一年半搞起来的设施来实现这一计划？这一点尚存疑问，据说，这个干校，“中央交给河南，河南交给信阳，信阳交给息县”，到今天为止，谁来接收，尚无音讯。

续
四月一日

这一年半，建校的方针是经济建校，突出炼人，其间每次战役结束，都举办讲用会，评比则全未举行过。炼人效果如何 可以“建立谁立”而定 建立者 小炼古工园 一

建设，都未能乐观厥成。艰苦创业，改地换天，报上见过很多，我得以目睹者，再三搜索，仅得 69 年去摘葡萄的京郊某农场——先办劳改农场，此时已改为公安部干校。至于下乡数次，所知农村情况，则 58 年起迄于今日除 1959—1962 年剧变后又恢复而外，首尾相比，变化实在不大。以 1957—1970 年两个粮产数字相比，平均每人得粮均为 600 斤，实际上也无所增加。

续

四月四日

干校一年半，生活水平远高于过去任何一次下乡劳动改造之时。五八年下乡，与农民同吃，其间在野草湾曾以四个下放干部独开伙食，在千根与牧羊工（高级工）搭伙，终究是庄户饭。五九年在商城，住国营农场四个月，与农场工同伙，后到“劳动队”虽系右派集中劳动的队伍，犹能保持一斤的吃粮，比当时农村断炊，高强得多，虽然如此，伙食标准究竟是庄户标准。60—62 年在清河，正值困难时期，水平也不高，而农场所多吃一些菜，当时已是难得好处境。69—70 年的干校，与这次都不相同，下乡之初吃的是白水煮萝卜白菜，然不久即开禁卖酱肉，而息县接待站则标准特高。息县接待站的高伙食并不特殊，而是一般现象，故 70 年初赵人伟认为此种标准与下乡锻炼、向贫下中农学习的气氛不符。但是比之普遍状况和一般趋势来说，这只是一种不合时宜的议论，因为 70 年一年，以我连食堂而论，实在是愈吃愈好。十二月清队新高潮以前，卖酱肉卖鱼的次数特多，十二月中旬以后，“卖小菜”的次数减少，实际伙食标准并未降低，冬季生活以后，据说女同志宿

舍中鱼虾不断，肉松炼乳不断。我自年初肺炎以后，消瘦特甚，春夏之交，略有恢复，冬季大见丰腴。这不仅因为我是买小菜的积极分子，也吃过一些炼乳、奶粉、藕粉之类。糖的消耗，最多时一个月可达三至四斤。肉松也吃过二斤……

50年代末期，去古未远，下乡时当然要照土改队办法同吃同住，64年周口店四清，还是派饭，自备精食品的已不在少，老头则吃供销社之类的食堂，已经偏离同吃同住的要求。干校是“学校”，是不与农民混居的学校，日常生活，在住与行方面比较城市已经艰苦得多，伙食之不能降低到当地农民水平是必然的。然而十年消长，也是见时易势移，人力难挽。分析其原因，可以列举下乡人员老了，城市生活方式固定化了，看农村贫困二十年来并无根本变化，等等，而瞻望未来，则全国农村都发生大寨式的变化，前途犹多困难。

迁出东岳

四月四日

二十五日开大会宣布搬家，到今天已经是第十二天了。行

这里有一桌，修好一凳，第一次睡了有床架的低铺，可惜今天装车完毕，才移新屋，即通知明晨要走，这种高贵的生活竟不能满一天。

十二日内，景象一日一变。猪圈存猪迅速变少，以致于猪去栏空，场上柴屯整批出售，运柴草的车牛人群，喧腾二三天，小学学生扛红麻，铁业社车运红麻又一二天。

四月二日起，每日清晨来带斗卡车四五十辆，昨天世经走，今天我们走，现在这个点上或已寂无人声了。

接收人员已来。沈佩林说，来者是正规部队，共来一个连，到我们这个点上一个班，也只是看守，究竟这份产业何人接办，看来还未定局。

机务队暂时不走，播种停了三天，今天又在继续了。

三线续闻

四月五日

昨晚通知今日无车，今晨知运输局不再来车，现还得在这里住上一二天。一屋一床，一桌一凳的生活可以多过几天，冥想记录的机会也多了一些。

三线建设，以前所知者为豫西、湘西、鄂西，近又闻陕西一些消息，陕西铁路，计划新建者有四，一自西安经韩城以达于山西的侯马，这是当年秦晋修好的旧径。一自安康以达于西安，这也许是古代栈道一线。一自西安以达于延安——延安不可以不通铁路，延安通车后，也许还可以在此基础上修建自山西以达银川而不绕河套的新路，此则还需时日，未可以近年期成。一自西安经商雒达襄樊，另有经汉水流域沟通“汉中—荆州”之线，而自襄樊一带还可修通信阳。这几条铁路，加上焦

枝线也是豫西、鄂西和晋陕相连通的线路。加上西南铁路系统，古代中国以长安为中心的西边发达地区，就四通八达，而第四个五年计划的面貌，也可概见一般了。

张之毅去京回后，只说到一条消息：山东莱芜发现大铁矿，可容纳三十万人就业云云。这样，山东有油，有煤，有铁，鲁中南的开发又是一个大课题了。

翻阅去年日记，对于中国大平原的开发颇寄以希望，以全局衡量，也许这个方面，要推迟到第五个五年计划。然而局势发展之速既出人意外，也许在二个积极性的安排下面，东侧开发，不久也会提到议程上来。何况目前冶金工业的发展，自炼铁以下的设备关可以说已经过去，重点移到矿山上来，莱芜发现，未必会搁置下来，而中国大平原的农业资源，究竟又十分可贵，三线地区的供应终究不免困难，几个中心，同时进行，未必没有可能。

从经济方面说来，这也是可能的。目前下放干部，下乡青年这份劳动力后备有成百万人，用于建设，人力成本不会增加到目前所费的一倍以上。粮食状况，近年来终究有所进步，建设材料，有目前的工业基础，比 59—60 年局面已全然不同。文化大革命以来郁结了无限的革命精力，全面建设已成了亿万人民迫切期待的事情。外交局面大大打开，进口设备与技术，我们一张口就会风涌而来，信贷是不成问题的。越战胜利若早日实现，人力物力向建设转移的分量更可增大。“全线出击”条件具备，只要调度得当，是可以干的。

这种局面，今年未必来到，明年后年则大有可能。“无债国家”，其实不过是清理过去。面向未来，“无债国家”不过是飞跃的准备而已。

留守的三天，东岳至明港途中

四月九日

留守生活三天，居饲养室之中屋，冥想太少，记录太少，闲居无事，甚至感到无聊。好在第二天下午洗了澡，洗了衣服，第三天下午把我睡的床架修订了一下，读了五日以前的参考，这三天也就过去了。

四月七日晨六时起身，匆匆早饭后即打行李，送行李，拆床架，参加装车。十时即行至东岳，又装上曾延伟的东西，十一时自东岳起行。

东岳息县的景色是熟悉的，息县西北向北至正阳这一路，还是第一次走。土路面，崎岖不平，看两侧农田，种得不好，甚至比东岳一带还差。玉笏桥是息县正阳交界，玉笏桥北行11公里，到明港——正阳的正规公路，路好，土壤也转为黄土，不再是息县的胶粘土了。看地图，玉笏桥在东岳正西，如果从民族所徒步到五笏桥，大概不过四五十里，汽车则绕张陶——息县——玉笏桥，走了150—170里。

到明港已下午四时半，遇小雨。在明港车站卸下曾延伟的姊姊和一批行李。继续西进到营地，卸车安置已八时许了。

明港的第一周

四月十五日

明港的第一周，劳动五天，其中一个星期天，大洗了床单、被子和睡衣，合起来是六天。这一周，布置了学习三二七

文件，二八决定以及作为二八决定附件的 1943 审干决定，我参加集体的讨论很少，今天要做小结，规定每一个人都要发言，苦于思想空虚，不知说什么才好。

这是一个军营，建于 1953。院内树木已经砍伐更新一遍，天花板已经补过，盥洗室已经有些损坏。房子宽敞， $10m^2 \times 14m^2$ 的一间大房子，原来住一个排的，住我们的一个排，室内安排，略如棉花仓库，而光线、过道等等，都优越得多。营房布置，团营排连的区分略可认识，让给我们的房子，至少占一个团的范围，院内道路是修筑过的，生活学习的区域又较小，每排房子都带有走廊，来后经过了几天雨天，都不是跋涉泥泞中的样子了。

形势续有发展，名古屋乒乓赛后，加、哥、英、美五国球队应邀到我国，总理亲自接见。九号公路大捷后，尼克松宣布五一前撤兵五万，但不放弃越南化计划，老挝解放军开始将打击方向转向泰军，第一季度工业生产成绩陆续宣布，上海总产值增 29%，北京在 28.8%，1971，这四五的第一年，也许将增加 30% 左右，这样的增长速度，将是空前的记录，开国以来的二十二年间，历经除旧布新，涤荡污浊，吐故纳新，二条道路、二条路线的斗争进行得如此彻底，从此以后，将是精神变物质的时期，看来，我们预测的三线与东侧同时发展，可能性愈来愈大了。

以下录 1946.4 主席《关于目前形势的几点估计》：

(一) 世界反动力量确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危险是存在着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因此，美英法同苏联的关系，不是或者妥协或者破裂的问题，而是后者较早妥协或较迟妥协的问题。所谓妥协是指经过和平协商达成协议。所谓较早较迟，是指在几年或者十几年以之内，或者更长

时间。

(二) 上述这种妥协，不是说在一切国际问题上。这在美英法继续由反动派统治的条件下是不可能的。这种妥协，是说在若干问题上，包括在某些重大问题上。但是，这一类妥协在目前短时期还不会很多。美英法同苏联的通商贸易关系则有扩大的可能。

(三) ……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

外交、财政和东部建设

四月二十二日

昨天报纸上刊登了一篇关于财政、货币的文章，历数西方各国通货膨胀和我国的稳定，其中有一句话，70年财政收入数字及收入增长速度，都是历史上所未有的，这一点其实不足为怪，因为当就业增加不多，而生产大幅度上升时，生产增加的绝大部分都是纯收入。进一步说，当就业增加，而工资保持目前的水平，劳动生产率又并不减低的时候，积累的速度也会远远超过生产增加的数字，日本50—60年代的迅猛发展，全部秘密都在于此。这种趋势，在我国将持续很久，——远较日本为久。因为我们的劳动后备，在目前说来简直是无限大。仅以上山下乡那部分青年而论，召回到工交、商、基部门，所需增加的工资，最多不超过现在维持费的二倍，而他们所能创造的价值，则将六七倍、七八倍于目前的维持费。所以，短期内，即在召回原由国家支付维持费的部分劳动力，还不需要培养、招募费用的期间内，生产增加对于财政收入增加的促进作用是极其巨大的，可以推测，71年的财政收入可逾千亿，二

三年内，有可能增加到1800—2000亿，——如果在二三年内，生产增加可以保持20—30%的年率的话。

所以，今后二三年将是花团锦簇的二三年，预料三线建设不可能完全容纳财政收入所容许的工作量——因为设计和其他基建的准备工作赶不上。这样，东部建设——在那里，有许多长期内已经准备好的蓝图，可以立即拿来付诸实施的——就必定会提到议程上来。

我们的“起飞阶段”已经过去，这是根据，外交方面的新局面即以此为根据。

台湾问题的解决，也可以以此为根据。

东巴事变和锡兰暴乱中的立场，也是如此。

初论明港

四月三十日

到此已过三周，曾西去明港镇，明港面貌，所知有限，作“初论”。

从地图上可知，明港处桐柏山东麓。营房北、南二边都为平坦而且很低的“岭”，其西边，由驻地远眺，可见有“岭”，略多观察即知西面和南北两边并不形成环抱之势，而且一条谷地逶迤西去。可以推测，循谷地西去，两侧山岭必逐渐高峻，以达于深山区。

驻地农田已形成“梯田”，不过骤看还不明显，实际上是一级一级的台田向南北岭上伸展，但伸展也止于岭腰，迫近顶部，是自然草地了。北岭（我们驻地在北岭）农田间有水塘，谷地最低处是一条稻田，高处现种小麦，度麦收以后一部也将改为稻田。这种“制度”，一直到明港镇都是如此。

三周内曾两到明港镇。这个镇现属信阳县，据闻曾隶正阳，也曾是信阳县治。这是一个古老的市镇，镇内砖瓦房的寿命，看来都在二十年以上。镇内中心街道，路面有用水泥铺筑的，有用沥青混凝土铺筑的，都有阙损，修补得不好。但街道、房屋、商业，看来都比息县要宏大，不过息县的特点是新，这里则“旧”得多。

可见工业，唯小铁厂。有小高炉四座，还有高耸的烟囱，可见当有炼钢设备。矿石准备用人工，焦炭用土法烧焦。从综合利用的观点来看，这是不经济的。

但是“明毛铁路”修筑至少已逾半年。毛集铁矿既然值得修轻便铁路，明港铁厂当然也值得扩大——不少应该扩大到煤气可以利用的水平。如果资源丰富，当也可以扩大成为豫南中型或大型钢铁基地。

初说明港，只能到此为止。

五一前夕闻江南铁路

四月三十日

杨坚白说，芜湖到贵溪铁路已在修建中。高兴得很，也不免引起悼念亡妻的哀思。偕游秀故乡，登黄山，曾相预期，已成泡影……

这条铁路可以简称为江南铁路。这是沿 30 年代旧称，又

“丹阳”腹地扩散，东侧铁路建设，此线得以优先，完全是合理的。

然而此线虽非一般的东侧建设可比，仍不妨把它称为东侧建设的先声。东侧建设，方面有二，一是浙、赣、闽、粤、桂五省丘陵地区的沟通，这一带，我未亲履其地，未能详评其利害，然而可以肯定，这些地方的交通建设，不仅可以充分利用各地农林资源，也可以大大开发矿产，发展重工业，二是中部大平原与山东的建设，除山东外，就国家工业交通系统而言，经济利益不大，主要作用为当地农业的现代化，这一部分，恐怕不免要排在后位。

两周杂记

五月十六日

五一节假二天，继以五一社论学习二天，五月五日俞震报告，“战斗打响了”。二周来的检举揭发交代高潮，我无所贡献，亦无可贡献，好在杂项劳动多，也不难度日。

形势续有发展，外交方面局面展开，已至土、伊、菲、马的频繁接触，与布雷讲话的台湾问题由两个政府自行解决的阶段。布雷讲话的翌日，我政府发言人加以严厉驳斥，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我如何解放台湾，不容美国人置喙。至于美国国内，尼克松表示愿访问中国，曼斯菲尔德已通过宇都宫德马交涉来华访问，以至乒乓之歌风行一时，气氛已迥然不同于往昔。局势中也有一些难于理解的因素，例如黎笋出席二十四大，在苏逗留一个多月，近几天来，黎笋来京，总理会谈仅一次，而西哈努克则事先去南方访问。这边就是说，印度支那三国斗争的胜利是必然的，美国后退是必然，但如何收场，还有

变化。

自老挝南部大捷以来，国际局面急剧变化，看来也引起过一些人的疑虑，美《人民论坛》对此有所论列，摘录如下：

“在友谊问题上，在极左分子、小资产阶级激进派和修正主义者中间最近正在出现一种危险的说法，这种说法是：对人民的这种友好表示，实际上就是对美帝国主义和美国统治阶级的友好表示，他们说，这种表示是出卖或放弃革命原则。他们说，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软化了，并正在改变他们的反帝立场，这是一种错误和危险的说法，应该与之进行斗争……”（参考消息 5/15）

国内经济，工业生产一季度增长数字报导了十一个省市，其他未见续报，我推测今年全国工业生产也许可以增加 30%，即或不至此数，1975 年前五年，将是史无前例的大跃进，则是十分可以肯定的，近数日来，连续报导了治淮方面的成绩。

也许是神经过敏的推测，不少农业生产，目光已辐射于东侧。目光东移，潜力最大的大片农区，当然是千里淮上——这个地方，在势不得不成为我国的谷仓……。

千里淮上，就自然条件而言，比黄河一线的华北平原远为优越，其地区广阔，又远超川西平原、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二千年来，此地之所以多灾多难，与北方帝都仰赖东南粮运频有关系——自“鸿沟”、汴河、北至隋炀连通运河，鲁南、豫西以及大别山诸水入海，不复畅通，这里的千里平原就常年汪洋一片。“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事实上当远推秦汉。现在淮上人力丰富，还有近代技术可以运用，无论南水北调（津浦运河），或疏通淮河入江水道，都已不难，这个地区理应迅速发展，以与江南锦绣山河媲美。而且，淮河水系一旦获得根本解决，农业建设还应转移其重点到苏北沿海大运河，以至在千里苏北沿海，与海争地，搞出一个二个我国

的“些德海”垦区来，总之，我国工业战线固然有做不完的事情，农业方面也是一样的，只要全力以赴，十年十五年，面貌必大有改变。

东侧建设，无论工业或农业，都是事半功倍，青岛、苏州，青年外徙，又返归故乡，我亲耳所闻。就地发展，费用省，技术文化传统又优于外移。西部建设，并不是没有必要，关中、河西、四川，以至京汉西侧的广大地区，资源理当开发，工业理当发展，百年来偏枯局面当改变。然而关中虽沃野千里，古代汉唐建都，粮食已仰赖东南，是该区农业资源确有一定限度。东侧发展，工农并举，粮食蔬菜无须调运，其利颇大。至于国防问题，越战胜利结果，“海警”大体上已无须忧虑。东西并举，速度更快，已见“十大关系”。无论如何，建设布局是必定会按照这个方向变过来的。

但愿今后十年，我国工业能十倍于今日（年率26%）

.....

网状水库与淮北三改

五月十六日

这几天报载治淮材料，对于沿淮（主要是淮北）的网状水库方案，即所谓“一片地对一片天”的方案作了激烈的批判，说这种方案造成了水系混乱等等的弊病云云，对照一年前我在日记上所议论，似乎可以评论一番。

曾希圣的淮北三改，在综考会时曾听到过，其内容则未加详究，可能“一片天对一片地”就是他倡导的理论，仔细想来，如果下游无洪水出路，即使沟网相通，沟网也不可能在汛期把洪水全部容纳下来，“一片天对一片地”，在这个意义上

说是很不现实的。由此说来，现在报导中所能看出来的治淮方案：反对下游拦阻上游洪水，而要疏导客水过境；全流域通盘筹划入海入江的洪水出路，完全是对的。然而在这个条件已经具备之后，沿海平原还是应该努力发展网状水库，因为淮河两岸是中性土壤，蓄水不致使土壤盐碱化，而网状水库无论如何可以容纳汛期洪水的一部或大部，下游压力也可以减轻。

曾希圣还有一个错误，即把“一片天对一片地”的实现寄托在很短时期以内。其实，要实现整个地区沟网相连，所需人力很多，只能分年经营，分年完成。而疏通入海入江水道，即使工程较大，但它比较集中，可以大规模地集中施工，在短期内加以解决。唯有在解决洪水出路，初步保证大片田野不是被淹，能保证一般收成之后，然后以四五年、七八年、十几年的时间，用建设旱涝保收的条田台田的法来建设网状水库，才是积极而又可靠的办法，达到这一步的时候，千里淮上也就成了江南景色了。

千里淮上应该大批（不是全部）改种水稻，种水稻用水，不能指望网状水库，而应“井渠并用”，而且，唯有大规模电灌，才能大批发展机井，东岳见闻，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了。

再论财政、外贸与建设

五月二十三日

昨闻三峡上马，晚间浮想联翩，不能入寐，再论财政，外贸与建设。

外人论我外贸者云，我国适奉独立自主的建设方针，仅在最近方痛感有扩大外贸必要云云，也算说中了某个方面，这种必要性，我看有对外政策的考虑，也有某种经济因素存在其

间。经济因素中最关键要点是财政盈余、外汇盈余与物资库存盈余需要用在有用的途径上，建设速度当然是在考虑中的，但是这是一种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可以不列在事态新发展的范围之内。

目前曾估计，70年代财政收入在千亿左右，从另一侧面来看也是完全可能的。70年工业交通国民收入为2162亿元，加上商业、基建和农业，总数当在3500亿上下，财政收入若达千亿，不过其30%而已，照1957年的比例，这是完全可能的。事实上，70年重要企业生产能量的运用更充分，发展大致可推定为57年的2倍，这是推定千亿收入的另一个侧面。

这样的财政收入，必然有相当数量的盈余，而财政盈余，又必然表现在外汇盈余和物资盈余上，外债和内债有待偿清，69年后，生产增长，70年前，偿债压力不复存在，建设规模，有于成规，未必大量扩大，盈余为量可观是必然的，九号公路战役前，这些盈余可以作为战略储备用，四月以后，再守成规，就成了保守主义了。

照老眼光看，建设规模，69年起已经大大扩大了，焦支线，9424等等，都是69年上马的，事实上，东岳乡居，所闻十分有限，焦枝、二汽、潜江、9424，都不过整个建设中的一斑而已。即使如此，这些单位的建设，其气派已非53—57年可比。然而这样的规模，还远没有用完我国建设的潜在力量，所以，建设规模，在最近二年内还要猛烈扩大。

猛烈扩大建设规模就是扩大外贸、扩大技术进口的背景。三峡电站，若以450KM输电半径计，其周边为汉中、西安、洛阳、商城、九江、长沙、重庆。其年发电量若以500亿KW，0.05元/KW计，每年收入达25亿元。这样，这个电站即使须投资100亿元，也是划得来的。为配合1000万KW的电站，所需各种用电工业企业的建设，尽求诸己，势必迟缓，

大量进口技术，可以提前实现其效益，为什么不干？

在这种情况下，大量输入原材料，也成了当务之急。马来西亚闻我愿购 20 万吨橡胶，为可以避免西方抛售战略储备橡胶的跌价危机而色然而喜。他们愿意购买的东西中，通用机械是重要的一项。这样，我国的外贸，从此开始了购原材料，输出机械设备的新途经，不再是出卖农产品，购入装备，更不说购制成品的消费品了，类似 Malasia（马来西亚）的例子，对于智利、秘鲁、玻利维亚、菲律宾、印尼，以至缅、泰诸国，都是合适的。很明显，我国从此要在国际市场上打击诸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日本了。我们为此重视植棉，这就是背景，可以相信，我国钢铁生产愈发展，即使国内建设规模扩大，不久也将在国际市场出售粗钢，成为日本的劲敌。

扩大外贸，反过来又将促进建设规模的扩大。这不仅因为工业装备的进口可以补我国机械制造工业之不足，也因为海港建设、远洋航运造船工业等等又将成为建设中的新项目……

“神武景气”将见于我国！

黄河的沉沙固堤（摘录）

五月二十六日

〔郑州花园口公社〕从 1969 年起，修建了提灌站，在黄河大堤背面沉沙，用泥沙淤厚加宽黄河大堤，黄水经过沉沙后，排出清水灌田，把灌溉和防洪固堤结合起来。

《引黄灌溉，变害为利》，《河南日报》，1971.5.25

明港两月

六月三日

四月七日到明港，到今天已将两月，近日摘录《反杜林论》，作荒废已久的哲学思考，要休息一下脑子，记明港的最初两月。

五月七日前是学习阶段，整整费去一个月，学习内容为70.3.27决定，71.2.8决定，1943年整风审干决定，以及“两类矛盾”，学习中要求明确政策，其实是明确对“五一六”的认识，其间最大的一件事是不指名地公布了陈伯达是总后台，因为也明确了“五一六”分子本质上都是受蒙蔽的受害者，这个阶段我发了次言，大体上还没有出什么错，五月八日，学习俞震报告结束，转入揭发检举、批判阶段，最初几天，我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写，讨差使到厨房去劳动。其后约二周，宣布今后劳动大家轮着干，于是虽间或劳动，大部时间学习，写过一次批判稿，给张之毅看了一下，实在因为我并不占有材料，也没有学好怎样批判，无法继续，看来人家也不会责备我。好在周前，六本书到了手，埋头读书札记，生活渐趋充实。

清查运动，实质上势如破竹，现在的问题，恐怕不是隐瞒问题，而是认罪问题，所以大批判就成了重要环节。由于我也写过一次这样的稿子，所以深知大批判是至难之事，“五一六”分子认罪不深或拒不认罪，原因也在这里。不过这种障碍是可以克服的，需要的时间也不会太多。

这里伙食好，初来时很馋，现在愈来愈吃不下，即或从事体力劳动一天，饭量也无法增加，房子比东岳好多了，但是，

生活愈转向以读书为主，也就愈感觉条件还不充分——营房究非学校和研究机构可比。

愈转向读书，其他一切愈易忘却，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科学家来访者日趋增加，年初返京的刘大年已出现在报纸上，看来最迟到年底，这个研究机关总要以缩小的规模恢复起来。

读报，记下一件最重要的 shock (震动)，意大利经济代表团访华回国，说我不愿通货膨胀，不愿在经济上受人控制，所以意对我出口还不能迅速增加云云，我终日关心增长速度，闻之不免惋惜。

麦收两天

六月七日

四日割麦动员，五六两天参加麦收。

65年周口店割谷两天，下肢肿胀。70年东岳收麦，腰弯不下去，跪着割，第二天就改任运输，以后参加了收割高粱和红麻，割豆子时也是搞的运输。这次我们只搞收割，没有其他出路，硬着头皮弯下腰去割麦。第一天和张向敏合用一把镰刀，下午，沈佩林、张向敏和我三个人合用二把镰刀，居然也顶了下来，晚上还不觉得行动不方便，翌日，没有解放军参加割麦，每人一把镰，自晨至晚一路顶下来，劳动比第一天还紧张，我却干得比第一天还好。尤其是下午的三个半小时，开始时拿到一把十分蹩脚的镰刀，割地边的粗壮麦子，居然还能不是“砍”而是“裁”。以后生产队长吆喝换镰，换来一把好镰，“快哉快哉”，我们二行赶张署光的三行，还赶了上去，挥镰裁麦行，一次裁二行或三行，达到了 1958 以来从未达到的水平。看来这是去年挥镰割高粱红麻练出了手劲，与使镰的技巧的结

果，更加意外的是，弯腰两天，虽然很难受，到第二天晚上收工的时候，我的狼狈相比之陈今淑等简直不想走路的样子还要好得多。如此看来，从1958年到1971年，13年中，我的劳动效能还并非走了下坡路。于是，再活二十年的勇气也增加了。

黄河沉沙

六月九日

黄河沉沙，不仅限于上次摘录，河南、山东所在都有，山东历城有一个有趣的数字，65—70六年之内，在44华里内，淤成宽200米的、高2米堤背土带，约计之得 $200m^3/年$ 。

历史上黄河水从未用来灌溉，筑堤用土，都取自堤背，河床愈高，堤岸愈高而愈狭隘，堤背愈挖愈深，一旦用黄河水灌溉，就要见沙，就会淤起土带，就会把堤加高加宽。二三百年以内，黄河中游，可以修成一个有较大水流坡度，两边堤岸既高，又可以宽达五华里至十华里的斜坡。这样，黄河就会名符其实地成为冀鲁豫平原上的分水岭。问题在于引黄灌溉现在未必普遍，也未必被看做防汛固堤的手段，但是，既然已有这样多的沉沙固堤的经验，引黄灌溉势必当作沿黄防汛的手段，为黄委会所提倡。这对于华北农业的发展以及治黄两者，都有极大好处。问题在于这样普遍推广之后，黄河势必不够用，南水北调就会提到议程上来了。

我以前冥想的那种用机械办法挖筑沉沙池的办法是不必要的。虹吸、电灌已可以解决问题。因为沉沙是逐年的，沉沙地必将逐年加高，只要灌溉是必要的，三五十年之后，所沉的沙就势必要求加高河堤，才能有处理之方。

治黄，治淮，都已引起适当注意，这是好事。

黄河问题看来已经解决了，上游沟洫，见效太慢，灌溉沉沙固堤，以至逐步抬高黄河灌区的田野，才是根本出路。

读《天演论》

七日休息，未去小卖部，巫（巫宝三）得《天演论》。下午，见巫读此书，疑为由京寄来，后闻购自小卖部，甚悔未去。

初见是书，似受电触。曾读李锐书，知昌济先生曾以欲得

经济发展速度质疑，其他

六月二十日

连日读书甚勤，《反杜林论》也结束，《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也已将次结束，报纸发表1—5月各省工业生产发展速度，几个晚上细细分析已知材料，结论是，短期内难望“神武景气。”

已知1—5月各有增长，辽宁、浙江、湖南、陕西都为15%左右，其中辽宁1—3月为20%，1—5月降为15%，度去年1—3月生产还未完全上轨道，以及full capacity（饱和）之后，增长也应放慢。又前知1—3月材料，天津亦为15%左右。1—3月，超过15%的有上海、北京、山东、山西、甘肃、江西、山东、江苏，除山西、甘肃为第三线，山东的铁、油、矿产大有希望以外，上海、北京等地必定逐渐放慢，甘肃、山西、江苏速度很快，重庆、贵州1—5月都在50%上下，但对全局影响未必太大，鄂、豫、冀、蒙、川五省还迄今尚未公布过数字，这是包钢、武钢、重庆、丹江口、潜江所在地，增长速度也许转快，究竟对全局影响有多大，能否使今年及今后全国年增长率超过20%，仔细想来，大成疑问。

举例来论，初到河南听报告，论二三年内河南发电设备将自50万—150万KW，极其兴奋，甚至以此推测全国，其实增长是由于丹江口水电站，而南阳—襄樊工业区的建设，则全赖丹江口电站，是为全国建设中心，决不可以为全国都将有同样速度，又如钢铁年递增率若为30%，1975将为5400万吨，速度不可谓不快。钢、化工、机械、石油、电力五者即便都达到年率30%，全部工业速度还是难于超过20%，因为煤、棉

毛丝麻纺织、食品等传统工业的增长速度比例是极慢的。又如三峡上马，若 10 年内能建成 1000 万 KW 的水电站，它在理想的“神武景气”中所占地位还是相对微小的。“把中国建成 50 个州组成的联邦”，各搞一套，当然大有帮助，但是前进途中的困难还是很大的。看起来，要持续地达到年率 20%，需要多种方案齐头并进，而这是很难设想的。障碍之一，不愿负债；其二，技术进口有限度。我们照例是愿意援外，而不愿有太多的技术进口的。

这些问题进行都已在主席的思考中，其中也包括人口问题。也许今后注意力将逐渐转向对外开放和内部发展（见 6.17 起，连续发表的斯诺记录），然而我要放弃那种轻信态度，要深思，要分析了。

一年来的大事纪

六月二十三日

70. 5.20 主席发表庄严声明

6. 发布增产节约号召

9. 九届二中全会，公布召开四届人大

7—8 讨论新宪法，和四届人大选举名单

这个阶段，是关于整党建党，继续九大的斗批改，召开四届人大，讨论新宪法等等。是九大的继续。国庆口号，也还无所变更。

国庆社论，内容与九届二中全会相同，外交上的重大事件是印度支那三国会议和朝鲜关系的改善。

10 中加建交

- 11 中意建交
12 新的清查“五一六”运动
12 下旬 主席与斯诺谈话
71. 1 元旦社论，提出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战线方面的教育
2—3 九号公路战役
4 美乒乓球队访华
4 下旬 Snow（斯诺）文章陆续发表
5 五一社论、反美统一战线
6.17 起 《参考消息》发表 Snow（斯诺）文章译文

排好上面这张大事表后，可以推测，揪出总后台，在十一以后，元旦以前，在中加建交前后，又由此可以推测，我们外交方针的大转变，酝酿于去年十月，成熟于十一至十二月。对“五一六”的新的大清查，是和外交方针的决策有联系的。这个转变，中旬经过一次曲折，即九号公路战役。然而这个战役，在尼克松是退兵一战，在我们，知道它是退兵一战，却还是极其认真地对付了的，九号公路战役过去，尼克松无报复打算，我们就和 Snow（斯诺）打招呼，让他发表他的文章；同时美乒乓球队也来华，改变就表面化了。

Snow（斯诺）文章在国内不公开地发表，表明自此以后，形势还将急转直下，联合国问题七月份就要解决，在此前后，中美建交，越战结束这些大事变都将一一到来，其间有一个疑问，即我国经济建设是不是会有什么利用进口技术以加速发展的可能？我想，这个可能不是没有的。甚至，利用美国，压迫日本与我缔结和约，获得一批赔款的可能也不是没有的，还有一些现在听来十分古怪的事，例如美日矛盾，日苏接近等等，都可能出现。

恢复表、笔和热水瓶

六月二十八日

去东岳途中，损失暖瓶一个。第一次脱坯，失笔；秋季，表损坏。来此后，孙云鹏代买到竹壳水瓶，邝日安代我把表寄上海修好，又代买幸福 14K 笔一支。表，寄到时“鼻子”脱落，未能使用。今天请假去明港修好，又把眼镜脚的螺丝配上，这样，眼镜、表、笔、水瓶都补充上了。此外还买了一支茶缸，把用了十三年的茶缸降级为痰盂，并镶一只牙（6 元），共花三十四元左右。

水淹东岳

六月二十九日

传闻上次大雨，水淹东岳，东岳街上水深一尺，我连的饲养房和招待所都塌了，猪圈不可知其结果，这又是商城事件的再演：水库大坝倒塌，河滩里的三角棚被冲走，而我已离开，东岳被淹，虽然事情比较不太严重，然而设想雨中搬家，而所要到达的地方也是受淹的房子，这种狼狈相又当如何？

又闻吕河桥冲毁了。

七一文章

七月一日

听了七一文章社论的广播，今后几天，大概要连续学习这篇文章。

这篇社论，是把七大与九大很好地综合起来了。它详细综合了五十年来的历史，把毛泽东思想综合了二条：①武装夺取政权；②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前者，是45年延安精神的复述，后者，论到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论到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说到了基本路线。其间有下列两点新解释：

①总路线——十大关系，而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则是总路线贯彻中人民群众的自发创造。

②基本路线，归结为所有制改造后，国内基本矛盾是什么？这就是说，基本路线和唯生产力论是对立的。唯生产力论的根据是先进的社会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其结论是“退回去”。

文章的突出重要部分是第三部分，即“重要问题在善于学习”，所谓综合七大与九大，主要见于此部分。这里，关于党内斗争，即反对党内和平论，又反对惩办主义；关于成绩，强调主流与支流的两点论；关于民主集中制，强调说真话。

社论广播二小时，可以想见准备时间极长，是新时期的纲领，管用相当长的时期。

换排，其他

七月六日

三日，星期六晚，全连大会上宣布撤销四排，我回二排，其他的人也多半是回原排的性质。星期日搬家，新居床位比原来的为好，有一些东西弄到大食堂去托林里夫夫妇照管。

到二排后仍继续学习七一文章，讨论中获悉姚登山已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当场宣布逮捕。二排的李学曾，于星期六晚带去北京，床位还保留着。

今天去明港帮助托运行李，计离去者章良猷夫人范惠兰，李维惠夫人张江滢，吴家骏夫人周楚璧，又王贵宸将其带来行李大批运回。回家行李满装一卡车。回时又去表铺修表，并代施修霖、杨长福汇款。代施、吴买了一些小东西。

现在的二排是没有沙吉才的二排。星期六宣布靳、李为指导员，王绍飞为连长，沙现专任专案工作。

星期一，董辅初宣布监管对象要每周汇报思想了，这也好，应该整理一下思想了。

杂记

七月十四日

四日搬家，迄今不足二周，生活已经完全习惯，和在四排有一个不同处：四排以读书为主，近十天来则以写思想汇报为主。十二日，交汇报第一篇（认罪服罪问题），星期日去明港装牙，开始把69年所写三大卷材料找出来，读了二天，并整

理了一下思想，今天酝酿写第二篇，确实是费了工夫，还准备再好好费一些工夫。李炳俊也许是怕我没有事做，要我批判1957—1964年右派言论，其实我准备要写的，远远比他们要求的为深。昨天他看了我的第一篇汇报以后，我报告，准备照我原来打算写下去，他说“研究研究”。研究表示此非他一个人所能决定，不过，我看大概也就差不多了。

清查斗争的第一个回合基本结束，现在进行“盗窃国家秘密”一案。翻阅俞震报告，还需一一落实案件的罪行，也许是不很多的了。与此同时，指挥部已把存库玉米一万余斤悉数上交本地粮库，家属正在逐个离去，也许留驻明港的时间不会太长了。

天气热，昨晚睡不好，生活条件比东岳好。于是，去年东岳究竟是怎样过来的，现在想起来已经好像十分遥远了。

又走了刘文璞夫人周殿凤，杨美廉夫人高景兰，送走刘翰承家的行李，李云伤腰椎骨，今天车送去信阳医治，陪去的杨坚白。

七一文章强调“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阴谋家、野心家、叛徒、特务、里通外国的内奸而外，一概适用。

李炳俊说，九江到黄石，分宜至井冈山均已修通铁路。分宜至井冈山线还要延长到广东，看地图，可能的线路有二，一经赣州，一经上犹崇义。这样，江西境内已呈铁道纵横之势，因为除浙赣湘、及九江——南昌、鹰潭——南平三线与以上二线外，芜湖——鹰潭线已在修筑中，而由鹰潭纵贯原中央苏区以迄广东大埔之线，又是早晚要兴建的。

又，他说，去年他船经宜昌，已闻山中放炮声，看来三峡水电站的准备工程，不是今年才开始的。

记公报

七月十七日

昨天中午，有人问我，尼克松要来，知道否，我说，这是不可能的。其实，昨天上午9时已首次广播《公报》，晚联播又广播了，而且昨天的报上已经见报了。

公报是戏剧性的。中美关系则不可能有戏剧性的发展。莱尔德去日、去韩，部署冲绳交还和越南撤退以后的包围中国的军事安排，对峙还要继续下去，而实力地位又是谈判的本钱。局势不可能有戏剧性的发展，原因在于我们的实力还不足以使事态有戏剧性的发展，但是长期来看，局势确实是戏剧性的。因为，自此以后，台湾问题要解决，苏日要加紧勾结，美日关系会逐渐疏远甚至会恢复到九国公约的局面，这就把1945年以来的局面从根本上加以结束，开始一个新时代了。

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不变的：国家之间的局部妥协，……（以下日记缺数页）

……从国内建设（需要革命秩序，需要反题以后的合题，需要上下一心的励精图治，力求生产与业务的日日新），或确立新的对外关系两方面来说，都是不可少的。八九个月来，社会风气似乎确实大进了一步了。

去年国庆口号，还是继续斗批改，虽已提出学习主席哲学著作，着重点还是“思想革命化”，“弄通马列主义”的口号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明港的几个月，学习上的口号是认真看书

学习，弄通马列主义，学会区别真假马列主义，具体要求实在是（甲）进行政策教育；（乙）号召全面看问题，以历史事件为比喻，这是 48 年的晋绥讲话精神，具体办法有所不同——以清查“五一六”代替“纠偏”。时势不同，措施各异，匠心巨手，叹观止矣。

不仅进行政策教育，政策也在变化。见于对外政策，亦见于清队处理政策，七一文章所指五十年的经验第二条，列为彻底揭露的共四类：野心家、阴谋家、叛徒、特务，其他一律“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自巫宝三、杨坚白案处理以来，一年以后，第一次处理了曾延伟，如此大案，还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所据的是中央最近颁布的一项标准（我们当然听不到，走过宣读的房间窗口，听到这么一个题目）。杨坚白处理时原薪减半发给。二个月前恢复全薪。由此推测，即使薄一波这一批人，也将能够安度晚年。

我现在更不关心我的处理问题。二周前写了一份思想汇报，决心超出“利用对象”的水平，力求继续革命，然而出处为何，不抱幻想，所不能忘记的，还是追求真理。倘然还能活二十年，最大希望，不过是广泛涉猎古今哲理，旅行祖国各地，看看山河如何重新安排，经济如何建设，作刍荛之献而已。Huxley（赫胥黎）说，“所遇善，固将宝而维之，所遇不善，亦无憚焉”，以之对付过去，以之对付未来。

会计一道，不想再碰。二十年前旧业，也不想再操了。

十年来的苏联经济

八月二日

读报，偶然接触的这个问题，想了一番，记录下来，以备

后验。

十年来的苏联经济，实际材料是十分缺乏的，几乎无所知。然而有缺点是确凿无疑的：

- A. 四五年前，钢铁生产已近亿吨，度现在早已超出一亿；
- B. 核武器储存，已接近美国。而近年来海军又猛烈扩大，在各洋水面上与美争霸，这当然也是经济发展的结果；
- C. 利别尔曼主义一度推行，不久以前，又为集中计划的趋向所代替。消费品缺乏依然，农产品供应无显著改善。

推测所能根据者仅此数点，倘还要加上一点什么，那就是波兰事变，与阿联合同盟条约等等。

那么，能够推测什么呢？

- A. 他们的经济是有发展的，但是，这依然是备战经济体制下的发展，而且是一种极其笨拙的、悉索献赋的以供军备的那种发展，一句话，Stlinism（斯大林主义）的经济体制，对于他们已经积重难返，成了不治之病了。
- B. 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们的经济制度本质上是一种浪费与窒息的制度，经济发展所获得的新增收入，用在军费与基本工业扩展上的比例很大，用于增加消费基金的数额，永远跟不上工资的增加。
- C. 他们迷信物质刺激，军备工业的发展是用物质刺激出来的，实际上这还是30年代的老办法。结果，工资增加永远超过消费基金的增加，通货膨胀永远没有遏制的可能。
- D. 看起来，“利润原则”可以刺激消费品的增产。然而在资源集中分配，而且永远优先分配给军事工业的条件下，允许通过价格机制来分配资源才能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利润原则，不仅不可能发挥其积极作用，而且总是起一种发展黑市，扰乱“计划”的作用。
- E. 问题的症结所在是“超平衡的发展”。超平衡发展，在

资本主义国家也会造成价格统制，与统制体制下的黑市横行的现象，然而这在资本主义国家终究还能起一种动员资源投入生产的作用，在苏联，则因为那个笨拙、窒息的体制，连这种作用也起不来了。

F. 这种笨拙窒息的体制的关键是中央集权。假使他们也采取给地方以发展地方工业的权力与责任的办法，动员资源还能深入一些。他们害怕这会分散军备必要的资源，采取多方限制的办法，于是，窒息变得十分难堪，局面也就无法改变了。

G. 也有副作用，——深入动员资源还是有人做的，那是犯法分子和投机家，他们起了我们要求地方所起的那种作用，但是这种作用不合法，范围极狭隘。而且败坏腐烂了社会机体。

这些，大半是老话。现在还应该来看一看，前途如何？怎样对付？

我想，在看得见的将来，这个看来都难受的体制，还是会歪歪斜斜地向前走，正如彼得一世以后，农奴制的俄国，也曾经发展了，而且争霸世界一样。而且，只要她还是在积极扩张的超级大国，没有任何迹象显出这个体制无法维持下去。

对付她的办法只有一个，挡住她，一步一步地把她推回去，瓦解她的国外体系，同时在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生活水平上超过她。只是超过她和超过日本的后果不一样。超过日本，是要日本回到我们为主的亚洲体系中来。超过苏联，是从东方把她推回去（西欧，责任是十国欧洲的），并且促进她的内部的变化，来推翻这个令人窒息的制度，并且最能使这个历史的怪物“开化”起来。但是她永远是一个欧洲和亚洲之间又是欧洲、亚洲之外的一个独立因素，这是变更不了的。

杂 记

八月八日

星期天，休息日。大洗了一通，离晚饭还有二小时，杂记一些事情。

考古所回去了十一人，死了一个高集（？）。回去是因为任务重，中山靖王的金缕玉衣现在已成故宫博览的珍品，在发展对外关系上也是有用的。高死，是“五一六”案，自杀的。据说，他先割静脉，未成，上吊，绳断，跌断二三个牙齿，伤太阳穴。然后，他又去取新绳，砍了，系了，毕竟死了。高参加西单武斗，案情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未知。

69年宣传队进所后，自杀二人，一陈翔鹤，《文学遗产》编辑，李劫人高足，《陶渊明之死》的作者，死于1969年秋。二高集，死于“五一六”案。

经济所下乡后死老人三：姚贤镐、曾延伟、薛永应三人之母。死工作人员二，郭谨仪、刘静姝。这二个人如果不死，也是“五一六”案对象。

曾延伟处理将近一周，周四座谈，嘱，自由写思想汇报。周六我交了学习基本路线的笔记。

美日蒋之间

八月八日

美国经很长时间考虑之后，研究抛出了罗杰斯声明，接纳我而不驱蒋。新华社评论，指出日本在这里起了十分恶劣的

……（日记此处缺数页）

……成为它的经济中极关重要的部分了。

山区即重工业区

八月二十六日

闲来喜读地图，缀报上零星消息，编成已知钢铁基地表，仍待补正。由钢铁基地表，悬想我国未来重工业区分布，发现一条人家早就知道的真理，山区即重工业区。

现在已经形成及正在形成的山区——重工业区，计辽东、太行南段、大同宣化、南阳襄樊、重庆、包头宁夏、徐州、福建三明、广东韶关、湘西涟源、西昌宁蒗等处，已成重工业基地，还不知发展趋向的，如北京究以冀东——热南，抑以原平代县为矿山基地；又如太原与石家庄能不能连起来，是否准备连起来，又如安阳、邯郸的矿山，是否会深入太行山以与上党相连等等，他如贵州、云南、大别山等重工业区为何形成，还看不出趋向，可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除石油而外，其他金属与非金属的开发，基本上都在山区。如此说来，多山国家是发展重工业的好地方，因为几乎每个山区都可以发现此种矿藏，而这是建立重工业的基本条件。

也许是无根据的遐想，好几个晚上浮起一片片铁路、高压线与巨型建筑，例如立山至鞍山一带的地区形象。1953年去东北回来，这种宏伟的景象深印脑际，以关内所见，缺乏这种景色为憾。现在则觉得地图上这里也是一片，那里也是一片。

当然现在这不过是极其稀散的星星点点，不出二三十年，这种浮想必能成为现实。

所不能断定的是速度。对此，二年来有过极乐观的预测，又自己否定了它。也许这两者都要修正，事实是在这两者之间，同时，速度也会走一个之字形——1970—1971年快些，中间减慢一些，以后又逐渐加速度地上去。如果15年内，钢产量可达1.5亿吨，事情就大有可为了。

山区都是边区，其中不少是我们的根据地。山区一个个发展成重工业基地，它们的经济关系就不能以省区为界，于是，那时候，行政区划也会有所改变了。

上海工业的扩散

八月二十七日

研究地图，加以以前所知点滴消息，推测上海工业正在向浙江、苏西、皖南扩散。

新安江现在是沪宁浙区电力的重要来源，但新安七里泷之外，其上游歙县一支与衢州、江山一支，还可以开发多级水电站，交通便利，技术条件充分，可能继续修建，青弋江密迩南京，也可能干上去。衢州化肥厂，江山水泥厂是新厂，都得力于新安江电站，这些厂又为修建多级水库提供了条件。衢州邻近黄坛口水电站，开发在新安江之前，皖南的“丹阳铁路”，会同浙赣路，实际上把天目山区围起来，也是充分开发水力的准备。9424工程，估计不会远在边省，可能就在镇宁山区的沿江地带，盖为上钢准备原料之用。

上海这个工业区，可以为开发浙江与苏南、皖南提供装备与技术，这个广大地区的开发，又为整个工业区提供矿产、钢

铁、建筑材料。江苏、安徽、浙江的工业生产量都大于他者，扩散上海工业，把苏浙皖三省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区，经济，迅速，而又切实、有把握。

纯属猜测，留待后验。

孤儿日本

八月二十七日

美国陨落，日本变为孤儿。

战后日本以吉田路线得以恢复经济，朝战为神武景气的渊源，越战使已趋长满的日本经济免于衰落，仍旧盘旋向上。直到美国采取紧急经济措施之举，还看不出美日分手的迹象。因为美国还要依靠日本遏制中国，作为与我谈判的本钱，日本还要依靠美国，刮些油水，且唯有在这项保护伞下，经济、政治，才有些底子。美国星辰陨落，一下子形势全变了。

首先是经济上的冲突，对美出口剧减，对整个日本经济是一次恶性向下循环的动因，在这一点上，美国决不会特别照顾日本，因为美国倘若后退一步，整个紧急措施便成为毫无意义的事情了。九十天过去，美国还要继续这条路线下去，于是蜡山芳郎预言的美日冲突的第一个因素就成为现实了。

有了这一个因素，美日同盟必定完全垮台。日本作为不沉的航空母舰，在美国决意改变中美关系之后，这种作用本来已经消失，经济措施是以这一政治决策为其基础的。这就是说，蜡山的第一个因素成为现实，是以第二个因素为其条件。有一，其二已经存在。

但是，现在已经谈不到日美冲突了。日美冲突，要以日德意轴心为其条件，仅仅一个日本，根本不能设想什么日美冲

突。新局势，确如松村一派人所说的，日本成了国际间的一个孤儿了。

逻辑上推论，美日同盟垮台后的日本，如果按照她的军国主义趋势，矛头不能不对准中国的话，结论是日苏反华同盟代替日美反华同盟。但是这一点现在很不现实，因为：

甲．苏日之间的结盟，对于日本弥补失之于美者，无所裨益；

乙．美日结盟，日本无须有强大的军力作本钱，完全可以依靠美国。苏日结盟，必须日本已经成为军事大国才有意义。事实是，日本现在还不是军事大国，三五年内要成为军事大国，困难也还很多。

苏日结盟的前提是日本反华，可是这个前提并不具有必然的无可改变的性质。国际孤儿的日本，要选择与国，除苏而外，中国也是一个可能的对象——历史文化、经济的因素，决定中国作为与国比苏联的可能性要大得多。还可以进一步说，当中国软弱的时候，日本军国主义的矛头对着我们，当中国强大的时候，要改变她的孤儿处境，非以我为与国不可。

我从前论蜡山的设想如要实现，必须我之经济实力超过日本方可。现在看来，当我们国防上强大，经济实力预想在不久将来即可超过日本的时候，日就不得不转而就我。——对美出口的损失，部分或大部分可以取偿于我：中日接近，对日本国

这样，我们的新外交政策，其正收到了“一石二鸟”的效果，所消除的敌对因素，不只是一个美国，而且加上了一个日本。再加上我们对西欧采取的是同情态度，于是剩下来要防备的只剩一个苏联了。

确实应该检查我的浅见。我把日本国内军国主义的因素估计太高，对于我对日社会党、公民党等在野外交的作用估计太低，——两者的共同根源，是对我的潜在威力估计不足。

松村谦三死了，我们对此处理得很隆重，发消息，去人吊唁，佐藤表示要与王权会面，证明右派佐藤也感到孤儿处境必须改变。佐藤前此曾经打算访苏，这在美国紧急经济措施以前是有意义的，在此以后，就变成不顾当前经济危机的死硬做法，看来这种打算只要搁起来，至多作了一着备而不用的棋子。我们的策略，也许是推动自民党的亲华派，连同社会、民社、公明三党推翻佐藤，结束战后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吉田路线。倘使这一点能够实现，不仅是政治上的大胜利，而且对于我国经济建设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有利因素。

此外，今年联合国的斗争，完全可能一下子解决问题而不会拖下去。

接着下去的文章是解决台湾问题了。

这几点如都能顺利解决，一个全胜的完备的〔时代〕就告成了。

× × × × × ×

要补充一点。日苏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着的。苏联有此要求，日本军国主义也必定视此为“出路”之一，所以，这种趋向，将长期间成为中日接近的对抗因素而存在着。结果是，日本未来的趋向将成为一次长期的争夺战，其中决定的因素还是中国的经济发展程度。假如中国能够大量对日出口矿石、煤、油、盐，又能大量吸收日本的制造品，日本必定过来。这个因

素，将可以大大超过西伯利亚资源开发的吸引力。如果这个方面发展的速度不快。日本经济为求自存，还不得不找其他方面的出路。这是十分现实的问题，仅仅“政治”，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9.2 注

东北农业资源的开发

九月二日

听到一些兰州、西宁的状况：当地工业仅仅处于发展的初期……（日记此处缺数页）

……月十日，批评我和吴敬琏拉拉扯扯，两周前和贺菊煌在明港一起吃了一顿饭，没有要他的钱，又批评我和审查对象拉拉扯扯，吃吃喝喝，于是，和人的交往只好愈来愈少。参考不准看，思想不活跃，尤其近来几天，晚上常常很晚才能入睡。幻想消除了，见五日的日记。“孤老头子”的凄凉感触愈来愈深，怀念孩子，怀念死去的采秀。手头可读的书少，今后一个长时期还不知干什么好。

这无非是不坚定，局势有变化，但仅仅是开头。而且局势的变化，在势怎样也是快不了的，它只能是日计不足，岁计有余，如果缺乏耐心，只有一条出路——不等了，不等也可以，但是，既然立志要等，而且我也等得起，又为何不等呢？要等，就要坚毅，脆弱是不行的。

北京日記

周 遊 日 記

(1972.10~1974.10)

1972 年

- 10月13日 《经验与自然》
10月14日 Hume(休谟) 《自然宗教对话录》
10月15日 Descartes(笛卡尔) 《哲学原理》
10月16日 同上
10月17日 校 Mill(密尔, 旧译穆勒)书译稿
10月18日 同上
10月19日 同上
10月20日 同上
10月21日 同上
10月22日 同上
10月23日 全连大会, 劳动; 搁笔
10月24日 停止译校
10月25日 Mill(密尔):《论自由》
10月26日 同上
10月27日 《总参谋部》
10月28日 《日本历史——国史批判》
10月29日 休息 同上
10月30日 《日本历史》,《文明论概略》
10月31日 《中国近代文论选》,《奥地利简史》
11月1日 同上
11月2日 《奥地利简史》,《总参谋部》
11月3日 《中国近代文论选》
11月4日 《人类理解论》
11月5日 休息

- 11月6日 《人类理解论》
11月7日 同上，去商务，扑空
11月8日 伤腿，得书，Kant(康德)
11月9日 休养
11月10日 《纯粹理性批判》
11月11日 同上
11月12日 同上
11月13日 同上
11月14日 同上
11月15日 同上
11月16日 同上，释文
11月17日 同上
11月18日 同上
11月19日 同上(洗衣服)
11月20日 《经验与自然》
11月21日 《纯粹理性批判》及释义
11月22日 同上
11月23日 同上
11月24日 同上
11月25日 Brakley(布拉德莱)：《逻辑原理》
11月26日 同上
11月27日 同上
11月28日 六弟来
11月29日 等母亲来，未得来
11月30日 和六弟共餐
12月1日 晤六弟共盘桓
12月2日 李云招待六弟
12月3日 《逻辑原理》

- 12月4日 与六弟盘桓
12月5日 同上
12月6日 《青铜时代》及《十批判书》
12月7日 与六弟盘桓
12月8日 《十批判书》
12月9日 同上
12月10日 同上
12月11日 《Queen Elizabeth》(《伊丽莎白女王》)
12月12日 《论语》
12月13日 同上
12月14日 同上
12月15日 《论语》
12月16日 外文经济
12月17日 《左传》
12月18日 同上
12月19日 同上
12月20日 同上
12月21日 同上
12月22日 甚少读书
12月23日 《国语》
12月24日 读费正清
12月25日 《国语》,《诗》
12月26日 《诗》
12月27日 同上
12月28日 同上
12月29日 同上
12月30日 同上
12月31日 同上

1973年

1月1日	《诗》
1月2日	同上
1月3日	同上
1月4日	同上
1月5日	《诗》
1月6日	《西亚、印度和克里特上古史》
1月7日	清洁卫生
1月8日	《西亚、印度和克里特上古史》
1月9日	《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铭文研究》
1月10日	同上
1月11日	同上
1月12日	《书》
1月13日	同上
1月14日	同上
1月15日	摘录新旧版通史的论儒部分
1月16日	同上
1月17日	同上
1月18日	洗被子
1月19日	《左传》
1月20日	《西周金文字大系》
1月21日	同上
1月22日	同上
1月23日	同上
1月24日	《左传》、《国语》

- 1月 25 日 同上
1月 26 日 《左传》
1月 27 日 《左传》，越南停火生效
1月 28 日 同上
1月 29 日 《三传》
1月 30 日 同上
1月 31 日 《三传》、《Differential Structure and Agriculture》
 (《结构差异与农业》)
2月 1 日 同上
2月 2 日 阴历除夕《Economics-Germany》(《经济学—德
 国》)
2月 3 日 同上
2月 4 日 招待孩子
2月 5 日 《Economica》(《经济》)
2月 6 日 《Economica and Economica》(《经济学与经济》)
2月 7 日 同上
2月 8 日 《England in 1685》(《1685 年的英国》)
2月 9 日 同上
2月 10 日 同上
2月 11 日 家事
2月 12 日 英文文献
2月 13 日 同上
2月 14 日 同上
2月 15 日 同上
2月 16 日 同上
2月 17 日 同上
2月 18 日 同上
2月 19 日 翻译任务

2月20日	同上
2月21日	英文文献
2月22日	同上
2月23日	同上
2月24日	同上
2月25日	翻译
2月26日	同上
2月27日	同上
2月28日	同上
3月1日	同上
3月2日	同上
3月3日	同上
3月4日	同上
3月5日	同上
3月6日	同上
3月7日	同上
3月8日	同上
3月9日	翻译任务
3月10日	英文文献
3月11日	休息
3月12日	英文文献
3月13日	船山春秋论文,《计量经济学》
3月14日	同上
3月15日	同上
3月16日	同上
3月17日	《中庸》
3月18日	《大学》
3月19日	《孟子》

- 3月20日 John Robinson and A Eco.R.(约翰·鲁宾逊和经济)
3月21日 同上
3月22日 同上
3月23日 同上
3月24日 战国时代
3月25日 百工问题
3月26日 《史记》、《战国策》
3月27日 《文物》、《考古》
3月28日 同上
3月29日 同上
3月30日 《国外科技动态》
3月31日 《史记》、《战国策》
4月1日 同上
4月2日 哲学史资料,近代
4月3日 同上
4月4日 同上
4月5日 同上
4月6日 同上
4月7日 同上
4月8日 同上
4月9日 同上
4月10日 同上
4月11日 《西汉文学选》
4月12日 游十三陵
4月13日 《西汉文学选》
4月14日 《汉书》
4月15日 同上

4月16日	《盐铁论》
4月17日	改译稿
4月18日	同上
4月19日	同上
4月20日	同上
4月21日	《明代粮长制度》及其他
4月22日	《汉书》, Veblen(凡勃伦)《企业论》
4月23日	同上
4月24日	《古代法》
4月25日	《荀子》《考古》
4月26日	《经济动力学》
4月27日	Perspectives on Economic Problem(经济问题透视)
4月28日	同上
4月29日	马蹬和封建主义
4月30日	同上
5月1日	同上
5月2日	Perspective(透视)
5月3日	同上
5月4日	《荀子》
5月5日	同上
5月6日	做饭
5月7日	哲学问题
5月8日	同上
5月9日	同上
5月10日	同上
5月11日	同上
5月12日	同上
5月13日	家务

- 5月14日 哲学问题
5月15日 同上
5月16日 《荀子》
5月17日 同上
5月18日 同上, 改译稿
5月19日 《周易》
5月20日 同上
5月21日 同上
5月22日 同上
5月23日 同上
5月24日 同上
5月25日 同上
5月26日 同上
5月27日 同上
5月28日 同上
5月29日 同上
5月30日 改译稿
5月31日 汪奠基——老子
6月1日 老子——汪奠基
6月2日 同上
6月3日 同上
6月4日 罗根泽—《诸子考索》
6月5日 同上
6月6日 改译稿
6月7日 同上
6月8日 Rostow(罗斯托)
6月9日 同上
6月10日 同上

6月11日	《老子衍》
6月12日	译稿
6月13日	History of Greece(希腊史)
6月14日	同上
6月15日	同上
6月16日	同上
6月17日	休息
6月18日	Grote(格罗脱)
6月19日	同上
6月20日	同上
6月21日	改译稿
6月22日	Grote(格罗脱)
6月23日	改译稿,休息
6月24日	休息
6月25日	同上
6月26日	同上
6月27日	Grote(格罗脱)
6月28日	同上
6月29日	同上
6月30日	改译稿
7月1日	Grote(格罗脱)
7月2日	同上
7月3日	同上
7月4日	同上
7月5日	Aris(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Herodotus
7月6日	同上
7月7日	休息
7月8日	Aris(亚里士多德)

7月9日	同上
7月10日	同上
7月11日	改译稿
7月12日	Grote(格罗脱)
7月13日	休息,去图书馆
7月14日	Herodotus
7月15日	同上
7月16日	Grote and Thucydides(格罗脱和修昔底德)
7月17日	同上
7月18日	同上
7月19日	同上
7月20日	改译稿
7月21日	搬家
7月22日	改译稿
7月23日	同上
7月24日	同上
7月25日	同上
7月26日	同上
7月27日	病休
7月28日	同上
7月29日	同上
7月30日	同上
7月31日	同上
8月1日	同上
8月2日	协和补牙
8月3日	Grote(格罗脱)
8月4日	同上
8月5日	休息

8月6日	上医院,理发,清洁卫生
8月7日	休息
8月8日	The Foundation of Christianity(基督教的建立)
8月9日	同上
8月10日	同上
8月11日	Her miserables(她的痛苦)
8月12日	同上
8月13日	Grote and Thucydides(格罗脱和修昔底德)
8月14日	同上
8月15日	同上
8月16日	同上
8月17日	同上
8月18日	同上 vol. II 完
8月19日	同上,清洁卫生
8月20日	同上
8月21日	同上
8月22日	同上
8月23日	同上
8月24日	Grote(格罗脱)
8月25日	同上
8月26日	同上
8月27日	同上
8月28日	同上
8月29日	同上
8月30日	同上
8月31日	同上
9月1日	Toynbee(汤因比)
9月2日	Grote(格罗脱)

9月3日	同上
9月4日	同上
9月5日	同上
9月6日	同上
9月7日	同上
9月8日	同上
9月9日	同上
9月10日	同上
9月11日	同上
9月12日	(vol.IV, 全书完)
9月13日	上图书馆
9月14日	Ehrenberg: Society and civilization in Greece and Rome(伊伦伯格: 希腊和罗马的社会与文明)
9月15日	Farrington: Science and Polities in the Ancient World(法林顿: 古代世界的科学与政治)
9月16日	休息
9月17日	Farrington(法林顿)
9月18日	Cambridge(剑桥)
9月19日	同上
9月20日	同上
9月21日	同上
9月22日	全休
9月23日	半休 Cambridge(剑桥)
9月24日	同上
9月25日	同上
9月26日	同上
9月27日	同上
9月28日	全休, 感冒, 买米

9月29日	Cambridge(剑桥)
9月30日	同上
10月1日	休息
10月2日	同上
10月3日	洗澡
10月4日	Cambridge(剑桥)
10月5日	Ehrenberg(伊伦伯格)
10月6日	Iliad(《伊利亚特》)
10月7日	摘录 Grote(格罗脱)
10月8日	同上
10月9日	同上部分, 搞译稿
10月10日	同上
10月11日	译稿
10月12日	同上
10月13日	Grote(格罗脱)
10月14日	休息
10月15日	还书, 采购
10月16日	借书, Cambridge(剑桥)
10月17日	同上
10月18日	《古代东方史》
10月19日	同上
10月20日	同上
10月21日	同上
10月22日	同上
10月23日	同上
10月24日	同上
10月25日	同上
10月26日	同上

- 10月27日 同上
10月28日 休息
10月29日 同上
10月30日 《古代东方史》
10月31日 同上
11月1日 Gibbon(吉本)
11月2日 同上
11月3日 外出采购,擦油大户
11月4日 做萝卜丸子,胃病复发
11月5日 Aristophanes(阿里斯托芬)
11月6日 外调一次
11月7日 休息
11月8日 Euripides(欧里庇得斯)
11月9日 同上
11月10日 同上
11月11日 休息
11月12日 Odessy(《奥德赛》)
11月13日 同上
11月14日 Iliad(《伊利亚特》)
11月15日 Euripides(欧里庇得斯)
11月16日 Euripides and Aeschulus(欧里庇得斯和埃斯库罗斯)
11月17日 同上
11月18日 同上
11月19日 Cambridge(剑桥)
11月20日 同上
11月21日 同上
11月22日 同上

11月23日	Lindbeck:On Hew Left(林德贝克:论粉碎急进派)
11月24日	Cambridge(剑桥)
11月25日	清洁卫生
11月26日	《学习与批判》,《自然辩证法》
11月27日	做菜
11月28日	Cambridge(剑桥)
11月29日	同上
11月30日	同上
12月1日	同上
12月2日	休息
12月3日	去北京图书馆,改译稿
12月4日	同上,买月票
12月5日	图书馆生活
12月6日	同上
12月7日	同上
12月8日	休息
12月9日	图书馆生活
12月10日	同上
12月11日	同上
12月12日	同上
12月13日	同上
12月14日	同上
12月15日	做菜
12月16日	图书馆
12月17日	同上
12月18日	同上
12月19日	同上
12月20日	同上

12月21日 同上
12月22日 休息
12月23日 图书馆
12月24日 同上
12月25日 同上, 改译稿
12月26日 同上
12月27日 同上
12月28日 图书馆
12月29日 休息
12月30日 图书馆
12月31日 年夜饭

1974年

1月1日 休息
1月2日 同上
1月3日 图书馆
1月4日 同上
1月5日 译稿
1月6日 图书馆, 译稿
1月7日 同上
1月8日 同上
1月9日 同上
1月10日 同上
1月11日 图书馆, 《戊戌以来三十年政治史》
1月12日 休息, 同上
1月13日 同上

1月14日	图书馆
1月15日	同上
1月16日	暂告结束
1月17日	买鱼,炸鱼
1月18日	Howard Sherman(霍华德 谢尔曼)
1月19日	同上
1月20日	同上
1月21日	Penguin(企鹅)
1月22日	做年夜饭
1月23日	春节,重生炉子
1月24日	Penguin 休息
1月25日	同上
1月26日	同上
1月27日	希腊史,所里开始批林
1月28日	希腊史
1月29日	同上
1月30日	同上
1月31日	同上
2月1日	同上,《老子释文评注》
2月2日	同上
2月3日	清洁卫生
2月4日	The Found of Christianity(《基督教的建立》)
2月5日	同上
2月6日	同上
2月7日	The Economic Life of Ancient World(《古代世界经济生活》)
2月8日	同上
2月9日	同上

- 2月10日 《政治学》,《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起源》
2月11日 同上
2月12日 希腊史笔记①
2月13日 同上
2月14日 同上
2月15日 同上
2月16日 同上
2月17日 休息
2月18日 希腊史笔记
2月19日 同上
2月20日 同上
2月21日 再去图书馆
2月22日 同上
2月23日 清洁,思考
2月24日 图书馆
2月25日 同上
2月26日 感冒,休息
2月27日 同上
2月28日 休息,笔记
3月1日 休息,笔记
3月2日 同上
3月3日 同上
3月4日 再去图书馆
3月5日 同上
3月6日 同上

① 希腊史笔记,即《希腊城邦制度》。顾准去世后,198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并收入《顾准文集》。

3月7日	图书馆半天, 笔记
3月8日	笔记
3月9日	去医院, 采购, 做菜
3月10日	笔记
3月11日	同上
3月12日	同上
3月13日	同上
3月14日	同上
3月15日	同上
3月16日	同上
3月17日	同上
3月18日	同上
3月19日	同上
3月20日	同上
3月21日	同上
3月22日	笔记
3月23日	休息
3月24日	Reconsider the notes(重新考虑笔记)
3月25日	同上
3月26日	去图书馆
3月27日	开始重写
3月28日	同上
3月29日	同上
3月30日	同上
3月31日	休息
4月1日	笔记
4月2日	笔记
4月3日	笔记

4月4日	笔记
4月5日	笔记
4月6日	笔记
4月7日	休息
4月8日	笔记
4月9日	笔记
4月10日	笔记
4月11日	第四章毕
4月12日	第五章的困难, Reconsider(重新考虑)
4月13日	解决, 直书一天 chap.5(第5章)
4月14日	休息, 清洁卫生
4月15日	笔记
4月16日	笔记
4月17日	笔记
4月18日	笔记
4月19日	笔记
4月20日	笔记
4月21日	清洁卫生
4月22日	笔记, 完成重写, 至 chap.5(第5章)
4月23日	笔记, chap.6(第6章)
4月24日	笔记
4月25日	笔记
4月26日	笔记, 读卢里叶
4月27日	笔记
4月28日	卡壳
4月29日	炸鱼
4月30日	笔记
5月1日	结束, chap.6(第6章)

- 5月2日 检讨, chap. b(第6章), 开始读文献
- 5月3日 (B.C) Fifth—Fourth century literature(公元前5—4世纪的文学)
- 5月4日 同上
- 5月5日 休息
- 5月6日 literature(文学)
- 5月7日 同上
- 5月8日 同上
- 5月9日 开始重写, chap. 6(第6章)
- 5月10日 买米, 林荫路
- 5月11日 取文物考古
- 5月12日 清洁卫生
- 5月13日 就医, 读 Catlin(卡特林)
- 5月14日 同上
- 5月15日 证明非虐
- 5月16日 就医,
- 5月17日 Catlin(卡特林)
- 5月18日 同上
- 5月19日 同上
- 5月20日 卫生
- 5月21日 C.A.H. Vol. V
- 5月22日 同上
- 5月23日 同上
- 5月24日 Thompson: medieval(汤普森: 中世纪), 再度戒烟
- 5月25日 同上
- 5月26日 休息
- 5月27日 同上
- 5月28日 同上

- 5月29日 同上
5月30日 Catlin(卡特林), 译基督教一段
5月31日 同上
6月1日 同上
6月2日 休息
6月3日 《中世纪史》, 去医院
6月4日 中世纪史
6月5日 同上
6月6日 同上
6月7日 同上
6月8日 《法国史》
6月9日 同上
6月10日 同上
6月11日 《法意》, 去医院
6月12日 《法意》
6月13日 同上
6月14日 同上
6月15日 同上
6月16日 做饭, 清洁
6月17日 Thompson(汤普森)摘录
6月18日 同上
6月19日 同上, 去医院
6月20日 Catlin - Hobbes(卡特林—霍布斯)
6月21日 同上
6月22日 同上
6月23日 做饭
6月24日 Hobbes(霍布斯)
6月25日 同上

6月26日	同上
6月27日	同上
6月28日	同上
6月29日	没干什么,洗衣服
6月30日	Hobbes(霍布斯),完
7月1日	做生日
7月2日	Catlin(卡特林)
7月3日	同上
7月4日	同上
7月5日	休养,去医院,边沁
7月6日	同上
7月7日	同上
7月8日	同上
7月9日	同上
7月10日	同上
7月11日	同上
7月12日	输血,肝功能
7月13日	休息
7月14日	Catlin(卡特林)
7月15日	去医院,青霉素注射一周
7月16日	Catlin(卡特林)
7月17日	李亚农史论集
7月18日	同上
7月19日	同上
7月20日	去医院
7月21日	The Quest of Certainty
7月22日	同上
7月23日	同上

7月24日	同上
7月25日	同上
7月26日	Catlin(卡特林)
7月27日	同上
7月28日	Catlin(卡特林)
7月29日	同上
7月30日	Macaulay(麦考莱), 李亚农
7月31日	同上
8月1日	同上
8月2日	同上
8月3日	同上
8月4日	同上
8月5日	同上
8月6日	同上
8月7日	同上
8月8日	英史编年
8月9日	同上
8月10日	同上
8月11日	同上
8月12日	同上
8月13日	同上
8月14日	Thomas More: Utopia(托马斯·莫尔: 乌托邦)
8月15日	Catlin(卡特林)
8月16日	Russel: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罗素: 西方哲学史)
8月17日	同上
8月18日	同上
8月19日	同上

8月20日	同上
8月21日	同上
8月22日	同上
8月23日	同上
8月24日	同上
8月25日	同上,半休,清洁
8月26日	同上
8月27日	同上
8月28日	Russell: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罗素:《西方哲学史》)Freedom and Organization(自由与组织)
8月29日	同上
8月30日	同上
8月31日	同上
9月1日	同上
9月2日	同上
9月3日	同上
9月4日	同上
9月5日	文物
9月6日	蒲寿庚考
9月7日	同上
9月8日	休息
9月9日	汉唐佛教思想
9月10日	同上
9月11日	等候
9月12日	等候
9月13日	等候
9月14日	等候

- 9月15日 清洁及采购
9月16日 六弟来，与六弟共同生活
9月17日 与六弟共同生活
9月18日 与六弟共同生活
9月19日 与六弟共同生活
9月20日 与六弟共同生活
9月21日 与六弟共同生活
9月22日 送六弟移居，善后工作与清洁卫生
9月23日 六弟来盘桓半天
9月24日 同上
9月25日 同上
9月26日 同上
9月27日 同上
9月28日 买票，买携带的副食品 六弟来盘桓半天
9月29日 副食品，发电报，包扎，六弟来盘桓半天
9月30日 送六弟经宁夏返沪
10月1日 大休息
10月2日 《庇隆——阿根廷》
10月3日 俞平伯：《红楼梦辨》
10月4日 Macanlay(麦考莱)
10月5日 同上
10月6日 《史迪威事件》
10月7日 休息
10月8日 Macanlay(麦考莱)
10月9日 同上
10月10日 同上
10月11日 同上
10月12日 同上

- 10月13日 《聊斋》,《开罗文件》
- 10月14日 《开罗文件》, Macanlay(麦考莱)。开始打针
- 10月15日 Macanlay(麦考莱)
- 10月16日 同上
- 10月17日 同上

致陈敏之的最后一封信

顾 准

六弟：

二十三信昨天收到。途间风寒，既已廓清，当可精神焕发地生活下去，十分高兴。

可是我却不行。咯血未愈，又加发烧，兼以服药反应弄得疲惫不堪。这里的人看我支撑为难，已写信要顾重之来此招呼，谁知道他会不会来？来倒也好，至少可以交流交流感情和思想。

病情如下：(1)病史，1970 肺炎未愈劳动，小咯血二月，(一面劳动，一面咯血)透视，支气管扩张，连续注射青霉素病愈。

又，1973.7，在一星期内由小咯血发展成为吐满口血，协和急诊，断为支气管扩张(有胸透)，注射安络血四五天病愈，又 1974 年 5—8 月连续低烧，胸透支气管扩张，累次验血，白血球高，连续注射青霉素，100 万单位×6，低烧停止。

(2)此次发病，9 月中旬感冒，感冒期间连续喝了些葡萄酒(平时不喝)，抽了几支烟(每天不超过三支)。9 月底，均应发现痰中带血。九月五日就医，给土霉素二天剂量，又给一些 virK.C.，九月九日就医，补给口服“安络血”，十二日起注射安络血一周。但一直不愈，22 日开始发现又有低烧，服云南白药三天，注射链霉素及青霉素。结果，低烧从 37.75°退至 37.3°，但云南白药的反应强烈，休息不好，停服。

(3)今就医，继续打青霉素、链霉素三天，继续注射安络血，

同时又拍了胸部X照片，下周二看情况如何。

已自费去购“三七”，买到后每天决服一钱。

我此次对病，采取采秀于1958告我的办法：“倒下来再说”。咯血令人心烦，也要求静处。然而我没有条件。唯一的办法是住院，但是我自己无奔走力量，反正“倒下来”自然会解决。情绪当然是恶劣的。开始是觉悟到我的健康状况，决定我此生搞不出什么东西来的了。懂得这一点是痛心的，也有过踌躇。其次是，开始懂得虽然搞不出什么东西来了，然而也会可以拖得下去，那就拖吧。“拖”的决心，和“倒下来再说”的办法倒是对得起头来的。如此一来，倒也安然地拖下去了。

你听这些话一定很难过。不过，人总得有点自知之明。从前我不想在老年时苟延残喘，现在已经“忍命”了，也算勘破一关了。

军宣队这次倒希望我到上海了，我不走。一走，他们轻松了，那不行。我还得在这里拖下去。

你仔细想想，我这个办法是对的。

“情况在变”，不错，正因此，我要在这儿拖。至于乐观，我还是乐观的，然而，（一）对现在正在变的情况，我不满意；（二）中国的伟大的变化，我恐怕在中起不到什么作用了。

易兄与我，周前盘桓过几次，现在走不动了，不去了，我也不要他来，免得我又害人。他的女儿，陈小群，66届初中毕业生，参加军垦，户口已迁回北京（因系独女），户口到军械厂工作单位公

基督教

乔治·卡特林 著 顾准 译

基督教本身——无论是统一教会还是(在分裂的年头)它的拉丁天主教或希腊正教的变种——把灵魂供给这个庞大的罗马帝国。它是罗马帝国的严格意义上的彼岸的灵界的对应部分。该撒们的罗马帝国,是提供法律面前然而又是该撒治下的平等的一个机构,是提供集体得以免于蛮族侵犯的自由,然而又是服从法律,服从“现在的权势”(powers that be)和该撒的天才的那种自由的机构。Irajan 对于希腊文明生活血肉相关的那些自愿结合的小社团猜忌得如此厉害,甚至对救火会也疑虑重重;早期基督徒只得把他们的教会登记为殡葬团体。博爱,是交给基督教来提供的——一种非以种族也非以地域为基础的博爱〔兄弟情谊〕(虽然犹太主义同时包括两者,又在 Armenia 有一种觉察得出来的、教会的首脑职务有落到自命为基督的弟兄们后裔的那些人身上的趋势),而是以理想原则即“道”(the Word)为基础的博爱。这种对博爱的看重,在已经被承认的哲学教导中是不明显的——如果不是新东西的话——但是和早期的宗教诸如 mithoicism 和 orphic 秘仪相比,它倒并不是空前的。

罗马帝国因为它打算要维持人们对于它那官方的、干巴巴的、无情的、不亲切的帝国宗教的企图落了空,在 Constantine (279—337)皇帝治下,为了它自己的利益和基督教妥协了。皇

帝在讨价还价中努力要做到不受到严重的损失。皇帝不再是神了，但是，虽然他甚至死前才受洗，他却成了“外观上的主教”(bishop in externals)——而这个东方西方还未分裂的普遍教会，变成效忠于帝国的人。罗马帝国汲出了——或者，人们想象它汲出了——为了使它的庞大的血肉躯体不致腐化所必不可缺的情感的精英。皇帝马上取得了“使徒的同侪”的正式地位。在别处，统治者要变成“最正统”、“最基督”、“最宗教”的。圣职人员 fertullian 能够说“帝国和我们有什么相干”的日子已经过去了。thalcedon 宗教会议(A.D. 451)用“你是教士又是皇帝，是战争中的征服者又是宗教信仰的博士”来向皇帝致意。我们回到了该撒，法老和 mikados 的古老信条——王即是神，或至少是王权神授的理论——上去了，只是蒙上了一层体面的面纱而已。教皇制度的功劳之一是，它破坏了这种僭窃，从而结束了这种暴君统治。在 Constnian 时代，一个杰出的圣职人员能够清清楚楚地说出这样的学说：“上帝什么也不需要，皇帝只需上帝”。于是，异端不仅是针对教会的反叛行为，也是针对皇帝的叛逆行为。事实上，它们常常是当地的不满情绪的外衣；或者，以埃及为例，是民族分离主义的外衣。帝国的精神是这样的一种精神，它在宗教的一致性中坚决主张其政治的重要性。皇帝在“闪耀至尊的圣像”的时候，作为至高无上的人物，承担了上帝的某些属性。更为危险的是，上帝承担了罗马皇帝的诸属性，他专制地、绝对地、独自地把炼狱的火焰施加在罪孽之上，犹如罗马法把尘世的火焰施加在弑亲上一样。

天主教会和罗马帝国一样是遍在的，独特的，在它之外没有安全 Voltaire 对于还存在于他的时代的罗马帝国，可以说它既不神圣又非罗马。Golthe 可以宣称：“这个亲爱的古老的罗马帝国啊，它是怎么结合在一起的啊”。然而它还是继续下去了，让它自己消失在 Napolean 的崛起和倾覆的种种纠纷之中。但是，

先知但以理的书里明明写着，第五帝国将要存在到最后的审判，存在到世界的末日。甚至当不可记忆的时代就已存在的天主教会，被剥夺掉它的尘世的俗界的姊妹以后，Seu Peveadem——“还和从来一样”——就像某个古代的女人当她的年青的同居者逝世以后，直到如今还没有能够承认人死了一样。在天主教会弥撒书内，在耶稣受难日篇中，迄今还可找到这样的祈祷文：

让我们也为我们最基督的皇帝祷告，为了我们的永久和平起见，愿我主上帝使一切蛮族都臣服于他。全能的和永生的上帝，一切政府的权力和权利都在他手里；他赞许地注视着罗马帝国；凡是相信它们自己的凶猛的民族总是要被您的全能的手压倒的。

但是天主教会终究是大大超过帝国的随军牧师。它是罗马的公民们通过基督共同体内的洗礼而建立起来的组织。它的世界性并不略逊于帝国，它的疆界不限于帝国四境之内。如果人们要问，在基督教帝国内异教徒能否享受完全公民权，历史学家Qrosius，能够宣称皈依了基督的哥特人，虽然处在帝国疆域之外，还是同志和兄弟。理论上帝国和教会两者都是独特的，遍在的——然而，它们之伸展到黑暗的蛮荒空间，疆界也许是不一样的。

尤有甚者，教会和先前的哲学家们一样，提出并且回答“生命的道路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发育完全的教会的福音书来自闪族犹太人，但是它的组织得自罗马，它的主教是戴上了主教冠的帝国太守——而它的哲学则来自希腊的斯多噶派供给了米兰的St·Amlrose加以表述的系统化的道德理论。柏拉图供给了公社的理论。新柏拉图派为神学提供了系统化的诸观念。教会一路向前走，借各个时代的宝藏丰富了自己，甚至使人回忆埃及

诸神的称号，词句和节庆也没有遗忘掉。简言之：生命的道路，是借合理的信仰获得拯救。不过古代教会忠实于古典时代的情绪，其忠实超过了现在人们容易承认的程度。它的思想即柏拉图主义，本质上是社会的，拯救连同它的一切圣礼，是在公社中，通过公社而获得的，还要伴以社会工作。兄弟情谊的爱，并不仅仅是善良的意愿，并不仅仅是徒托空言的荣宠和恩惠。

教会为正统主义战斗，它是不容忍的，这分明因为社会联系事关重要，所以，凡是异端，就是反对这种共同信仰的社会联系的叛逆行，是反对人们在其中、以及其它为自己准备和圣徒最后融为一体，或性灵上交往的共同体的一种背信弃义的行为。象昔尼克派、斯多噶派，甚至象伊壁鸠鲁派，它蔑视（贤明逊于 Aristotle）人间世的环境、善业和对人的尊敬。它不从事于反对战争、奴役，也不从事于反私人财富。

它的原始的精神是和平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Ananias 和 Sapphira，因为只把他们财产的一部分给公众而受到 Pater 的诅咒，亦即在精神上受到电刑。圣地的教会，在其初期一切东西都是共有的，就和主的门徒们一样。“伟大的教会”（主的屋子，亦即 Kuriou oikos；或 Ecclesia。即“召唤出来的”或“蒙选的”）缓慢地把它这些事情上的信念弄明确了。凡是推选出来的、完全宗教的，亦即凡是神命的，决不能持戈作战的。St·Basic 的一个僧侣参加了军队，当他能够回到他的修道会去以前，必定要经过长期的忏悔。教士（clerici——“推选出去来的人”）必不可打仗。又如我们已经看到，某个 Orosius 可以坚决主张甚至罗马的敌人，当他们也是基督徒的时候，他们也是兄弟。

保持了一种有限度的共产主义……简言之，教会对付这些争论，是借助于由神命特别挑选出来的那些人要过理想性质的宗教生活——偶然也要对其他人以精神上的指导者的身份行事——他们是实践和平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常备兵”，而这些人又

有别于人类中的“有罪的芸芸众生”，他们只能指望遵守最低的道德法则，他们可以为他们之间的争吵打架并且打出结果来，他们可以去寻找金子。这种区别是令人震惊地柏拉图式的。

希腊人，尤其是逍遥学派的希腊人，充分意识到人是动的，还常常是不快活的动物。文明是这样一种实体，大多数人在其间必须当作工具，为的是使光荣的文明的社会结构可以上升到它的顶峰。群众是一堆无足轻重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也无关紧要。无产阶级的教会不能够采取这样的态度。而这是它的革新。一切人全都是“一个躯体上的诸器官”，信徒中最卑微的人，服务于他永恒的造物主的更伟大的荣光——而不是奢华的仪仗的荣光——并不略逊于信徒中最尊严的人。拯救是无须代价地奉献给所有的人的，虽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为应该对此作出回答。但是，教会对于动物本性是用原罪来替代了的——而且从来不会忘掉要记住它在人类事务中所起的作用。教会具有柏

拉图那般抽象的、唯心的、神秘的、形而上的一套人生哲学

们的最好的(“最好的”取决于独立的价值标准,不是变幻无常的,也不取决于投票)。教会的划时代的(如果不算是新颖的)贡献是断言——比 Socrates 所持理由广阔得不可比拟——灵魂不灭,也就是断定个人的不可计量的价值。断定这一点,无论它怎样肤浅怎样怪诞,总是反对多神主义和融合主义理论的——“把各人的衣衫重新联结在一起,人们就该融合到普遍灵魂中去了”(“fusing all the skirts again, Should fall remerging in the general soul”)他是不死的,只因为他在共同体之中的,然而,无论如何,他还是作为一个个人而不死的。他是这个兄弟会中的一个个别的有生命的成员,不是社会的一个轮牙。就他自身的权利来说他有权和别人一起受苦受难,有权和别人一起受治疗,有权同情别人(*In his own right he was entitled to compassing sympathy*)。作为一个有灵魂的人,他在这个方面拥有天赋的和道义上的权利,也因为这个原因,纵然教会全部机构是柏拉图式的教阶制,它还是根深蒂固地平等主义的,就好像在尊重人的尊严——有别于城邦的或民族的光荣的人的尊严,亦即作为人的所有一切人的尊严——的逻辑中一样。

再说,柏拉图反反复复地说到,似乎他假设正义是社会的(所以,他把它弄成是静止的)、卑微的人,除了留意他的实在的卑微的行道的业务而外,是没有什么权利可言的;然而基督教观念却与此相反,把它的精髓放在拯救教义上。他在每个人身上寻找他潜在的本质。它坚决主张,真正的神的正义是个人的,无论在尘世里或天国中,无论是现在或最终,正义总是个别地落实到每个人身上的,与此相似,荣耀总按照他决意去做的程度归属于他,纵然他的决意在环境中被压倒了。它在灵魂不死中找出来了一种神话——当然不是那么非柏拉图式的一在它衬托之下,教会能够提出上帝面前所有的人无分贵贱都有权要求正义的中心教义;这种权利,使得“动”的灵魂具有不可计量的价值,

使得它甚至有权要求统治者和国家的尊敬。教会的共产主义像 Plato 一样是专业人员，而不是像利维坦那种形状的官僚主义的，如像在 Weff 夫妇那里一样。不过，它的平等的教义是其中心，这是个人主义的，革命的，动的。

教会是平等主义的，因为它是一个兄弟会，但是，就是在兄弟会里，每个人的天赋也是各不相同的。它之所以是平等主义的，有更为深刻的理由，因为它把价值观察的中心从随带有公民的功效的此岸世界转到来世，转到上帝跟前去了。在上帝眼中，一切都是儿子，都是不死的，都是个人，都具有和最高救赎行为完全相称的价值。他们通过献祭成了上帝的儿子。于是，这种平等主义就是彻头彻尾彼岸世界的，和随时可以碰到的，惯常的等级区分毫无关联的——甚至不是由天性的平等，而是由于理想中的天惠或灵魂中的潜在力量的平等（亦即超自然的，先验的）。柏拉图的“自然的”（合理的）生命之道，变成了基督教的超自然的（非物质的）生命之道。这一教义是和摈斥此岸世界为无关重要相联系的。它是苦行的。它懊悔地并且故意地和此岸世界，和肉体结合在一起。但是纪律的意义它是懂得的。

教会在反对 Aristotle 的文明的论证，在卫护它的平等的无产阶级的公社中，立誓要为反现在、肉体和魔鬼——亦即公共的事业生涯，肉体的要求和智力上的自豪——而战。简言之，它比昔尼克派更为昔尼克主义，它从根本上谴责希腊人对文明的观念；在灵魂上严阵以待地反对这个文明和它的业绩。教会通过全面否认他的常识性的假设，单枪匹马地迎战 Aristotle，Tertullian 说，“我信，因为它荒谬”（*Credo quia absurdum*）。不顾理性主义者和死灭了的文明的一切主张，教会懂得她拥有灵界的权能来创造历史。在这里，起作用的是信仰。教会不是为那个骄傲的人而是为那个质朴的人要求人们对他的尊重，而这是超乎 Aristotle 在他的学问中所知道的一切超乎一个 *organon ewpsu-*

chon——“活的工具”之上的。

教会在其最初的几个世纪中，还具有一个被迫害的团体的精神状态，而且到此为止它还是信奉千年至福说的——这就是说，相信“在千年”周期“之末”，第二次降福就要来到——。所以她对此岸世界的某种政治和社会理论并不加以严重的注意。神学家们的严肃的思想，只是缓慢地赶上了群众中咬文嚼字的弥撒亚复活论。Cemems Alexand Viuns 领导的 Alexandvie 学派，缓慢地构筑起来它的精致的新柏拉图神学，以与更务实的 Arrtiock 学派相对峙。不过，直到 Constantine 皇帝皈依为止，教会还没有着手推敲关于她和帝国关系的理论。她逐步开始使自己适应还要无定期地留在尘世，具有俗世的责任，所以具有作为最高的超自然的公社来履行俗世统治的义务的观念……

选译自乔治·卡特林《政治哲学家史话》1939 年出版。

附录

原准日記

顾准生平与学术思想

陈敏之

一

顾准生前，多数读者只知道他是一个会计学家、经济学家，至于他在历史、哲学、政治等领域中的学术思想，则鲜为人知。这不足怪，因为他连基本工作权利都被剥夺殆尽的年代，能活下来就已经是一种幸运，哪里还谈得上什么读书、思考、写作。现在保存下来并得以公开问世的遗作，是在一种十分奇特的条件下的产物，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因为如果没有 1972 年冬我在北京寻找他和同他的晤见，没有 1973 至 1974 年这两年间同他频繁的通信以及在通信中进行的学术讨论（有趣的是 1973 至 1974 这两年，他在生活上的处境相对平静，是一个难得的可以充分利用的空隙），那么，他的这些学术思想大概也无法逃脱伴随他的躯壳一起离开这个尘世的命运。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几经周折出版，王元化是最早读到此书中的一位。他在为本书所写的序言中认为此书“是近年来我所读到的一本最好的著作；作者才气横溢，见解深邃，知识渊博，令人为之折服”。“他对于从 1917 年到 1967 年半世纪的历史，包括理论的得失，革命的挫折，新问题的涌现，都

作了认真的思索，这些经过他深思熟虑概括出来的经验教训，成为他的理论思考的背景，从而使他这本书成为一部结合实际独具卓识的著作。”“由于作者这本书的启示，我对自己一向从未怀疑的某些观点发生了动摇，以至要考虑把这些章节删去或改写。这本书就具有这样强大的思想力量。”“读了这些凝聚着智慧和心血的文字，不得不使人感动。他的这些笔记是在十年浩劫的那些黑暗日子里写的，没有鼓励，没有关心，也没有写作的起码权利和条件，也许今天写出来，明天就会湮没无闻，甚至招来横祸，这是怎样的毅力！”陈修良在以《坎坷的一生的思想家顾准》为题的文章（见《上海滩》1994年第6期）中说：“上海，为现代中国奉献了一大批杰出的革命家和卓越的思想先驱。但是，集革命家和思想先驱于一身的人物毕竟是少数，他们是特别出类拔萃的勇士。我想，我们的老战友顾准应该是跻身这一行列而无愧的。”对于顾准的为人和他的思想的评价，我，作为他的亲兄弟不想再作任何评说，我只想在这里以简约的文字对他一生的经历和学术观点作一些客观的介绍。

顾准一生的经历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时期：（一）1927～1940；（二）1940～1956；（三）1956～1974。

（一）1927～1940（12～25岁）。

1927年在我国现代史上是十分重要的关键的一年。国共第一次合作所进行的第一次反帝反封建大革命在这一年以国共分裂、革命失败而告终，继之而来的是绵延的十年之久的内战。1927年，顾准还是一个12岁的孩子，稚气未除，为了挑起维持家庭生活的重担，以中华职业学校旧制商科初中（二年）毕业的水平，进入潘序伦创办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任练习生。从这一年起，一直到1940年离开立信，离开上海，前后13年，可以说，他是在立信度过了他的青年时期。在这14个

年头中间，他的成长向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为了改善家庭的经济条件，激励他勤奋地学习和工作，在不太长的时间里，他终于从一个练习生成长为会计学专家、教授，有多部会计学著作问世（其中有些未署自己的名）；另一方面，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正确途径，终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且成为一个忠诚的党的地下工作者。1934年以后，他曾担任过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上海分会主席，总会宣传部副部长，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党团书记、中共江苏省委职委书记与文委副书记。

（二）1940~1956（25~41岁）

这16年跨越了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后最初的7年。如果说前13年他的工作和生活相对比较稳定，那么这16年中他的工作变动较大，足迹从苏南而苏北，而延安，然后又回到华东（苏北~山东）；上海解放，随军进入上海。这16年中，工作有顺利的时候，也有某些颠踬，其中以1952年三反运动中受到撤职处分，^①对他以后的命运影响最大。这一时期他基本上还是一个实际工作者，担任的职务有：苏南澄锡虞工委书记、专员，江南行政委员会秘书长，苏北盐阜区财经处副处长，淮海区财经处副处长；到延安后在中央党校学习；回到华东后曾任利丰棉业公司负责人，苏中行署货管处长，山东工商总局副局长，渤海行署副主任，山东省财政厅长。上海解放，任上海市财政局长兼税务局长，华东财政部副部长。不久，调去北京，曾任建工部财务司司长，洛阳工程局副局长，1955年，入中央党校学习。

（三）1956~1974（41~59岁）

离开中央党校，到了当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经济研究所。

^① 关于1952年顾准在三反中受到的撤职的错误处分，见《我知道的顾准与三反》。

当时中科院的负责人曾有意要他去经济研究所担任副所长，他坚辞未就。以后要他去资源综合委员会任副主任，勉强同意了，不过，经他要求，仍兼着经济所的研究工作。可是，研究工作不过刚开了一个头，厄运再次临头，1958年戴上了右派帽子，按照规定，开除党籍，下放农村劳动改造。1962年，摘掉右派帽子后，再次进入经济研究所，作了一些会计研究^①。1965年，“文革”前夕，再次戴上右派帽子。不久，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当然在劫难逃。从1956年到1974年，在这漫长的18年中，他立志进行的探索、研究，真正能够利用来写作的时间也不过是他生命的最后短促的两年，而这两年，也是利用了在非常特殊的环境中存在的某种空隙。如果上帝对他宽容一些，不要过早地夺走他的生命，那么，他留给我们的思想资料，相信一定会比现在多得多。

综观顾准的一生，说他“一生坎坷”，并非过分。在顾准身上，绝对找不到一分奴气或媚骨。“少年得志”（指12至25岁。他自称这是他职业向上时期），也许增强了他的自信；而自信常常表现为傲气。在他和我的通信中，“睥睨”这个字眼出现过不止一次。这种居高临下、傲视一切的气概，在倡导每个人成为“螺丝钉”、“驯服的工具”的社会里岂能容得；而他又是一个有自己的主见、心口如一、说话没有遮拦的人；他的性格中的这个致命的弱点；在这个“史官文化”有着几千年传统的国度里，悲剧的命运无可避免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① 其研究成果《会计原理》、《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在他死后，已分别公开出版。

二

上海《文汇报》刊登了张劲夫同志《关于顾准同志的一件重要史实》的一篇短文。文中所说的“重要史实”，指的是1956年顾准曾向孙冶方提出过对社会主义社会价值规律问题的看法。这篇短文的结尾说：“这一史实，说明两个问题：一是顾准曾向治方指出的看法，在五十年代能提出这样重要的看法是很难得的；二是治方对后来印文集时未附上这一后记^①，感到欠缺，在临终前当面叮嘱他的两位学生，尔后再整理出版文集时，一定要补印这一后记。治方的严肃科学态度，在这样一件事上，也反映出他的高尚风格，是令人敬佩的。”去年，经济研究所成立40周年，我在应约为《经济研究》（1993年第10期）写的《从〈关于顾准的一件重要史实〉谈起》这篇文章中曾说：“这件小事，居然引起了劲夫同志如此认真的重视，他不仅亲自核实事实，而且还撰写了这篇短文，足见他对正直、严肃的从事理论研究的一些老同志的关注和深情。”我还说，“值得称颂的是治方同志，我国先贤所说的道德文章，在治方同志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不是么，如果治方不在他这篇文章的后记中有这样的记述，谁也不知道这件事。这同现在某些人为了争所谓发明权甚至可以对簿公堂，其风格相距何其遥远。1975年治方度过七年多漫长的单身监禁的苦难，出

^① 1956年孙冶方写的《把计划和统计工作放在价值规律基础上》在《经济研究》1956年第6期发表时，后记中有这样一段话：“还在今年初夏，吴绛枫（顾准）同志就提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问题，来同我研究，并且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的那一段关于价值决定的引证指给我看。”

狱后获知顾准的部分骨灰洒在三里河的小河中，每天清晨都要去河边散步，以寄托对亡友的思念。顾准生前也曾对张纯音（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已故）非常自信地说：“治方如果被放出来，他第一个要见的一定是我。”他们两人情深如此，可是，在历尽劫难以后，竟未能再次一见，实在是一桩无法弥补的遗憾。

顾准写作《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经济研究》1957年第3期，以下简称《试论》）是在1956年到了经济研究所以后。此文曾数易其稿，到最后定稿前后经过约一年。当时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在中央党校刚传达。顾准有鉴于前苏联农业的严重停滞（1954～1955年前苏联粮食总产量还低于沙俄时代），在离开中央党校前他撰写的《学习毛主席关于十大关系报告的体会》这篇文章后，提出国家在农产品收购中贯彻等价交换政策的必要性，并以农产品收购中流入农村的购买力如何形成工业品的最大市场，以及它对工业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等进行了认真的探讨^①，实际上，这时他已注意到在工农产品的交换以至整个国民经济中遵循价值规律的重要性。《试论》是《体会》的进一步发展，作者自己也说：“写作《试论》的动机有二：第一是想把《体会》的主旨即价值规律的作用扩大到整个经济生活；第二，反对当时倡导的不久还见于实行的降低生产资料价格的另一种观点和措施。”《试论》所面对的是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当时被人们视作经典、不能更改的一些基本原理，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论》及其他著作中再三提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人交换将被废

^① 我在整理顾准遗稿时曾见到一份以《粮价问题初探》为题的内部研究报告，以后为治方同志索取去，不知现存何处。《学习毛主席十大关系报告的体会》则未见。

除，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不再存在，分配将利用劳动券；生产资料一旦为社会占有，商品生产将被消除，社会的生产品将直接用为再生产的生产手段与生活资料，不再是为交换而生产的商品；等等。既然货币、商品都已经废除、消失，价值范畴和价值规律自然也就没有继续存在的余地。《试论》为了论证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货币、商品不能废除，价值范畴、价值规律仍应继续存在并发挥其应有作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某些论点或结论不能不有所突破。这在当时斯大林的权威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问世不久的情况下，需要多么大的理论勇气。距离《试论》的发表，37年过去了。关于商品、价值规律的理论讨论，现在已经成为明日黄花，因为实际生活已经远远超越当时理论讨论的范围和程度。我在一篇文章中曾这样说过，“社会的生产活动只要继续进行下去，社会分工只要继续存在和得到发展，商品生产就不可能从经济活动中被排除出去，价值规律也不可能被停止活动。认为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生产出来的才是商品，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就不再是商品，这种观点和马克思自己对商品本质所作的科学分析是直接相悖的，因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只是改变了生产资料作为财产所有权的归属和生产是在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它并没有改变，也改变不了商品生产中劳动二重性和价值二重性的本质。”“苏东剧变之发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过，其中至为重要的一个因素是经济没有搞好，无视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地位和作用。”“市场经济，说到底，不过是一种承认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存在并使其能充分发挥作正常作用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和手段而已。决定社会性质的，是所有制，是剩余劳动的占有和分配，而不是别的”（拙文《从〈关于顾准的一件重要史实〉说起》，《经济研究》1993年第10期）。以劳动券代替货

币，列宁在苏维埃初期曾尝试过，失败了，认为这是“力不胜任”的，因此现在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再去找这个麻烦。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已经确立，但是，在前进的道路上仍会有新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和解决。

究竟什么原因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生产资料一旦为社会所有（公有制）、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以后，对商品、货币和采取如此坚决的排斥态度，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不仅常常容易被忽略，从理论或逻辑上也很难找到解释。顾准在《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以下简称《原始积累》）这篇文章中对此提出了他的理解。他认为：“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劳动者，被他自己的劳动所异化了——这是他（按指马克思）的根本哲学命题，是他的社会主义革命学说的出发点；是他坚决主张社会主义不再存在商品关系（这是他称之为拜物教的一种关系）和价值范畴的原因。”顾准说，“现在读《原始积累》章，看到他从‘农民土地的剥夺’开头，看到他把鸟一样的自由劳动者的存在作为资本主义兴起的唯一或几乎唯一的必要条件，在理解了他的学说的‘发源地的秘密’（这是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评论黑格尔的用语）之后，就不难理解了”。哲学的思考和科学的分析在这里产生了矛盾。如果不从马克思主义所产生的历史背景，不统盘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这个“发源地的秘密”是不容易找到的。理论界为之争论不休，政治家因此在实践中陷入误区的问题，本来是并不难解决的，然而最后，却仍然必须经过几十年的痛苦经历之后由实践来纠正，实在是得来不易的教训。

《原始积累》一文写于1973年6月。作者在文章的开头所说“感谢促进者”的这个促进者，是作者30年代的一个老朋友李少甫（已于1979年去世），文章是应他的要求写的。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试刊）曾刊登过此稿，（我手头现在还保

存一本)，但至1980年1月正式出版时，此文据说被一位权威人士下令抽掉。1981年，得到黄逸峰同志的支持，此文才得以在上海《社会科学》(1981年第5期)公开发表。

过去我读《共产党宣言》，因为缺乏必要的关于西方的历史知识，不可能不是望文生义，一知半解，生吞活剥，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十分可笑。我相信，和我类似的人不在少数。《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都曾提到市民阶级（近代资产阶级前身）和城市共和国，两者同近代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诞生和发展有着不可分割、极为密切的亲缘关系，可是身为东方的中国人对之却只能瞠目以对，不知所说为何物。作者指出，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城市共和国，起源于城邦国家，而城邦国家是希腊、罗马的传统，它的渊源远远超过中世纪，是西方传统的一个显著特点。中世纪欧洲的城市，是一个摆脱了封建主和王朝的封建义务的自治体，它同罗马传统的法权观念有关系。那么，中世纪欧洲的城市又是如何摆脱封建主和王朝的封建义务而成为自治体的？简单说来，是城市用钱向封建主赎买来的。你给钱（常常是封建主为了筹措军费需要巨额现款），我就给你（允许你实行自治的）一纸特许状（英国作家莫尔顿《人民的英国史》、法国瑟诺博斯著《法国史》中对此都有相关的叙述，可参阅）。（在中国，这实在是不可理解，也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在中国，朝廷兴军募饷之事很多，但是决不会有出卖特许状，由此建立一个‘独立王国’式的自治体的可能。”“考究其原因，中国历史上的法，是明君治天下的武器，法首先是和刑，而不是和权联在一起的。”他说：“我们中国人只知道秦始皇、李世民、朱元璋或者蒙古人、满洲人带兵打仗，击败旧皇朝和一切竞争对手，登上宝座；知道汉武帝打匈奴

奴，缺钱，有著名的‘杨可告缗’^①，征收财产税，对象主要是商人，结果是‘中人以上家率破’。哪里知道城市可以花钱买特许状，取得自治权利，登上政治舞台，成为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支持统一的基础！”他进一步指出：“罗马法权传统，国家是建立在公民权利基础之上的。个人权利，在理论上是受到法律保障的，国家不得随便加以侵犯。固然，这不过是纸面上的保障，然而纸面上的保障也是世世代代斗争结果的记录。可惜，在中国，在皇帝面前，宰相也可以廷杖，等而下之，什么‘权利’也谈不上，所以，马克思讥讽中国是普遍奴隶制。”西方和东方在法权观念和传统上的差异，直接影响东西方历史发展的差别。作者明确指出，“法权体系是上层建筑。并不是只有经济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能使什么样的经济结构生长出来或生长不出来。资本主义是从希腊罗马文明产生出来，印度、中国、波斯、阿拉伯、东正教文明都没有产生出来资本主义，这并不是偶然的。”他对我们中间有些人侈谈什么中国也可以从内部自然生长出资本主义，用简单的非历史的类推：既然欧洲中世纪产生城市，产生市民阶级即资产阶级，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规律对于中国就应该无条件适合，倘若不是意外的历史事变打断客观历史发展过程，中国社会自己也能生长出资本主义。顾准认为这是一种非历史的观点，必须批判。

他认为市民阶级是欧洲文明独特的产物；认为有了市民阶

① 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发布“缗钱令”，征收工商业财产税，遇到抗拒，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又发布“告缗令”，对隐匿财产不报，或报而不实者，没收其财产，并奖励告发，给告者以没收财产之半，由杨可主持并派使者至地贯彻。结果没收财产以亿计，中等以上的工商业者大批破产。

级，并不必然从中产生出资本主义来。为了论证后者这个命题，作者从西方历史中撷取了一些向资本主义进军中的“落伍者”为例证。其实，这些“落伍者”一点也不落后，在当时都是一些强大的商业城邦或商业共和国。其中如“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皮萨、佛罗伦萨，现代银行和国际汇兑制发源于此，近代物理学和实验科学滥觞于此，她们还是文艺复兴的故乡，为现代资本主义举行过奠基礼；又如汉堡（由不来梅和卢卑克等北欧商业城邦组成的汉撒同盟），12、13世纪后曾显赫一时；再如西班牙诸城市公社。西班牙首先发现新大陆，征服拉丁美洲，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那么，为什么市民阶级在转化成为资本家的路途上有这么多都倒下去了呢？作者认为，商业城市，唯有在合适的政治权力和强大的武装保护下才能长出资本主义来。不过，如果政治权力和军事力量只以城市为取得征服扩张的财源之所，而不保护她成长的话，那也是长不出资本主义来的。

关于近代资本主义为什么发源于英国？作者是这样回答的。

甲，那时的英国承受了历史积累起来的全部科学技术、合理经营知识，以及航海、商业、殖民的全部有利后果；

乙，英国本身的有利条件：（一）她组成了一个统一的王国，并以保护她的商业利益的扩张为基本国策，（二）这个统一的王国作了异常的殖民扩张，不过，她不是以建立一个罗马式的拿破仑式的大帝国为目标，而是古代希腊式的殖民地——对母国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殖民地。

丙，基本上采取富于商业冒险精神的贵族所组织的垄断公司（东印度公司、南海公司等）的形式。19世纪中期，穆勒在他的著作中，十分强调一切营业性事业都绝不宜由政府来办，它实际上反映了从17世纪以来英国的基本态度。我们中

国则恰恰相反，和从汉代盐铁由国家专营到清代食盐官卖，广州十三行是皇商的传统相比，两者的差别是如此明显。

丁，对战争采取的政策不同，其结果也不同。作者以拿破仑战争为例，法国失败了，英国胜利了。作者在这里说，英国的对手，采取王朝本位政策的，虽然所继承的历史遗产都相同，却无例外地抑制了发展，而在英国，每一次战争都是财神的胜利，最后是产业革命。

作者认为，在英国首先产生出资本主义来，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单独一个因素是不能达到这种结果的。由此推论，认为任何国家都必然会产生出资本主义来是荒唐的；特别在中国，这个自大的天朝，一直到庚子、辛丑才被敲醒过来，说会自发地产生出资本主义，作者认为这不过是梦呓。

在《原始积累》这篇文章里，作者还对资本主义定义，忍欲、节约和清教徒精神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和绝对贫困化问题进行了认真、深入的讨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作者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定义只集中在下面这一点上：“资产阶级是指占有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现代资本主义阶级”（《共产党宣言》恩格斯附注）感到不满足，因为这样的定义对于工场手工业、农业或是机器大工业都是适用的。作者认为，对照中国的状况，还得补充以下几点：“法权体系和意识形态所决定的、国家的商业本位的根本态度；欧洲古代，加上经过文艺复兴积累起来的科学技术；合理经营（包括复式簿记）的知识；宗教革命，尤其是 16 世纪英国宗教纠纷中对天主教的深刻憎恶所激起的崇尚节俭的清教徒的上帝选民的意识。”

作者认为，清教徒精神，确实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动力，“忍欲”和“节约”包涵不了，还要加上冒险精神、创业精神；“上帝的选民”的意识，就是要以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的那

种宗教精神。这几种精神互相结合，可以表述为崇尚个人才能，力主个人权利神圣的“极端个人主义”。作者在指出清教徒精神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以外，同时也指出了它残酷的一面，例如贩运黑奴、残害童工等，因此连基督教徒也谴责他们。

绝对贫困化的问题，理论界也曾热烈讨论过一番。作者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是极其明确的。他说：“（1）马克思本人，没有直接说过什么绝对贫困化；（2）马克思指出工人的工资被其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所决定，但是他所说的必要显然是弹性的，是水涨船高的。马克思本人，如果认为工人生活水平会从资本主义发轫之初的一般平民生活逐步下降到‘收租院’的水平，他还能是马克思吗？（3）马克思的贫困化理论，和他在哲学上坚持无产阶级是人从自己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异化出来的残缺不全的人的观点密切相关。从这个命题出发，资本主义不消灭，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和社会产品不回到社会化的人手里，这种异化不会结束。不管我们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总之，不了解他的这个理论，也就不会理解他的贫困化的理论。”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诞生了一个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亚洲产生了中国、朝鲜、越南，在欧洲，诞生了东欧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美国对朝鲜、越南，英法在对埃及的战争中虽然遭受了挫败，但是，资本主义看来还有顽强的生命力，一下子还望不到它的末日，原因何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这篇文章是作者针对我提出的问题所写的。文章首先回顾了历史，指明战后（这里指二次大战）20年帝国主义全面退却了，帝国主义变成了经济帝国主义；老殖民主义变成了新殖民主义；在与古代罗马帝国相比较的基础上，指出“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的真实涵义，其立论的基础是：“甲，帝国主

义本国，不复是基本的工农业生产国家，她只产奢侈品，正如罗马和意大利不再生产粮食，而只生产橄榄油、果品和畜牧产品一样。她靠剥削殖民地过活，正如罗马当时靠剥削行省（罗马的行省太守剥削行省是十分可怕的）过活一样。乙，帝国主义国内的无产阶级，将要堕落到罗马的 Proletariat 那样，免费供给、寄生、腐化。丙，文化上、科学技术上的没落，当然更是必然的。丁，当年，罗马产生过一批金融资本家，他们借款给到行省当太守和财务官的人，利息极高，但是偿还是有保证的。帝国主义国内财政资本的统治，又是和罗马的事例相类比的。”但是，实际生活表明，现代经济帝国主义并没有走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中所指出的那条路，而是走了另外一条不同于罗马帝国（也就是不同于《帝国主义论》）的道路。作者指出，19世纪下半期，英国确实曾迷恋于殖民主义，因而在德、美等国工业突飞猛进的时期，英国大大落后了。一直到本世纪50年代以后，她才懂得了这一点，并且迎头赶了上来。而且，由于工人运动的传统，使英国获得了福利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称号（因为她的国营经济已及于铁道、保险、煤矿、铁矿等部门）。其次，她们的科学技术并未衰落。再其次，丢掉殖民地，减少或者没有国防费用的负担，成了急剧发展经济的先决条件。

帝国主义没有走列宁指出的道路，资本主义也没有按马克思预言的那样发展。马克思预言过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其理由是“（一）资本主义的生命线是资本的增殖，但是，高利润必须低工资，低工资造成消费不足，造成恐慌；（二）而且，当资本有机构成愈来愈大，同量的剩余价值表现为愈来愈低的资本利润率，资本利润率有趋向于零的趋势，也就是资本主义有无疾而终的趋势；（三）从社会结构上说，资本愈趋于集中，愈来愈多的资本家将被剥夺，资本和私有制及其社会性质之间

的矛盾愈来愈显著，社会主义化，最后不过是一举手之劳”。这个预言，本世纪初愈来愈不合乎事实，于是有列宁的发展。列宁的发展未被证实，1929年的经济恐慌，又使人们回到马克思，所以有30年代（第三）“国际”总危机之说。现在事隔40年（按：指以作者写作此文年代计算），1929年那样的恐慌一直没有再现，而且似乎也不会再现，原因何在？

作者在引举沙赫特^①和凯恩斯两个怪人，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大公司、大政府、大工会以及多元主义哲学、学术自由和民主政治等因素以外，认为资本主义还有生命力的原因在于它不限制，相反还在发展批判。作者作了这样一个假设：1929年恐慌时期，如果那些坚持前凯恩斯经济学说的政党，下令禁止一切异端的思想，资本主义早就完蛋了。作者说：资本主义是一大堆罪恶的根源，可是这一大堆罪恶不断被揭发，不断受到注意，老是在作一些大大小小的改良，于是，它虽然“气息奄奄”了，却老是混下去了，有的时候还显得颇为活跃。这显然是批判在那里发挥了作用，使资本主义的生命能延续下去；但是，作者又同时指出，批判归根到底，资本主义要被批判送终。作者还作了这样的预言：“我看，资本主义不会通过暴力革命灭亡掉，这是因为它在批判——改良。但是，它会在批判——改良中一点一点灭亡掉。”

三篇经济论文，其中《试论》写于1957年，距今已37年，其他两篇均写于1973年，离开现在也已21年。不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或是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及其将来的命运，这些问题都同当前的实际生活和人类今后的命运有着如此密切和重大的关系；这些文章中提出的观点，

^① 沙赫特是希特勒的经济顾问，沙赫特的建议使希特勒得到经济复兴，凯恩斯则拯救了资本主义。

不论你同意或不同意，讨论它们，通过讨论甚至争论，使我们的认识、思想不停滞在某一点上而有所推进，总会有所裨益，这正是顾准所乐意看到的，虽然他现在已看不到了。

三

1969年4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曾以庄重的言词宣告：“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党的接班人以这样的形式确定下来并公开载入党章，史无前例。不幸的是两年以后，林彪没有等到接班，便自我爆炸，摔死在温都尔汗的一片荒漠之中，成了我党历史上极为难堪的一页。

翌年（1972年），像狂飚一样席卷中国大地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这时似乎因为出现了顿挫而相对地显得有点平静，这是一种难得的暂时的空隙。非常幸运，这一年的初冬，我以探亲的名义去北京探望年近九旬的老母亲，还意外地没有费多少周折晤见了音讯隔绝多年、生死不明、约有十年未见的五哥顾准。从此以后，开始了京沪两地没有间断过的通信，一直到他离开这个人世为止。收集在《顾准文集》（以下简称《文集》）中曾经以《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为书名出版的都是1973～1974为两年通信中写下的遗墨。

诸者不难发现，《文集》中的有关西方史、其中尤其是有关希腊史、希腊文明几乎占了大半的篇幅。1972年冬，我和顾准晤见之后，我曾向他提出想读一点历史的意愿，他劝我应当先读一点西方史。在我们的通信中，他曾不止一次地向我说过，不懂得西方历史，很难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

诞生在西方的土壤上，它离不开西方的历史背景和传统的影响（他曾慨叹《资本论》的某些译文，因为译者不懂得西方历史，译得不准确，还自己动手译了某些段落）；正像西方人如果不了解中国历史，不懂得孔、孟、老、墨、荀、韩等等就不可能懂得中国文明一样，有人曾严厉批评过言必称希腊罗马，其意当然是批评这些人只会背诵洋历史、洋教条。身为中国人，对中国的文化一知半解，当然是可悲的；不过，反过来，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对西方历史一窍不通，不了解由以产生马克思主义的西方的历史和传统，不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原义和它的精神实质，又怎么可能正确地运用于中国的实际。可悲的是，这个至为浅显的道理至今似乎仍不被重视，满足于一两本红宝书，仍然迷恋、鼓吹“半部论语治天下”这种陈腐的传统观念。

现代西方文明袭古代希腊文明的传统，这已为举世所公认。我不知道顾准立志研究古代希腊史起于何时，不过，我相信不会迟至 70 年代以后，因为没有相当的积累，1974 年是写不出《希腊城邦制度》这样的著作来的。我还可以肯定他的这种研究是服务于他自己立下的下述目的：(1) 为了彻底读懂马克思主义，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义；(2) 弄清楚西方文明的渊源；(3) 在全面比较中西文明的基础上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但是，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驱使他沉潜下来默默地去作这种研究和探索的呢？1972 年冬，我和他晤见时，他已是孑然一身。妻子汪璧早在四年前无可奈何地先他弃绝尘世；老母亲和孩子想见面不得；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得不到一点亲情的温暖，过着最清贫、孤独的生活。我历数他一生的经历，实在无法理解他究竟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罪过或错误，沦落到如此地步？我能够找到的理由只有一条：他只相信科学和真理，而不服膺任何权威；他是一个正直、诚实的人，从不隐瞒自己

的观点；他曾说过：‘我赞美革命风暴，问题在于娜拉走后怎样？’^① 在他心中念念不忘的是“娜拉走后”提出的这一大堆至今还未得到解决的问题；他是一个彻底的爱国主义者，他梦寐以求的是我们国家民族的腾飞和人民的富裕、幸福。他逝于 1974 年 12 月，1989 年及之后发生了东欧、苏联的巨变，他都不及见。但是他比我们所有的人都要早地敏锐地提出了“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正是由于困扰着人们当今最重要的，也是关系到人类未来命运的问题，使他置所有一切于不顾而去潜心研究、探索。他说过：“唯理主义者，尤其是革命家们，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唯有坚持‘理想’是唯物的，有根据的，同时又是绝对正确的（或者谦虚一点，是组成绝对真理的某个重要成份），他们才心有所安，他们唯有坚持真就是善，才能理论实践一致地勇往直前，这是一种道德哲学的原因，本来应该是肃然起敬的。”他接着说“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过来的，然而，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成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这里，请注意，他反对的是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而不是革命的理想本身。

吴敬琏和顾准相处，有十多年之久（1956～1974 年）。他对顾准在这一期间的了解比我更多更深，更为可信。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想，一个人只有有这样伟大的人格，只有有这样的对民族、对人民高度的责任感和为人类争取更美好的未来的使命感，才有可能在那十分险恶的政治环境和极其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孜孜不倦，勇敢地进行只有后代学人才能认识其价值，甚至完全有可能永远湮没无闻的历史探索。他的学术成就，也正是这种精神的产物。例如，他写作《希腊城邦制

① 《顾准文集》第 363 页。以下凡只注页码者，均引自《文集》

度》，就完全不是‘发思古之幽情’的结果，而是为了回答‘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早在干校的时候，为探索为什么播下了革命理想主义种子却得到了林彪‘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结果的问题，追溯文化史和法权史的根源，遇到了东西民族的历史殊途是怎样开端、怎样形成的问题。为了解答这些问题，顾准真是做到了王国维所说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那时，顾准曾反复和我讨论希腊城邦制度的起源问题。他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假说，又一个一个地推翻，最后才形成了一套可以自圆其说的解释。为此，顾准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在有限的书籍中摘取有用的材料，细心地把它们缀在一起，形成一个体系。回到北京以后，他拖着低烧咯血的病躯，废寝忘食，每天只带几个冷馒头去北京图书馆，查阅了大量书籍，闭馆以后，回到学部大院的集体宿舍再夜以继日地写作，终于写出了这部连西欧史专家也对它的科学价值赞叹不已的巨著。”李慎之说：“他（顾准）曾经是一个极其热忱、甚至狂热的理想主义者，但是 50 年代以后，个人的遭遇，国家的命运，不可能不使他要努力弄懂民主是怎么一回事。当他意识到民主起源于古希腊与罗马的城邦国家以后，就下定决心要用十年时间，先研究西方的历史，后研究中国的历史，进而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人类的未来进行探索。”“他为弄清楚希腊城邦制度，从地理到历史，从人种到字源……一点一滴地搜罗材料，排比材料，分析材料，打破了许多中国人仅仅凭中国自己的历史而对外国所作的想当然的了解，他终于弄清楚了只有希腊那样的地理、历史、文化条件才能产生在古代世界是孤例的民主制度。^①

《希腊城邦制度》1982 年出版后，曾引起学术界、尤其历

^① 《读书》，1995 年第 9 期。

史家的关注，评论的意见不尽一致，这是极其自然的。有的认为：“顾准同志的遗著《希腊城邦制度》是我国城邦史的开山之作，它以崭新的面貌和独到的见解为城邦史的研究增添了一朵奇葩。”“顾准同志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希腊城邦制度。他是我国第一个比较系统地观察了城邦制度对西欧中世纪乃至近代历史影响的学者。他指出：‘城邦制度的流风余韵，在罗马时代和欧洲中世纪时代，一直流传不衰，还对近代西方历史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影响……’在这里，他省略的内容由他先前写的另一份笔记（指《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一文，见《文集》310—330页）表达了。他认为资产阶级的前身市民阶级的渊源可以上溯到罗马和罗马以前，它是希腊文明的产物。欧洲资本主义的诞生地的自由城市的兴起，更和希腊—罗马的法权观念有关”。正因为城市具有特别的法权，所以它有特殊的政治地位，“资本主义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是一种法权体系，法权体系是上层建筑，并不是只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能使什么样的经济结构生长出来或生长不出来。资本主义是从希腊罗马文明产生出来”。这些论述读来使人耳目一新，但要得到公认还需进一步论证，这一任务顾准同志已无法完成了。”^①

另一种意见，在肯定《希腊城邦制度》由于选题的重要和涉及问题的深度，它仍可称为建国以来我国学者关于希腊政治、经济制度史的一部专著之余，认为“城邦绝非希腊所特有，而是古代欧洲、非洲、美洲曾经存在过的。在神州大地，它也存在过。”“按照我们的认识，城是人类社会最早自行瓦解的原始公社演化出来的一种公民集体的经济、政治、社会、宗教和意识形态的统一体。原始公社的普遍性决定了城邦的普遍

^① 修海涛：“百家异说一家之言”，《世界历史》1984年第3期。

性。”也许限于篇幅，作者未能列举史实予以证明。文章作者进一步指出：“马克思的一元史观的指导作用特别不容忽视。弄清楚各个民族历史发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更透彻、准确地说明各国有民族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①”研究的方法和目的，对每一个研究者来说，都有选择的充分自由，原是不应强求一致的，也只有经过充分的自由讨论，学术才能得到繁荣和发展。

希腊城邦和城邦制度，在古代世界历史中，是不同于古代各文明古国（埃及、巴比伦、波斯、印度、中国等）的特殊的仅见的例外，是孤例。但是它对后世的影响却十分巨大。也许我们可这样说，世界历史发展的两种不同道路和分野就是从希腊城邦和城邦制度开始的。因此，探索和理解希腊城邦和城邦制度的起源以及它的发展历史的轨迹，对于当代的我们和我们的后人具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应当是不言而喻的。

关于希腊城邦和城邦制度的起源和形成，顾准有一段十分简明的说明：“当希腊产生出她能够作系统而概括思考的知识分子来的时候，她是处在世界上一切文明民族的最独特的环境之中。”

“希腊文明，也是渊源于从中亚出发的大陆最古文明。这个文明首先繁荣在两河流域和埃及；希腊是经过克里特——迈锡尼文化，继承了这个传统的，希腊人原来是蛮族，他们来到希腊半岛和爱琴海诸岛屿，开始也是务农。然而那里土壤太贫瘠，而爱琴海和东地中海的曲折海岸和多岛而不广阔的海域，使他们很快进入到以通商、航海和手工业为生。很幸运，他们周围是一些丰饶的文明的王国和帝国（巴比伦、埃及）；远处，黑海和地中海两边有蛮族，但也是开化的蛮族（恺尔特人、斯

^① 廖学盛：《〈希腊城邦制度〉读后》，《世界历史》1984年第3期。

基泰人、柏柏尔人等)。既然有如此独特的地理条件，又以商业、航海和手工业为生，他们本民族无需从独立城邦建成统一民族帝国来抵御外敌，所以，甚至荷马时代的巴忽疏斯(部落王)也被民主制度(当然多半是贵族的寡头政治)所取代了。”

“这种环境，是埃及、两河流域、波斯、中国、印度所没有的，她们都是大陆国家，她们不能不以牲畜和农耕为主。他们的大陆而非海岛半岛的地理环境，使她们不能一开始就建成王国和帝国。(第241页)

希腊城邦制度在我们面前展示了一场我们东方的中国人从来没有见过的绚丽斑烂的图画：它的主权在民的直接民主制度，它的公民、公民权和公民意识，它的独特的与我国古代完全不同的官制、兵制，城邦对于维护自己国家主权独立的坚强意志，城邦的法治精神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一整套国际惯例和近现代国际法的萌芽，它的杰出政治家(梭伦、伯里克利斯)和灿烂的文化、艺术等等；顾准向我们介绍了城邦制度的许多特点之后，特别注意到了城邦的民主制度是不是就像许多历史家认为的那样，是从氏族民主直接演变过来的？

有些著名的史家虽然也承认历史上的希腊也存在过王，但他们认为，希腊的王不是东方那样“神授”的王，英雄传说中即使有神授王权的模糊的迹象，那也是纯粹出于诗人的想象，希腊的王原来是氏族民主制度中的民选军事领袖。

顾准指出，马克思本人也受了极大的时代限制，因为马克思生前，还根本不知道有克里特文明、迈锡尼文明和埃特鲁里亚文明，除迦太基而外，欧洲两个海上文明都是不知道的。现在翻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马克思关于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摘录，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他(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说的，确实代表马克思的意思)认为罗马、雅典都是以氏族方式‘在一起的土著’

直接形成的国家。换句话说，把历经沧桑，最后在海上文明的影响之下形成的、迥异于国家的城邦，和易洛魁人那样的国家的部族联盟等同起来，这真是天大的错误。要知道，从易洛魁人的部落联盟，到埃及、巴比伦那样从部族王基础上成长的国家之间，相隔多少历史阶段？而埃及、巴比伦那样的亚细亚国家和文明的城邦走的又不是一条路，在其间划上等号，真是误尽苍生？”

对于希腊城邦的民主制度是直接从氏族民主演变过来的这一论点，作者是深有怀疑的。他提出如下的问题：“一切民族都经历过原始公社阶段，氏族民主是原始公社的共同特征，我国当然也不例外，那么为什么我国古代史中找不到一点城邦影子呢？埃及、两河流域、以色列和叙利亚、印度、波斯等等的历史，我们发现在那里也同样找不到什么城邦制度的影子。”“共同之处是有的，它们都存在过神授王权，有一个身兼军事领袖和最高祭司，或者用我国史籍的语言来说，叫做‘国之大事，唯祀与戎’的最高统治者，即君主。他的权力是绝对的，人民是他的‘臣民’。这种王权起源于部落王。原始公社性质的部落的王，也许是氏族民主制度下的民选军事领袖。因为在遥远的古代，不可能见于史籍。……这种‘杀人盈野、杀人盈城’的征服业绩被渲染为神的业绩，在征服中建立起的王权也被渲染为神授的王权。王权所依靠的是军事力量。但唯有手执宝剑的王同时又是‘受命于天’的王，他才具有精神上的权威，王权才世袭得下去。王权是神授的，所以我国周代的王称为天王，他是‘天子’——‘天的儿子’。古代东方诸国有不同的宗教，王权神授所用的说法五花八门，各尽其妙，实质上是完全一致的。”（第83页）

作者列举史实证明：远古希腊一样存在过“神授王权”，城邦制度是“神授王权”在一种特殊环境下演变出来的东西，

它并不是直接从氏族民主递嬗过来的。

上世纪末开始的考古发掘，及其后长时期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辛勤研究，使得远古时代的希腊史的面貌彻底更新了。考古发掘把英雄传说中的特洛伊古城（即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叙述的以木马计取胜的那次战役故事的发生地）发掘出来了，把亚该亚人的“万民之王”亚加米农（特洛伊战役中一方的统帅）的都城迈锡尼发掘出来了，把传说中的克里特的克诺索斯王的宏伟的宫殿发掘出来了。这些地下发现的图版、壁画、以及许多文物，使人们无法相信，这些巴息疏斯（王）是氏族民主制度下的民选军事领袖，人们不能不肯定，他们和“东方专制主义”的诸王一样，是“受命于天”，统治剥削大批劳动人民的“王”。

史学界发现，希腊文明开始于克里特（位于地中海北侧、希腊半岛之南的一个岛屿），它从克里特传播到大陆希腊，其中心是迈锡尼（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东北部）。克里特文明一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3000 年，其极盛时期在公元前 1600 年。“公元前二千年，克里特已经有了如下的手工业者：武器匠、木匠、铁匠、皮革匠、制壶匠、青铜器匠、镂刻匠、象牙技师、画家、雕塑家等等。”^① 于此可见，公元前二千年的克里特已经达到何等的文明程度。

到公元前 14 世纪，克里特衰落了，迈锡尼兴盛起来了。14 世纪初期，迈锡尼的王宫和卫城改建得规模宏大，城市不仅是王宫所在地，而且成了政治经济中心，聚居着王廷的文武人员、工匠和奴隶。王宫建筑宽广，有好几层楼。用巨石建筑的城垣，狮子门和豪华的圆冢，都是那个时代的建筑物。”当时的迈锡尼“统治着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阿提卡（雅典）、

^① 塞尔格耶夫：《古希腊史》。

彼奥提亚、优卑亚岛、爱琴那岛，它扩大及于特萨利亚、爱奥尼亚诸岛屿、埃托利亚（中部希腊科林斯北侧）。克里特这时也许倒转来向锡尼纳贡了。（第 91 页）

公元前 12 世纪特洛伊战争之后，迈锡尼王朝急剧衰落了，多里安人（北方的希腊人，原在今希腊东北和保加利亚南部）的入侵，不仅使希腊大陆上相对统一的局面从此破坏。更重要的是大大推进了迈锡尼时代早已开始的海外殖民。“远古的灿烂的希腊文明中心东移了。而那里是希腊城邦制度的发源之地。”（第 100 页）有趣的是，城邦的发育和城邦制度的发展是在小亚细亚，然后又回到了希腊半岛本土，兜了一个圈子。”

小亚细亚诸殖民城邦，开始时似乎都有国王，这是因为在新地方建立新国家所能效法的楷模，还只能是他们所熟悉的旧制度，另一方面，也因为有些城邦开始时希腊人还居少数，要等到本土移民逐渐增加上来，和当地人民逐步同化的时候，这些城邦人才彻底“希腊化了”“但是一旦这些城邦希腊化了，王政就有名无实，实际上成了贵族阶级统治了。（第 117 页）

发生在希腊城邦的贵族政治和我国春秋时代的“世卿政治”有什么异同之处？作者作了对比之后说：春秋时代的“世卿政治”当然是贵族政治，但不是组成为一个阶级的贵族用“法治”来行使的政治统治，它是几个贵族世裔或贵族中杰出人物的“人治”；同时，“世卿政治”下。国君仍然保持着至尊的地位，至少理论上可以随时亲掌政权。这种“世卿政治”，在中国史上是以“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然后通过激烈的兼并和法家的政治改革成立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皇朝而最终结束了的。希腊的贵族政治性质与此不同，历史上说，它是王政和民主政治之间的过渡阶段。历史条件不同，发展的道路自然就不一样了。（第 122 页）

“公元前 7 世纪以前小亚细亚这个中心，不仅发展出来了新政制——城邦制度，发展出来了兴盛的海上贸易和城市手工业，也发展出来了新的文化。”产生了一大批著名的诗人、文艺家、哲学家、数学家、医学家。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学术上的创造发明总要有长期的积累，公元前 6 世纪以后，小亚细亚诸城邦思想家和学者辈出，正证明了前一个时期小亚细亚这个文明中心在历史上所起的伟大作用。“公元前 7 世纪起，希腊文明的中心，又从小亚细亚移回希腊本土了。古典时期希腊史上几次著名的历史事变，如希波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等中心都在希腊本土。发源于小亚细亚的新文化、新政制，开花结果却在希腊本土。小亚细亚城邦愈来愈退居次要地位了”。（第 125 页）

作者特别关注的其次一个问题，既然希腊同样存在过神授王权时期，那么她的城邦民主制度又是怎样从王政演变过来的呢？城邦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阶级关系剧烈变化，城邦建立之初所征服的本地居民，原来是依附民或农奴身份，在漫长的世代中，他们在语言风尚上希腊化了。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以及人力的缺乏，必定使他们上升到了自由民的地位。这些自由民，连同希腊本土来的新移民，构成城邦的非贵族的平民大众，他们是心怀不满的潜在的民主主义者，“在希腊本土，非贵族的平民大众，是僭主推翻贵族寡头政体所依靠的力量；他们以后也推翻僭主，建立了民主政体。（第 24 页）

从王政到民主政治，一般都经过贵族政治或僭主政体作为过渡。“希腊城邦的贵族政治，并不是杰出的一二个贵族的‘人治’，它是合议制的，它会发展出一套贵族这个阶级内部的民主惯例。从而必然逐步建立起一套规章制度，这就是法律和法典的渊源，总之，这是‘法治’”。（第 121 页）

“希腊诸邦的内外环境极不相同，各邦统治阶级对付新形

势所采取的政策也不同，有的成功，有的失败，各邦历史演变也就多种多样。在希腊本土，同属多里安人的国家，科林斯、麦加拉、西息温在新形势下大举移民海外，发展工商业，使得它们内部发生剧烈的政治变革，于是兴起僭主，推翻贵族，解放农奴；斯巴达则征服美塞尼亞，扩大了农奴数量，加强了对农奴的镇压，为此建立了公民中严格的军营生活，从此以后，长期内经济和艺术文化的发展，是和斯巴达无缘的。她的‘战士——公民’的特权公民的‘民主’制度，则九百年间保持不变。又如特萨利亞，她的四周是高山，贵族役使农奴耕牧于广漠平原之中，希腊世界的沸腾的经济生活与剧烈的政治变革对她影响微弱。”（第 154 页）这就是希腊诸邦在公元前 8 世纪到 6 世纪之间历史演变过程的多样化。

僭主，含有篡夺者或僭窃者的意思，是不合法的王，是事实上的专制君主，但是都不称王，而用一些“终身执政官”、“全权将军”等等以示谦逊的称号。“这种个人专制的政体，是一些个人野心家专利用贵族寡头政体面临新形势下的无能、纠集心怀不满的平民群众，组织个人卫队、毁弃当时的宪法或惯例，夺取政权而形成的，他们在夺取政权后，实行一些有利于平民的政策，然而政权则不向平民开放。就城邦制的一般演变规律来说，僭主的暴力推翻根深蒂固的贵族寡头政体，是走向‘主权在民’的一种过渡形态，也算还是必要的过渡形态。”

“僭主所取代的政权，大体上是贵族寡头政体所依赖的力量，是无法忍受经济上惨遭剥削和政治上绝对无权的农奴或平民。他们当政以后念念不忘的固然是一己的或家庭的私利，可是为此他们就必须采取牺牲贵族、有利平民的政策。因为如果平民政治上成熟了，他们就无需依靠僭主来贯彻他们的意志，他们可以自己起来革命，建立民主政体；或者，至少利用平民意志的贵族，已经不能建立僭主政体，只能在民主政体的框架

中获得一己的领导权了。正因为两个彼此敌对的阶级，一个已经统治不下去，一个还未成熟到可以统治，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胜负不决，行将两败俱伤，于是才出现凌驾于两个阶级之上的僭主专制政体，用强力来把社会维持下去。公元前7至6世纪的普遍状况是，继僭主政体以后，出现了普遍的民主政治时代，僭主政体所起的，正从贵族寡头专政到民主政治的过渡作用。（第187～188）作者在这里强调指出，僭主政治这种历史现象只发生在希腊，是希腊城邦特殊条件下的产物。

僭主既然是采取不正当的手段以篡夺、窃取政权，当然要讲究一些“僭术”，两千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有几则论“僭术”的，颇有深意，不妨录之如下：

“相传……僭主司拉绪布卢（米利都）曾遣人问计于另一邦（科林斯）的僭主伯利安德。伯利安德正站在黍田之间，对使者默然不作答，而以手杖击落高而且大的黍穗，直到黍穗四顾齐平而止。使者不懂他的用意，就这样去回报主人，司拉绪布听到了，知道伯利安德是在劝他芟刈邦内特出的人。”^①

“（僭主）还须禁止会餐、结党、教育以及性质相类似的其他事情——这也就是说凡是一些足以使民众产生互信和足以培养人们志气的活动，全都应加预防。此此，僭主也须禁止文化研究及类似目的的各种公社。总之，他应该用种种手段使每一个人和其他的人好象陌生人一样。……僭主还要使住在城内的人民时常集合于公共场所，时常集合在他的宫门之前。

这样僭主既可以借以窥察人民的言行，也可由此使大家习惯于奴颜婢膝的风尚。^②

“僭主的习惯就是永不录用具有自尊心和独立自由意志的

①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55页。

②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292页。

人们，在他看来，这些品质专属于主上，如果他人也自恃其尊严而独立行事，这就触犯了他的尊严和自由；因此僭主都厌恶这些妨碍他的权威的人们，僭主还有宁愿以外邦人为伴侣而不愿交接本国公民的习性。他们感到外邦人对他们毫无敌意，而公民都抱有对抗的情绪。①

“返观我国古代的历史，对照起来，不仅‘战国时代’三分晋国的韩、赵、魏是僭主，取代姜齐的田成子是僭主，崛起草莽的刘邦也是僭主，然而两千多年来的我国历史虽有直书弑君的传统，虽有正统与非正统之争，却从来没有僭主这个概念。一切开国皇帝，无论是在农民暴动中崛起的刘邦、朱元璋，无论是欺凌孤儿寡妇的赵匡胤，无论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终于达成‘我其为周文王乎’的曹操，都是‘奉天承运’的天子。其实，往上追溯，被孔丘捧到天上的文武周公的道统，从殷商‘传统’的观念来看，又何尝不是僭主？”（第184—185页）

希腊的僭主既然夺得了政权，为什么不象我国和东方国家，进一步称王或称帝，却向另一个方向发展，成为转化为民主政治的过渡形式？作者为我们作了分析：“城邦太小，不像领土国家那样，可以在王国中央建成一个住居着王室及朝廷以及为王室及其朝廷服务的形形色色人员的王都，这样一个王都，唯有广大领土的国家才供养得起。同样，也唯有有这样一个王都，王权才能用辉煌的宫殿、神庙、仪仗、御林军装饰起来；又唯有这些装饰，‘奉天承运’的谎言才能发生效力。蕞尔小邦的希腊城邦，僭主周围虽然围绕着一批雇佣卫队、顾问和战友，但规模究竟有限。而他们兴起的时候，又值希腊古代王权传统已被航海、贸易、神人同形的宗教，人文主义的文艺

①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294～295页

所摧毁。贵族阶级亦即知识阶级充满着一种‘玩世不恭’的不信神的精神的时候，要把他们属于他们侪辈的，只因为手段高明，获得了政权的僭主尊为神佑的王是绝对办不到的，于是这些事实上的专制君主，只能是僭夺者和篡窃者的僭主了。”（第 185 页）

为了把僭主政治这一仅仅发生在古代希腊史上的特殊的历史现象和它的历史作用比较彻底地弄清楚，顾准确实作了一些穷究的功夫。1973 年 6 月，他专门从英国历史学家格罗脱的著作《希腊史》（共 12 卷）中选择了其中的一章《希腊的僭主政治》（收入《文集》时篇名为《僭主政治与民主》），并为之写了跋，寄给了我，使我和《文集》的读者确实受惠不少。

公元前 7 至 6 世纪的 200 多年间，正好是我们的春秋时代。在这期间，希腊史则是以贵族向寡头和僭主政治为中介，从王政时代过渡到希波战争后雅典民主的全盛时代。在我国，恰好在同一时期，则是从“礼乐征伐”所出的天王，加上宗法封建的西周制度，过渡到七雄并立，法家兴起，以至秦汉统一这么一个过渡时代，我们向专制主义变，希腊向民主主义变，希腊以外的整个世界（也许要把罗马、拉丁世界、迦太基、日耳曼蛮族除外）与中国几乎事同一律；2000 多年来世界历史发展的这种基调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因此，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认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两条不同的道路从这时就开始了。

希腊城邦制度的全部优点和弱点，在希波战争（公元前 6 世纪）中充分显露出来了。作者以其冷峻而饱含感情的语言作了如下分析：“希腊文明本身也渊源于这些古老的东方文明，因为它从头到尾是海上文明，一连串历史事变又促使它发展起来了一种自治自给的城邦制度，这种城邦制度在可称为偶然的历史条件下——小亚细亚内陆在赫梯（王国）崩溃后长时期内没有出现强大的王国——居然获得了充分发展所必要的几百年

时间和空间，它不仅在海外巩固了，希腊本土也城邦化了。自治自给的，个人创造能力有充分发展余地的城邦制度，在这几个世纪中，在经济、军事、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充分吸收了东方古文明的遗产，加以消化，加以改造，并以跃进的速度加以提高。公元前 6 世纪波斯被征服以前，事实上希腊文明已经高于‘东方’文明。然而自治自给的城邦制度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的个人主义和城邦本位主义，使它在强大的外敌侵犯面前显得一盘散沙，使它宁愿各别屈从于大帝国成为它的藩属，无法团结起来外御强敌，并在对外战争中谋求民族统一。其结果，藩属帝国的那些城邦，还势必要派兵出战，在帝国的旗帜下，向本民族的其他城邦战斗，有的城邦的僭主还成为王国的驸马。波斯兴起后，只有避难移民，却没有团结抗战的打算”（第 200—201 页）。但是，希腊城邦终于觉醒了。在以雅典、斯巴达为核心的团结奋战下，强大的波斯入侵结果终于以彻底失败告终。

作者继续写道：“这次战争的结果，充分证明了创造和发展的希腊文明优于停滞不前的东方文明，也证明了城邦制度固然会在各城邦之间造成不团结，然而城邦内部民主制度，不仅在和平生活中发展了各个人的创造能力，在危急存亡关头也把千万人民团结成一个人，对敌人作坚决的斗争，一旦外敌侵犯使这些城邦结集起来成为坚定的抗敌同盟，就完全可以战胜在专制主义经济驱迫下的，貌似强大，实际上是离心离德的帝国军队。希波战争胜利以后，创造的而不是墨守成规的希腊文明从此跃进得更快，‘古典时期’的希腊，是人类文明极其光辉灿烂的阶段，对后来历史的积极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然而城邦希腊没有在希波战争中克服它制度上固有的致命弱点，这种弱点，在此后 105 年的历史演变中，最后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城邦希腊的消亡……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作者写到这里，来信告诉我，他“卡壳”了。在他写给我的一份笔记中还可以找到这样的痕迹：“你还记得，两个月前，我跟你说过我的‘迷惑’。我写《希腊城邦制度》，本来是有感于在希腊那种小邦林立，相互竞争中，个人创造性发挥到了顶点，创造出灿烂的希腊文明，其中关于哲学、科学、文学的，至今我们还深受其惠。所以要写，是想歌颂它。可是写着写着，对于林立小邦之间的自相残杀，甚至不惜勾引希腊文明历来的大敌波斯，而且这个波斯帝国，此时已经奄奄一息，而希腊则纵然在自相残杀，还是方兴未艾——对这种不顾大体实在受不了，不知道该歌颂不，有点迷惘起来了。”（第 207 页）那么，迷惘和卡壳后来又是怎样解决的呢？作者同一篇笔记中说：“在早期文明历史中，文明的创造和繁荣大都起于林立小邦的局面下的某些邦之中。然而要使这些珍贵的人类精神财产大规模地传播开去，军事征服，以及军事领袖的独裁政制——亦即君主政制是不可缺少的。”“作了这样考虑之后，我对小邦林立的迷信是批判掉了，然而我还是厌恶大一统的迷信，至于把独裁看作福音，我更嗤之以鼻。”（第 209 页）

城邦的根本精神是自治自给，是完全的主权和完全的独立，充分体现“主权在民”和“轮番为治”的特色。作者对这种直接民主制无疑是十分倾心和赞佩的，但他也一再提醒我们，这种直接民主制只有在小国寡民的条件下才有可能。他认为，在区域辽阔的国家里，若利用“直接民主”的口号，挂苏维埃式的、代表大会式的、一党制的民主的招牌，来掩盖“时代的智慧、荣誉和良心”对全国人民实行领导的国家，说干脆点，独裁国家，别的结果是不可能有的。

这里，应当提到斯巴达了。斯巴达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城邦，它在古希腊史中是一个变例。斯巴达位于希腊半岛南部，

在征服其临近地区美塞尼西以后，被征服的人民一直处于称为黑劳士的农奴地位。为了防止“叛乱”，保持征服所建立的秩序，黑劳士永远处于严厉的监视之下。斯巴达的男人从小就处于严峻的军营生活之中。一切艺术文化会松弛这种恒久的警惕和严峻的军营生活，于是斯巴达人从此就不要艺术文化了。斯巴达还有一个奇特的规矩，新生婴儿要送给长者，经过检查，若认为不适宜让他生存，就抛到泰革托斯山峡的弃婴场。强健的可能成长为良好战士的婴儿才允许养育成人。青年人终年不穿鞋，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团队里，从事锻炼、运动和学习语文。少年人和青年人都必须奉命去作苦工，并且必须绝无抗拒之意，绝无怨言地去完成。成年公民每人领受一分份地，由黑劳士耕种，交纳实物贡献。公民不得从事生产劳动，他们必须参加公餐，不论贫富都吃一样的东西，每人交纳定量产物给公共食堂供公餐之用。全部公民都是战士，平时都生活在按军事编制的集体里，军事操练一直不断。他们还相应地建立起来一套集体主义的，不怕个人牺牲，惟军事荣誉重于生命的精神进行训练的制度，希波战争中防守温泉关的斯巴达王李奥尼达部下300名战士全部战死。其中有两个因患病得李奥尼达允许离队，一人闻警返队战死，一个生还本国，受到全民蔑视，以后在普拉提亚战役中奋勇作战，才洗雪了污名。

斯巴达的全权公民最多的时候不过一万人，到公元前5世纪时，不到六千人。边区居民从军组成辅助部队。黑劳士也要从军，任军中杂役。斯巴达的重装步兵，是整个希腊世界最精锐的军事力量。

雅典和斯巴达始终是希腊的两个中心。希波战争就是以雅典和斯巴达为核心，团结整个希腊各城邦共同奋斗，才战胜强大的波斯帝国的。雅典民主引起了世世代代民主主义者的仰慕，同样，斯巴达精神也是后人仰慕的对象。它的尚武精神，

它的平等公社，它们看来是“共产主义”的平等主义的生活方式，都使得她在古典希腊时代的政治生活中起重要的以至支配的作用。

作者曾慨叹过：“1918年李卜克内西在柏林建立的坚决的共产主义团体称为“斯巴达团”，我对这位崇高的人是尊敬的，可惜他不理解马克思。”（第258页）对于斯巴达体系，作者自己承认“怀有复杂矛盾的感情。”他说：“平等主义，斗争精神，民主集体主义，我亲身经历过这样的生活，我深深体会，这是艰难环境下打倒压迫者的革命运动所不可缺少的。但是，斯巴达本身的历史表明，僭寡头政体，严酷纪律长期维持的这种平等主义、尚武精神和集体主义，其结果必然是形式主义和伪善，是堂皇的外观和腐败的内容，是金玉其外而败絮其中；相反，还因为它必定需要砍掉长得过高的谷穗，必定要使一片田地的谷子长得一般齐——它又不精心选种，不断向上，却相反要高的向低的看齐——所以，斯巴达除掉历史的声名而外，它自己在文化和学术上什么也没有留下，甚至歌颂它伟大的著作，还要雅典人来写。”（第256—257页）这样的评价，应当说并非完全出自感情。

对于斯巴达的农奴制和雅典奴隶制并存的问题，作者原来的计划是打算专门有所论述的（见《希腊城邦制度》后记，见《文集》第221页），以后病魔夺走了他的生命，没有来得及写出来。因通信中我向他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学术界曾经引起迷惑和争论、至今还没有定论的问题，他在以信函形式回答我的问题时附带地论述到了雅典古典奴隶制和斯巴达黑劳士的问题（见《文集》第287页～292页。篇名《统一的专制帝国·奴隶制·亚细亚生产方式及战争》是后来加的）。在《希腊城邦制度》中，作者已提出过，希腊奴隶起源于买来的奴隶（战俘，从蛮族那里贩买来的奴隶），并非起源于社会内部的债务

奴役。这里，作者明确指明，大规模的奴隶制，开始于公元前5世纪希波战争中雅典取得胜利后，战争中获得的大量战俘，转化为奴隶；而一旦奴隶成为物质生产的重要劳动力，就要搜罗奴隶。作者认为，奴隶要占优势成为制度，这唯有在商品货币关系十分发达的工商业城邦中才有可能。其条件是：具有可以拥有奴隶的自由民（相对于没有这样大的个人权利的王朝臣民）；商品货币关系发达，使财富有无限积累的可能，使自由民有把财富投资于奴隶这种‘生产性固定资本’上的要求。没有这些要求只会有鸳鸯、袭人这种奴隶，奴隶成不了制度。普遍的劳动者，是乌进孝管下的，比鸳鸯、袭人生活困苦无数倍的赋役农民。十分特别的，雅典市的警察和档案管理员也由奴隶充当，他们是国家奴隶，也是买来的，由国家供给饭食，可以自由择居，这算是最高级的待遇。其他充当家庭仆人和手工作坊帮工的奴隶，因为人数少，主人对他们接近的机会多，容易产生感情，大体上还能获得比较过得去的待遇。待遇最残酷的是矿工。主人可以释放奴隶（即解除其奴籍），也可以由奴隶把按惯例属于自己合法收入的钱款存储起来，积成整数向主人赎身。被释放奴隶取得外邦人的身份，如果他死后无嗣，遗产归主人家继承。

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作者向我指出，埃及、巴比伦等所谓“东方”，没有希腊、罗马的奴隶制。这一点马克思是知道的，所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在古典的即奴隶制的（注意，马克思用古典一词，指历史的古典时代，即希腊盛期和罗马时代，包括奴隶制和奴隶制还未发展起来的“公民城邦”时代）、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之外一定要加上一个亚细亚的。“马克思的‘亚细亚’或‘东方’，指的是大陆务农的领土王国或帝国。那些领土王国或帝国，王朝的威力所寄，在于农民的贡献和‘徭役——兵役’，这和滨海的工商业城邦，国家的威力

所寄是海上贸易的海军是不一样的。这些国家的最大要求是‘教民耕战’，耕战的民绝对从属于王朝。你说他是奴隶吗？有功可以授爵。你说他是自由民吗？他又绝不如希腊罗马的公民那样，凡执干戈以卫社稷的就有参政的权利。他没有‘政权’，只是有战功可以授爵，对他所耕种的土地没有绝对的所有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他的一切财产，王朝随时可以征发。他的产品，甚至不能自由出售。在这种情形下，拿合乎西方的‘自由民’和‘奴隶’的范畴来对待这种‘赋役农民’，是格格不入的。”（第290~291页）

自由民和奴隶的范畴，不见于波斯、埃及、巴比伦、中国。《旧约》上也没有见过这类名词。这个名词的起源显然是希腊，是城邦制度中的概念。黑格尔把东方的制度称作普遍奴隶制，即王或帝一个人是自由的，其他，连大臣也不自由——
~~比如，埃及国王就随军作战，但王后和大臣们都是奴隶。~~

的解体。原来，罗马从一个城邦共和国变为罗马帝国以后，不仅罗马城邦和意大利这个老根据地，而且整个罗马帝国广大领土，都遭到了精神解体的危机，基督教正好提供了当时迫切要求的福音。

罗马没有哲学，如果说有，无非是征服的哲学。罗马把那时可以征服的世界，全部征服了。罗马皇帝安敦倾向于不动心的希腊斯多葛哲学。不久以后，罗马陷入地方军阀争夺皇位的残酷战争之中，显贵们的未来也朝不保夕，至于原来勇敢守法的罗马公民，早已经过 Proletariat（最下等级）这一段经历，完全消灭掉了。凡不是奴隶主的，不论是罗马原来公民的后裔，还是被征服的民族，还是奴隶的后代，都呻吟在罗马的无个性的、无民族性、无创造性的、昏天黑地的世界主义统治之下。没有未来，没有理想。现世的事情，有人看来，因为已经极度圆满而无复可为；有人看来，因为极度绝望而无复可为，大家把精神寄托到宗教上去是唯一的出路。这个世界，证明了原罪教义是天经地义的，皈依用他的血救赎我们原罪的主耶稣吧。新宗教就这样不胫而走了。

高度文明的希腊人的精神危机更甚于罗马人，危机来得比罗马人早。基督教的传布于罗马帝国各地，就是首先在希腊语人民中传布的（《新约》的最初文本是希腊文本）。其实，还可以进一步指出，新宗教在很大程度上是没落的希腊人的宗教，它是犹太教的圣史和希腊思想的混合品。

新宗教的教义，因为是希腊思想使之精致化了的，所以它才能在那时候的西方文明世界不胫而走，这是十分明显的事。

新宗教是希腊思想的宗教化，这是西方学者公认的（参见《文集》第 239~241 页）。

蛮族覆亡罗马帝国，是在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之后。

蛮族征服了罗马帝国，基督教征服了蛮族。

“教会是黑暗时期的罗马典章、罗马法制、希腊思想的保藏库。”（第 249 页）“欧洲的蛮族征服，不像在中国，由古老的文明同化了蛮族，以致蛮族文明后来竟然全部消灭。欧洲蛮族征服之后，后来没有由“罗马人”光复过，蛮族文明以骑士文明的形态，发展成为和教士文明并行的一种文明。教士文明还是罗马传统。但是两种并行的文明并不是各不相干的，它们在互相渗透。文艺复兴，终于扫掉了古老文明的壳子，古老文明渗透到世俗文明中去，压倒了宗教文化，进一步发展成了近代欧洲的文明——这是一种注定要传布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中去的进步文明。”（第 249 面）

中世纪的西方基督教会，做过许多坏事，它掠夺地产，剥削农奴；它制造战争阴谋，多次造成流血的大屠杀；它提倡迷信，搞圣者遗骨的崇拜，搞异教裁判所，多少创造性的科学和科学家被扼死了，残杀了；它穷奢极欲，出卖赎罪符，多少庄严的主教宫殿成为最荒唐的寻欢作乐之所。然而，它也做了一些好事，最重要的是它是黑暗的中世纪的唯一的教育事业的组织者、保护者；它是唯一的学术研究中心。（《文集》249 页）

“中世纪的基督教会，又是世俗政治权威以外的另一个政治权威。说它是政治权威，一部分是直接符合于事实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力量，它有时候和帝国争夺欧洲的政治最高权力；当没有一个欧洲范围的帝国的时候，它本身事实上就是欧洲的最高政治权威，所以教廷能发动和组织十字军——虽然它的权威更多的是在精神和文化方面。”（第 250 页）

“两种政治权威同时并存，对于欧洲政治之不能流为绝对专制主义，对于维护一定程度的学术自由，对于议会制度的逐渐发达，甚至对于革命运动中敢于砍掉国王的头，都是有影响的。因为两头政治下最底层的人也许确实捞不到什么好处，体面人物却可以靠这抵挡那，可以钻空子，不致于像中国那样

‘获罪于君，无所逃也’，只好延颈就戮。”（第 250～251 页）

“基督教并不教导人们超脱一切，它不是出世的，它要求人们参与人世间的活动，要求人们为善。它宣扬爱，强调‘爱你的邻人’。它还提倡并实行消费共产主义，凡‘信主’的，要把一切财产捐献给教会。它还‘允许人们犯错误’，错误了只要忏悔，就可救赎。不仅如此，它还宣扬人生来就带来一份原罪，主耶稣用他的血救赎了人们的原罪。人们要信仰主耶稣的道，这是得救的唯一办法，信道的人是上帝的选民，上帝的选民解放了自己，还有责任解放全人类。”（第 247 页）

宗教是一种文化、社会现象。宗教至今还在人类社会中发生着巨大的影响。看来，在相当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宗教还不会从人类生活中消失。认识基督教产生的历史背景，它的思想渊源，它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作用等等，对于我们，应当是有积极意义的。

顾准有一个奇特的异乎寻常的观点，他认为西方史是外来的海上文明，而不是当地土著的文明。希腊文明源于克里特文明，这是埃及文明跨海过去的，经过一再的海上迁移，形成了海上文明的希腊文明。

罗马，“它和希腊、迦太基一样是外来的海上文明，而不是土著的文明。罗马与拉丁，是当地土著同化于海上文明较早，形成的一种混合文明，它兼备两者之长，成了征服整个地中海世界的中心力量。西方史整个说来，是外来的海上文明作为‘模子’，强迫同化当地的土著（伊卑利亚、凯尔特——高卢、维兰诺瓦等等）而形成的。”（第 282 页）

“迦太基是从西顿·推罗（今黎巴嫩境内）向西殖民形成的。另一支较早绝灭的海上文明是埃特鲁利亚（Etruria，约在公元前 1100 年），它是从小亚细亚吕底亚西迁到意大利半岛北部形成的。罗马，极可能是土著的拉丁人，在强烈的埃特鲁利亚

这一海上文明的影响下或领导下，按照海上文明的样子建起城来，形成一个城邦，这样开始她的历史的，但是，后来罗马人赶走并征服了埃特鲁利亚人。”（第 282 页）

顾准认为，所谓海上文明，是指从某一地方的土著飘洋过海到一个新地方所形成。这种移民，不同于游牧民族的陆上迁移，而是经过一段并非与人斗争而是与自然斗争的历程；一般说来，陆上迁移，举家连同全部财产可以全部装载在一辆牛车上缓慢地往前移动，海上迁移，风险大，有血缘关系的老弱不宜同行，同舟者往往是抱有同一目的而并非有血缘关系的青壮年；到达一个陌生的海岸，周围的一切都不知道，移民要在那生存，必须筑城而居，逐步扩大它的活动与征服领域，希腊城邦就是这么起源的。反之，非海上文明的文明，则是部族胞族形成集团，出现部族王，各部族王之间相互征伐、兼并、逐步扩大成为大王国或大帝国。

筑城聚居的海上移民的城邦，一般是城邦，不是领土国家。政制，一开始几乎无例外地是贵族政制，亦即元老院掌权，地位平等的公民组成公民大会参与政事。

“部族王经过征战形成的王国，一般是专制主义政制——不仅中国、波斯、埃及、巴比伦、印度，直到古代史上所发现的任何这样的国家，包括西欧的高卢、塔尔苏斯、日耳曼等全部如此。所不同的是，部族王凡兴起不久的专制色彩较少，王与‘战友’之间的关系还比较平等；部族王国历史愈久，王权的尊严愈往上提，专制主义的色彩愈浓厚。”（第 283~284 页）

指出海上文明与大陆文明形成和发育成长的不同的历史条件，对于理解人类社会在其漫长的发展历史中何以会存在如此

有政治上的绝对权威是不成的。范文澜强调中国文化传统是“史官文化”是一点也不错的。所谓“史官文化”是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权威，绝对不得超过政治权威的这种文化。”（第 244 页）

“孔子是第一个在野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在他以前，识字和文化知识，是‘史官’所垄断的。他们所负责管理的文化资料，无不与政治权威有关。孔子自命为继承文武周公的道统，所强调的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目的是要使‘衰世’恢复成康之治，所谓‘我其为东周乎’。这种文化对象的几乎是唯一的对象，是关于当世的政治权威问题。在我国战国时代，就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百家争鸣”，热闹过一阵，但为时甚短；即使在当时，学术界的祭酒荀况大声疾呼，不准进行学术的辩论，认为这样的辩论无裨于治，是奸人的奸辩，应予禁绝。”（第 243 页）

顾准引用龚自珍《乙丙之际著议第六》中的一段文字，认为它对史官文化作了极好的解释。

“有天下，更正朔，与天下相见，谓之王。佐王者，谓之宰。天下不可以口耳喻也，载之文字，谓之法，即谓之书，谓之礼，其事谓之史。职以其法载之文字而宣之士民者，谓之太史，谓之卿大夫。天下听从其言语，称为本朝、奉租税焉者，谓之民。民之识立法之意者，谓之士。士能推阐本朝之法意相诫语者，谓之师儒。王之子孙大宗继为王者，谓之后王。后王之世听言语奉租税者，谓之后民。王、若宰、若大夫、若民相与以有成者，谓之治，谓之道。若士、若师儒，法则先王、先冢宰之书以相讲究者，谓之学。”（第 352 页）

这段文字把史官文化的实质描绘得再精当不过了。作者不无嘲弄地接着说：“君天也，天不可逃也”，中国知识分子就是生活在“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这种史官文化的传统之中。

除了伦常礼教，没有学问，专心知识，探究宇宙秘密不是出路，要逃避王权，只好走老庄禅佛一路。在西方，政治权威不是至上的权威（在王权以外还有一个并行的教权），思想家出在“和尚”中的不少，不过那种和尚是研究科学，写哲学著作的和尚。绵延承袭了二千多年史官文化传统，其影响自然不可能在旦夕之间打扫干净。明了这一点，对于应当如何正确对待当今的诸多文化现象，当是大有裨益的。

在中国历史上，究竟有没有存在过奴隶社会这样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封建社会起于何时？郭沫若曾把我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界线定在实行“初税亩”时，此说曾得到毛泽东的首肯，但学术界对此说仍有不同看法。不过，习惯上仍把秦汉大一统以来称作封建社会，其实，秦汉以郡县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完整的说法似乎应当是中央集权、绝对君权和专制主义三位一体的结合。在这里，绝对君权是核心，所谓君要臣死，不得不死，君权是绝对的权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提到王荫茂（清道光年间的户部侍郎）关于货币的奏疏被皇帝驳斥的时候，曾讥讽地说过：“不知道他是否因此挨了屁股？”在西方人崇尚个人尊严的眼里看来，这是不能容忍的，表现了对中国专制主义憎恶的感情。它与西欧的封建制，有着极为明显的差别。

在西方，封建关系并不限于“授土”和“效忠”两者。这种权利和义务，成为关系两方面都必须信守的契约，并不仅仅受封者对授封者负有义务，在王侯作超额索取时，受封者可以反抗。倘若授封者对下面的权利是绝对的，那就是绝对君权，就是专制主义，就不是封建制了。这就是英国大宪章的来历，也是英法等国议会的实际起源。

其之所以如此，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因素：（1）罗马法的契约——有关权利义务的传统影响；（2）和世俗权威并行的，还有

一个宗教权威。即使是强大的王侯，要像我国春秋时代那样兼并，吃掉对方，会受到强有力的反抗，因为在它后面还有一个宗教权威，这是他受不了的。

欧洲中世纪，为了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的民族国家，反对封建诸侯的分散主义，虽不得不和城市（市民阶级——亦即近代资产阶级前身）结成同盟，还不得不打倒宗教权威的偶像，进行宗教改革；这种情况——不同于我国历史的比较复杂曲折的历史过程，确实不易为中国人所理解。而这个过程，恰恰是进入近代议会民主的开端。

《文集》中关于骑士的文明的篇章，是作者专门为了答复我的提问而写的。作者很谦逊，特地声明“对此没有认真摸过，得到的骑士文明的概念，大部分来自零星的外文文学资料，这样要缀成一篇笔记是不可能的，不过，既然提到，就来胡诌一通吧。”（第293页）

作者告诉我们，骑士文明的民族渊源是日耳曼人。“在森林中的日耳曼人，是质朴、勇敢、贞洁的，是西方一夫一妻制，女子可以当继承人的传统的保持者，并一直流传到现在。（第293页）

日耳曼人征服罗马以后，其中唯一的一支法兰克人，建立了法兰克王朝。他们没有建立充分发展的官僚机关，因而不得不把政权分散下去，封建割据也就成为不可避免。5世纪前后，欧洲还有另一支日耳曼人，到后来建立的挪威、丹麦、瑞典等国，他们的大胆、勇敢、尚武、爱好航海冒险，不亚于骑在马上的征服者，历史上曾经征服过英格兰，法国的诺曼第，地中海的西西里。

政权分散化，其最底下的一层，拥有一块最小的封邑，它的主人是骑士或“从男爵”。封邑也就是庄园，其中有身份上依附于封建主的农奴。在这种世俗政权的结构旁边，是高度集

中的教会，它完全超越了当时王国的界限，是西方世界的民办性组织。主教直接受教会指挥，教皇由红衣主教选举产生。世俗政权不仅是分散的，也是粗陋不文的。文化都在教会掌握之下，骑士是战争中的主角，每一个骑士都带一个扈从，人自为战。骑士军的存在，不过两三个世纪。骑士精神比骑士军活得更长久。

骑士精神非常重视忠诚（忠于誓约不是忠于某个人）、守约（重然诺）、荣誉感（个人尊严）、一夫一妻制，对妇女的尊重、保护以及骑士式的恋爱。不要忘记，现在在公开场合，使用的礼仪性语言中把女士们放在先生们的前面，还是这种骑士风度的余韵。

关于民主问题的一组文章，共四篇，都是在通信中写下的，并非另外专门撰写的文章，编成文集时，才加上篇名。时间集中在1973年3、4月两个月中（只有其中一篇未标明时间，现在回忆，不会早于或迟于1973年3月），可见当时我们一开始通信，最关心的话题是民主问题，讨论也最热烈。我记得在讨论中，我曾提出过不同意的、反对的、甚至反驳的意见，这在《文集》有关的文章中还可以找到一些痕迹。不过，我究竟提了哪些不同的意见，时隔20多年，已经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因为是在兄弟之间的通信中讨论民主问题，问题虽然是非常敏感的，但讨论却是放言无惮、无所顾忌的。因此原稿中许

有立足于科学精神之上的民主，才是一种牢靠的民主。”所谓科学精神，应当是：（1）承认人对于自然、人类、社会的认识永无止境；（2）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在人类知识的宝库中添加一点东西；（3）这些知识，没有尊卑贵贱之分，研究化粪池的人和研究国际关系、军事战略的人具有同样的崇高性，清洁工人和科学家、将军也一样；（4）每一门知识的每一个进步，都是由小到大，由片面到全面的过程，前一时期的不完备的知识A，被后一个时期较完备的知识B所代替，第三个时期的更完备的知识，可以是从A的根子发展起来的，所以正确和错误的区别，永远不过是相对的；（5）每一门类的知识技术，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一种统治的权威性的学说或工艺制度，但大家必须无条件地承认，唯有违反或超过这种权威的探索和研究，才能保证继续进步。所以，权威是不可以没有的，权威主义则必须批倒。唯有看到权威主义会扼杀进步，权威主义是和科学精神水火不相容的，民主才是必须采用的方法。”（第344～345页）

在另一处，他把问题又深入了一步，所用言辞也更明确而直率。他说：“民主诚然不是目的，那么把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定为目的又怎样？问题的焦点是，社会主义实现了，或者共产主义实现了怎么样？回答是，实现了，连民主也不存在了。这个答复，其实暗含着：革命的目的，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建立一个没有异化的，没有矛盾的社会。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有进步。所以，民主是与不断进步相联结着的，而不是和某个目的相联结着的。”（第370页）

所有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同志都应当对这个问题进行冷静的、严肃的深入的思考。思考的结果，也许有些人会这样想，

既然共产主义的目的是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天国，而地上建立天国是彻底的幻想，那还有什么意思呢？如果这样想，不免太肤浅了。人类生活在这个星球上，不但要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要改善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现在这个问题愈来愈紧迫了），使人类的环境，不断得到改善，“力求向上，向上，还向上”。难道这个目的不更博大吗？

“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斯大林是残暴的，不过，也许他之残暴，并不 100% 是为了个人权力，而是相信这是为了大众福利、终极目的而不得不如此办，内心为善而实际上做了恶行，这是可悲的。”（第 375 页）

顾准撰写上述言辞是 1973 年 4 月 29 日，到今天我执笔准备结束这篇文章，正好 23 年整。23 年以前，在我们兄弟之间讨论人类的根本问题，其目的无非是希望在继续争取人类美好的未来的事业中能找到一条更妥善的途径和方法，再也不要发生内心为善而恰恰做出许多恶行的蠢事，使人类继续蒙受羞辱，并付出沉重的代价，我想，这是一个公民应有的希望和权利。

我所知道的顾准与“三反”

陈敏之

顾准，在1952年的“‘三反’”运动（由党中央发动的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运动，简称“三反”）中倒下，从此以后在上海消失了。他是头上戴着“恶劣分子”的帽子离开上海的。他究竟是“恶劣分子”，还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我决无意于为他翻案，现在也已无此必要（党对他历次所受的错误处分，在他死后已经先后进行平反、纠正，虽然不无遗憾的是这些都来得迟了一步，死者生前未能亲见）。我的目的只是想把他被扭曲了的形象，恢复其本来的真实面目；这也是我道义上责无旁贷的一种责任。

顾准和上海应当说有着比较深的渊源。从1934年起，他曾先后担任过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上海分会主席、总会宣传部副部长（有一个时期，我们家里成了印刷发行党的秘密油印刊物和宣传品的机关）、职业界救国会党团书记、江苏省委职委书记、文委副书记（书记为孙冶方），一直到1940年7月去苏南抗日根据地为止。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顾准随军南下，担任准备接管上海财政经济的一支干部队伍——青州总队（下分财政、工业、轻工业、银行、商业、公用事业等大队，共约二千人）的总队长。上海解放，他担任上海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上海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潘汉年），华东财政部

副部长（部长陈国栋）。从 1927 年至 1940 年，他在我国著名的潘序伦创办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工作 14 年。通过自学，30 年代他自己也成了有一定知名度的年轻的会计学家。他的职业和党的地下工作的经历，使他对上海的经济和职工运动具有一定的了解。

1952 年 2 月 29 日上海市委召开宣布黎玉、顾准等八个党员撤职或开除党籍处分的干部大会我也参加了。当时除了震惊，也感到愕然。我相信他和贪污、浪费、官僚主义无关，但为什么要给他这样严厉的处分，实在不能理解，在我心中一直是个谜。我至今还记得，就在召开这次大会的前一天，顾准还在电台作关于开展“五反”运动（指一些资本家的行贿、漏税偷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五种违法行为。“五反”是由中央发动与“三反”先后同时开展的一次运动）的广播讲话。（顾准遗留下来的自传材料中有这样的记载：“受谭震林委托，暂时负责‘五反’运动的领导，并在谭和顾之间建立直接的指挥关系，此事在华东局的一次会议上，得到了陈毅同志的欣然同意”，可以证实我的记忆并无错误。）可是，相隔不过一天，一个“五反”的领导者，为什么在“三反”中被撤职，我不能不感到意外。不过，事后我从来没有问过顾准本人，因为我怕触动他这个伤疤。其实，对顾准本人，也是十分突然的，当时市委负责人之一的陈丕显曾询问他对处分的意见，顾准直率地表示了“感觉十分突然”。事隔 22 年，1974 年 9 月，离他去世前两个多月，我和他在北京有过一个多星期的盘桓。在他对一些往事并不轻松的回忆中，“三反”中他为什么被撤职，我才第一次有了一些了解，原来它和上海税收方法之争有关。解放初期，在税收方法上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是中财部的意见，主张“民主评议”；一种是顾准的意见，主张“专管、查帐、店员协税”。“民主评议”是解放初

期通行于刚解放不久的中小城市的一种税收方法，它的具体步骤是：（1）规定某一时期全市应纳工商税总额；（2）由城市税收机关会同市工商联会把这一税额分摊到各行业；（3）再在各行业范围内把税额分摊到各户，由各户自报公议。这种税收方法在帐册不健全、征税技术上有困难、纳税户也不太多的情况下，也未尝不可作为一种权宜的过渡方法采用。顾准从上海的实际情况出发，认为上海大中厂商的帐册一般比较健全，完全可以依率计征；上海的工商户数量众多，采取民主评议，不仅层次多，而且有极大的可能造成税负不公；再说征税总额也难以确定，很难使征税户的税额完全符合税法规定的税率；上海有强大的工人阶级，可以动员他们来协助监督，防止偷逃税的行为。顾准在工作上提出不同意见，并且敢于坚持，当然不是为了一己的私利。这场争论因为涉及到与中财部的意见相左，当然惊动了上海市委。市委（还有华东局）曾不止一次地讨论过这个问题。1950年8月陈毅在去南京军区前夕，曾专门找潘汉年和顾准到他家里讨论这个问题，陈毅同志的结论，毫无保留地指出要废除民主评议，采取“自报、查帐、店员协税”的方法。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市委和陈毅同志的同意和支持，顾准的主张是不可能付诸执行的。这场争论自然也通到了中央。1951年12月，陈云同志（当时的中财委主任）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指出，上海税收方法争论中，“顾准的方法是对的”，这个意见还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朱如言（解放初期上海税务局副局长，已故）生前曾亲口对我说过类似的话，告诉我陈云认为税收方法之争，“一直在顾”。按照顾准的税收方法，1951年3月税收实绩1.8亿元，较1950年增加6倍；1952年3月，入库税收3亿元，较1950年增加10倍。1950年“二·六”轰炸以后，上海工商业一度萎缩，1951年的税收增长，可视为工商业恢复的反映；1951年至1952年上海工商业已恢

恢复正常，税收的增长明显地高于经济的增长，应当认为这与税收方法的科学性以及采取有力的组织措施（根据顾准的建议，市委已批准各区设立区税务局和按地区设置税务专户专管员等）有关。

这场争论到这里本来应该结束了，是非曲直也已有了结论，顾准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然而，事实并不完全这样。1952年2月29日上海市委在大会上宣布的顾准的罪名是“一贯存在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违犯党的政策方针，思想上、组织上与党对抗”，这个罪名显然不属于“三反”的范围。就在这次大会召开前夕，税收方法之争的一方，中财部领导以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到上海来帮助“三反”五反工作。既然大会宣布的顾准的罪名与“三反”无关，人们从宣布的罪名的措辞中也就很自然地会把它和税收方法之爭联系起来，顾准自己作这种推论，自然更容易理解。

1974年9月，顾准在和我追述这件往事，曾直言不讳地直陈他的推论，不过，口气是平静的。他还列举了其他一些事实来证明他的推论并非纯属无根据的虚妄。我当然无法否定他的并非完全没有根据的推论，但是我仍然不想把他的推论公之于众。这倒不是因为出于要为尊者讳或还有什么顾虑。不，这点勇气我还是有的，因为我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妻室老小的后顾之忧，我之所以不想这样作，是因为我现在重提这件发生在四十一年以前的错案，其目的并不在追究什么个人责任，只是想把顾准在“三反”中被严重扭曲的形象恢复过来，让大家知道他决不是什么“恶劣分子”，而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我还衷心祈愿，把一个人的真实形象加以人为扭曲的现象，从此以后不要再发生。须知这种现象不论发生在什么人身上，它的后果有多么严重！

1980年2月，在北京召开了顾准和他的妻子汪璧的追悼

会，为他们进行了平反昭雪。但是，这时顾准在上海“三反”中所受的错误处分，还未解决。

1985年，顾准的子女和我同时向上海市委提出了申请。在此案处理过程中，市经委案件处的一位同志（恕我没有记得他的姓名）曾到我家里提到处理此案遇到的困难，说“‘三反’中顾准受处分，在市委的档案中找不到有关的书面正式文件，唯一能找到的根据就是《解放日报》发表的消息”。因此，市委为顾准恢复政治名誉的批复也只能用“撤销 1952 年 2 月 29 日市委负责同志在全市负责干部会议上宣布的撤销顾准同志市委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职务的决定”这样的措辞，这实在是异乎寻常的。

1952年“三反”至1974年顾准去世，历时二十二年。在我国，在那个年代，一个人遭受了第一次厄运，第二次、第三次也就非常容易再次光临，于是就有 1957 年的第一次错划为右派分子；1965 年的第二次错划为右派分子；接踵而来的是对全国人民都具一场浩劫之灾的文化大革命，顾准自然不能幸免。

不会使人发笑。随之而来的是凌辱、苦役、迫害、家庭的对立、分裂、破碎，然后是丧失亲人的无尽的哀痛，也许还有难以摆脱的终生的悔恨。多少个家庭在经历了难以尽诉的痛楚之后，都会说：“哈哈镜”现象应该从此停止。这实在是苍生之福，社稷之幸。

顾准的最后十年

陈敏之

他成了一个有家不能归的“寡人”

往事如烟，不过，有些往事却是一辈子难以忘怀，也不应该忘记的，因为它是那样刻骨铭心。1965年冬，汪璧（我的五嫂）在来信中告诉我，她准备和五哥（顾准）离婚，双方已商谈过并已取得协议，如果我没有什么意见，就打算分别向各自的组织打报告。不过，信中还说，只要五哥有一天脱掉右派帽子，就可以立即复婚。言外之意，仿佛在告诉我是出于无奈。就此事征求我的意见，希望我复信云云。读信，我并不感到太突然，在我心里倒是觉得可以理解的。我心里明白，导致离婚的原因与不久前发生的那件事有关。也就是1965年的春天，有一天收到五嫂来信说，某日晚上突然来两个人把五哥带走了，带到哪里去，不知道。对此，我倒是真的吃了一惊。因为根据我的经验，这是一种非同寻常的手段，我没有想到在我们共和国也会发生这种不符合法律程序的行为（以后到了文革时期，就成了司空见惯的了），我完全能够感觉到问题的严重程度。然而我无法向五嫂说一句安慰的话，因为我同样一筹莫展，只能默默地等待。接着，警报又从我大姊那里传过来，在

清华读书的她的次子的学校里来了两个人，声称要家里把她儿子的来信全部交出来，大姊来和我商量，为了不要把顾准牵连进去，我出了一个不高明的主意，主张信不要交出去，结果，当然没有起什么作用。那么，大姊的儿子在学校里究竟犯了哪一条，要如此大动干戈？原来，他和几个同学组织一个什么现代马列主义研究会的组织，这些年青人真不知天高地厚，共和国虽然公开声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立国的思想基础，但是哪里能随便研究得的，自由结社更是犯天条。这件事传到了康生那里，本来打算把张闻天、孙冶方、顾准串起来打成一个有组织的反革命集团，结果是空欢喜一场。经过严格的隔离审查，证实组织上与顾准毫无干系，但是思想上的影响却是摆脱不掉的。过了大约四个多月，五哥给我来信，说已经回到家里，在隔离期间，除了他的外甥交代的他都承认下来以外，他没有作过任何交代，因为他事前对这个组织毫无所知，实在没有什么可交代的，对于难以容忍的逼供行为，他曾经以绝食抗议过；现在在等待处理，大概国庆以后可以作出决定。不久，决定下来了，再次戴上右派帽子，下放去京郊房山大韩继村劳动改造。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从上海接到解放区、曾经在战争环境中辗转流徙、年近八旬的老母亲，这次只能送到太原的妹妹处，让她有一个比较安宁的生活环境，不至于为儿子担忧受怕。

这时，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已经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根据我的政治经验，我预感到这是一场政治风暴即将来临的征兆，虽然我无法预知这场风暴将持续多久，范围多大。在这种政治气候下面，五哥第二次戴上右派帽子固然是五嫂决心离婚的一个因素，但当时她的内外处境的艰难、困窘和难以明言的复杂情况，比我所能知道的可能严重得多。对此，我完全能理解。我深知，从1934年他俩结婚以后的三十多年来，真

是两情相笃，患难与共，经历过多少惊涛骇浪，不是出于万不得已，五嫂是绝对不会提出这种看来绝情的措施的。对此，我当然只能表示同意，虽然我内心深处并不赞成。我没有想到五哥这个家庭的这种裂变，以后会成为破碎一片，再也未能复原。

五哥到房山大韩继村劳动改造，通信好象还有自由，还能和我通信。因为已经办过离婚手续（实际上不过各自提出了离婚申请，没有经过法院，并无法律效力），他觉得不便和家里直接通信，要我作中介，代为转信，我自然一口应承了。1952年“三反”以后，他先后在上海（建造二万户公房）、洛阳（当时156项国家重点工程中有几个在洛阳建设），有过一些搞建筑工程的实际经验，因此，对当时正在建造中的工程，常常还多嘴多舌，提出这样那样他认为必须提出的意见，还是那样不安分，不避嫌疑，不顾别人会有什么看法，完全忘了自己当时的身分，认为这是他应尽的责任。

离婚对他实在是一件不堪重负、令人心酸肠断的事，他丧失了可以向之倾诉一切的妻子，丧失了孩子，丧失了家庭这个唯一可以让他稍稍休息、得到一点温暖的所在，他成了一个有家不能归、孑然一身的孤独的“寡人”。这时他在给我的信中经常出现“丧家之犬”、“白虎星”（言指害了他的孩子）这类自嘲自责的字眼。

“我为秀服丧是终身的”

1966年冬，红卫兵运动的狂飙从城市到农村席卷祖国大地，近在京师近郊的房山当然不会例外。开始时，他的真实身份并没有公开，后来，终于被红卫兵知道，一场灾难不可避免地降临到他的身上。在一封信中，他告诉我，红卫兵将他一顿

痛打之后，还把他打翻在地，在地上拖，弄得满头满脸全是血污。为了不致酿成人命，经济所只得把他们全部调回北京城里。从此，通信中断，音讯隔绝。一直到他生命终结，再没有能和他的妻子、孩子，还有老母亲见一面，生死两茫茫。

1968年4月，汪璧自杀身亡。我第一次听到这个传闻，还是在漕河泾原“少教所”隔离期间，我不相信这是真的，但是我无法深究，直到1969年9月回到家里，我妻子告诉我这是确实的，然而我仍然觉得难以置信。1967年11月，我曾有机会去北京，便专程去探望过她，那时，她看来十分疲惫和憔悴，但是，我怎么能想到仅仅半年以后，她会绝望到作出这种选择？老母亲走了，去了太原；丈夫虽然同在一个城市，却是咫尺天涯；孩子们都给文革的巨潮卷走了；身边没有一个亲人能给她这颗孤独无告、破碎的、流淌着血的心以一点安慰，否则，也许这场悲剧是可以避免的，我曾这样设想过。五哥知道汪璧的死讯，整整迟了一年半，组织上把这个消息封锁了，不让他知道。从顾准的遗物中发现的日记可以获知，1969年11月，经济所奉林彪第一号令“一锅端”下放到河南息县前夕，他曾两次提出书面申请，要求和妻子见一面，这时他已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觉得他的妻子已不在了，因此，他又向组织保证：“无论她死了，疯了，病重了，都一不影响下去；二不影响改造”，组织这才向他说了实话。但是，有关他妻子的死期，死况，遗言等等，仍然一概不知，对于他妻子的死，他在日记中写道，“闻噩耗，既觉意外，也不觉意外；意外的是，她爱孩子，为什么给孩子留下一个‘母自杀’的家庭环境；不觉意外的是，1965秋，她已写过遗嘱，1967年5月，她看来已经实在支持不住了。”妻子已经永远再也见不到了，他要求和他的孩子见一面，组织上同意了，然而却遭到孩子的拒绝（现在知道，并非出于孩子的本意），他本来还想见面后在外面招呼

孩子一起吃一顿饭，也成为可悲的幻想破灭了。他想和亲人晤见，得知更多信息的一切努力都告失败。人生还有什么比丧失自己的妻子更令人心碎，深沉的哀痛难以抑制，一次吃饭时，悲从中来，伏在饭盆上失声大号。他在日记中写着：“1944年在延安，我为父亲服丧，这一回，我不服丧，因为我为秀服丧是终身的”，“我至少还要活二十年。三十五年的记忆（指从结婚至今）至少在我心里还要活二十年。”他没有死，活下去了，但是只活了五年。

这以后的几年，是彼此绝对的隔绝。

一张油票和两年通信

1972年初冬，我取得当时干校组织上同意，藉探亲假的名义去了北京，除探望老母亲外，也想趁便探寻五哥的下落，我觉得无论在道义上、感情上，这都是我不容推辞的责任。说来也巧，五哥恰好也在这年夏天从河南息县回到北京，因此，没有费多少周折就找到他并晤见了。在晤见之前，我先看到了一封他给孩子的信。信很短，大意是，祖母是否健在，很想念。附去照片六张，是刚回到北京时照的，哪一位要照片，可以给他。我现在还没有力量照顾你们，附去省下来的油票一张，表示一点心意。下面黏贴的是一张从他自己的口中省下来的当时能用的油票。读信，看着照片，我怎样也难以抑制涌动的泪水。这使我联想起六十年代初，他拼命笔耕（指翻译熊彼得、罗宾逊夫人的两部经济学著作。这两本书一直到他死后，才由商务印书馆于八十年代先后出版），企望以此来使家庭经济多少能得到一些改善。当我想到笔耕所蕴含的是一个父亲对自己的家庭“赎罪”心理和一张小小的油票中包容的是一腔舐犊之情，我怎样也难以抑制自己心灵的震颤。

离别十年，劫后重逢，当然是高兴的，但是彼此都很少述说过。曾经设法让五哥和在三妹处的母亲见一面，未能如愿，直到他两年后离开尘世也未获实现，成了无法补偿的终生遗恨。他当然也非常惦念自己的孩子，想见见他们，在我去京之前，他已作了努力，都归无效。因此，话题也绝少再提及这些令人凄怆的事。倒是当我诉说在漕河泾期间，除了“红宝书”和《毛选》外，再也读不到其他书籍，浪费时间，表示极大的惋惜，希望读一点中国历史时，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劝我应当先读一点西方历史，他说，中国人对自己国家朝代的更迭、嬗变总是知道一些梗概的，但是你如果不懂西方历史，也就很难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这一点，当时我并不真正理解，直到我多少读了一点西方史以后，才真正有所体会。身为中国人，如果对自己老祖宗的历史茫然无知，当然是一种无可饶恕的羞辱；谈历史，言必称希腊、罗马，对于这种洋教条，固然也应批判；但是，作为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对于由以产生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历史以及影响及于现代西方国家的希腊文明传统一无所知，他确实也很难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就象外国人如果不懂得孔、老、庄、墨、荀、韩等等，也就不可能真正懂得中华文明及其传统一样。目前的问题是多少懂得一点西方历史和希腊文明的人太少，而不是太多。举一个最浅显的例子。我过去读《共产党宣言》，对于其中提到的市民阶级，究竟是何所指，市民阶级是怎么产生的，它对近现代资本主义和议会政治的产生和发展起过什么样的作用等等，可以说完全无知，因而只能生吞活剥地囫囵吞下去，一直到读过一些西方历史以后，才有了真正的了解，我相信不少人会有此同感。

大概以此为契机，才会有 1973～74 两年间在我们两人间不断的通信。这些通信，不是海南天北或家庭琐事的闲聊，而是对一些彼此都感兴趣的历史的或现实的问题的认真的讨论，

其中不少是我提出向他请教的问题（这些在通信中他所写的“笔记”，都已收入《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见《顾准文集》）。对于一个立志服务于祖国和人类的人来说，当他发现西方文明中确实有许多为我国固有的文明所阙如的长处和优点时，凭着社会良知，他是无法加以拒绝的。为了自己国家、民族的振兴和腾飞，汲取其他文明中的所有优点和长处，应当是无可非议的，那种虚妄的民族自大在这里不应当有立足之地。

“娜拉走后怎样”，是顾准借用鲁迅的命题提出的一个当代的问题，是当前我们面临的最大的问题。这个命题的实际涵义是：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胜利，这当然很好，但是“不要以为我们的问题全已解决。清醒地看到问题所在，知道我们解决了什么，哪些没有解决，哪些走过了头，实事求是，而不是教条主义地对待客观实际，我们国家就会在经济上雄飞世界……”（《顾准文集》P.330）顾准提出这个命题，至今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个世界又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继东欧崩溃，已有七十多年历史的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又宣告解体；在我国，“四人帮”覆灭，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以后，终于从历史性的灾难中走出来，并且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我们近期的奋斗目标。当我们回顾这些历史事件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承认，在一个经济文化都很落后并且有着顽固的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实在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业。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毕竟是人类历史的一种创举，是一种根本性的改革，是一场自我革命，清醒地看到还有哪些重大问题和障碍，没有解决或需要克服，细心地寻找解决这些重大问题的科学的有效的方法，仍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因此，盲目乐观在这里是没有根据的。

两年通信中所讨论的问题涉及的领域虽然相当宽泛，但是

中心只有一个：两千多年来，在封建专制主义严酷的统治、压迫、奴役下的苦难的中国人民，好不容易争来了一个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按照逻辑，理应是一个政治清明、生活一天比一天好起来、有着平等、民主、自由，充满着希望的社会。要知道，1973年至1974年“四人帮”还没有垮台，中国人民的苦难还看不到头，在我们兄弟之间的通信中，除了对祖国命运深切的关注和忧思外，岂有他哉！要不是1974年12月顾准的生命被夺走，我们之间的通信还会非常有兴趣地继续下去。

病床上写了两个便条

1974年11月2日，我接到五哥的电报，说是病重住院，要我马上去京，我一刻也没有停留，设法买了一张车票，立即赶去了。在原协和医院的急诊观察室见了面，情况确实严重，每天咳血大半个茶缸（200—300cc），什么止血药都用上了，仍然无效（去年春天他在信上告诉我，也咯过血；拖了不少时间才慢慢停下来；去拍了X光片子，也查不出究竟）。他神色有点凄然地对我说，这次竖着进来，要横着出去了。他大概已意识到这次病情的严重（不幸被他自己言中了）。当务之急是设法尽快住进病房，否则，不仅日常生活困难（医院对急诊观察室的病人不供应伙食），也不能进行正规的检查和治疗。在几位老朋友的奔走帮助下，总算很快住进了病房，经检查，确诊为肺癌，癌肿有鸡蛋那么大，长在心脏旁边，不能动手术。检查、诊断结果，我都如实告诉他，没有瞒他，他的反应是平静的。不过，他提出了一个要求，要见见他所有的几个孩子，还在手纸上用铅笔在病床上写了两个便条，大意是我宽恕你们，也希望你们宽恕我，祝福你们（这时他的大儿子已结婚，

马上要生孩子)。对此，我作了许诺，我说我一定想法要他们来看你。我为此写信、谈话、生气，作了许多努力，结果，都未能说服他们在其父亲生前去见一面，我的许诺未能兑现。对于一个失去了家庭，失去了妻子，已经知道活着的日子屈指可数的父亲，对孩子的殷切的眷念之情，我完全理解，然而这时我能做什么呢！

1965年至1974年，正好十年。这十年，顾准经历了第二次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妻子无奈地与他离婚，子女离去，奴役般的劳动改造，无休止的批斗和凌辱，妻子自杀，还有疾病的折磨，这是一个常人所难以承受的重担，但是，并没有把他压垮，他要活下去，再活二十年。可惜，在他作出这样的誓言以后，只活了五年。

在他一生中最痛苦的莫过于亲人对他的不理解。他经常以“害了他们”自责，一直到临终前还要求他的孩子对他“宽恕”。他真的害了他的孩子并且需要孩子对他的宽恕么？

1982年，顾准的大女儿在读了他父亲和我的全部通信的手抄本后(即后来出版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给我寄来了一份《读后感》，其中写道：“真正严峻地摆在面前的，是需要解决这样的一个悖论——为什么我们和父亲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愿意献身于比个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标，却长期视为殊途？强调分离时间太久，搞技术工作理论水平低等等，都仅仅是外部的原因；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所接受的和奉行的一套准则，为什么容不进新鲜的、可能是更为科学的内容？究竟是哪一部分需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今后对亲人以至社会再做蠢事？对于一个愿意严肃生活的人，必须有勇气正视、解答这些问题，并且付出代价”。这个问题提得好，无愧是顾准的女儿。

“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过来的”

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可爱的，他们都愿意献身社会，报效祖国。他们担心的倒是报国无门，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葛剑雄教授对我国知识分子有一个很平直、公允的分析，他在对发生于我国 1800 多年前东汉的党锢案这一历史事件作了评述之后，曾说了下面这段话：“知识分子多少有点知识，这是他们的幸运，也是他们的不幸。有了知识，就想有运用的机会，就不会满足于有饭吃，有衣穿，有妻室儿女，这就是所谓实现自身价值。”“在皇权垄断一切的社会，要实现自身价值，舍做官就别无他途。可是做了官就只能服从法律和上司，就绝对避不开现实政治。疾恶如仇会有党人那样的下场；洁身自好或许能做到，却因此而一事无成；同流合污又有违初衷，而不齿于士林；急流勇退倒也干脆，但原来的理想也随之成为泡影。”这种情况，二千多年来，在我国皇权至上，政治权威主宰一切，范文澜把它称之为史官文化的传统，至今还保留着它的巨大影响。因而葛教授不得不希望于未来，他接着说：“如果知识分子的‘知识’不限于儒家的经典，而是包括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的各个方面；如果他们不必都为‘政治’服务，而能享受不问政治的自由，从事能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工作，那么党人中必定会出现不少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实业家或真正的政治家，或许根本不会出现党锢案并留下这篇《党锢列传》。对 1800 多年前的东汉，这无疑只是荒唐的假设，但对最近几十年的中国，这值得我们深思。”（《探索与争鸣》1995 年第 10 期）这实际上也是对顾准大女儿提出的问题的一种解答。中国知识分子殷殷期盼的无非就是这样一种气氛和环境，使每一个正直、诚实的知识分子能有机会实现自身的价

值，服务社会，报效国家。

纵观顾准一生，他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坚决地、义无反顾地从理想主义走出来，走到经验主义去。用他自己的话：“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过来的（按：指革命的理想主义），然而，当今天的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地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

当我仔细审视我国的近现代史，我发现我们共和国的诞生（1949）与皇冠落地（1911），其间间隔不过38年。回顾一下这38年的历史，可以称得上五彩缤纷。其间有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闹剧；有军阀割据的混战，有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有国共十年内战和八年抗日战争；然后是三年解放战争，可说是内战、外战连绵不断，而我们的共和国恰恰是直接从枪杆子里诞生的。革命的浪漫主义可以在一瞬间使社会发生革命的根本变革，把历史缩短了几百年，这当然是好事，但常常也带来了另一方面的不足，旧社会留下来的渣滓来不及作彻底的打扫和清理，还常常穿起新的外衣，把自己打扮得使你分辨不清他的庐山真面目。人们也许忽略了一个问题，在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皇权垄断一切的时间长达二千余年，影响既深且远，而近代资本主义则发育不良，先天不足，力量既脆弱，其影响更微不足道。可是，几十年来，我们却习惯于与资产阶级斗争。我总觉得这个从历史母胎中带来的“特点”是不能忘记的。从“史官文化”传统影响中走出来，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还有不少艰难险阻要跋涉，清醒地看到这一点是十分必要的。

送 别

——在顾准身边的最后一个月

陈敏之

五哥病逝至今已经两个多月了。

我再也没有那一个像我的五哥那样，可以向他尽情倾诉，可以和他进行无拘无束的讨论，可以向他请教的人了。两个多月来，每当我想起什么，想按照往日的习惯给五哥写信、向之倾诉，而感觉到他已经不在这个人世间时，我难以忍受地感到苦恼，感到寂寞。

现在，我写下这些，在九泉下的五哥是不是会知道他的弟弟还在怀念着他，因而精神上得到某种安慰？

我写这些，为了悼念我的五哥，也是为了自己觅取某种慰藉。

医 院 一 月

1974年11月2日（星期六）下午一时许，午饭还没有吃毕，邮递员送来了给我的电报。电报是五哥发来的，说已住院，要我马上去京。看了电报，我预感到情况不好，心中极为不安。

这时距我9月30日离开北京，不过短短一个月。9月30日，国庆前夕。这天北京阴雨，五哥亲自送我上车厢，当时看

他精神很好，看不出一点有病的样子，有一点感冒，总以为不久就会痊愈的。离开北京以后，我去银川、兰州、西安转了一圈，10月16日才回到上海。途中我虽然仍写信给他，但因为我在旅途中，他无法给我复信，因此一直到回到上海以后，我们的通信才恢复。

10月29日，收到他10月26日的来信，告诉我：自9月底以来咯血不停（事实上，9月30日我离开北京时，已发现咯血，因为怕引起我不安，瞒着我），并重新发现有低烧，觉得精神疲惫。准备采取过去五嫂对他说的“倒下来再说”的方针。所里同志看他支撑不住，已写信给重之（五哥的小儿子），要他回来照顾，不知道会不会回来。军宣队这次主动提出要他来上海我这里，但他不愿意来。我立即回了一封复信。表示我坚决不同意“倒下来再说”。并且告诉他：如果重之能回来最好，由重之陪同来上海。如果重之不来，则我准备亲自去京陪他来上海，我同时又给三妹去了一信（五哥来信附去），除了告诉他五哥病情不好外，要她支持重之回来。

11月2日晚上，樱初好不容易给我买到了翌日去京的车票，而且很幸运地买到了一张卧铺。我心里自然是极度焦虑不安的。不过，我还是满怀希望，一俟五哥病情稍有好转，和他一起到上海来继续治疗和休养。

4日下午，我见到五哥，才知道2日他给我发出电报之前，所里军宣队负责同志曾给三妹打过两次电话。第一次通知三妹：五哥已住院，要她去看看，答复是“要研究研究”。第二次又去电话，答复是：“和五哥已十余年无来往”。军宣队要她通知五哥的子女，答复是：“我不知道，你们可以自己去打听。”又说：“上海他有一个弟弟，他愿意照顾，你们可以和他联系。”

三妹在收到我给她的信后，于11月2日曾给了我一个复

信。信极简单，寥寥数语：“老五信寄回，没有意见。小弟（即重之）未来京。接到电话，说老五病住院，经济所约已告你。”从这信看来，三妹的态度和五哥告诉我的，可以证实是一致的。

我就是这样再次去京的。

由经济所老张同志（恕我忘了他的名字）陪同我各自骑一辆自行车匆匆赶到医院急诊观察室见到五哥时，我们都非常激动，彼此都强忍着噙着的泪和哽咽的声音，不愿增加哀凄的气氛。他亲切地和我握过手后，对我说：想不到你来得这么快。他告诉我，本来不想要我来京的，这次要我再次去京，在五哥是出于万不得已，而且他可能已预感到这次病情的严重，和往常不同。就在这第一次见面，他对我说：这次从前门进来，要从后门（意指太平间）出去了。随后，他又从衬衣口袋中掏出一个银行存折和积存的粮票交给了我。现在回想起来，他对身后的一些事情似乎早有准备。他说话和动作虽然是平静的，但事实上对自己的病似乎已清楚地意识到是无望的。不过，他还是对我说：“希望能早一点住进病房。”这不仅出于护理和治疗方面的方便，这时他对自己的疾病显然还抱有希望，争取能早日治愈，恢复工作能力。几十年来，对于一个平常人来说难以忍受颠簸、坎坷、打击，没有使他折服，疾病当然不可能轻易使他屈膝，更何况他热爱生活，热爱伟大的祖国，在他生命的余年还要继续他已经进行了二十余年的对未来的探索。生命对于他是重要的，他决不会轻易放弃。

经济所的同志告诉我：从 10 月初他就开始咯血。也曾经去就医治疗，但咯血终未能止住。10 月 16 日起，终于支撑不住而卧倒在床（查他的日记，至 10 月 15 日日记的写作中止）。又拖延了半个月，一直到 11 月 2 日。经济所的领导看他实在不能再拖，才送医院。这时，每天咯血大半痰缸（200～

300CC)，身体的亏损是可以想象的。因为1973年8月他也曾咯血，医生诊断是支气管扩张，因此，这时我虽然见咯血不止而焦急，但还以为是旧病复发，不疑有他，仍然满怀希望，以为只要咯血能止住，就能逐渐痊愈，并以此劝慰他，我还对五哥说：我保证你从前门出去。

在急诊观察室的几天，为了止住他的大量咯血。医院大夫用了各种止血药物，而且剂量很大，然而仍然无效。11月7日上午，迁入了病房，五哥和我都为之很高兴，因为这就可以作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

但是住进病房以后，并没有带来福音。11月11日，主管大夫贺仁通知我，经过化验，痰中发现癌细胞。同时，根据X摄片，确认为肺癌。乍听之下，我震惊得发呆了。接着一阵悲痛，哽咽住了。我知道，这是无望的绝症，生命对于五哥已经不过是时间问题，病魔终将从我手中夺走他，我怎么能抑制得住自己的悲痛！

五哥，我没有瞒他，因为我相信他经受得住。而他，确实也经受住了，显得很平静，好象一切都在他意料之中。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始终没有唉叹过一声。为了劝慰他，也是为了鼓励他，我对五哥说：你一生是倔脾气，对病也要倔到底，斗争到底。我还说：即使明知等待着你的是什么，也要高高兴兴、快快活活地迎接它。他欣然点头同意。其实，我说这些都是多余的，他跟我说过：他并不怕死，唯一感到遗憾的是对于学术、政治无能为力了。

他在精神上从来没有屈服过，但自然的肌体的抵抗力毕竟敌不过病魔的侵袭，眼看着他的精神一天比一天萎顿了下去。他确曾顽强地为生命的延续斗争过。虽然吞咽十分困难，但还是强迫自己多吃一点东西，以增强肌体的抵抗力。他每天输液的时间多至七八小时，至少也要五六小时，在病榻上不能转辗

反侧，但总是忍受了下来，一直到临终的前几天，才加了一副铺板，使他躺在床上稍稍舒服一点。他完全信赖大夫。本来，他对中医的科学性有些偏见，但为了不忍拂逆几位老友的好意，也为了冀求治愈于万一，他毫不勉强地接受了中医和中药的治疗。

他对生活的态度一直是积极的。他怕旷日持久。他的意思显然是不愿意缠绵病榻，既不能工作，又拖累别人。他曾对我说，与其丧失工作能力而活着，不如早点死掉。他对所有来探望他的朋友、同志以及四十余年前就结识的从远地赶来的老朋友，当他们临走的时候都和他们道别。这不是怯懦的语言，正是正视自己的未来命运的勇敢的珍惜的告别。

五哥患的是中心型肺癌，有鸡蛋大小的一个肿瘤生长在靠近心脏旁边，主气管分叉的左侧，因此，在治疗方案的选择上既不能动手术切除（在手术台上就有危险），又不能照光（即深部X光照射或用同位素），唯一可选择的是化疗（即注射化学药剂）。以后经医院同意，同时又结合中医治疗，服用中药。开始化疗的头几天，反应似乎还好，咯血也略见减少，看到似有转机的希望，很高兴。但到十一月下旬以后，病情显著恶化，脉搏增快，自原来的40~50次/分，增至100次/分左右，到最后病危时增加至140~150次/分。呼吸困难，竟日竟夜不能离开输氧。12月1日下午6时左右憋气严重，一度病危。12月2日下午3时许，两手青紫，牙床紧闭，手足俱冷，一度处于昏迷弥留状态。经抢救后，始苏醒过来。这天晚上我九时多离开医院时，五哥神志还很清楚，虽然口齿不清，说话困难，但他仍一如往常那样说：你走吧，催我回去。我总以为第二天还能见到五哥，那里知道这次竟成永诀，再也见不到活着的五哥了。

真挚的友情

在五哥整个患病期间，使我永远不能忘怀的是五哥生前的一些朋友、同志的关注，特别是几位老友的真挚的友情，令我深深感激。

10月16日五哥病倒在床上以后，林里夫（五哥四十年前在上海地下工作时期的老同志，老朋友，经济所同事）每天到经济所来为五哥煮饮食，照顾日常生活。进医院以后，经济所领导虽然派了一位同志去照顾，但林仍然每天三次去医院悉心照料；十一月四日我到京后也仍是如此。事情也巧，我到京后的第二天，工宣队进驻经济所，原来经济所长期瘫痪的状态，为之一变，规定人人每天必须上班，不得迟到早退。这样，经济所当然不可能再派干部去医院照顾，而我也正好接替上。虽然如此，林当时每天下班后还是要到医院去探望一下才放心回家，并且总是为五哥鼓信心。当看到我每天上下午两次去医院，一天来回四次，整天在医院照顾，怕把我累垮了，立即要他的女儿皎皎每天上午去医院顶替我，还不时带一些食品给五哥吃。要知道，林在政治上的处境很不好，经济条件尤其困窘。然而为了挽救老友危殆的生命于万一，他根本不顾这一切。

为了争取及早住进病房，为了争取能不能为五哥输一些血，骆公（耕漠）为此去找杨纯（中国医学科学院党委书记），处奔走多次。为了请林里夫介绍的老中医来会诊，骆公（还有张纯音同志）两次请了假，想方设法去借了或雇了出租汽车陪同一起到医院来。在五哥最后病危的那几天，晚上需要人陪夜，骆和林坚决不同意我留在医院，还准备他们自己陪夜。后来因为经济所其他几位年纪较轻的同志的劝阻，才算作罢。

林、骆都已是六十多岁的高龄了，对于他们的这种真挚的关注和感情，是不能用言语来表达我的感激之情的。

应当在这里提到的还有陈易、翁迪民、何惧等几位。五哥病重住院，几乎每天都去，连他的女儿小群也热心地去找她的同学的母亲来会诊。尤其令人感动的是何惧，他患肺癌已八年，肿瘤已转移穿孔，据他自己说，他曾被三所医院的大夫判处过“死刑”三次，但还顽强地与疾病斗争着，并且异常乐观地生活着，为了介绍他自己的经验，为五哥鼓信心，还特地到医院来“现身说法”。

在上海的五哥的四十多年前的老朋友李少甫、李燮泉等，当他们从我给樱初的信中获悉五哥患病住院并且是肺癌时，他们立即写信给五哥表示慰问和鼓励。在给我的信中表示了最深切的关怀和劝慰。少甫还终于在 11 月底藉接他的女儿去上海生孩子为名专程去北京探望五哥。这时五哥已处于病危状态，但神志还十分清醒。12 月 1 日上午我陪同少甫和他的爱婿高风去医院探望五哥时，五哥对少甫说：千里奔京，向我告别。这时离开五哥向这个人间永远告别已不到两昼夜的时间。

老友李燮泉因为自己有病，不能长途旅行，想去京而未果。还有沈尉平，正好从上海返回银川，途径北京，12 月 1 日下午偕吴履绥一起去医院，总算在临终前见到了一面。

这里应当特别记述下来的还有张纯音同志和她的女儿咪咪（徐方）。五哥生前就曾告诉过我：1969 年 11 月经济所从北京搬去河南息县时，他正是刚刚获悉五嫂（汪璧）去世已经一年多，稽头拒绝和五哥会见，不仅是精神上受到最严重打击的时候，也是生活上最艰苦的时候。就是在这种情形下，纯音同志和她的女儿咪咪（那时还只十五岁）给予五哥最难得的关心和照顾，咪咪常常偷偷地送一些奶粉之类的东西给五哥吃。咪咪对五哥的同情和感情似乎随着对五哥的理解的加深而与时俱

增。以至五哥成了她心灵中最钦佩的一个人。她在获悉五哥病危以后给五哥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刚刚收到妈妈的信，获悉你病重的消息，真是悲痛万分！我实在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此时此刻的心情。我不能失掉你，你是我的启蒙老师。是你教给我怎样做一个高尚的人，纯洁的人，一个对人类有所贡献的人……”

“几年来我们在一起的那些日子象电影一样在我眼前出现。东岳的月光下你告诉我要像小孩捡石子一样为自己收集知识财富，从那时起我才下了活一生学习一生的决心。你对我讲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要为自己寻找一个目标，即使明知道这个目标是自欺欺人的，也要向着这个目标去奋斗，否则你生活就没有中心。在这一点上你就是这样做的，你对我起了以身作则的作用……”

“听说你的孩子还是不肯来看你。我想你也不必过于为此伤心，我就是你的亲女儿。尽管不是亲生的，难道我还不能代替他们吗？”

“我知道泪水是救不了你的，只有用我今后的努力和实际行动来实现你在我身上寄托的希望，这样才是对你最大的安慰。”

五哥看了这信，流泪了。我也是强忍着噙着的泪读完这信的。

感情决不会平白无故地产生的。究竟是什么魅力使这位姑娘对五哥产生了这么深厚的感情的呢？如果承认感情的深度是和理解的深度成正比的，那末，这个仅仅二十岁的非亲非故的女孩子对五哥的理解，实在是远非那些自以为革命，其实却是完全没有超脱一般流俗见解，实际上是以所谓坚定的政治立场

来掩盖自私心理的人所能比拟的。

对于经济所以以及所有关心五哥的同志和朋友，其中尤其是张纯音、江明、吴敬琏等几位，他们有的帮我守护在五哥病榻旁边，有的帮我整理五哥的遗稿遗书以及料理身后的事务，我再次表示由衷的感谢。我深深知道，当时五哥的处境和他们中间有些人的当时的困难处境，因此，对于他们的这种真挚的关心和帮助，我是永远铭记不忘的。

两代人的悲剧

11月4日，我到北京去医院见到五哥的当天下午，五哥就曾对我说：我所有的几个子女都想见见。又问我：在他临终的时候，他们会不会去见他？对他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我忠实地转达了。至于第二个问题，我无法代替他们答复，我只能直率地说：这得由他们自己来答复了。

当天晚上，我没有见到稼头。小米（逸东，五哥的大儿子）当时不在北京，在云南某地工作一年，据说因为他爱人快要临产，将提早于11月中旬回京。我为了想避免和他们谈话时抑制不住自己激越的情绪，11月9日下午给他们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历史上有许多先驱者（社会、政治、哲学、自然科学各个领域），不被当代的人们所理解，被视为异端，这种情况并不罕见。你们的爸爸虽然还不能说是这样的先驱者，但是据我所了解，我敢断言，你们对你们的爸爸实际上一点不理解，他比我和你们的目光要远大得多。许多年来，他不过是在探索着当代和未来的许多根本问题的答案，如此而已。如果认为作这样的探索就是一种该死的异

端，那他决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有人以有他为辱，我却以有他这样的哥哥为荣。

在家庭关系上，他深深地爱着你们的妈妈。自从你们的妈妈不幸去世以后，他又把全部爱倾注在你们身上。我相信，这一点，你们是会感觉到的。这一次，他又向我表示：希望和你们兄妹五人都见见面。他还问我：如果他这次不幸死去的话，你们会不会去看他？对于这个问题，我当然无法代你们答复，这只能由你们自己答复。（这里五哥用铅笔亲自加了如下的旁注：如果我临死的话，我还是希望见见你们，一是请你们原谅（妈妈说我害人，我实在是害了你们），二是祝福你们。然而我怎么也抑制不住心头的酸楚。这里我又加了如下几句话：关于你们爸爸所说的“害了你们”，我想作一个注解：一个忠实行自己的信念作探索的人，往往不能两全——既忠实行自己的信念，又顾及家庭，这就是演成目前的悲剧所在。）

我没有想到我必需再次来北京，但是我觉得我不过是做了一件我应该做的事，因为我认为并不是单纯出于兄弟的情谊。

你们对你们的爸爸过去所采取的立场、态度，我不想非议。但是任何事情过份了，总会要走向反面，我想顺便指出：对于你们至今为止所采取的态度，舆论并不是没有非议的。娘娘这次对我说：你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由你们自己抉择。我虽然是看着你们长大起来的，但不想有半点勉强的意思，由你们自己决定。

我已经对祖母说过：如果你们仍然坚持过去的立场、态度，对你们的爸爸的健康以至一切，我都包了，而且包到底。我说这话是算数的。

我怕控制不住自己激越的情绪，所以写这些，代替我

说话。当然，我想说的远不止这些。

你们的爸爸今天上午在病床上写的两个条子附此。

五哥的两个条子，其中一个的大意是：想见他们；表示他原谅他们，也希望他们原谅他。另一个是专给小米的。祝福他幸福（已经结婚并且马上要生孩子）。

见到稼头大约是当天晚上，小米的爱人也在。我的信她们两人都看了，反应是出奇地冷漠。既没有向我进一步询问她爸爸的病情和生活状况，更没有丝毫表示自己对此的态度。尤其令我惊诧的是稼头竟说：军宣队想甩包袱；还说：她已写信给重之，要他不要回来，理由是不合适。

我实在抑制不住自己的气愤。以稼头这样的年龄和经历应有的水平，怎么能说得出来这样不合情理的话来！谈话就此中止了。

和小米的谈话，情况更坏（11月13日晚上）。我给他看了我写给他们上引的这封信。开始，我努力克制着自己，语气平静，不要使自己情绪激烈。可是，最后毕竟还是控制不住满腔义愤动了肝火。对重之来京的问题，他和稼头持同样的态度，理由是怕受他爸爸的影响。这真是一种奇怪的想法。用他们爸爸自己的话来说：我人都快要死了，还怕受什么影响？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不是可以这样提问题么？——如果他们自己认为思想正确，立场坚定，又有什么影响可怕的呢？最后，我激愤地说：如果你们仍然坚持你们原来的态度，不要你们说，我宣布，我和你们断绝关系，你们可以不认我这个叔叔。这次谈话当然是极不愉快，而且毫无结果。

要重之回来，是经过经济所领导同意，由经济所领导写的信，当然是代表组织的意见。至于五哥，原意是想要他回来照顾，可以把我顶替出来，免得把我累垮了。一方面固然是为我

着想，一方面也确实想借此机会可以和他的孩子“交流感情和思想”。因为在五哥的心目中，认为重之对他还有一定的感情。大约半个月后，重之给了我一封复信，表示坚决不回来，理由是“怕受爸爸的影响”。事实上，重之回来与否，其焦点集中在对他们的爸爸应当作怎样的评价和对他们的爸爸应当采取什么态度这两个实质问题上。

现在姑且暂时把第一个问题搁在一边，先说第二个问题。这就是：对于一个具有右派分子这样政治身份的爸爸，在他生命危殆的时候应当采取什么态度？

过去，我对于他们的家庭关系，从来没有干涉过，而且，我已经指出，对于他们过去所采取的立场、态度，我不想非议。还应当指出：他们立场坚定，坚持要革命，跟毛主席走，不怕艰苦，对工作认真，这些都是足以令人欣慰的。不过，我确实认为，即使过去，他们所采取的某些态度也太过份了。我所知道的事实远非全部（因为我毕竟远处上海，不在一起共同生活），为了证实我认为过份了的观点，我想列举几件我所知道的事实。

1966年，五哥夫妻俩各自向自己的所属单位打了离婚报告，但并未批准，也没有进一步办理过法律手续。以后五哥搬离家庭，从此以后一直分居，没回过家；1967年，五哥回家取书籍和衣服日常用品等，其子女闭门不纳，五哥在门外虽叫唤再三，坚决不让进门。后来还是邻居帮助他把东西搬下了楼；随后他们要五哥签具断绝父子、父女关系的声明。1968年4月，五嫂不幸自杀去世。他们不通知五哥，让他和五嫂最后告别，成为无可挽回的终身遗恨。1969年11月，当五哥即将随经济所离京去河南前夕，要求见五嫂一面而获悉她已不在人世，要求和稼头见一次面，此事经经济所军宣队领导同意并派人去和稼头联系，稼头竟拒绝会见；1972年8月，五哥自

河南回北京，探询到稽头地址后曾写信给她，却仍置之不理。这封信，1972年10月我去北京，因为要探询五哥下落，稽头给我看了的，我还能记得此信的大意。五哥在信中说，现在还谈不上我对你们尽什么责任，不过，我积存了一些钱（补发的生活费）和粮票可以资助你们。信中问老母是否还健在，祝老人健康长寿等等。信中另外还附了一张油票，在另外一张空白纸上粘贴了他刚回到北京后八天拍的八张或六张半身照片，特别说明，如果谁看到了要，可以给他。我读此信时，一面读，一面禁不住流下了眼泪。尽管重之他们可以责难和批评我“人情味”、“没有原则，只讲感情，只讲亲属”、“立场不坚定”，但我至今仍被五哥这种对他子女真挚的感情所感动，而并不为我的流泪而感到羞耻，更不认为这就是丧失了立场。

11月16日，经济所党内外群众经过讨论，一致同意通过给五哥摘除帽子。当天傍晚，经济所领导派了代表到医院去向五哥正式口头通知，还表示五哥的问题，早在1969年就准备解决，因为经济所长期瘫痪，因而给拖下来了，借此表示慰问和鼓励。这个情况，重之、稽头、小米等我都告诉了，他们都是知道的。按说，界限问题这个“障碍”这时已不复存在了。可是，重之仍然不回来，稽头、小米仍然不去医院。我实在不理解这究竟是为什么？

12月4日上午9时半，经济所在医院举行向五哥遗体告别仪式。虽然三妹、稽头、小米上午8时就去医院，我原来以为他们一定会和我一起送遗体去八宝山的，结果竟未去，陪同我去的只有李少甫、沈尉平两位老友。12月6日下午我去八宝山取五哥骨灰，这天上午小米就知道这事。作为五哥的亲儿，竟采取不闻不同的态度，结果也是我一个人去的。

五哥对他的孩子也实在钟情。在五嫂不幸去世以后，把他的全部爱倾注到孩子身上去了。还在一九六九年那么艰困的条

件下，他买了一只表，是准备给稼头的；同是在这个时候，他另外准备了一套被褥，打算有一天孩子会去看他时能用上；1962、1963年那么勤奋地笔耕（译述两本著作）是为了孩子；1972年回到北京写给稼头信中所表达的表示未能尽责的歉疚的感情是令人感动得为之涕泣的。每当他从我这里获悉他的孩子们的成长的情况，他感到十分欣慰；他把从我这里收集到的他的孩子的照片珍藏起来粘贴在照相簿中；而据母亲告诉我，孩子们却把父亲从幼时代起的照片全部毁弃了……所有这些和他的孩子对他的冷漠到冷酷程度的态度，不能不在我心中形成一幅强烈对照的图画！

有一次，我曾把他对他孩子的钟情戏谑地比作巴尔扎克小说中的“高老头”（这个比喻当然未必恰当），但除了引起他一阵苦笑之外，对他没有起到什么安慰的作用。

在五哥身患重病、生命危殆的时候，怀念他的孩子，想见见他的子女，想有一个亲子女在他身边照顾他，这原属人之常情。而他的子女在他缠绵病榻，生活亟需有人照料的时候，去作必要的照顾，也决不会有悖于毛主席和党的政策，更何况这时已经通过了摘除帽子，“界限”的障碍已不复存在。然而五哥的这个愿望，一直到他瞑目为止竟未能实现！

虽然孩子们对五哥的态度是这样，但五哥始终原谅他们，他认为不应当责怪他们。可是，孩子们对他的态度，却始终影响着他的情绪，而且成了对他致命的打击。11月27日，当他最后知道重之终于不会来，其他几个孩子也始终未去见他，他情绪激动，竟有四个小时不能平静下来。我记得第二天他见到三妹和七弟时，说了这样一句话：想不到过去写的东西（指断绝关系的声明）竟有这么大的效力啊！以后，虽然经过大夫和我对他作了许多譬解，情绪稍稍安定下来，但从此以后，病情急转直下，迅速恶化。11月28日，老中医第二次来复诊时，

一搭脉，就说是着了重急，生了大气，表示已无可挽救，勉强开了处方。从这天起，到他去世，为时还不到五整天。

关于他和他的孩子的关系，曾经一度是我们通信中的话题，不止一次地提到过。1974年9月我第一次去北京和五哥在一起盘桓的半个月中，也曾不止一次地谈论过这个问题。我虽对他说过：这实在是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的，他似乎同意这个结论。有一天，我们一起坐在紫竹院湖畔的长椅上，周围异常寂静，他情绪激动，以感叹的语气对我说：这个问题在他，总算解决了。其实，这个问题不过暂时在理智上解决了，他心中蕴藏着的对孩子的钟情，随时都会迸发出来。陈易在五哥病危的时候，曾以“英雄肝胆，儿女心肠”这样两句话劝慰过他，这后一句话的确说中了五哥的实在心情。

我曾经在给五哥的信中说过，这是两代人的矛盾。每一个时代都有这种矛盾，不过矛盾的内容随着时代不同而不同罢了！

现在，我要说，这是两代人的悲剧，是无可避免的，是时代的缩影。

五哥要求他的孩子原谅他。但我想说，不必要求这种原谅！

母亲的无法弥补的遗憾

关于五哥的病，对已经九十高龄的母亲到底怎么说，这是一个颇费斟酌的难题。11月4日晚，我去妹妹家看望母亲。对于我见到妈时怎么说，五哥已考虑到了。我们一致同意，不能瞒老人，因为瞒是瞒不住的。老人一定会奇怪，我才离开北京一个月，怎么又来了？瞒她，只会使老人满腹疑虑。因此，只能也应当如实告诉她。至于五哥病情的严重程度，当然暂时

还必须保密，免得增加老人不必要的忧虑。

妈听到我告诉她五哥生病住院，没有显得激动和特别不安。几天以后五哥从急诊观察室住进了病房，妈似乎更放心了一些。不过，每天一定要等我从医院回来，并且问过当天五哥病情变化的情况以后才肯去就睡。当妈知道五哥每天只能吃半流质的粥和牛奶，就悄悄地背着我掏钱要阿姨去买来了鸡和蛋等，并且总是默默地每天亲自到厨房里去操作，一切都弄好了以后，要我带到医院给五哥吃，藉以增加他的营养，增强体质。妈不能亲自到医院去探望五哥，妈的全部感情，妈的一颗慈母的心完全倾注到这里面去了。有一天，当我看到妈又默默地一瘸一瘸往厨房里去为五哥亲自操劳时，我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哽咽得淌下了眼泪。妈已经是九十岁的垂暮之年的老人，而五哥并不是没有子女。现在，他的子女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却要九十高龄的老母亲亲自为她病危的儿子操劳。处在这种一颗慈母的心和子女的异常的冷漠的强烈对照之中，我又怎么能不感情激动？！

妈唯一的遗憾是在五哥生前终于未能谋一面。

当妈知道五哥已经摘掉帽子，政治情况有了根本改变，而病情已经危殆时，曾以十分坚决的语气要到医院去和五哥见一面。她曾向三妹亲自提过，也曾向我说过。妈对我说：“已经十年不见，想去见见。”“我本来想在我病倒的时候，让老五来服侍我，想不到他现在竟要先我而去了。”妈说这些的时候，声调虽然还是像平时那样平静，但噙着的泪禁不住还是掉了下来，默默地用颤抖的手擦了一下。

对王姐的两个要求 二妹初回故乡 墓高筑墓立碑

但处在当前的现实情况下，我却不能支持妈的要求，原因是这里隐伏着见面以后老人和五哥两人一恸而绝产生更大悲剧的可能。我对妈说：现在你去见五哥，你心里一定会难过，五哥见了你也不免激动，万一你老人家再有一个什么三长两短，叫我怎么办？我真是上海也回不去了。这次，你无论如何就听我的。我每天去见五哥，也代表了你，就好像你自己去一样。母亲是十分通达的，虽然有点勉强，还是听从了我的劝说。但是，老人的无法弥补的遗憾，这个结局也就这样注定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老人的遗憾真的是不可避免的吗？

1972年11月底，当经历了这个时代的艰辛，我和樱初去北京见到五哥之后，就曾设想让母亲和五哥见面。但这个设想终于因为政治上的考虑，不要使三妹为难，我和妈都没有坚持而没有实现。临离开北京返沪之前，我和三妹达成了如下的“协议”：将来母亲病危进医院之后，立即通知五哥，让他们在医院见面。这个建议是我提出的，因为那时我还充满了希望，我满以为时间将能提供足够的机会。现在看来，我的建议多么愚蠢，而无情的不可预料的现实，把我的，也是母亲和五哥的共同的希望砸了个粉碎，现在悔恨也已来不及了。

1973年8月，当我知道五哥咯血以后，我曾写信给三妹，要她就近去看望五哥。之后，我又去了一信，提出我准备把母亲接来上海，这样，就使母亲有和五哥见面的可能。我指出，1972年的“协议”是不现实的，因为事实上如果母亲病危入医院时，多半母亲将已是不省人事，这时见面还有什么意义？我说，与其让母亲抱憾终身，毋宁让母亲和五哥见一面，即使一恸而绝也比抱憾终身好。对于我提出的这个建议，过了几个月以后，一直到1974年年初，三妹才通过七弟给我的信中才给了我答复。这是用母亲自己的口吻说的，说她老人家不想再

动，不想离开北京，我的第二次努力就这样吹了。

母亲的遗憾，如果把眼界扩大开了来看，原也不算得一回什么了不起的事。母子诀绝而不能谋一面这样类似的悲剧，古今中外，难道还少么！然而妈和五哥同住在北京有两年多之久，相距不过数里之遥，而竟然必须弄成个咫尺天涯，直到五哥离开这个人世间，不能让他们谋一面，这是我始终无法理解，也是我无法原谅的。

手足咫尺天涯

三妹对于五哥患病住院，早于我就知道了的。对于我会再次去京，自然也在她的意料之中，因为我之再次去京是她向经济所领导“推荐”的结果。她想继续保持十余年来和五哥之间的这种界限。对他的病，不想沾边，不闻不问。不过，既然知道我从医院里五哥身边来，绝对不闻不问也不行，但是我还是能辨别得出这种关心的真诚的程度。因此，当我见到她听了我病情介绍之后的冷漠的反应时，我并不感到奇怪。奇怪的是象三妹这样一个“老同志、老党员、老干部”竟然对我说：军宣队想推卸责任。我实在无法理解！

五哥住在首都医院（即现在的协和医院），三妹工作的单位离开医院相距不过咫尺，每天必经。自 1972 年五哥从河南回到北京，他们就一直不见面。11 月 16 日经济所党内外群众同意通过给五哥摘除帽子，当晚我就告诉了三妹。但是从 11 月 2 日经济所领导通知她五哥住院要她去看看以后，一直过了整整三个星期，到 11 月 23 日才第一次到医院去探望五哥！

在医院里经常有一些病友或病友的家属以关切地询问五哥的病，并在我离开医院的时候，主动照顾五哥。这些病友或病友的家属，与五哥和我都是一些素不相识的人，他们这种真诚

的关注不能不使我感动。而这期间，有一位女同志从南京来京参加张云逸同志的追悼会，住在三妹那里，三妹照顾得很周到。相形之下，不是显得太悬殊了么？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七弟是我写信通知他到北京来探望五哥的。他在北京待了五天，但一共只去了医院两次，在医院的时间总共不超过三小时。七弟与五哥没有见面，至少都在十年以上。一九七三年夏，七弟恢复了自由，来信告诉我他将去北京治病，并打算去看望五哥，我去信告诉了他五哥的地址，结果在北京待了两个月之久，却始终没有去。这次三妹、七弟要去医院探望五哥，事前我都告诉了五哥，并且劝他见面时不要激动，而他对见面时需要对他们说些什么，事前也作了考虑，但见面以后结果仍不免激动。五哥见到三妹时，首先对这几年来三妹承担起奉养母亲的责任表示感谢。三妹答复说：你知道了就好了。对七弟则重复说了：我想他们（指他的子女）想得好苦啊！说这话时声音是哽咽的、凄恻的；还说：他的病旷日持久。（他哪里知道没有再过多少日子，就永远辞别了这人间），一再叮咛七弟、三妹一定要想一个妥善的办法，找人来照顾他，好把我解脱出来。这次他实在出于不得已要我来北京以后，对如何能把我解脱出来，一直成为他的一樁心事放不下来。11月19日，七弟原说要回德州，后来因为便车这天不走，推迟到第二天回去。我原以为既然翌日他就要回德州，这天下午一定还会去医院告辞的，应当是情理之中的。那里知道他竟没有去。来京五天，临走以前，正是五哥垂危的时候，连向五哥告辞一下都不去，这在我的感情上无论如何也通不过去！我实在无法忍受！11月30日上午，七弟回德州，临走时，我只能对他这样说：“这次你来总算和五哥告别过了，我和你也从此告别了！”

兄弟，可以是同志和朋友，也可以是敌人。同样的，朋友，其情谊可以有过于兄弟，也可以最后成为不能两立的敌

人。这其间，当然是有原则为准绳的。五哥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是敌人吗？答复如果是肯定的，那么，就应该像对待敌人一样，他们根本不应该去看他。答复如果是否定的，那末，他们的态度岂不太有悖于常情常理？从我们几个弟妹的童年时代起，五哥肩负起我们这个家庭的全部重担，直到我们都参加了革命。我想，时间总还不至于把他们的记忆冲淡得毫无影踪吧？

遗书与后事

在知道了确诊自己是肺癌之后，五哥的神情看起来并没有特别的不安，还是那么平静，不过似乎证实了他原来的估计：这次要从后门出去了。11月中旬的有一天，他跟我说：有些身后的事需要向我交代一下，等过一天精神稍好一些再跟我谈。他的意思是很明白的，就是要我记下他的遗书。

11月15日下午，他对我交代了早已想好的身后的有些事该如何处理，和有些必须表达的话。还谆谆嘱咐我，要我注意健康，坚强地活下去。当天晚上我回去整理好了一份如下的初稿：

我于学问、政治已无能为力，这是我唯一的遗憾。

我热爱生活，我知道生活在人间的日子已经有限，我将勇敢地迎接死亡的来临。

对于所有关心我的朋友和同志，尤其对于里夫、耕漠两位老友对我真挚的关注，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生前所用全部遗物交给重之；在京存款（补发的生活费，现由六弟交给母亲保存）交给淑林，并入妈妈的遗存；在上海现由六弟保存的存款伍百元赠予里夫老友。

我所有的全部书籍交给六弟并由他全权处理。遗稿（一）有关希腊史部分交给吴敬琏同志；（二）其他部分均由六弟全权处理。

请六弟选择一些纪念物品代我送给张纯音同志和她的女儿咪咪。

医院认为：我的病例特殊，如果需要，我的遗体愿供解剖。我的骨灰倒在三里河中国科学院大楼（前经委大楼）前面的小河里。

祝福我的孩子们。

1974年11月15日下午口述，六弟记录。

第二天，我把记述的上述初稿给他看了，他认为前面两段话是空话，删掉。关于遗体愿供医院解剖，是这天他嘱咐我后添加进去的。11月17日我把修改稿正式抄录了两份，由他过目以后签了字。

但是后来正如前面我所叙述的他的孩子和他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他对孩子态度也有了变化。11月下旬的某一天他对我说：原来有一些考虑须修改。我懂得他的意思，便我还想等他精神好一些再谈这事。12月1日，我看到五哥已经处于危殆状态，这时五哥说话已十分困难，我觉得不能再拖延了，我只能把我对此事理会的意思告诉他，问他这样办好不好？他表示同意。当晚回去按照他同意的意见作了修改，作为他的遗书的最后定稿，谁知这时五哥已不能再执笔了。这份定稿，12月2日下午，我又向他把修改的地方最后重复说了一下，终究没有能签字。

修改的内容只涉及两句话，这就是：“我生前所用全部遗物以及我所有的全部书籍交由六弟并由他全权处理。在京存款（补发的生活费，现由六弟交给母亲保存）交给母亲全权处理。”

修改后的遗书虽然五哥没有签字，但这份遗书连同过去经过五哥签字的遗书我给经济所的领导同志、三妹、稽头、小米以及少甫等几位老友都看过，以示昭信。

12月2日晚，我到9时许才离开医院。五哥一股劲地像往常一样准时回家。这天下午3时左右可能是因为中午十

在一个小山包上，从山脚下到骨灰堂的办公室，有几十级台阶，我双手捧着骨灰盒，心情是凄凉的，脚步是沉重的，我一步一步吃力地好不容易走完了台阶。办妥寄存的手续后，又放到了指定的在地下安放骨灰盒的一个小龛里面。

归途经过三里河时，感谢经济所的杜培荣同志，是他扶着我走下陡峭的三里河前面的小河河岸。我默默地把五哥的一包骨灰抛到河中心，看着它缓缓地随着南去的流水漂浮了一阵，

来发展的方向和未来发展的一幅大体的图景。但是，今后的道路又怎么走下去，未来的理想图景又怎样实现，毕竟还得依靠人类自己不断地进行探索，一步一步走下去，现在的答案是没有的，正像万应灵丹是没有的一样。历史只能是在探索，实践；再探索，再实践的不断反复中往前演进，往前发展。如果承认历史的发展确实就是这样，那末，有更多的人作这种探索有什么不好呢？

就我自己对五哥的理解来说，我认为他就是属于这样一个人。他曾对我说过：他自己有一个十年计划，准备以十年的时间对西方和中国的整个历史作一个通盘的比较彻底的比较研究，并以此为基础对未来作一些探索，着重点是未来。他对祖国的未来、人类的未来一直是乐观的，充满信心的。他不顾自己身体的健康，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1974年春夏，有好几个月天天上北京图书馆，他的研究是十分认真和勤奋的。他的关于古代希腊史的研究，不过是他的整个探索的一个开端，他的一份十万余字的古代希腊史笔记（没有写完），不过是他的研究的一个副产品。他的这种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难道不值得尊敬吗？

可惜，一个人的真正价值是不容易被人认识的，就象玉之于璞一样。五哥的悲剧也正在这里。五哥常自称“白虎星”，这是他对自己的一种嘲弄。但是，可惜，确实有一些自以为正确、自以为革命的人，真的把他看作“白虎星”，象对待瘟神一样，害怕和他沾上一点边，即使他最亲近的亲人也竟不免如此，岂不悲哉！

五哥，当然不是一个完人，不是一个没有弱点和错误的人。然而五哥生前，我曾对他许下过这样的诺言：我要尽我的努力使他的子女对他达到真正的理解。因为我感到他的子女对他不理解，或者甚至从一些表面的事实对他产生一种错误的理

解是十分不幸的（当然，这种不幸的事肯定并不止发生在五哥一个人的家庭中）。这个诺言，因为我还没有来得及作必要的努力（当然也应该责怪我没有认真及时地去作这种努力）和五哥过早地去世，在五哥生前没有能实现。以后，这个诺言会不会成为一种奢望，我不知道。因为他的子女和他毕竟是两代人，他们的经历和经验，他们所处的环境条件和所接受的教育、影响，毕竟存在着巨大的差别，而这种差别常常不是我一个人的努力所能消除的。但是，我仍然把我写的这篇悼念五哥，为自己寻找某种慰藉的文字，也当作是我为了使他的子女对五哥达到真正的有所理解的一种努力。我希望将来有一天他们会有机会看到我这篇文字和现在由我保存的五哥遗留下来的全部文稿，其中包括他的自传材料、笔记，保留下来的他和我通信中极其有限的一部分，还有他的一些日记。

我知道在这篇文字中我使用了一些措词激越的词句，我不想改动它，因为它真实地反映了我当时的思想情绪。我记录下来的也全部都是真实的事，虽然，我的本意并不想谴责任何人，因为正如五哥所说：“不能责怪他们”。整个悲剧是时代使然。

1975年3月4日午后写完

后记：想写一篇悼念五哥的文字的心愿已经很有一些日子，但直到2月16日才开始执笔。其间正好收吴敬琏同志托人带来的五哥的《希腊史笔记》的遗稿，为了读这份笔记，这篇文章搁下了一些日子，一直到3月4日才写完。

这篇文章我准备在我死后给五哥的所有几个孩子看看，我希望拿到我这篇文章的人能忠实地执行我的这个期望。

1975年3月28日

附记：此文写成后，从未公开发表过，只是给少数亲友看过，写作此文的目的在于使五哥的孩子对他们的父亲能有真正的理解，这是五哥生前我未能实现的诺言。现在，这个目的已经达到，因此这篇文字的意义只在于忠实地记录了五哥生前最后一个月中所经历的一切。

1995年12月11日

汪璧——一位不应被遗忘的女性

陈敏之

至少已经十年以前，陈修良大姐曾不止一次向我提出，应当为汪璧写一篇纪念文字。这件事一直悬在我心上，不敢忘怀。之所以迟迟未曾动笔者，乃因为我与汪璧虽然情属亲谊，但细数起来，真正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实在有限，有关她的生平事迹所知不多，生怕写出来不免干巴。

为汪璧写纪念文字最合适当然莫过于我的五哥顾准，然而他离开这个尘世已经二十一年。他生前没有留下任何纪念文字，仅留下了一点痕迹——1969年10月，经济研究所“一锅端”下放去河南东岳前夕，他似乎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感到秀也许不在了”，因此，再三要求和他和妻子见一面，连队负责人拗不过，只得以实相告，她已经死了，可是死期、死况、遗言，一概不知。在听到这个死讯以后，他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字句：“闻噩耗，既觉意外，也不觉意外，意外的是她爱孩子，为什么给孩子留下一个‘母自杀’的家庭环境；不觉意外的是，1965秋，她已写过遗嘱，1967年5月，她看来已经在支持不住了。”日记接着写的是：“我就去打饭来吃，吃了几口饭，悲从中来，脸伏在饭盒上失声大号。但是我还是抑制住，努力把饭吃完，我要活下去……”

1934年他们结婚，我是亲见的。当时顾准19岁，汪璧20

岁。五哥属于早熟型，因此结婚也早。因为处于地下，结婚没有任何仪式。结婚以后三十多年，当然也有多次离别，战争年代，也常常生死难卜。1943年，顾准在去延安途中，越过平汉路封锁线时，一颗流弹把头上戴的帽子打了个洞，子弹擦过头皮，差一点就“光荣”了，如这次真的死别，顾准与汪璧分手已经四年，竟未能见上一面，说上一句话。两年前，我去北京，一位我素来尊敬的兄长辈问我，汪璧为什么要自杀？我实在无辞以对。还是顾准最理解她，她“已经实在支持不住了”，才最后不得不作了这样的选择。党章和宪法都被践踏，空气中到处充溢着无法无天，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可以说自己的心声，心每天都在淌血，除此，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

1967年11月，我有机会去了一次北京，特地去百万庄探望五嫂。看上去，她不只疲惫，而且显得十分憔悴、衰老，一脸病容。我在她那里吃了一顿饭，没能谈什么，也不可能谈什么。现在回想，我十分懊悔，为什么当时连一句可以使她稍稍宽慰的话也没有说。饭后我即去探望住在我妹妹那里的老母亲（1965年送去太原，这时已迁来北京）。这是我和汪璧最后一次见面。到北京来后没有几天，我自己也失去了自由，音讯完全隔绝。1969年9月回到家里，才知道她已于1968年4月去世的确实消息。

她的死，毋宁说是悲壮的。为了保持自己的清白，不被污辱，能够勇敢地面对死亡，难道能说是一个怯懦者？对于这样一位默默地奉献了自己一生的女性，我永远在心里尊敬她。

汪璧，原名方采秀，进入解放区后从母姓，改名为汪璧。结婚以后的第二年，1935年10月，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受到破坏，组织上决定顾准离开上海，汪璧陪伴他一起流亡北平。他们坐的是一艘货轮，去天津再转北平。临行的这一天清晨，我特地从南市家里赶至杨树浦码头为他们送行。已经是深秋，

江面上有一层薄雾，似乎增添了几分离别的气氛。这是我第一次与亲人离别。以当时的政治环境，谁也难以预料什么时候能再见。当时离别的情景和我的心绪，至今犹清晰可忆。

在北平，他们开始时分别住在小公寓里，以后两人一起租住民房，依靠顾准的笔耕收入（此时顾准为潘序伦编写一些会计学著作以获取稿费，上海的家庭开支也依靠它），过着最清苦的流亡生活。他们经常去北京大学等校旁听，或者到北京图书馆，勤奋学习，不久，北平学生掀起了“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震撼全国。这时，顾准在北平等待将党的组织关系转去已经有几个月，却仍未接上。1936年1月，接到组织通知，乃于是年2月返回上海，立即投入已经蓬勃发展起来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党的地下工作。

从1936年初回到上海至1940年7月顾准离开上海进入苏南解放区的这几年中，顾准为了躲避追捕，还曾有过多次政治流亡，住所经常搬迁，生活极不安定。在此期间，汪璧曾生过两个孩子，流产过一次，两个孩子，同样在一岁多点、以同样的脑膜炎症夭折。孩子夭折，对一个年轻的母亲感情上的打击如何严重是可以想见的。我曾在无意中读过汪璧在孩子夭折后所写的日记，一种母亲为丧失自己孩子的难以尽言的无限哀恸、凄楚，在字里行间跃然而出，读之催人泪涌。在同样艰险的地下革命的环境里，女性的负担（无论是生理上的和精神上的）总要比男性沉重得多，汪璧自然也不例外。

1937年11月，中共江苏省委成立。1938年1月在江苏省委领导下，成立职员运动委员会（简称职委），彭柏山为书记，顾准、胡实声、陆志仁等为职委委员。汪璧在职委领导下从事职业妇女工作。当时职委会议经常在顾准家里召开，汪璧也常列席会议汇报职业妇女方面工作开展情况。在当时封建性、殖民地性依然极为强烈的旧中国，职业妇女在工资待遇、劳动条

件等方面都受到很多歧视。例如海关、邮局等都明文规定已婚妇女不予录用，录用后结婚者即予开革等等。为此，上海职业妇女为求自身解放，自1935年起，就有“中国职业妇女会”的组织，其骨干为启秀女中毕业的同学。已在海关工作，也是启秀毕业的茅丽瑛是这个组织的核心人物。1938年5月，为了适应当时已成为“孤岛”的政治环境，更有利于开展群众运动，中国职业妇女会改组为上海职业妇女俱乐部（简称“职妇”），茅丽瑛被选为主席。汪璧代表职委领导“职妇”的工作。茅丽瑛被发展为党员是汪璧向职委提出建议，交由当时也在海关工作的胡实声完成的。茅丽瑛入党后，更积极地开展“职妇”工作，为支援新四军，发动募集寒衣，搞义卖活动等，工作异常活跃，因而遭到汪伪特务暗杀，奉献了年青的生命。消息传出，整个孤岛为之震动。

1940年7月，顾准离开上海到苏南解放区，汪璧和她的第二个孩子，还有母亲仍留在上海。这时我们家似乎成了党的什么秘密机关，利用我母亲和汪璧这样的家庭环境作掩护。因此，皖南事变后我经过上海去苏北，随后顾准从苏南奉调经上海去苏北，都不准在家里停留。出于恪守党的纪律，我至今都没有问过究竟。

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驻上海租界，孤岛陷落。汪璧和陈修良同志等一起撤至苏北。1943年，解放区为了度过最艰难的时期，执行“精兵简政”政策，汪璧携带她的新生女儿只身回到上海，直至1944年冬再回到解放区。这以后，经历了抗日战争的胜利；顾准从延安到华东，老母亲和汪璧的大女儿从上海接来解放区以后的团聚；三年解放战争中从苏北撤退到山东，再撤至大连，辗转流徙的战争年代的艰苦生活；然后迎来了全国解放。

上海解放，汪璧起初在华东财政部公营企业财务管理处任

附录/

副处长（顾准兼处长）。解放初期，许多工作均属公开性质，公营企业财务管理处更是一项新的工作，不仅要有一定的业务能力，还要有相当的政策水平。当时，顾准为了开拓这项工作，网罗了一批思想进步的党外人士在这个处工作，这是一些在解放前就已颇有地位，担任厂长、经理，有经验，有才干的专家。汪璧处身其间，要搞好关系，做好工作，并不容易，但她以其特有的平易、谦逊、诚恳的态度和作风，获得了他们的尊重，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1952年的“三反”运动中，顾准以莫须有的罪名受到错误的撤职处分。“三反”撤职，对顾准和顾准家庭的命运都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顾准被撤职，汪璧自然感到十分突然。曾经有好心人劝汪璧离婚，被婉言拒绝了，因为她对自己的丈夫有充分的理解和信任。

在我园 历三十六第一集 由越共党中央委员会第一集

哪里知道这是在玩火！新中国虽然是以马列主义为立国之本，但哪里是能随便自由研究得的，自由结社更是犯了天条。发现这个“反革命”组织，给当时康生企图把张闻天、孙冶方、顾准打成一个有组织的反革命集团提供了最好的根据。顾准在经过100多天最严格的隔离审查后，证明他和这个所谓“反革命团体”毫无瓜葛，但仍然认定思想上脱不了干系。于是，1965年国庆节后，顾准再次戴上右派帽子，并决定发落到房山大韩继村监督劳动。随即，汪璧被迫作出了别无选择的抉择，决定与顾准离婚。就这样，这个家庭彻底破碎了。原来以为是暂时的离别也就成为难以弥补的永久的诀别。

所有对汪璧比较熟识的人，都知道她是一个十分善良、沉静、娴淑的女性，在她身上，既有古代妇女传统的美德，又兼有现代革命女性坚毅的气质。她的一生是平凡的，没有一点英雄传奇色彩；她为追求人类的崇高理想默默地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她对社会、家庭、丈夫、孩子、母亲只有给予，从来不知道索取，她永远是谦逊、朴实的。1980年2月，在汪璧死后十二年，为他们夫妇俩一起举行了一个庄重的仪式，把他们俩的骨灰盒重新安置在一起，一对受尽人间折磨的灵魂，从此可以在一起互诉衷肠。但愿他们能够得到生前没有得到的永远的安宁吧！

给顾准伯伯的最后一封信

徐 方

顾伯伯：你好！

刚刚收到妈妈的信，获悉你病重的消息，真是悲痛万分！我实在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此时此刻的心情。我不能失掉你，你是我的启蒙老师。是你教给我怎样做一个高尚的人，纯洁的人，一个对人类有所贡献的人。几年来你一直是我心目中的“模特”。尽管我现在还很幼稚，但我是在你带我踏上的人生道路上沿着你指出的方向一步步走去的。我是顶讨厌个人崇拜的，但回想起来一生也就崇拜过一个人——这就是你。

几年来我们在一起的那些日子像电影一样在我眼前重现。东岳的月光下你告诉我要像小孩捡石子一样为自己收集知识财富，从那时起我才下了活一生学习一生的决心。你对我讲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要为自己寻找一个目标，即使明知道这个目标是自欺欺人的，也要向着这个目标去奋斗，否则你生活就没有中心。在这一点上你就是这样做的，你对我起了一个以身作则的作用。我现在也在为自己寻找着新的目标，为这新的目标奋斗着。在生活的道路上我又碰到了许多使我感到十分矛盾的问题，我多么期望能把这些问题向你倾诉，得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好答案。但现在看来暂时是不太可能了。我相信你会坚强地生活下去的。听说明年年初要搞调演，那时我们就又能见面

了。

听说你的孩子还是不肯来看你。我想你也不必过于为此伤心，我就是你的亲女儿。尽管不是亲生的，难道我还不能代替他们吗？！

我知道泪水是救不了你的，只有用我今后的努力和实际行动来实现你在我身上寄托的希望，这样才是对你最大的安慰。

就先写到这儿吧，希望你勇敢地面对现实，要有信心把病治好。

祝

早日恢复健康！

咪咪

74.11.18

迟到的理解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读后附记

顾淑林

1983年初到1984年初，我仔细阅读了这本通讯录（系尚未出版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手抄本）。（其间遇两次搬家，又有近半年没有住处，因而拖延了时间）流畅的行文，深邃的洞察力，中肯精辟的分析，使人折服。在这后面的是父亲对国家前途极度关切的责任感和探讨真理的热情、勇气，它是如此汹涌澎湃，深深地激荡着我的心。原有的父亲的形象，至此彻底地清晰高大起来。骨肉情感，对动乱年代和家庭变迁的痛苦回忆，成年以来对文中所及问题的思考，以及严酷的自我剖析，所有这一切，困扰在一起，多少个夜晚不能成寐。

可以说，凡是与国家兴亡有关系的重大问题，父亲几乎都涉及到了。对这些问题的本身，我不敢妄加评论，从中表现出来的品格气质，使人想起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说过的话：“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感谢六叔陈敏之保存并整理了这样的一部珍贵的文稿。

1965年底，父亲第二次“戴帽”，我被告知父母亲决定暂时“分手”。“这样可能对他（指父亲）的改造有好处。我们说好十年以后再见。”母亲这样对我说。那一年我二十三岁。从

这以后，我们和父亲没有再见过面，在这之前，我和父亲相处的时间也十分有限。对我来说，从1961年底到1964年这一阶段算是接触最多了，——每月一次的回家（我在念大学），其他的时间里，父亲要么在前方，要么在异地工作，要么在出差，要么在劳改。

我们这些“右派”子女，从少年时代起就面对着许许多多的怀疑、冷眼和挫折，但在忘我的学习工作劳动中，以自己的行动赢得了谅解和友谊。我们的信仰可谓真诚，这里面原因很多，有学校社会的，有家庭亲友的，有个人的。我无法在这里展开来一一回顾。记得我的中学那个团支部，真有点“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味道。在文化革命的高潮之中，我的支部书记和党委书记，曾为我划入编外名单和军管小组据理力争，党委书记周行松说：“你家庭没有问题”，挽留我在七机部工作，然而在1972年夏天父亲回京以后，我拿着父亲的信征求他们是否去看望父亲的意见时，他们默然了，“再等一等”。前不久的一九八四年春节我才得知，他们曾为此亲去科学院了解情况。还有，人们可知道母亲去世的惨状和她的遗笔？还有周恩来总理的榜样……

说我“至死一直在反对父亲”，这实在是抬高了我。1965年以前，我不觉得他讲的有道理，而我，愿意献身我所相信的一切；以后是长年的相互隔离，父亲更加深刻、通达（这是熟悉父亲的亲戚的评语），我们也在成熟起来，但是我们都是没有得到填补隔离造成沟壑的时间。

我不想逃避自责，也无法躲开痛苦。我的父母感情很好，家中每一个人包括祖母和我们大家都心胸开阔，从未有过什么“家庭纠纷”，我的家庭的离异，对每一个人来讲都从来不是轻松的事。如果说过去还有一种超乎家庭关系之外的神圣责任感部分地掩盖亲子感情的话，那么今天我们是在赤裸裸地经受着

感情的煎熬。我逐年地追踪着父亲的一生，1957年以后，他是一步一步地从地狱中趟过来的呀。他的深刻的思索是在数不尽的批斗、侮辱甚至挨打之中完成的呀。在他最需要亲人的时候，亲人远离了他，可是恰恰他的思考，包含着更多的真理。人生只有一个父亲，对于这样的父亲，我们做了些什么呢？

说我主张“依附”，这是一场误解。我们参加工作进入社会已久，每人写得一部自己的历史，我没有依附的思想，也没有依附的行为，有的刚好还是它的反面。当然这些并不重要。问题在于，从依附与否着手，是否能触及我们家庭悲剧以至社会悲剧的症结，另外，与此多少有点关系的一个题外话，或许也应该提一提，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父亲的以至我的家庭的悲剧，是他的某一个女儿还是某一个儿子？我觉得我们用片面的绝对化的眼光看待事物，已经吃尽了苦头，现在需要的是深深的实事求是的分析，需要更多的沟通和谅解。

真正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的，是需要解决这样一个悖论——为什么我们和父亲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愿意献身于比个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标而却长期视为殊途？强调隔离时间的久长，搞技术工作理论水平低等等，都仅仅是外部的原因，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准则，为什么容不进新鲜的、可能是更为科学的内容？究竟哪一部分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今后对亲人以至社会，再做蠢事？对于一个愿意严肃生活的人，必须有勇气正视、解答这些问题，并且承受代价。

1984年2月

患难之交 相濡以沫 ——骆耕漠访谈录

邢小群

(骆耕漠先生今年 89 岁，是我国老一辈的著名经济学家，曾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等职。他曾与顾准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同事多年。在文革中，骆耕漠被污陷为“叛徒”、“反动学术权威”，在自己的处境异常艰难的情况下，仍然给了顾准难得的帮助。他们之间的友谊，可谓相濡以沫的患难之交。现在，骆老已经双目失明多年，但他听说《顾准日记》即将出版，还是欣然接受了笔者的采访。)

我对骆老说，听说，您在文革期间顾准最困难的时候，不遗余力地帮助、关心过他。今天想请您谈一谈。

骆老精力尚好，但是长时间地谈话，对于他来说还是比较困难的事。骆老说，这个事，我愿意谈。为了表达我们对顾准的纪念之情。

他说，抗战时期，我是盐阜地区行政公署财经处处长兼苏北区党委财经委员会副书记，那时顾准在沙家浜一带打游击。中央让他到延安汇报工作，并给了他一个任务，让他到淮海地

区转一下，然后再去延安。他去延安要经过苏北一带的封锁线，在等待过封锁线的机会时，他曾给我做过助手，任盐阜区财经处副处长；他也曾在淮海地区行政公署任财经处副处长。我们就是这样开始相识的。他从延安回来后，我们又在苏皖地区见过面。但是当时彼此并不很熟悉。

真正比较了解顾准，是建国后在华东财委和在经济所成为同事以后。

骆老主要谈了顾准从干校回到经济所以后的情况。

骆老说，1969年我和顾准等一起下放到河南干校。从东岳干校搬到明港军营后，我们谈话比较自由了，但也不能“乱说乱动”。那时顾准的身体还算好，没有看出有什么病。当时到河南找我们外调的人很多，浪费人力财力，很不方便。周总理说，他们下去已经两年多了，让他们统统回来吧。于是，1972年5月，我们就回到北京。下干校时，很多人都将房子退掉了，而回来的人很多，包括军宣队、工宣队，房子已不够住了。没有住房的人只能到亲戚家借住。我也没了房子，住在我弟弟家。顾准和江明在干校时就住在一起，他们又是不能住到外面去的人，到了学部，仍住在一起。那个房间有个小套间，顾准住在里面。顾准整天就是看书。当时正认真地看《圣经》，当然是作为学者在研究。并且，我看他还给商务印书馆翻译《龙巴特》。他比较困难，想挣点稿费。他经济拮据，却买了一个双灯罩的台灯。江明问他为什么买这种台灯，还很贵？他不说话。后来我们才明白，是为了纪念他的妻子汪璧。一个座台两盏灯，仿佛她就坐在对面。

那时顾准虽然瘦了一些，但不像有了什么了不起的病。当时我那种身份也不便找别人谈，每天去学部上班，就只到他那里坐坐。张纯音住在顾准他们对面。有一次她对我说，顾准总是看书，身体好象衰弱了些。于是我、张纯音、江明就设法带

他出去吃吃小馆子，借此让他走动走动。那时我妻子唐翠英也常烧一些红烧肉，让我用大搪瓷缸子带给他吃。

记得我刚补发了工资，家里人分散四处还没有回到北京。我请顾准到莫斯科餐厅吃饭。回来时太阳落山了，他说，我们走条近路回去吧。其实路也不近。走到一座楼前，他眼睛望着楼上一个窗户，默默地停了好长时间。我才知道，他是特意到汪璧住过的地方凭吊，汪璧是在这里自杀的。我知道他们俩感情很好。早在 1965 年经济所干部下放到周口店搞四清，有一次我要回家，顾准（因戴右派帽子监管劳动不能回家）对我说，你能不能去看看汪璧？顺便请她找一下带耳朵的棉帽子和围巾给我捎来。我找到了汪璧。她说，我就给你找，麻烦你带给他。文革开始后，他的女儿带头逼迫她妈妈与顾准离婚，想来孩子们和他妻子都遭受到了巨大的精神创伤和压力。

有一天，我到经济所上班，吴敬琏仓促地赶来告诉我，他刚把顾准送到首都（协和）医院观察室。吴敬琏在干校营房时孤零零地自己住在一处，他和顾准多有交流。回北京后，有个政策，我们得了小病在学部卫生所看；大一点的病，到学部所在的区医院。能让顾准到首都医院，看来他是病得不轻。顾准正在首都医院半地下的观察室。那里没有关系是搞不到床位的。吴说：“我也没有办法。”我一听很着急。想来想去，想到抗战时我在苏北工作时，有过数面之交的杨纯。在淮海区，杨纯和顾准曾在一起工作过。她时任卫生部副部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党委书记。吴敬琏陪我去找她，她正在开会。我就写了个条子留给门房，大意是：顾准你是知道的。他现在病得不轻，正在观察室里，我心里很不安。你能不能看在老关系上，请你的秘书关照一下……说实话，条子能不能起作用，我们不敢抱希望。第二天我到医院观察室去看顾准，人家说已经去了病房，我才长舒了一口气。顾准住的是七、八人一间的那种中等

病房。他靠在病榻上，见我进去，直作揖，感谢帮他进了病房。我和他讲了找杨纯的事，顾准也慨叹再三。

顾准的病是在肺和心房外部之间长了个瘤，医院研究来研究去，感到手术很难做。他的弟弟陈敏之告诉他，做手术没有把握。但是他决心要动手术。认为不开刀是死，开刀或许还有希望。

我和张纯音打听到协和医院东边有个姓李的老中医，是看疑难病的高手，就去找他。李医生让我去协和医院征得医院同意；并要求有车接送才能出诊。医院那边是同意了，我们这边的小轿车怎么办？我先是找到老伴的单位，希望他们能帮帮忙，回答说制度规定不行；又找到我在杭州监狱时的难友、原铁道兵团政委张崇文同志。后来就是张崇文政委派司机接送老中医，给顾准看了两三次病。

当时北京人艺的著名导演焦菊隐同顾准在一个病房，有一次，焦菊隐对别人讲：顾准看起来是很倔强的，但也有脆弱的一面。我与顾准交往中也感到顾准有很骄傲的一面，被他看得起的人不多；但也有很谦虚的一面。比如，他去延安经过淮海区，去时和回来就不大一样，回来后谦虚了许多。他有很固执的一面，也有儿女情长的一面。他非常想念他的儿女，特别是想见见他的小儿子。但是儿女们因深受他政治问题的株连，对他成见很深，当时政治气候还很左，他们都不愿意或不敢来见他。军宣队的人对他也很同情，在他病重时，就在一个字条上写下：“我是有错误的”的几个字，让他签字。希望他儿子见了字条能够来看他一下。开始他不同意签字，经过大家反复劝说，才勉强签了字。结果他儿子始终没有来。顾准临终前一天的下午，我带着我的小女儿去医院看望他。看到我的女儿，他自然联想到他的儿女。在回家的路上，小女儿伤感地对我说：“顾叔叔落泪了，一大滴、一大滴的……”

顾准临终时讲到他非常感激三个人；一个是林里夫，一个是李少甫，一个是我。林里夫和顾准都是“一·二八”上海“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的发起人。当时在上海一“文”一“武”很出名，文委方面的周扬、夏衍他们都知道林里夫。建国后林里夫是《经济研究》的主编。林里夫还是顾准的入党介绍人。文革中被整得很厉害，但人也很硬气。顾准病后，大家说是不是给顾准请个人照顾他。林里夫说，不用，我女儿在内蒙插队，刚病退回来，就让她来照顾。以后，他就让女儿像侍候家人一样每天在医院守在顾准身边。李少甫人很正直。30年代他在杭州经营了一个很大的火柴厂，生产的火柴够整个浙江省用。抗战初我们在浙江办刊物，他说，我可以用做火柴盒的纸给你们换白报纸用。顾准病后，他专程从上海赶到北京看他两次。

顾准病重后，科学院学部对他不错。白天是林里夫的女儿照顾他，晚上学部经济所派人到医院值班。最后一个晚上吴敬琏在他身边。第二天，我在去学部的路上，被吴敬琏叫住，他告诉我，顾准去世了。后来，我们一起去了医院，看到的顾准遗体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了，非常难过。因我年龄大了，大家不让我去火葬场。最后陈敏之及顾准的妹妹和他大女儿、我和我妻子、林里夫等人绕他的遗体一周，举行了小小的告别仪式。

火化以后，陈敏之告诉我，顾准要求把他的骨灰撒在经委、计委大楼西的那条小河里。他曾在这一带工作过。他觉得河再小也是通往大海的。我们一块儿到那条小河边儿，小河边儿没有台阶，我只好拉住陈敏之的手，让他探下身子把骨灰送到河里。他只撒了一半。另一半落实政策后，从人民公墓送到了八宝山革命公墓，放在正局级干部停放处。这虽非死者所愿，却安了后人之心。

顾准去世后，陈敏之说，大家对他这么好，他留下的东

西，你们每人挑一件，留作纪念吧。江明说，我要那盏双罩台灯，以后，我会想到顾准工作时的情景。我说，我要顾准那把大算盘，那把大算盘跟了他多年，他算盘打得非常好，可以双手打飞归。陈敏之就把算盘送给了我。

骆老说话很吃力，很慢。前后竟谈了将近四个小时。最后，他对我说，你写多写少都不要紧，关键是请表达出我的一份感情。

我与顾准的交往

——吴敬琏访谈录

邢小群

邢：您与顾准是好朋友，想请您谈谈和顾准交往的前前后后。

吴：顾准1956年和1962年两次进经济研究所。其实只是在他第二次来所，特别是1968年在河南明港干校，我们才相熟而且相知起来。

顾准第一次来所，是在建筑工程部洛阳工程局和部财务司担任几年行政领导工作以后，想退出实际工作，冷静地思考一些问题，就趁当时“充实文教战线”的机会，调到经济所做研究工作。初来的时候，担任我所在的财政组的组长，所以是我的直接领导。但他并不管组里的行政事务，从早到晚都钻在经济所图书馆的书库里读书。他留下的经济学文章都是那个时期写的。当时，他已经意识到计划经济体制全面建立以后有什么事情不对劲了，因此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这篇论文里，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生产也可以由市场规律自发调节的观点。他的这种观点在当时的中国经济学界是非常超前的。在粉碎“四人帮”以前，虽然曾经有一批经济学家提出过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各企业之间交换的产品也是商品（南冰、索真），或者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卓炯）等突破性的观点，但是没有一个人达到了顾准那样的水平。甚至像孙

治方这样杰出的经济学家，虽然提出了“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的口号，但他还是再三说明，自己所讲的“价值规律”是“第二号价值，规律”，而不是听任价格自发涨落的市场规律。只有顾准鲜明地提出让价格的自发涨落、即真正的市场规律来调节生产。所以，**顾准是中国经济学界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第一人**。我当时研究的课题是企业改革。我的思想还停留在“利用价值规律”、“加强经济核算”的水平上，所以说对顾准的思想是完全不理解的。

就在这期间，所里爆发了一场青年人和党支部领导之间关于“向科学进军”问题的争论。同时，当时经济所的一位领导人在审干中被怀疑有什么“历史关节问题”。于是，上面考虑更换经济所的领导，有意让顾准当副所长，代理所长。但是，当时将被取代的一位领导成员，恰好是顾准参加革命时的直接领导。顾准觉得由他来取代老领导，不符合中国人做人的准则，便要求调离经济所。中国科学院领导同意了顾准的要求，把他调到了科学院所属的综合考察委员会任副主任（主任是由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兼任的）。顾准在综考会大概就办了一件事，即与苏联科学院生产力配置委员会联合进行的黑龙江流域综合考察。可是就在这项工作中惹出了麻烦。

在黑龙江考察期间，几位苏方人员态度相当蛮横，凡是开发的好处都想留给苏方，而造成的损失却让中方承担。顾准看不惯这种大国沙文主义的作风，采取了针锋相对、据理力争的态度。考察组有的中方领导成员认为，对“老大哥”应当恭谨从命，就把顾准的有关言论记下来，报到北京去。正赶上“反右派”，由于顾准的这些言行违反了毛主席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中的第六条：“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他被打成“右派分子”。我那时也因为“严重右倾”挨批，所以不知道批判顾准的具体过程，只知道在科学院范围内印发了辑录他的

“反党言行”的专题材料（他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作用的言论当然也被辑录进去了），开过好几次批判会，然后正式戴上“右派”帽子。他后来对我说：1957年那次当“右派”纯属“误会”，戴上“右派”帽子促使他重新思考，思想发生不少变化，对“左”的那一套开始有了认识，所以第二次在1964年因为批评对毛主席的个人迷信再次戴上“右派”帽子，倒不是误会了。

1962年他被“摘掉右派帽子”之后，由于他的老友孙冶方的安排，回到经济研究所，分配在政治经济学组工作。这时顾准的思想已经变得很成熟。他后来说过，1952年在上海被免职时，思想还是相当正统的，只认为是被个别人挟嫌报复，并没有想到在制度上有什么问题。后来当了“右派”下放劳动，接触了农民，看到他们与城里官员过的天差地别的生活，联系到党内生活中出现的种种不正常的现象，才有了认真的反思，逐渐意识到夺取政权、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存在一个“娜拉出走以后怎么样”的问题。

邢：顾准第二次来经济所以后你们的关系怎样？

吴：我那时自认为属于力求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行自我改造的知识分子，根本不理解他的想法。他那时主要搞自己的翻译，跟我们也不太往来。

邢：当时“摘帽右派”不能搞研究，只能搞资料吗？

吴：那倒不是。据我观察，他和孙冶方是生死之交，孙冶方对他是非常尊重的。所以只要孙当所长，还能保护他。这段时间顾准主要的兴趣是读书，搞翻译。他翻译了好些书，比如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这本书就是那时翻译的。不过这种状况只持续了一年多时间。1964年夏天批判孙冶方一开始，首先就拿孙的老朋友们开刀，一个是骆耕漠，一个就是顾准。拿他们开刀的目的，是想说明孙的朋友都

是叛徒、修正主义分子。当时顾准的一位外甥在清华大学办了一个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读书会。这个读书会被打成反动小集团。外甥交代了顾准平时谈到的一些想法，于是就说顾准是这个“反动小集团”的“黑后台”，给他第二次戴上“右派”帽子。在那个年代里，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例如，在孙冶方的罪状里有一条叫做“里通外国”，根据是 1958 年大跃进时，原来国家统计局的苏联专家、苏联国家统计局平衡司司长索波里访问中国，问起当时的经济情况，孙冶方用俄语讲了一句“头脑发热”，后来被人揭发，就成了孙冶方“里通外国”的证据。至于我，当时积极参加运动，不但对顾准很“左”，还批判过自己的老师孙冶方。虽然孙冶方对我们这些积极参加运动的年轻人很宽容，当 1975 年他从监狱出来，我去看望他，并代表周叔莲向他道歉的时候，冶方说，在当时的环境下，我们这些人或多或少都有过类似的经历，这事你们不要再提了。不过对于我们来说，却不能不把自己由于自私和盲从而在政治运动中采取的错误态度，引为终身的教训。

邢：那么，后来你和顾准是怎么接近起来的呢？

吴：我开始比较理解他，是 1969 年以后的事情。那时我在哲学社会科学部河南信阳专区的息县干校被定为“帽子拿在人民手中”的“反革命分子”，到劳改队劳动，开始和他朝夕相处。“文化大革命”以后，当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群众分成了三派，一派叫“联队”，一派叫“总队”，还有一派叫“大批判指挥部”，我自己属于第三派。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这三派之间一直打来打去。

邢：那时顾准干什么呢？

吴：顾准因为是“死老虎”，不在矛盾的中心，就有可能在旁边看。在林彪死了以后，管制大大放松了，他对经济所几派的头头都讲过，你们今天你打倒我，明天我夺你的权，自认

为在搞革命，光荣得很，其实不过是给人家当棋子摆弄，有什么意思，不如安下心来读一点书，做点对人民有益的事情。据我所知，有的同志听从了他的话，后来在学术上真有进步。

军宣队来了以后，开展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先是依靠“总队”并联合“大批判指挥部”的一些人把“联队”彻底打跨。把“联队”的几乎全部骨干都打成了“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然后，又开始整“大批判指挥部”的人。

邢：把你打成“五一六”分子了吗？

吴：是的。他们抓住我曾经议论过康生这一点，说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证据确凿，完全可以定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不过“帽子先拿在人民手中”，放到劳改队去劳动。这时，顾准是劳改队里的一名老劳改犯，实际上带领大家劳动。我在没进劳改队以前就干过农活，也做过瓦工、电工，都还能够胜任。进了劳改队干的第一件活是在猪圈里起圈。这活我实在干不了。圈里垫的土黏性很大，和猪粪便混合以后，一铲子插下去就怎么也抬不起来了。这时顾准过来帮我。他说，你哪能干得了这个活，我来。以后，我就一直和他一起呆在这劳改队里。当时我38岁，他已经50多岁，而且已经开始痰里带血了，但劳动很认真，对我也非常照顾。那时我开始对“文化大革命”的真实目的产生怀疑，对中央文革小组的那几个人更是觉得他们心怀叵测。顾准总是说，这不只是那几个人的问题，对于中国为什么在20世纪都已过了一半的时候还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怪事，需要放到整个历史发展的背景下去观察。那时的劳动很重，也没有很多机会深谈。到了1971年春天，整个学部干校搬到了京广铁路边上的明港镇部队的空营房，就不再劳动了，集中搞“清队运动”。在“革命群众”开会搞运动的时候，我们这些人在临时搭起的席棚里听候传斗。不挨斗的时候，我们可以做自己的事。到了这一年的庐山

会议以后，说华北地区是陈伯达的反革命基地，从华北调来的军宣队变得六神无主，对我们这些“反革命分子”也就管得更松了。顾准对我说，要把中国的事情弄清楚，首先得学习世界文化史、经济史、政治史、宗教史，对整个人类历史作一番整理。然后回过头来分析中国的问题和探索人类的未来发展，就容易看得清楚。于是，我们决定利用这个有充分空闲时间的机会，从希腊史开始我们的历史漫游。吸收新知识要有工具，所以我在顾准的鼓励下决定恢复我在中学时学过、但学得不好的英语。当时在干校，除了“小红书”、《林副主席语录》和六本辅导《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经典著作的小册子，严禁看别的书，更不用说英文书了。但是我们利用顾准巧妙争得的读书“特权”，凡能找到的书，有什么看什么。原来事情是这样的：一次一位军宣队的参谋发现顾准正在看中英文对照的《圣经》，便批评他说，马克思早就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你怎么能看这样的书，何况还是英文的！过了几天，顾准拿着一本《“左派”幼稚病》辅导材料去问这位参谋：列宁说修正主义者“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长子权”，这是什么意思。这位参谋答不上来，顾准就把他狠狠地教训了一顿。顾准说：这个典故出自《圣经》，你不读《圣经》，就根本读不懂列宁。从此，军宣队有意识地避开顾准，以免再出现这样的尴尬局面。我也就沾了他的光，能读我们想读的中文书和英文书了。我们从希腊史入手，一面看，一面议论。除了希腊史，我们也看一点有关中国史的书。当时，已经传出关于“《十批》不是好文章”和“崇法批儒”的“最高指示”。为了自己来判断是非和探索“文革”领导人深层的思想，我们读了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以及《荀子》、《韩非子》等书。对于《十批判书》用批判法家学说来影射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做法，我并不十分喜欢。但是，对于当时的领导人怎么会对

法家推崇备至，更感到不可理解。宣扬施行专制统治可以不择手段的韩非自不必说，像被尊为圣人的荀况也公然主张“才行反时者杀无赦”，实在使人吃惊。从这里，我看到了所谓“儒表法里”的专制主义思想在中国政治思想中多么源远流长。这样，对于探索希腊城邦民主制的源头的兴趣也就更大。

过去苏联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书籍总是说，希腊、罗马的公民民主制度是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公社民主制直接继承过来的，似乎公有制度总是与民主制度相联系的，共产主义社会不外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复归，但是，这种说法与历史事实明显不符。事实上，在原始社会与古代民主政体中间隔着王政时代和寡头专制。既然希腊城邦民主制不是从原始公社直接演化来的，它是从哪产生的呢？为了求解，我们反复讨论，进行“思想试验”来证实或证否有关这个问题的各种假说。后来我从希腊的小亚细亚殖民地的民主制的形成先于本土的事实，以及这些殖民地的社会结构与英国的北美殖民地很有类似之处得到启发，提出了这样一种假说：当初小亚细亚殖民地的希腊人多半是为逃债，或者被放逐，而到那里去的。他们的原有的等级从属关系的羁绊已经被切断了。面对着强大的异族势力，他们只能以独立平等的成员的身份组成共同体。城邦民主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展起来的政治制度。然后，母邦再把殖民地的这种制度移植过去。顾准很欣赏这种解释。我当时没有考虑到，古代地中海地区的航海贸易和市场制度，也为城邦民主制提供了经济基础。我们还用当时初步形成的一些思想来分析时事，议论诸如重印《天演论》的用意是什么、评法反儒的实质在哪里之类的问题。顾准后来对别人说，与吴敬琏聊天是一种享受，也许就是指这一段时期我们之间的讨论说的。我自己也是这样。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参与这种能够启发人的思想的自由讨论了。这种机会居然在被打成“反革命”的情况下得到，

真是一种奇缘。

邢：他后来给陈敏之的信也是说的这些。

吴：1972年整个学部从明港回到北京，我们这些“反革命”都被禁止随便出学部大院的大门。我没有理它，迳自回家了，也没有人来抓我。顾准无家可归，只能住在学部大院里。从那以后，我们见面就比较少了。只能一两个月见一次面，交流一下各自的见闻和学习情况。我们都在继续自己的“漫游”：顾准拖着痰中带血的病体天天跑北京图书馆收集资料，回来挑灯夜战，加紧把在干校酝酿成熟的关于希腊城邦制度的著作写出来；我则正在通读吉朋的《罗马帝国的衰亡》，并把我对西方经济和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延伸到中世纪。同时，我们也关注西方世界的经济学的发展。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时期，经济研究所图书馆在馆长宗井滔的主持下，继续订阅国外期刊杂志，所以我们能够看到《美国经济评论》一类西方学术刊物。我在顾准的帮助下，翻译过乔·罗宾逊夫人的《经济学的第二次危机》；他也翻译过《乔·罗宾逊经济学论文集》。这时学部的军事管制已经松懈下来，顾准也交了不少新朋友。其中最要好的是经济研究所已故的张纯音女士。张纯音是上海人，父亲是老一代心理学家张耀翔。她并不关心政治，但是为人正直，对“左”的那一套很看不惯。她的丈夫是电力部门的一位资深工程师。她们全家都和顾准很谈得来，在生活上也给予他很多照顾。此外，顾准同经济研究所的赵人伟、周叔莲、林青松、张曙光也有不少的交流。

到了1974年10月，他的肺疾愈发加重，痰中的血点愈来愈多。那天我陪他到“反帝医院”（协和）看痰液培养的结果。大夫在看了检验报告后认为有问题，但顾准是戴着帽子的“右派”，不敢收他住院，就把他放在急诊室外的走廊里。顾准的老战友骆耕漠听到这个消息十分着急，不顾自己带着“叛徒”

帽子，拄着拐棍去求新四军时的战友，当时在卫生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的杨纯。杨纯派了一位秘书去打招呼，才把顾准收下住院。

因为大夫在查房时用英语说明顾准的病情，他便清楚地知道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在这以后，他把我叫到医院去，非常冷静地告诉我，他将不久于人世，而且过不了多久就会因为气管堵塞说不出话来，所以要趁还能说话时作一次长谈，以后就不用再来了。他说，我认为中国的“神武景气”是一定会到来的，但是什么时候不知道，所以我送你四个字：“待机守时”，还是要继续我们的研究工作。总有一天要发生变化。那时，要能拿出东西来报效国家。

邢：他所说的研究是指希腊问题还是经济学？

吴：都不完全是。他不管是研究希腊还是研究西方其他国家，目的都是要从与中国的比较中得出对中国有用的大结论来。我曾对他说，你的著作不应该叫希腊城邦研究，而应该叫东西文化异同论。在当时，这种研究肯定会看作“崇洋媚外”，大逆不道。我问他，你不怕人家发现你的意图？他笑了笑说，可惜他们（指“四人帮”及其爪牙）没有那么聪明。他认为振兴中国的机会是会到来的。为了抓住这样的机会，中国人需要有自己的理论思维。而这种思维决不能凭空得来，必须为此付出艰辛的努力。

顾准同孙冶方不只是生死之交，而且心心相印。他们不仅在气质、品德和人生追求上非常相像，而且社会观点也十分接近。只不过孙冶方从青年时代起在苏联读书，常常不自觉地流露出计划经济的影响。所以在那次最后的谈话中，顾准谈到孙冶方时说，现在别人说他是“苏修特务”，我深知孙冶方的为人，他决不会当汉奸！所以只要不被折磨死，他总有一天会出来，只可惜我见不到他了。你见到他，一定要代我致意。

邢：后来的情况呢？

吴：后来不出顾准所料，他很快就因为癌肿堵住了气管而说不出话来。入院才一个多月，已告病危。也许是预感到自己行将离开人世，有一天，顾准让人带话给我，说白天有亲朋好友陪伴，晚上来陪他的人是经济所领导派来的，与其中有的人单独共处，使自己感到很不愉快，希望我能去陪他。当天下午我去医院，这时的顾准已经处在临危状态，癌肿几乎把气管完全堵死，他只靠用全部力气从高压氧气瓶中抽进的一点氧气维持着一缕如丝的生命。他的兄弟陈敏之等为他梳洗安顿以后离去，我独自坐在他的床前，握着他的手，希望他能够入睡。大约到了 11 点钟，他挣扎着用完全听不见的声音和手势，示意我打开行军床休息。我刚刚迷糊过去，就被前来抢救的医生和护士的脚步声所惊醒。在他故去以后，我首先打电话通知的，是陈敏之和顾准的妹妹陈枫。后来，我们和一位年轻的护士一起送顾准去太平间。在推车去太平间的路上，顾准临终的一幕始终浮现在我的面前。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亲眼目睹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寂灭消逝。而这次眼看着消逝的，竟然是这样一个嫉恶如仇却又充满爱心，才华横溢、光彩照人的生命，不能不使人黯然神伤。

编后记

□丁东

已故思想家顾准的文集出版之后，引起了中国知识界的高度重视。对顾准的生平和思想的研究，将不是一个短暂的文化热点，而将成为社会人文研究领域里长期存在的一门显学。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尽可能多地整理和出版顾准的遗著，就成为一项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工作。本书就是这项工作中的一部分。

顾准生前有写日记的习惯。由于严酷的生存环境，一些日记已经失散了，或者销毁了。目前发现的顾准日记只有三本。一本是顾准1959年10月至1960年1月下放河南商城监督劳动时的日记，是顾准所在单位经济研究所在他去世后整理档案时发现的，原件现在由顾准的次子高粱保存；一本是顾准1969年10月至1971年9月下放河南息县学部五七干校的日记，还有一本是顾准1972年10月13日到

1974年10月15日在北京读书和生活的简单记录。日记到此戛然中止，从此顾准卧床不起，直到1974年12月3日凌晨与世长辞。这两本日记，是陈敏之当时整理顾准遗物时发现的，现保存在陈敏之处。为了叙述的方便，编者分别将这三本日记命名为“商城日记”、“息县日记”和“北京日记”。

这三本日记，虽然只是顾准生命长河中三个片断的记录，但对于研究顾准思想的发展，却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它从多方面提供了顾准思想形成的政治背景、文化背景和生活背景。作为经济专家的顾准本来是不可多得的领导人才，在五十年代初他已经显示了卓越的才干。当时某大区领导人就有“我们这里没有一个比得上顾准”的说法。然而，由于他的卓越能力，更由于他的独立见解，他无可避免地陷入了接二连三的灾难之中。他有志于学术研究，然而能够坐在书桌前阅读、思考、笔耕的生活，在他一生中只有短短的几段，加在一起也不足十年。他这三本日记，都是正常生活被迫中止的年代的忠实记录。最后一本，记录了他生命最后两年的读书生活，使我们能够从中了解《希腊城邦制度》和《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这两部杰作产生的文化背景。在“商城日记”和“息县日记”中，大量记录的是饥饿的威胁、疾病的折磨、失去亲人的悲痛；是被迫检查交待，是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是没有读书、写作的时间和条件的苦恼。然而，就是在物质匮乏和精神折磨的双重压力之下，他经常关注的仍然是民族的命运、人类的前途。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从工业，到农业；从物价，到财政；从经济，到政治；从内政，到外交；从国内问题，到国际问题，他都有着执著的思考和独立的见解。他是多么热切地期盼中国尽快结束无休止的政治运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让古老的中华民族雄飞于世界，他是多么热切地希望能够在祖国的振兴中，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然而，严酷的环境，不

但剥夺了顾准发挥治国之才的机会，而且屡次剥夺了他作为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

有一种看法，假设顾准能够拥有从容的学院生活，将能取得更大的学术成就，留给后人更多的将是学术遗产，而不是人格遗产。从容的书斋生活，固然是顾准生前的渴望，甚至在大部分时间里是奢望；然而，我不得不反问，仅仅在当代中国的学院里或者书斋里，能够产生作为卓越的思想家的顾准吗？独立的人格、早年的追求、革命的体验、从政的经历、渊博的学识、坎坷的遭遇和炼狱的苦难，实际上共同构成了顾准思想产生、形成的背景和条件。这种书斋假设，本身就是一种书生之见。我们反对人为地制造苦难。但思想使人受难，受难使人思想，又是一个实在无法回避的事实。

自然，顾准也不是圣人。他在生活中，也有彷徨的时候；他的思想，也有历史的局限和时代的烙印。编者的想法之一，就是如实地展示顾准的真实面貌。

顾准的手稿，还存有他在病中给六弟陈敏之的最后一封信和“北京日记”中提到的译稿《基督教》，此书一并收入。

为了便于读者了解顾准更多的情况，本书收入了陈敏之先生的五篇文章：《顾准生平和学术思想》、《我所知道的顾准与“三反”》、《顾准的最后十年》、《送别——在顾准身边的最后一个月》、《一位不该遗忘的女性——怀念汪璧》。其中特别应当指出的是，《送别》一文写于1975年3月顾准刚刚去世不久，作为顾准最亲近的兄弟，陈敏之当时就充分地认同顾准的追求和探索。这篇完全不同于当时流行的价值观的文章，本身已经具有一种历史文献价值。本书收入的徐方（即张纯音的女儿咪咪）给病中的顾准的信，也是如此。

在编辑过程中，王元化先生建议，选入顾准的大女儿顾淑林1984年读了父亲遗稿之后写的一篇感想。顾淑林女士现居

荷兰，题目《迟到的理解——读〈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是编者所拟。这就使本书的内容更加充实。顾准的女儿对父亲的理解，也是后代对思想先驱者的理解。我们民族的进步，固然需要先驱者的思想之光去探路，更多的人则是在对先驱者从不理解到理解的过程中，告别盲从，走向清醒；告别幼稚，走向成熟。

王元化先生读了邢小群对顾准生前好友吴敬琏的采访录后，建议对经济学界前辈、顾准的患难之交骆耕漠先生也进行一次采访。在暴力宣嚣、人性沦丧的年代，骆老和经济所其他朋友，能够对顾准相濡以沫，雪中送炭，实在是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的动人篇章。

在本书编辑出版过程中，还得到过许多人的关心、支持和帮助。他们之中有：李慎之、吴敬琏、郑惠、郑海天、程乃欣、张楠、黄德志、魏光奇、徐庆全、周实、俞景华、刘延民、李建惠等，在此一并表示感谢。